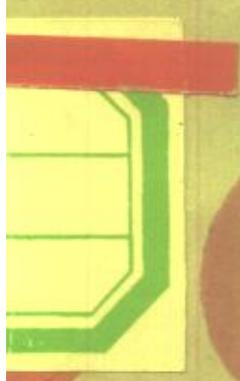


被背叛了的革命

列夫·托洛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被背叛了的革命

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

列夫·托洛茨基著

柴金如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Leon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
Translated by Max Eastman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inc., N. Y. 1937

被背叛了的革命

列夫·托洛茨基著
柴金如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資料室編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 定价(七)0.95元

出版者說明

本书是托洛茨基一九三六年写的。一九三九年中国的托派分子曾据英文本譯成中文，以《苏联的現狀及其前途》为名出版。現在这个譯本是根据美国紐約道布萊德、多兰公司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英文本重新翻譯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在布尔什維克党和斯大林的领导下，經過对反对派分子的激烈斗争，到三十年代中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不但各国进步人士，即使某些資产階級分子，也为这些成就所惊異。苏維埃国家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这一切同时也都說明反对派分子的进一步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就打算用这样一本全面誣蔑苏联內政、外交、經濟、政治各方面的书来挽回自己的影响。托洛茨基在这里尽量貶低苏联当时取得的成就，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把一切罪过都推在斯大林和布尔什維克党的身上，认为十月革命已經“被背叛了”，苏联的党和国家已經蜕化，除非再經過一次“革命”便无法加以挽救——这就是托洛茨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托洛茨基在本书中提出一些理論观点，都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例如：

托洛茨基反对在建設社会主义时期加强无产階級专政。他說，“无产階級在剝夺資本家的时候，实际上已經进入把自己作为一个階級来消灭的时期”。如果剝削階級已被消灭，国家已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那么就必須“扔掉国家这件紧身衣”，因此“加强专政是毫无意义的事”。他說他不能想像，“被剝夺了权力和財產而梦想資本主义复辟的一些人还能同‘小投机商’和‘誹謗者’一道

来推翻无阶级的社会”。

托洛茨基硬說“一国社会主义論”并非列宁的理論，它的主要理論根据——資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規律，并不是列宁发现的，也不是資本主义独有的，而是人类历史的普遍規律。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上世紀就知道有这种規律，而德国的机会主义分子福尔馬尔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指出过。认为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是妄图建立孤独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为地割断苏联同世界經濟的联系，这将导致資本主义复辟，而不是建成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在本书中繼續發揮他的所謂“不断革命論”。他认为“誰战胜誰这个历史性问题，是不能在国家境界以內决定的，国内的成功和失敗只不过是為这个问题在世界舞台上的解决准备或多或少的有利条件”，而“如果世界无产阶级处于消极状态，那么，苏联內部的社会矛盾不仅有可能而且必然会导致一种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因此，托洛茨基仍旧把苏联的前途寄希望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以为这将喚醒苏維埃群众的“独立精神”而起来斗争。

对于苏联的經濟政策，托洛茨基特別攻击农业集体化，认为“集体化的真正可能性……决定于工业供給大規模农业以必需的机器的能力”，而当时苏联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而迅速集体化便具有“經濟冒进性质”。他說由于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結果，已在农村中培养出一批“资产阶级集体农庄”，拖拉机手等都成了“农民貴族”。

在党的組織原則問題上，托洛茨基极力鼓吹党内派別自由，說什么“关于布尔什維主义不容許搞派別活动的說法，是墮落时期的神話”。认为党不應該禁止派別活动，否則就是把国家政治制度用于党内，結果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成了“党内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托洛茨基在这里提出的各种观点，无非是他在二十年代的爭論中以及过去說过的种种調調的翻版，但是在这里表达得比較集中，也更加露骨。

序 言

本书的目的

资产阶级世界起初假装不注意苏维埃制度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即不注意实验已经表明社会主义方法可以实行的证明。博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俄国工业发展的空前速度，不是依然常常试图保持一种深思熟虑的沉默，就是只限于说是由于极端“剥削农民”才取得的结果。他们正在失去一个难得的解释机会，为什么像中国、日本或印度的农民遭到那样残酷的剥削，而工业发展速度却从来没有接近苏联的工业发展速度。

然而，事实毕竟胜过一切。所有的文明国家的书店现在都摆满了关于苏联的书籍。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本来就少见。在盲目的反动仇恨驱使之下编写的书籍正在迅速地减少。关于苏联的最新著作，有相当一部分的笔调即使不是兴高采烈的，至少也是赞许的。这种亲苏著作的大大增加，作为新兴国家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的一种标志来看，只能表示欢迎。另外，把苏联理想化总比把法西斯意大利理想化好得多。然而，读者要想在这些著作当中找到对十月革命的土地上的真实情况的科学估计，那是徒劳无益的。

这些“苏联友人”的著作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肤浅的报刊文章，或多或少地有一点“左”倾的报道构成这类文章和书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一类虽然写得比较冠冕堂皇，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抒情诗式的和和平主义的“共产主义”作品。第三类是经济方案主义，带有旧德国讲坛社会主义的精神。路易斯·费希尔^①和

^① 路易斯·费希尔(Louis Fischer, 1896—)，美国记者，一九二二年后长期担任《民族》杂志驻欧记者。著有《世界事务中的苏维埃人》、《苏联旅行记》、《甘地与斯大林》等。——中译者注

杜兰提^①是相当著名的第一类代表。已故的巴比塞和罗曼罗兰代表“人道主义”朋友这一类。这两个人在倒向斯大林以前，前者写过一本基督傳，后者写过一本甘地傳，这并不是偶然的。最后，保守迂腐的社会主义的最有权威性的代表人物是不知疲倦的費边社夫妇比阿特里斯·韦伯和悉尼·韦伯。

使这三类各有不同的人联合起来的是，在既成事实面前叩头，偏爱使人安心的論断。起来反叛本国的资本主义，这是这些作家所不干的。因此，他們比較願意信賴一种已經进入低潮的外国革命。十月革命以前，以及十月革命以后若干年，这些人当中沒有一人，甚至他們的精神祖先也沒有一人，想到如何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实现这样一个問題。这一点使他們容易承认苏联所实现的就是社会主义。这种情况不仅使他們成为跟上时代的进步人士，甚至还使他們得到某种內心的稳定。同时，这一点并不使他們承担什么义务。这种深思熟虑的、乐观的和毫无損害的著作把所有不愉快的事都看作明日黄花，对于讀者的神經有一种鎮靜的作用，因此可以找到一个現成的市場。这样，不知不觉之中正在产生一个国际学派，这个学派可以称之为**文明资产阶级的布尔什維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說，**激进派旅行家的社会主义**。

我們不打算同这个学派的著作进行爭論，因为这些著作沒有认真地提出值得爭論的理由。这个学派实际上剛剛提出問題就认为問題已經解决了。本书的目的是要正确地估計目前的情况，以便更好地了解未来的情况。我們所要談到的过去，只限于有助于了解未来的部分。我們这本书是帶有批判性的。崇拜既成事实的人是不能准备未来的。

苏联的經濟文化发展进程已經經歷了好几个阶段，可是还一点也沒有达到內部平衡的状态。如果你們記得，社会主义的任务

① 杜兰提(Walter Duranty, 1884—)，美国記者和作家，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五年任駐莫斯科記者。著有《鸚鵡》、《克里姆林宮和人民》、《苏联》等。——中譯者注

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团结一致和一切需要得到妥善的满足为基础的无阶级的社会，那末，从这个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苏联还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固然，苏维埃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矛盾很不相同，但是这些矛盾还是很尖锐的。它们的表现是物质上文化上的不平等、政府的压制、政治上的各种派别以及派别斗争。警察的压制可以缓和和改变政治斗争，但是不能消灭政治斗争。被压制的思想在每个阶段都对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有时对它有帮助，有时对它是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苏联的发展，便一分钟也不能忽略全国正在进行的一种虽然遭到压制却是情绪激昂的政治斗争所遵奉的那些思想和口号。在这里，历史同活生生的政治直接地交织在一起了。

谨小慎微的“左倾”实利主义者喜欢对我们说，批评苏联必须极端慎重，否则就会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就我们来说，我们远不认为苏维埃国家是那样容易动摇的一种结构。苏联的敌人对苏联的了解远比它的真正朋友各国工人清楚得多。在那些帝国主义政府的参谋本部，对于苏联的成就和失败都有精确的估计，并且不仅仅是依靠公开的报道。不幸，敌人可以利用工人国家的弱点，却从来没有利用对那些他们认为有利的倾向所进行的批评。大多数官方“友人”敌视批评，实际上并不是掩盖他们对苏联脆弱所抱的恐惧，而是掩盖他们对自己给予苏联的同情的脆弱所抱的恐惧。我们对于所有这一类的恐惧和警告都将漠然视之。决定问题的是事实，而不是幻想。我们打算让人看的是真面目而不是假面具。

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日

附记：本书写成并且送交出版社以后，莫斯科宣布了开庭审讯“恐怖”阴谋案件。自然，审讯的情况不能在本书中加以估计。然而，本书对于这次审讯“恐怖”案件的历史必然性的陈述，对于这个神秘案件的故意神秘化的事先揭露，却因而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一九三六年九月

目 录

序言 本书的目的	3
第一章 取得了什么成就	1
一、工业增长的主要指数	1
二、对这些成就的不偏不倚的估计	3
三、按人口计算的生产	8
第二章 经济增长和领导的左右摇摆	13
一、“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对富农的方针	13
二、大转变：“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和“全盘集体化”	21
第三章 社会主义和国家	31
一、过渡性制度	31
二、纲领和现实	34
三、工人国家的双重性质	36
四、“普遍化的匮乏”和宪兵	39
五、“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专政的加强”	42
第四章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	46
一、货币和计划	46
二、“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	49
三、卢布的复兴	53
四、斯达汉诺夫运动	55
第五章 苏维埃的热月	61
一、为什么斯大林取得了胜利	61
二、布尔什维克党的蜕化	67
三、热月的社会根源	75
第六章 不平等和社会矛盾的发展	83
一、匮乏、奢华和投机	83

二、无产阶级的分化	89
三、集体农村的社会矛盾	93
四、统治阶层的社会面貌	98
第七章 家庭、青年和文化	104
一、家庭中的热月	104
二、反对青年的斗争	114
三、民族和文化	123
第八章 外交政策和军队	135
一、从“世界革命”到“维持现状”	135
二、国际联盟和共产国际	140
三、红军及其学说	149
四、废除民兵和恢复军官军衔	157
五、战争中的苏联	164
第九章 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	171
一、国家资本主义?	179
二、官僚是不是构成一个统治阶级?	181
三、关于还没有为历史所决定的苏联的性质问题	184
第十章 新宪法反映出来的苏联	188
一、“各尽所能”地工作和个人所有权	188
二、苏维埃和民主	190
三、民主和党	194
第十一章 苏联到何处去?	200
一、作为一种危机制度的波拿巴主义	200
二、官僚同“阶级敌人”的斗争	204
三、新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208
附录 “一国社会主义”	213
苏联的“友人”	220

第一章 取得了什么成就

一、工业增长的主要指数

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落后的俄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消灭君主政体和农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隶制等民主任务。然而，在农民群众带头之下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在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之后就停止前进。资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是直接地密切地连接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并不是偶然的。最近几十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资本主义衰退的条件下，落后国家是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一些老中心所已经达到的那种水平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由于自己已经进入死胡同，便挡住了那些正在逐步文明化的国家前进的道路。俄国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并不是因为它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落后国家的**联合发展法则**。以前的沙皇帝国，尽管作为“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列宁语）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甚至到现在，即在革命以后十九年，也还是面对着“赶上并超过”——因此首先是**赶上**——欧洲和美国的任务。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解决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早已解决了的那些技术和生产率的问题。

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旧统治阶级被推翻以后，从野蛮转变为有文化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而只不过是彻底地摆出来。同时，由于革命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才得以运用新的和远为有效得多的工业方法。只是由于一种计划性的领导，国家才得以在一段相当短的时期内把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所破坏

的东西恢复起来，并创建巨大的新企业，增加新的产品品种和建立新的工业部门。

布尔什维克党曾经指望得到国际革命的迅速援助，由于这种革命发展得特别缓慢，使苏联遭到了莫大的困难，但也因而显示了苏联内在的力量和资源。然而，要想正确地估价所取得的结果——它的光辉成就以及不足之处——只能用一种国际的尺度来衡量。本书将从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明这种进程，而不是堆积大量统计图表。虽然如此，为了便于进一步讨论，还是有必要以某些重要的数字作为出发点。

在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停滞和衰退状态的情况下，苏联工业化的巨大规模无可辩驳地表现在下列总指数上。德国的工业生产，只是由于疯狂的备战，目前才正在恢复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英国由于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最近六年来的生产才提高了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约百分之二十五；法国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首位的是日本，它狂热地武装自己，掠夺邻国。日本的生产差不多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但是连这样例外的指数，在苏联的发展动力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苏联的生产在同一时期增长了约两倍半，也就是百分之二百五十。重工业生产在过去十年（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五年）中增长了九倍以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年），基本建设投资达五十四亿卢布；一九三六年，指标是三百二十亿卢布。

如果卢布作为衡量的单位还不稳定，那末我们就撇开用货币估计的办法，而用另外一种绝无问题的单位。一九一三年十二月，顿河流域生产了二百二十七万五千吨煤；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生产了七百一十二万五千吨。在过去三年当中，煤的产量增加了一倍。钢和轧钢的产量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半。石油、煤和铁的产量比战前数字增加了两倍到两倍半。一九二〇年第一个电气化计划制定以后，全国有十个区电力站，电力总产量是二十五万三千瓩。到一

九三五年，这种电力站已达九十五个，总电量是四百三十四万五千瓩。一九二五年，苏联在电力生产方面居第十一位；到一九三五年，已仅次于德国和美国。在煤的生产方面，苏联已从第十位升为第四位。鋼从第六位升为第三位。在拖拉机的生产方面，居世界第一位。糖的生产情况也是这样。

工业的巨大成就，农业的大有希望的开端，旧工业城市的急剧发展和新工业城市的兴建，工人人数的迅速增长，文化水平和文化需要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毋庸置疑的成果，而旧世界的預言家們曾指望十月革命成为人类文明的坟墓。我們同资产阶級經濟学家已經再没有什么可以爭吵的了。社会主义已經表明，它有权取得胜利，不是在《資本論》的书頁上，而是在包括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业舞台上——不是在辯证法的語言中，而是在鋼、水泥和电力的語言中。即使苏联由于內部的困难、外部的打击及其领导的錯誤而崩潰——我們断然希望不要发生这种情况——这个不可摧毀的事实，即一个落后国家只是由于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就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也仍然还是未来的实际景象。

这一点也結束了我們同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者的爭吵。我們能把改良主义者的老鼠般的大惊小怪同被革命引导到新生活中的人民所完成的巨大工作相提并論嗎？如果一九一八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运用工人們所交給他們的政权来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去拯救資本主义，那末，很容易看到，一个包括中东欧和相当一部分亚洲的社会主义集团，在俄国經驗的基础上，今天将会拥有怎样不可征服的經濟力量。世界各国人民将不得不用新的战争和革命来償付改良主义的历史罪行。

二、对这些成就的不偏不倚的估計

苏联工业的富有生气的系数是空前的。但是这些系数还远不

是决定性的。苏联正在从一个低得可怕的水平上逐步提高，而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从非常高的水平上滑下来。决定当前力量对比的，并不是增长率，而是两个阵营表现在物质积累、技术、文化、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整个力量的对比。当我们从这种统计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对苏联极其不利。

列宁所表述的问题——誰战胜誰？——是一个以苏联和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为一方同以国际资本和苏联内部敌对力量为另一方之间的力量对比的问题。苏联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使它得以加强自己，前进，武装自己，必要时则可以撤退和等待——一句话，能够坚持下去。但是，从本质上看，誰战胜誰这个问题——不仅是作为一个军事问题，而且还要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面对着苏联的。军事干涉是一种危险。随着资本主义大軍而来的廉价貨物的干預，将是一种更要大得多的危险。无产阶级在一个西方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会立即从根本上改变力量的对比。但是，只要苏联还是处于孤立状态，或者更坏些，只要欧洲无产阶级还遭受着挫折，还继续退縮，那末，苏联结构的实力归根到底还是要以劳动生产率来衡量。而在市場經濟之下，劳动生产率表现在生产成本和价格上。国内价格和世界市場价格之间的差别，就是衡量这种力量对比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苏联统计学家甚至連接近这个问题都遭到禁止。原因是，尽管资本主义处于停滞和腐朽的条件下，但是在技术、組織以及劳动熟练程度方面，它还是远远走在前面的。

苏联农业的傳統的落后情况，是人所共知的。农业没有一个部門取得的进展能够有一点点同工业上的进展相比。例如，一九三五年底莫洛托夫就曾抱怨說，“在糖萝卜收获量方面，我們还落在资本主义国家后面。一九三四年，我們每公頃^①的收获量是八

① 一公頃約等于两畝半。——英譯者注

十二噸^①；一九三五年，烏克蘭特大丰收，收穫量是一百三十一噸。而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國的收穫量是二百五十噸，法國每公頃的收穫量在三百噸以上。”莫洛托夫的抱怨可以擴大到農業的每個部門——谷物以及紡織原料，特別是畜牧業。農作物的適當輪種，選種，施肥，拖拉機，康拜因，良種畜牧場——所有這些在社會化的農業中都在準備一次真正巨大的革命。但是，恰恰是在這個最保守的領域，革命需要時間。同時，雖然已經集體化，問題卻依然是如何達到資本主義西方那種較高的水平——儘管西方還受到小農制的限制。

工業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鬥爭是從兩方面進行的，一方面是採用先進技術，另一方面是更好地利用勞動力。最現代化的大工廠之所以能夠在短短幾年中建立起來，一方面是由於西方有高度水平的資本主義技術，另一方面是由於國內實行着執行計劃經濟的制度。在工業這個領域，外國的成就正在起着同化作用。蘇聯的工業也像紅軍的裝備一樣，是以一種勉強的速度的發展的，這個事實擁有巨大的潛在的好處。蘇聯的工業同英國和法國不一樣，它並沒有不得不使用舊式的工具慢慢地發展。蘇聯的軍隊也沒有註定使用老式的裝備。但是，就是這種狂熱的發展，也有其消極的一面。工業的不同部門之間沒有聯繫；人落後於技術；領導不勝任自己的任務。所有這些表現為，生產成本極高，而產品質量低劣。

石油工業的領導寫道，“我們的工廠擁有同美國工廠一樣的裝備。但是，鑽孔的組織工作是落後的；工人不夠熟練。”據他說，數不清的損失是由於“疏忽大意，不熟練，沒有技術監督。”莫洛托夫抱怨說，“我們在建築工業的組織工作方面是極其落後的……絕大部分都是以前式的可惡的方法使用工具和機械。”諸如此類的表白在蘇聯報刊上俯拾皆是。新技術仍然遠遠不能取得其資本主義祖國所取得的成就。

① 一噸，英制等於一百一十二磅，美制等於一百磅。——中譯者注

重工业所取得的大規模成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工业才能建立起来。但是，现代工业的衡量标准是生产精密机械，而这一点既需要技术，也需要一般文化。在这个领域，苏联还落后很多。

毫无疑问，军事工业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陆军和海军是最有势力的服务对象，也是最难侍候的主顾。可是国防部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伏罗希洛夫——在一系列的公开演说中却喋喋不休地抱怨：“你们为我们红军制造的产品质量，我们并不总是完全满意的。”这些慎重的字眼所暗示的不安情绪，是不难感觉到的。

重工业的领导在一个官方报告中说，机器制造业的产品“必须质量优良，不幸，情况并不是这样”。他还说，“我们的机器是昂贵的。”像往常一样，这位报告人没有同世界生产比较，提出确切的比较材料。

拖拉机是苏联工业的骄傲。但是拖拉机的有效使用率是很低的。在上一个工业年度里，有百分之八十一的拖拉机需要大修理。不仅如此，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在耕作季节最紧张的时候都出了毛病。根据某些计算，只有每公顷收获二十到二十二吨谷物，机器拖拉机站才够开支。而目前，平均收获量还不到上述数字的一半，国家只好付出几十亿来弥补亏空。

汽车运输方面的情况还要糟。在美国，一辆载货汽车一年要行车六万到八万公里，有时甚至十万公里；在苏联，只有两万公里——也就是只等于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每一百部机器当中，只有五十五部在使用；其余都在修理或者在等候修理。修理费用比所有新生产的机器的成本多一倍。难怪国家会计部门报告说，“汽车运输只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根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说法，随着铁路运载能力的增加而来的是“数不清的损坏和损耗”。根本原因还是一样：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劳动技术水平太低。保持转辙机变换无误的斗争正在变成一

种英勇的业绩，获奖的女转辙手在克里姆林宫把这种业绩报告给最高的权力集团。水上运输最近几年虽然有了进展，但是仍然远远落后于铁路所取得的进展。报纸上每隔一个时期总是出现关于交通方面的消息，什么“可恶的船运情况”，“船只修理质量极低”，等等。

轻工业的情况比重工业甚至还要坏些。苏联的工业可以表述为这样一条独特的法则：越是接近群众消费的商品，通常总是越糟。在纺织工业中，根据《真理报》的说法，“次品所占的比重之大是可耻的，选择的余地很少，低级的东西占主要地位。”报刊上每隔一个时期就出现一些抱怨的词句，嫌广泛消费的日用品的质量低劣，例如：“铁器笨拙”；“家具难看，随便拼凑，马虎了事”；“找不到中意的钉子”；“社会的食品供应制度根本不能令人满意”。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

只用数量指数来说明工业的进步，而不考虑质量如何，差不多就像只用高度来描述一个人的身体，而不管其胸围如何。不仅如此，要想正确地判断苏联工业的动力，除了质量上需要检查以外，还必须牢记这一事实：某些部门的迅速发展是用另外一些部门的落后换来的。为了建立巨大的汽车厂而付出的代价是，公路缺少和保养很差。“我们的道路太糟了。在我们最重要的公路上——从莫斯科到雅罗斯拉夫里^①——汽车一个小时只能行驶十公里（六哩）。”（《消息报》）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说得很明白，国家还停留在“原始的没有道路的传统状态”。

城市经济也处于类似的状态。新工业城市在很短的时间内兴建起来；与此同时，几十个旧城市却在逐步失去其极盛时期。首府和工业中心正在成长和整顿修饰；豪华的剧院和俱乐部正在全国各个部分迅速地建立起来；但是缺乏住宅的情况达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住房通常还是没人关心。“我们建造的房子质量很差，花

^① 雅罗斯拉夫里(Yaroslavl)，在莫斯科东北约二百哩。——中译者注

費却很大。我們的房子使用得破爛不堪，却不加以修繕。我們很少修理，或者修理得很差。”（《消息報》）

蘇聯的整個經濟就是由這種不平衡狀態組成的。在一定的限度以內，這種不平衡狀態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蘇聯經濟過去和現在都有必要從最重要的部門開始發展。可是某些部門的落后大大地減少了其他部門的效能。一種理想的計劃管理，所要保證的不是個別部門達到最大限度的速度，而是整個經濟最適當地發生效能；從這個立場出發，統計出來的增長率在初期是比較低的，但是整個經濟，特別是消費者，將會得到好處。歸根結蒂，總的工業動力也會得到好處。

在官方統計數字中，汽車的生產和修理都算在工業生產總數中。從經濟效率這個立腳點出發，這一部分應當減去，而不是加進去。這一點適用於工業的許多其他部門。由於上述原因，用盧布計算的全部估價只有相對的價值。一個盧布究竟是什麼，這一點不能肯定。藏在一個盧布背後的是什麼——是一架機器的製造，還是一架機器的過早損壞——這一點也並不總是肯定的。如果根據“穩定的”盧布估價，大工業的總生產比戰前水平增加了五倍，那末，石油、煤和鐵以噸計算的實際產量增加了兩倍到兩倍半。這些指數之間之所以有這樣大的差別，根本原因在於蘇聯工業建立了一系列沙俄時代所沒有的新部門，不過還有一個較次要的原因，那就是在處理統計數字時有其傾向性。大家知道，每個官僚機構都有一種粉飾事實的固有需要。

三、按人口計算的生產

蘇聯的平均個人勞動生產率还是很低的。在最好的五金鑄造廠，根據其廠長的說法，每個工人的鋼鐵產量等於美國鑄造廠平均產量的三分之一。如果把兩國的數字作一比較，也許會得出一個一比五的比例，或者還要糟些。在這種情況下，說鼓風爐在蘇

联比在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得“更好”，并没有什么意义。技术的作用在于节省人力，另外没有别的作用。在木材和建筑业中，情况甚至比五金业还要差些。在美国的采石区，每个工人一年可采五万吨，在苏联只有五百吨，也就是只有十分之一的样子。这样显著的差别，不仅是由于缺少熟练工人，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作组织得不完善。官僚竭尽全力推动工人，但还是不能适当地使用劳动力。农业的情况当然比工业更要差些。劳动生产率低，国民收入就低，结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必然也低。

官僚们断言苏联的工业生产量在一九三六年将居欧洲第一位——就其本身来说，这种进步是巨大的！——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不仅没有考虑物品的质量和生产成本，而且没有考虑人口的多少。然而，一个国家总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从消费者分配的产品数量上——至少是大略的数字——才能明确地看出来。让我们算一下这种简单的数学。

铁路运输对于经济、文化和军事目的的重要性，用不着阐述。苏联的铁路有八万三千公里，而德国是五万八千公里，法国是六万三千公里，美国是四十一万七千公里。这种情况意味着，德国每一万人有八点九公里铁路，法国是十五点二公里，美国是三十三点一公里，而苏联是五公里。因此，根据铁路的指数来看，苏联在文明世界中还是居于最低的地位之一。商船在过去五年中增加了两倍，现在差不多同丹麦和西班牙的商船相等。除了这些事实以外，我们还必须看到，铺石公路的数字依然非常之低。苏联生产的汽车，每一千个居民只有零点六辆。英国大约八辆（一九三四年），法国大约四点五辆，美国是二十三辆（而一九二八年是三十六点五辆）。同时，除了在铁路、水路和汽车运输方面极其落后以外，苏联的马的相对数字（大约每十个或十一个公民有一匹马）也没有超过法国或美国；另一方面，这种牲畜的质量，苏联也远远落在法国和美国的后面。

重工业方面，虽然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但其相对指数也还是

不怎么好。一九三五年苏联的煤产量，每个人大约只有零点七吨；英国将近五吨；美国将近三吨（而一九一三年是五点四吨）；德国大约两吨。钢的产量：苏联每个人大约有六十七公斤〔一公斤差不多等于二又五分之一磅〕，美国大约二百五十公斤，等等。在生铁和轧铁方面，大致上也是同样的比例。一九三五年苏联每个人生产的电力是一百五十三瓩时，英国是四百四十三瓩时（一九三四年），法国是三百六十三瓩时，德国是四百七十二瓩时。

轻工业方面，按人口计算的指数，一般说来还要低些。一九三五年的毛织品产量，每个人还不到半米〔一米等于三十九点三七吋〕，也就是还不到美国或英国的百分之十到十二点五。毛料只够拥有特权的苏联公民穿用。群众穿用的印花布，大约为每人生产了十六米，但是还忙于应付冬季服装的需要。苏联的鞋类生产，目前大约每人半双，德国是一双以上，法国是一双半，美国大约三双。所有这些都是撇开质量指数而言的，质量指数比较起来还要低些。我们可以姑且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几双鞋的人，其百分比比苏联大得多。但是不幸，在赤脚者所占的百分比中，苏联仍然是最高的一个。

在食品生产方面，差不多也是同样的对比关系占优势，有一部分甚至还要坏些。尽管近年来俄国确实取得了进展，但是蜜饯、腊肠、乳酪——更不用说点心和糖果了——还是完全不够基本居民群众的需要。甚至在乳制品方面，情况也不妙。在法国和美国，差不多每五个人有一头牛，德国是每六个人一头牛，苏联是每八个人一头牛。但是从产奶量来说，苏联的两头牛必须大约当作一头牛来计算。只有在谷类作物的生产方面，特别是黑麦，还有在马铃薯的生产方面，按人口计算，苏联才大大超过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但是，把黑麦面包和马铃薯当作主食——这是贫穷的典型象征。

纸张的消费量是文化方面的主要指数之一。一九三五年苏联生产的纸张，每个人不到四公斤，美国超过三十四公斤（而一九二

八年是四十八公斤), 德国是四十七公斤。美国每个居民每年消費十二支鉛笔, 苏联只消費四支, 而这四支的质量还很糟, 其效率赶不上一支好鉛笔, 頂多等于两支好鉛笔。报纸經常埋怨, 由于缺乏基本讀物、紙張和鉛笔, 学校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难怪要在十月革命十周年实现的扫盲任务还远远沒有完成。

从更为一般的考虑出发, 也可以同样地說明問題。苏联每个人的国民收入比西方少得多。由于基本建設投資大約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比任何其他国家要高得多——人民群众所消費的总数不能不比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低得多。

說实在的, 苏联並沒有有产階級——这种階級的奢侈生活是要用人民群众的消費量不足来平衡的。然而, 这种改变的意义并不像初看来那样偉大。資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弊病并不在于有产階級的奢侈生活——尽管这一点本身也許是可恶的——而在于这一事实, 即資产階級为了保障其过奢侈生活的权利, 保持了它的生产資料私有制, 这样就使經濟制度注定了陷于无政府和衰退的状态。在消費奢侈品方面, 資产階級当然拥有壟断权。但是在基本需要品方面, 劳苦群众是占压倒多数的消費者。不仅如此, 我們以后还会看到, 虽然苏联沒有原来意义上的有产階級,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特权很多、威風凜凜的居民阶层, 这个阶层在消費領域侵吞了很大一部分。因此, 如果苏联按人口計算的基本需要品产量低于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 那的确意味着, 苏联群众的生活水平还低于資本主义水平。

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責任, 当然在于俄国的暗淡而悲慘的过去——它的黑暗和貧穷的遺產。要想走上进步的道路, 除了推翻資本主义, 沒有別的道路。为了使自己坚信这一点, 只要看看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波兰就行了, 这些国家一度是沙皇帝国最先进的部分, 而現在在泥沼中几乎不能自拔了。苏維埃政权的不朽貢獻在于, 它同俄国千年的落后状态进行了緊張而成功的斗争。但是正确地估計已經取得的成就, 是进一步前进的首要条件。

蘇維埃政權正在經歷一個**準備**階段，它正在輸入、模仿和吸取西方的技術和文化成就。生產和消費的相對系數證明，這個準備階段還遠遠沒有結束。甚至在未必會有的資本主義繼續完全停滯的條件下，這個階段也還是必須經歷一整個歷史時期。這是我們在進一步考察以前需要的第一個極其重要的結論。

第二章 經濟增長和領導 的左右搖擺

一、“軍事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 和對富農的方針

蘇聯經濟的發展路線，遠遠不是一條連續均勻上升的曲綫。在新政權建立以來的頭十八年中，以尖銳的危機為標志，可以明確地分成幾個階段。扼要地概述一下同政府政策有關的蘇聯經濟史，對於判斷過去和展望未來來說，都是絕對必要的。

革命以後的頭三年是公開進行殘酷的國內戰爭時期。經濟生活完全服從前方的需要。文化生活陷於絕境，其特點是，在物質資料極端貧乏的情況下，創造性思想達到極為大膽的程度，特別是列寧個人的思想。這就是所謂“軍事共產主義”時期（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一年），這個時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社會主義”同樣富有英勇精神。在這幾年當中，蘇聯政府的經濟問題縮小為主要支持軍事工業，利用過去遺留下來的貧乏資源來達到軍事目的，同時使城市居民活下去。從本質上看，軍事共產主義就是在一個被圍困的堡壘內有系統地組織消費工作。

然而，必須承認，就最初的概念而言，軍事共產主義所追逐的目的是更為廣泛的。蘇聯政府希望並且致力於使這些組織方法直接發展為一種生產以及分配方面的計劃經濟制度。換句話說，蘇聯政府希望在不破壞制度的情況下，逐步地從“軍事共產主義”達到真正的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黨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通過的黨綱中說：“在分配方面，蘇維埃政府目前的任務是，堅決地繼續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全國範圍的產品分配，以代替貿易。”

✓ 但是，实际情况同“军事共产主义”纲领的矛盾越来越大。生产不断下降，这不仅是因为战争的破坏行动，而且还因为对生产者个人利益的刺激消失了。城市需要农村地区供给谷物和原料，而没有什么东西拿来交换，唯一可以交换的东西是五颜六色的纸，按照很久以前的概念，这种纸就叫做钱。于是农民把仓库设在地下。政府则派出武装工人队去收粮。农民削减了播种面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以后，工业生产最多只等于战前水平的五分之一。钢产量从四百二十万吨下降到十八万三千吨——也就是只等于过去的二十三分之一。谷物的总收获量从八亿零一百万担下降到一九二二年的五亿零三百万担。这是极端饥饿的一年。对外贸易在同一时期从二十九亿卢布猛降为三千万卢布。生产力的破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国家及其政府都走到深渊的边缘。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乌托邦式的希望，到后来受到了无情的批评，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不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当时一切打算都基于西方的革命早日取得胜利这样一种希望，那末，执政党在理论上所犯的错误就依然是不可理解的。不言而喻，在苏俄以后用粮食和原料偿付的条件下，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不仅会供给苏俄机器和工业品，而且还会提供成千上万的高度熟练工人、工程师以及组织者。毫无疑问，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取得胜利——这件事的独一无二的障碍是社会民主党人造成的——德国以及苏联的经济发展本来会以巨大的步伐向前迈进，而今天欧洲和全世界的命运也会无可比拟地更加幸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发生了那样令人愉快的事情，也还是有必要放弃那种由国家直接分配产品的办法，而采取商业的方法。

列宁说明了恢复市场的必要性，因为农村中存在着千百万个体农业经济，这种经济除了通过贸易以外，还不习惯于同外界发生经济关系。而贸易流通会在农民和国有化工业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是当时提出的一个名称。这种“联系”的理论公式是很

简单的：工业应当供给农村地区必需品，而价格应当使国家能够避免强迫征购农民的产品。

改善同农村地区的经济关系，无疑是新经济政策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然而，经过短期的试验以后，事实表明，工业尽管具有社会化的特点，但还是需要资本主义所制订的一套付款办法。计划经济不能仅仅依靠论据。供求法则在长时期内依然还是一种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不可缺少的调节者。

市场在新经济政策认可和有组织通货帮助之下开始发生作用。早在一九二三年，由于农村地区开始给予刺激，工业便开始恢复。不仅如此，工业的发展还很快达到了高速度。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即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的生产都增加了一倍，到一九二六年就已达到战前水平——也就是说，比一九二一年的规模增长了四倍多。与此同时，农业虽然是以一种要适中得多的速度发展，其收获量却在不断地增加。

从一九二三年这个关键性的年头开始，执政党内部在工农业关系上早就存在的意见分歧，开始趋于尖锐。在一个贮备消耗殆尽的国家里，只有向农民借谷物和原料，工业才能发展。然而，如果对产品的“强制性借贷”过重，就会损害对劳动的刺激。农民对未来的繁荣没有信心，因此如果城市派出购粮队，他们就会用停止播种来回答。另一方面，如果收购过少，又会使工业遭到停工的危险。农民得不到工业品，就会转向工业劳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把旧家庭手工业恢复起来。党内的意见分歧开始发生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究竟从农村拿多少东西来供给工业，才能加速工农业生产平衡时期的到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执，很快就由于农村本身的社会结构问题而复杂化。

一九二三年春天，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左翼反对派”——可是当时大家还不知道这个名称——代表，用情况不妙的图表形式表明了工农业价格的脱节。这种现象当时第一次被称为“剪刀差”，这个术语从此以后几乎成了国际通用的名词。如果工

业进一步落后——发言人說——而使这种剪刀差繼續扩大，那末城乡关系就会不可避免地破裂。

农民对于布尔什維克党所完成的民主与土地革命和对于它采取的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政策，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沒收地主的土地和使用国家的土地，每年給农民带来五亿多金卢布的好处。可是在国家产品的价格方面，农民付出的金額要大得多。只要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次被十月革命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的实际結果，是使农民遭到亿万卢布的損失，那末两个阶级的联盟就依然是一个疑問。

农民經濟从过去沿襲下来的分散性，由于十月革命的結果而更加加重。在革命以后的十年中，独立农户的数字从一千六百万增加到两千五百万，这自然加强了大部分农民經濟完全自給自足的性质。这就是农产品缺乏的原因之一。

小商品經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剝削者。随着农村恢复的程度，农民群众的分化也开始扩大。这种发展走上了过去走过的老路。富农^①的增长远远超过农业总的增长。在“面向农村”的口号下，政府的政策实际上是使自己轉向富农。加在貧农身上的农业稅比加在富裕农民身上的重得多，不仅如此，富裕农民还占有了国家的大部分貸款。余粮主要掌握在农村上层分子手中，这种余粮就被他們用来奴役貧农并进行投机，卖给城市资产阶级分子。当时的执政派理論家布哈林向农民提出了他的著名口号“发财吧！”从理論上說，这个口号的意思也許是富农逐步长入社会主义。实际上，它意味着牺牲压倒多数的利益而使少数人发财致富。

政府在自己政策的摆布下，面对着农村小资产阶级要求被迫步步后退。在一九二五年，雇佣劳动力和租用土地在农业中已經合法化。农民在一方面是小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工之間日益两极化。与此同时，国家由于缺少工业商品而被排挤出农村市場。

① 即雇佣劳动力的富裕农民。——英譯者注

在富农和小家庭手工业者之間，就好像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出現了經紀人。国家企业本身，为了获得原料，越来越不得不同私商打交道。資本主义日益高漲的潮流到处可以看到。有头脑的人清楚地看出，在所有制的形式方面进行的一次革命，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問題，而只不过是把这个問題提出来而已。

一九二五年正当对富农的方針全力执行的时候，斯大林开始准备把土地非国有化。有一位苏联記者在他的暗示下提出了一个問題：“把每个农民耕种的土地立契出租十年，是不是不符合农业的利益呢？”斯大林回答說：“符合，甚至可以出租四十年。”格魯吉亚的农业人民委員在斯大林本人的倡議下，提出了土地非国有化法案。其目的是使农民对于自己的未来具有信心。在一九二六年春天这项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預定要出售的粮食有百分之六十是掌握在百分之六的农民有产者手中！国家不仅缺乏用来出口的粮食，而且連国内需要的粮食也不够。由于出口达到无足輕重的地步，結果必須放棄进口工业品，同时尽可能削減进口的机器和原料。

这种依靠富裕农民的政策推迟了工业化并且打击了一般农民群众，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的两年內清楚地显示了它的政治后果。这种政策使城市和乡村的小資产階級大大地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使他們夺取了許多下层苏維埃，加强了官僚的力量和自信，加重了对工人的压力，并且完全压制了党和苏維埃的民主。富农的增长使統治集团的两个著名成員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不安，意味深长的是，这两个人当时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主要的无产階級中心的苏維埃主席。但是各省以及官僚都坚决站在斯大林一边。对富裕农民的方針取得了胜利。一九二六年，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及其追隨者参加了一九二三年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派”）。

当然，“原則上”統治集团就在当时也并没有放棄农业集体化。他們只不过是按照自己的願望把这项工作推迟几十年。后来担任

农业人民委員的雅柯夫列夫在一九二七年写道，虽然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通过集体化才能完成，但是“这项工作显然不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能够完成的，也许十年也完不成。”他还說，“集体农庄和公社……現在和将来很长一个时期，毫无疑问都只不过是个体农业經濟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小島。”实际上，那个时期只有百分之八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党内关于所謂“总路綫”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就已表面化，到一九二六年变得格外紧张激烈。左翼反对派在其涉及各种工业和經濟問題的长篇綱領中写道：“党应当抵制并粉碎一切要取消或損害土地国有化的倾向，因为土地国有化是无产階級专政的支柱之一。”在这个問題上，反对派取得了胜利；直接企图反对国有化的打算放棄了。但是，这个問題所牵涉到的当然还不止土地的所有制形式。

“为了抵制农村个体經濟^①的增长，我們必須更快地发展集体农庄。必須有系統地年年撥出一笔相当大的款項来帮助貧农組織集体农庄。合作社的整个工作应当圍繞着这个目的：把小生产轉变为集体化大生产。”但是这个广泛的集体化計劃，被頑固地认为在未来的几年以內仍然是空想。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它的任务是驅逐左翼反对派——筹备期間，以后担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莫洛托夫一再重申：“我們絕不要墜入(1)广大农民群众集体化的那种小农幻想。在目前的环境下，这种集体化不再可能。”从時間上看，当时是一九二七年底。統治集团在那个时候同自己未来的农民政策竟有那么大的距离！

在那几年(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統治联盟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二六年初倒向反对派)，一直跟“超工业化”和計劃领导的鼓吹者作斗争。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知道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于大胆

① Fermerstvo(俄文 Фермерство)。——英譯者注

的經濟倡議竟采取那样痛恨的不信任态度，一定会大吃一惊。在外来的推动之下，工业化的速度通过实验加快了，与此同时，所有的核算却粗暴地取消了，总的开支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二三年反对派提出执行五年计划的要求时，遭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嘲笑，这个阶级所怕的是“跃进到不可知的世界”。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斯大林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还说，试图建立第聶伯水电站，对我们来说，就像农民不买牛而买了一个留声机一样。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概括了整个纲领。值得指出的是，在那几年当中，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报刊以及追随其后的社会民主党报刊，都以同情的口气重复官方的说法：“左翼反对派”所主张的是工业浪漫主义。

在党内讨论不休的时候，农民对于缺少工业品的回答是越来越顽固的怠工。他们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也不增加播种面积。右翼（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在那个时期是决定调子的，他们要求在农村为资本主义倾向开辟更广阔的场所，具体作法是提高粮食价格，甚至不惜降低工业发展速度。在这种政策下，唯一可能的出路是，进口工业品，出口农业品原料。但是这样做就会意味着，不是在农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而是在富农和世界资本主义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了。使十月革命达到这样的目的是不值得的。

在一九二六年的党代表会议上，反对派代表作出的回答是：“加速工业化，特别是用增加富农捐税的办法，就会生产大批物品并降低市价，而这是对工人和对大多数农民都有好处的……面向农村并不意味着背对工业，而是意味着工业向农村。因为国家的‘面’如果不包括工业，对农村就没有用处。”

斯大林在答复中斥责了反对派的“臆测的计划”。工业绝不要“向前猛冲，以免脱离农业和不管我国的积累速度”。党的决议继续重复这些消极适应上层富裕农民的词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为了最后粉碎“超工业化者”而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警告是：“国家资金过多地用于大工程是危险的”。统治派当时仍

然不願看到任何其他危險。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經濟年度，工業主要靠革命前的機器和農業靠舊工具的所謂恢復時期宣告結束。要想進一步前進，必須大規模地進行獨立的工業建設。領導工作不可能再沒有計劃地摸索着進行了。

關於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假想的可能性，反對派早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期間就已作過分析。他們的總結論是，從資產階級手中承襲下來的設備消耗完以後，蘇維埃工業在社會主義積累的基礎上有可能取得在資本主義下完全不可能達到的發展速度。我們對發展速度所作的審慎估計大約在百分之十五至十八之間，統治派的領導人們對此公然加以嘲笑，認為是一種不可知的未來的幻想音樂。這一點就是當時反“托洛茨基主義”鬥爭的本質。

最後到一九二七年才起草完畢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正式草案，充滿了小家氣派。按照計劃，工業生產的增長速度從百分之九逐年下降到百分之四。在整個五年期間，每個人的消費只計劃增加百分之十二！在這個初次起草的計劃中，貫穿着令人難以置信的膽小思想，這一點清楚地表現在這個事實上，即五年末的國家預算計劃，總共只占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六，而無意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沙俄，其預算倒占了百分之十八！也許還有一點也值得提一下，幾年以後，起草這個計劃的工程師和經濟學家都被當作按照外國的指揮行事的有意識的破壞分子受到審訊，並受到法律的制裁。這些被告者如果有膽量的話，本來是可以這樣回答的：他們的計劃工作完全符合當時政治局的“總路線”，並且是在政治局的命令下制訂的。

不同傾向的鬥爭，現在轉為用數學來表示了。反對派的綱領說，“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際，提出這樣一個成效極小和十分悲觀的計劃，這一點意味着，實際上是在反對社會主義。”一年以後，政治局採納了一個新的五年計劃，生產的每年平均增長率達百分之九。然而，實際發展情況顯示了一種難以改變的趨勢，即接近“超

工业化者”所估計的系数。又过了一年，政府的政策作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时国家計劃委员会起草了第三个五年計劃，其增长率很接近一九二五年反对派所預測的数字，比可能預期的还要接近。

正如我們在这里看到的，苏联經濟政策的真正历史同官方的說法是很不相同的。不幸，像韦伯夫妇这样忠实的調查者一点也沒有注意到这种情况。

二、大轉变：“五年計劃四年完成” 和“全盘集体化”

在个体农民事业面前犹疑不决，对巨大的計劃沒有信心，維持最低的速度，忽視国际問題——所有这些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国社会主义”这一理論的本质。这个理論是无产階級在德国失敗以后，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一次提出的。不要急于工业化，不要同农民爭吵，不要指望世界革命，特別是，保护党的官僚的权力，使它不要受到批評！农民的分化被指責为反对派的捏造。上面提到的雅柯夫列夫解散了中央統計局，因为这个机构所进行的統計，使富农所占的地位超过了当局认为滿意的程度。另一方面，领导人鎮靜地表示，物品缺乏的情况已經过去了，“目前的經濟发展是一种平稳的速度”，将来收购粮食将更加“公正”，等等。力量加强的富农把中农拉过去，使城市陷于粮食封鎖状态。到一九二八年一月，工人階級的面前出現了日益逼近的饥荒阴影。历史也会开恶意的玩笑。就在那一个月，当富农正扼住革命的喉嚨时，左翼反对派的代表被投入牢獄或者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各地去，罪名是他們在富农的幽灵面前“惊慌失措”。

政府企图把事情說成这样，粮食封鎖是富农（他們是从哪里来的呢？）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明目張胆的敌对态度引起的——也就是說，是普通政治动机引起的。但是，富农很少倾向于那种“唯心主义”。如果他們藏匿粮食，那是因為他們从买卖当中无利可图。

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們才把广大的农民阶层置于他們的影响之下。对富农的破坏行动只采取镇压的办法，显然还不够。必須做的是改变政策。然而，即使做到这一点，搖摆不定也已浪費了不少時間。

当时还是政府首脑的李可夫，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宣布：“发展个体农庄是……党的主要任务。”斯大林支持这种說法，他說：“有些人认为个体农庄的作用已經消失，因而我們不应当支持这种农庄……这些人同我們党的路綫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过了不到一年，党的路綫已經同这一段話毫无共同之处。“全盘集体化”的曙光开始出现在地平綫上。

新方針正像以前一样，是抱着实验的态度提出的，同时是通过政府集团内部的隐蔽斗争提出的。左派的綱領在一年以前就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右派和中派在共同对付反对派的情况下团结起来，但是在清除反对派以后，右派和中派之间的未来斗争将会不可避免地加速到来。”后来的发展正是这样。正在分裂中的集团的领导人們，当然絕不会承认左派的这个預測像許多其他預測那样会成为事实。直到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斯大林才公开宣称：“說我們中央政治局內有右傾或对右傾的調和态度——已經到了拋棄这种謠言的时候了。”^① 两派当时都在試探党机构的意見。受到压制的党天天都生活在阴險的謠言和猜測当中。但是只不过在几个月的時間里，一向善于摆脱困境的官方报刊宣称，政府首脑李可夫“曾經推測苏維埃政权要遭到經濟困难”；共产国际的首脑布哈林是“資產階級—自由主义影响的导綫”；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主席托姆斯基只不过是一个可悲的工联主义者。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所有这三个人都是政治局的委員。由于同左翼反对派进行的整个斗争是从右派方面取得武器的，因此布哈林現在能够理直气壮地譴責斯大林，說他在反右派斗争中使用的武器，正是

^① 《論联共（布）党內的右傾危險》。《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中文版第203頁。
——中譯者注

他所指責的左翼反对派的一部分綱領。

无论如何，到底还是作了改变。“发财吧！”这个口号，连同富农毫无痛苦地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論，终于遭到了譴責，虽然時間晚了些，却格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工业化提上了日程。自我滿足的那种清淨无为的心情，被一种加快速度的恐慌情緒代替。列宁的差不多已被遺忘的口号“赶上并超过”，加上了新的字眼：“在尽可能最短的时期內”。作为最低綱領制訂的五年計劃，虽然原則上已經得到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同意，但是一个新的計劃代替了它，而这个新計劃的基本因素完全是从已被打垮的左翼反对派的綱領中借来的。第聶伯水电站，昨天还被比作留声机，今天成了注意的中心。

在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新成就以后，口号又进了一步：“五年計劃四年完成”。令人吃惊的經驗主义者現在认为什么事情都能做到了。正像历史上往往出現的情况一样，机会主义轉变成它的反面——冒險主义。从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八年，政治局已經决定了接受布哈林的“龟行速度”哲学，現在却毫不費力地一跃而为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企图把各个部分的暫时的成就改为定額，而忽視了不同工业部門之間互为条件的相互关系。計劃中的財政漏洞，用印制的紙票填塞。在第一个計劃期間，貨幣流通量从十七亿增加到五十五亿，到第二个五年計劃开始的时候，达到八十四亿卢布。官僚不仅摆脱了群众在政治上的監督——这种强制执行的工业化給群众增加了无法忍受的負擔——而且摆脱了金卢布^①所發揮的自动監督作用。通貨制度本来在开始执行新經濟政策的时候已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現在又連根动搖了。

然而，从农民方面出現了主要危險，这不仅是对实现計劃來說是如此，就是对政权本身來說也是如此。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全国居民吃惊地从《真理报》的一篇

① 一个金卢布理論上等于五美元。——英譯者注

社論中了解到，农村的面貌根本不是当局到那时为止所描繪的样子，相反，倒很像被开除的左翼反对派告訴他們的。报刊昨天还否认存在着富农，今天在上方的暗示下，发现不仅农村有富农，而且党内也有富农。事实表明，共产党的核心組織經常为富裕农民占据着，这些农民掌握着复杂的机器，雇佣雇工，对政府隐瞒几十万普特粮食，并且无情地譴責“托洛茨基主义”政策。报纸爭先恐后地刊载聳人听闻的报道，揭露居于地方書記职位的富农如何拒絕批准貧农和雇工入党。所有的老标准都顛倒过来；好和坏互相换了位置。

为了养活城市，必須馬上从富农那里得到每天的粮食。这一点只有用武力才能做到。沒收余粮——不仅是富农的，还包括中农的——用官方的話來說，叫做“非常措施”。这个名詞也許意味着，明天一切照旧。但是农民不相信这种好听的字眼，他們不相信是对的。粗暴地攫夺粮食，連富裕农民增加播种面积的积极性也給剝夺了。雇工和貧农沒有活干。农业又一次进入了死胡同，国家也随之进入死胡同。因此有必要不惜任何代价修改“总路綫”。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虽然还把个体經濟放在主要地位，但是已經开始強調必須更快地发展苏維埃农場和集体农庄。然而，由于对粮食的需要非常紧迫，向农村进行的軍事征討不能停止，那个促进个体經濟的計劃只好擱置起来。結果必須“滑到”集体化方面去。收购粮食的暫時“非常措施”，出乎意料地发展成为一个“消灭富农階級”的計劃。互相矛盾的命令一个接一个，比粮食配給的命令还要多，从这些命令可以看出，显然，在农民問題上，政府不仅沒有五年計劃，連五个月計劃也沒有。

新計劃是在粮食危机的刺激下制訂的。根据这个計劃，集体农庄到五年末大約要容納百分之二十的农户。如果考虑到，在前十年当中集体化在农村所占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一，那末，这个計劃太大就是显而易見的了。这个計劃到五年过了一半的时候，还远远落在后面。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斯大林放棄了猶豫不决的态

度，而宣布要消灭个体经济。他说，农民正在“整乡、整区甚至整个省”地加入集体农庄。雅柯夫列夫在两年前还说，合作社在许多年内只能是“农户大海中的一些岛屿”，现在作为农业人民委员，却接受了命令要“消灭富农阶级”，并且在“尽可能最早的日期”全盘集体化。在一九二九年，集体农庄所占的比例从百分之一点七增长到百分之三点九。一九三〇年增长到百分之二十三点六，一九三一年是百分之五十二点七，一九三二年是百分之六十一一点五。

现在，谁也不会愚蠢到再去重复自由主义分子的谰言，说什么集体化整个说来是在赤裸裸的武力下实现的。在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有一个时期举行了反对地主的起义，另一个时期向未开垦的地区输送了大批移民，还有一个时期则纷纷奔向形形色色的派别，这些派别答应用天上的乐园来补偿农民在地球上的那一小块地。现在，在没收大庄园和彻底分配土地以后，要把小块土地再联合成大片土地，成了农民、农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死存亡问题。

然而，只是这种一般的历史性考虑，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集体化的真正可能性，并不决定于农村陷入困境的深度，也不决定于政府的管理能力，而主要决定于现有的生产资源——也就是工业供给大规模农业以必需机器的能力。这种物质条件是缺少的。集体农庄建立时所拥有的装备，主要只适用于小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言过其实的迅速集体化便具有了一种经济冒险的性质。

由于事先没有料到自己的政策进行了这样急剧的转变，因此政府在新方针方面没有、也不可能进行甚至基本的政治准备。不仅农民群众，就连地方政权机关也不知道要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农民听到谣言，国家要攫夺他们的牲畜和财产，他们非常愤慨。而这种谣言同事实的距离并不远。实际上，官僚实现了他们以前讽刺左翼反对派的那句话：“掠夺农村”。对农民来说，集体化似乎基本上就是没收他的所有财物的一种形式。官僚机构不仅把马、牛、羊、猪集体化，而且把新生的小鸡也集体化了。正像一个外国观

察家所說的，官僚“把毡靴非富农化了，而这些毡靴都是从小孩子的脚上脫下来的”。結果，农民像患了流行病一样，紛紛廉价出售牲畜，或者为了得到肉和皮而把牲畜宰掉。

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一次莫斯科代表大会上，有一个中央委員安德烈耶夫描繪了一幅集体化的两面图景：一面是，他断言正在整个农村强有力地发展着的合作化运动，“現在将摧毁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另一面是，农民在加入合作社以前爭先恐后地出售自己的工具、牲畜甚至种籽，这种情况“所占的比例肯定日益具有威胁性”。不管这两种概括多么矛盾，二者对比之下却正确地表明，集体化的迅速实行乃是絕望的一种标志。上面提到的那位外国評論家写道，“全盘集体化使国民經济陷入一种几乎史无前例的毁灭境地，就像进行了三年战争一样。”

两千五百万单干农民的利己主义，昨天还是农业——虽然像农民使用的老馬一样，但还有些力量——的唯一推动力，現在官僚却在缺乏技术設備、农学知識和农民本身的支持的情况下，設法一劳永逸地由两千个集体农庄管理处加以控制。这种冒险做法的悲惨后果，不久就产生了，并且一直延續了若干年。粮食的总收获量，一九三〇年曾經增长到八亿三千五百万担，在以后的两年中下降到七亿担以下。减少的数量从本身来看似乎并不是灾难性的，但它意味着，正好丧失了城市所需要的那一部分粮食，如果让城市即使保持那种长期的饥饿定量的話。在技术作物方面，后果还要糟。在集体化前夕，糖的产量曾經达到差不多一亿零九百万普特^①，到全盘集体化的高潮时期，由于缺少糖萝卜，产量下降到四千八百万普特——也就是說，减少了一半。但是遭到破坏力最大的巨風的是动物的王国。馬匹的数目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五，即从一九二九年的三千四百六十万匹下降到一九三四年的一千五百六十万匹。牛的数目从三千零七十万只下降到一千九百五十万只，

① 一普特約等于三十六磅。——英譯者注

即减少了百分之四十。猪的数目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五；羊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六。人由于饥饿、寒冻、流行病以及镇压措施而死去的数目，不幸，没有像牲畜屠宰数统计得那么精确，不过也达几百万。造成这些牺牲的责任，并不在于集体化，而在于集体化时所使用的的一套盲目的、粗暴的和冒险性的方法。官僚机构一点预见性也没有。甚至企图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同农庄的福利结合起来的集体农庄章程，到悲惨的农村遭到这样无情的破坏以后才公布出来。

这种新方针之所以具有强制性，是由于必须设法在一定的程度上摆脱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政策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即使如此，集体化本来也还是能够、也应当拥有一种比较合理的速度和比较审重的形式。官僚既掌握着政权，也掌握着工业，本来可以把发展过程规划得不致把国家引向灾难的边缘。它本来可以、而且也应当采取比较符合农村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的速度。“左翼反对派”的流亡机关报在一九三〇年写道，“在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下，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在大约十年或十五年的时期内，可以得到彻底的改造并为集体化提供生产基础。但是在这个时期内，将会有不止一次的机会推翻苏维埃政权。”

这个警告并没有夸大其词。在全盘集体化的年代里，十月革命的领土上从来没有这样直接地充满了毁灭的气息。不满、不信任、苦难，逐步腐蚀着全国。通货的混乱，稳定的“传统的”自由市场价格的高涨，国家和农民之间从贸易关系过渡到粮食、肉类和牛奶征税，同大规模掠夺集体农庄财产以及大规模隐蔽这种掠夺行为进行的殊死斗争，为了反对富农的破坏行为（在“消灭”富农阶级以后）党所进行的纯粹军事性的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恢复粮食卡片和饥饿口粮，最后还有恢复护照制度——所有这些措施使整个国家重新充满了那种表面上早已结束的国内战争气氛。

对工厂进行的粮食和原料供应，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坏。无法忍受的劳动条件引起劳动力转移，装病不上工，工作粗心大意，

损坏机器，廢品的百分比高，以及总的來說质量低劣。一九三一年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了百分之十一点七。根据莫洛托夫附带提到的一点——所有苏联报刊都曾刊载——一九三二年的工业产量只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五，而不是原来年度计划所规定的百分之三十六。說实在的，在这以后不久全世界就听到，五年计划已經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內完成。但是这一点只不过意味着，官僚在捏造統計数字和輿論方面厚顏无耻，毫无顾忌。然而，这还不是主要問題。危險的不是五年计划的命运，而是政权的命运。

政权侥幸保存下来了。

但这是政权本身的优点，因为它在人民的土壤中已經深深地扎了根。同样重要的是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农村經濟混乱和內战頻仍的那些年代，苏联主要是在一个外国敌人的面前陷于瘫痪状态。农民的不滿情緒侵入了整个军队。不信任和犹疑不决挫敗了官僚机器和领导干部的士气。在这个时期，無論是从东方或者是从西方給予一次打击，都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幸运的是，在工商业陷于危机状态的最初几年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迷惑的观望心情。誰也不准备打仗；誰也不敢尝试一下。不仅如此，沒有一个敌对国家充分地認識到这种社会动乱的严重程度，这种动乱当时在官方歌頌“总路綫”的吼叫声中正在震撼苏維埃的国土。

* * *

我們的历史綱要虽然簡短，但它表明——我們希望它可以表明——工人国家的实际发展已經多么远地离开了逐步地不断地取得成就这样一幅美丽的图景。我們在下面将要探討过去的危机，得出一些可以說明未来的重要征候。但是除此以外，对于我們來說，似乎还有必要对苏維埃政府的經濟政策及其左右搖摆的情况进行一次历史性的回顾，以摧毀那种人工培养出来的个人拜物教。这种拜物教认为，要取得成就——不管真的还是假的——关键在于领导的特殊品质，而不在于革命所創造的那种财产社会化的

条件。

当然，新社会制度的客观优越性本身，也表现在领导人的方法上。但是，这种方法同样地也反映了国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同时还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具有局限性的条件，而当权的干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

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苏维埃领导人的政策无关紧要，那将是最严重的错误。世界上还没有别的政府，把整个国家的命运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到这样的程度。资本家个人的成败，当然不是全部，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时甚至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决定于个人的品质。作一些必要的改变，苏维埃政府在整个经济制度方面所占据的位置，也就是资本家在一个企业当中所占据的位置。国民经济的集中性，把国家政权改变为一种具有巨大重要意义的因素。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府的政策就不能用概括的结果来判断，也不能用纯粹的统计材料来判断，而必须看清醒的预见性和计划领导在取得这些成就方面起了什么具体作用。

政府方针的左右摇摆，不仅反映了情况的客观矛盾，而且反映了领导人在及时了解这些矛盾和采取措施防止这些矛盾方面能力不够。要把领导的错误表达得像簿记一样准确，是不容易的，但是从我们对于这种左右摇摆的历史所作的概括说明当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已经强加给苏维埃经济一种总开支极大的重担。

有一点当然还是不可理解的——至少以一种合理的态度对待历史的话——即一个思想最贫乏、犯错误最多的派别怎么会、为什么会反而占了上风，压倒了所有的其他集团，并且把一种毫无限制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我们的进一步分析也将为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我们还会看到，专制领导的官僚主义方法同经济和文化要求的矛盾，同苏联发展过程中由于新危机和动荡不安的产生而不可避免地要求采取的必需措施的矛盾，如何越来越尖锐。

然而，在探讨“社会主义”官僚的双重作用以前，我们必须回答

這個問題：以前取得的成就的真正結果是什麼？社會主義在蘇聯真正建成了嗎？或者更審慎地說就是：目前的經濟和文化成就可以成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保證——就像資產階級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其成就變得能夠成為防止農奴制度和封建制度復辟的保證那樣嗎？

第三章 社会主义和国家

一、过渡性制度

社会主义在苏联，是不是像官方当局所断言的那样，的确已经实现了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末，已经取得的成就是不是至少已经肯定了一点，即无论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如何，社会主义在苏联境内一定可以实现？上面对苏联经济主要指数所作的严格评价，应当成为我们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但是我们也还需要某些基本的论点作为参考。

马克思主义从技术发展是进步的基本泉源这一点出发，而在生产力的动力这一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纲领。如果你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星球会被某种宇宙灾难所毁灭，那末，你当然会拒绝共产主义前景以及其他许多事情。可是除了这种还有疑问的危险以外，没有任何科学根据为我们的技术、生产和文化的可能性事先规定一个框框。马克思主义对进步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顺便说一句，只是这一点，就使马克思主义毫不调和地反对宗教。

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应当是使人的经济力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即生产劳动不再是一种负担，因而不再需要任何刺激；同时，生活日用品的分配，在这种用品日益丰富的情况下，除了还需要由教育、习惯和社会舆论来加以监督以外，再也不需要任何其他监督——这一点目前在任何富裕家庭或者“还过得去”的寄宿舍都做不到。坦率地说，如果认为这样一种真正朴实的前景是“乌托邦”，那是相当愚蠢的。

资本主义为社会革命准备了条件和力量，即技术、科学和无产阶级。但是共产主义结构并不能立即接替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一点上，过去的物质和文化遗产整个说来是不够的。工人国家在其

初期还不能做到各尽“所能”——就是說，尽可能地 and 自願地發揮其能力——也不能不管做什么工作而一律“按需”分配。为了提高生产力，还必须依靠傳統的工資支付标准——就是說，按照个体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生活日用品。

馬克思把新社会的这个初期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以区别于高級阶段；在高級阶段，物质上的不平等以及匱乏的最后痕迹将一齐消失。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經常是以新社会的低級阶段和高級阶段来对比的。目前官方的苏联学說，“当然我們还没有**完成**共产主义，但是我們已經建成了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为了证明这一点，官方提出的論据是，在工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国家托拉斯，农业中是集体农庄，商业中是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乍看起来，这种情况完全符合馬克思想像的——因而也是假定的——方案。但是，正是对于馬克思主义者來說，如果不問劳动生产率处于什么水平而只考虑所有制的形式，那末，这个問題并没有真正解决。馬克思的意思是，归根結蒂，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从一开始就比最先进的資本主义經济发展水平要高些。从理論上說，这个概念是无可非議的，因为如果**就世界范围**來說，共产主义即使在其最初阶段也意味着，其发展水平要比資产階級社会高些。此外，馬克思还曾預期，法国人将开始社会革命，德国人将把这种革命繼續下去，而由英国人来完成它；至于俄国人，馬克思把他們排列在很靠后的位置上。但是，这个想像中的次序被事实推翻了。現在誰要是想把馬克思的普遍历史概念机械地运用到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苏联这个特殊的例子上，誰就会立即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

在資本主义鏈条上，俄国并不是最坚固的环节，而是最薄弱的环节。目前的苏联并不是超过了世界經济水平，而只不过是設法赶上資本主义国家。如果馬克思把在資本主义时期最先进的資本主义的生产力社会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那末，这个名称显然不适用于苏联，因为今天它在技术、文化

和生活中的美好事情方面仍旧比资本主义国家差得很多。因此，这样說比較真实，即目前拥有各种矛盾的苏联制度，不应称为社会主义制度，而应称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预备性的过渡性制度**。

在这方面，一点也沒有搬弄辞藻、咬文嚼字的意思。制度的力量和稳定性，归根結蒂，决定于相对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經濟如果拥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技术，其社会主义发展就会真正得到保证——姑且說，保证自动发展——不幸，对苏联經濟来說，这一点还根本談不上。

为苏联现状辯解的大多数庸俗的辯護士，倾向于提出类似这样的理由：即使承认目前的苏联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在現有的基础上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定迟早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因此，只有時間的因素是不肯定的。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尽管乍看起来这种論据似乎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却是极其肤淺的。在历史进程还成問題的时候，時間絕不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在政治上把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搞錯，比在文法上搞錯要危險得多。演变远远不是像庸俗的韦伯式演变主义者所想像的那样，在于逐步积累和不断“改进”現有的东西。演变包括从数量到质量的过渡，还包括危机、跃进和倒退。正是由于苏联还远远沒有达到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也就是說沒有建立生产和分配的平衡制度，因此苏联的发展不是和諧地进行的，而是在矛盾中进行的。經濟矛盾产生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有它自己的发展邏輯，它并不等待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我們剛剛看到，在富农的例子这一点是多么真实。富农并不願意演变地“长入”社会主义，出乎官僚及其思想家的意料的是，富农要求进行一次新的补充的革命。掌握着权力和财富的官僚本身，願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嗎？关于这一点，肯定可以提出疑問。无论如何，如果相信官僚在这个問題上所說的話，那是輕率的。在未来的三年、五年或十年当中，苏联社会的經濟矛盾和社会矛盾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目前不能最

后肯定地回答的一个问题。结局取决于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的斗争——不是在一国范围内，而是在国际范围内。因此，在每个新的阶段，对于实际存在的各种关系和趋势的联系及继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现在就要看看在国家这个问题上这种分析的重要性。

二、綱領和现实

列宁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剥夺了剥削者以后，它就会认为没有必要在社会之上保持一部官僚机器——首先是警察和常备军队。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夺取政权以前两个月写道，“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可以告诉你这一点，但是他们——机会主义者——忘记了补充：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需要建立一个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国家与革命》）^① 这一段评论当时是针对着俄国孟什维克、英国费边社之类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说的，现在却以加倍的力量打击了迷信官僚国家的苏维埃崇拜者，因为这个官僚国家没有一点“消亡”的意图。

社会需要官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即尖锐的矛盾要求得到“缓和”，“调节”，“整顿”（总要符合特权者即有产者的利益，同时总要对官僚本身有好处）。因此，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不管多么民主，总是加强了并完善了官僚机器。列宁写道，“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②

从一九一七年开始——即从夺取政权成为党的一个实际问题的时候起——列宁一直在思考消灭这个“寄生虫”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每一章中都重复和说明了这一点：无产阶级在推

① 参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390页。——中译者注

② 同上书，第395页。——中译者注

翻剝削階級以後，將打碎舊官僚機器而從職員和工人當中創立自己的機器。同時無產階級將採取措施來防止自己的機器轉入官僚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分析過的辦法：（一）不但實行選舉制度，而且隨時可以撤換，（二）薪金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三）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①你不要以為列寧所說的是十年當中的問題。不是，這是“我們應當而且必須在**完成無產階級革命方面開始**”採取的第一個步驟。

在奪取政權一年半以後，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包括關於軍隊的部分，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這種大膽的看法有了完整的說明。強有力的國家，但是沒有官吏；武裝的政權，但是沒有武士！軍事的和國家的官僚制度的建立並不是由於防禦任務，而是由於社會階級結構帶進了防禦組織。軍隊只不過是社會關係的一種縮影。當然，在工人國家像在其他國家一樣，防止外來危險的鬥爭，需要的是**一個專門軍事技術組織**，而不是一個特權的軍官階層。黨綱要求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常備軍。

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从一开始就不再是原來意義的那種“國家”——即一個使大多數人服從的特殊工具。物質力量以及武器都直接立刻轉入像蘇維埃這樣的工人組織手中。從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天起，國家作為一個官僚工具開始消亡。這就是黨綱發出的呼聲——而且到現在還沒有停止。奇怪的是，這種呼聲聽起來就像幽靈從陵墓中發出的聲音。

儘管你可以解釋目前蘇維埃國家的性質，但有一件事是確鑿無疑的：蘇維埃國家生存了二十年以後，不僅沒有消亡，而且沒有開始“消亡”。更糟的是，它已經發展成一個前所未聞的強制工具。官僚不僅沒有消失，讓位給群眾，而且已經變成一個支配群眾的毫無控制的力量。軍隊不僅沒有被武裝的人民代替，而且已經產生

① 《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68頁。——中譯者注

了拥有特权的軍官阶层，他們享有元帅的荣銜；而人民，即“专政的武装担負者”，現在在苏联却被禁止携带甚至非爆炸性的武器。無論怎么想入非非，也很难想像有什么比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想法描繪的工人国家的图案与現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實際国家之間的对照更为鮮明。列宁的著作还在繼續出版（說实在的，檢查官已經作了删节和歪曲），但是目前苏联的领导人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态方面的代表們，甚至沒有提出为什么綱領和现实之間存在着这样显著的差别。我們一定要設法替他們做这项工作。

三、工人国家的双重性质

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間的桥梁。因此，就其本质來說，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一种暫时的性质。实现专政的国家，有一項附带的但帶有根本性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准备本身的消灭。这个“附带的”任务所实现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国家在实现其根本使命方面究竟取得多么大的成就，这个根本使命就是：建設一个沒有阶级和在物质上沒有矛盾的社会。官僚和社会和諧的发展是彼此成反比例的。

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反杜林論辯中写道，“当从現代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統治和个人之生存斗争不再存在的时候，以及当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暴力行为都一起消灭了的时候——那时候，便无需乎压迫什么人和束縛什么人了，那时候，現在执行这个职能的国家政权也就失去其必要性了。”^① 实利主义者认为宪兵是一种永恒的体制。实际上，只是在人彻底控制自然以前，才是由宪兵控制人类的。由于国家将要消失，“阶级的統治”和“个人之生存斗争”也一定要消失。恩格斯把这两种情况联系起来，因为在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景方面，几十年的時間是无济

^① 參見《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294—295頁。——中譯者注

于事的。但是对于肩負着革命重担的那些世代的人來說，情况似乎有所不同。的确，資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产生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但是麻煩在于，生产資料的社会化还没有自动地消除“个人之生存斗争”。問題的核心就在这里！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美国那样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也不能立即滿足每个人的各种需要，因此它就会被迫鼓励每个人尽量增加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鼓励者**的职責自然就落在国家身上，結果它只好采取資本主义所制訂的工資支付办法，尽管作了各种各样的修改和减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写道，“**资产階級式的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在它經過长久的产育苦痛以后刚刚从資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經濟制度以及由此經濟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①

列宁在解釋这段值得注意的話的时候补充說，“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階級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階級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們遵守法規的机关，权利也就等于零。可是，〔下面还是引用列宁的話〕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內，不仅会保留资产階級的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階級的**资产階級国家**！”^②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結論被当前官方的理論家完全忽視了，但它对于了解——或者更确切点說，对于初步了解——苏維埃国家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負有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国家，只要被迫用强制的办法維持不平等——即少数人在物质上的特权，那末它就依然是一个“**资产階級**”国家，即使已經沒有**资产階級**。这些話既沒有褒的意思，也沒有貶的意思；这些話只不过是如实描繪事实。

资产階級的分配标准原是为了加速物质力量的增长，这种标

① 《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22頁。——中譯者注

②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58頁。——中譯者注

准应当为社会主义目的服务——但只是在最終的意义上是这样。国家直接并且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质：当它在生产資料方面維護社会财产的时候，它是社会主义的；当生活日用品是以資本主义价值尺度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情况下进行分配的时候，它是資產階級的。对于特点的这种矛盾的說法，可能使教条主义者和經院哲学家感到害怕；我們只能向他們表示吊慰。

工人国家的最后面貌，应当决定于国家的資產階級傾向和社会主义傾向之間不断变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傾向的胜利，事实上意味着宪兵的最后消灭——即国家溶化为自治社会。只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足够清楚地了解，苏联的官僚主义这个問題，無論就其本身來說，或者作为一种征候來說，具有多么无可估量的意义！

列宁运用他的全部智慧极其尖銳地表明了馬克思的概念。正是由于这一点，列宁揭示了未来困难——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困难——的来源，虽然他沒有把这种分析进行到底。“一个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国家”已为事实证明，同真正的苏維埃民主毫无共同之处。国家的双重职能不能不影响其結構。經驗显示了理論所不能清楚地預見到的情况。如果說为了維護社会化财产使之不致遭到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破坏，一个“武装工人的国家”完全够了的話，那末，在消費領域作出不平等的規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些财产遭到剝夺的人是不願意創造也不願意維護财产的。多数人不可能关怀少数人的特权。工人国家为了維護“資產階級法权”，被迫創造了一种“資產階級”型的工具——即那些旧的但穿上了新制服的宪兵。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初步了解了布尔什維克綱領和苏联现实之間的根本矛盾。如果国家沒有消亡，反而变得越来越专橫，如果工人階級的全权代表們官僚化而官僚們駕于新社会之上，那末，这并不是由于过去的心理殘余等次要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只要国家不能保证真正平等就会产生并支持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这样一种铁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結果。

官僚主义的倾向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遭到扼杀，这种倾向即使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也会到处表现出来。但是非常明显的是，从革命中产生的社会越是贫穷，这种“法权”的表现就会越加严酷越加赤裸，官僚主义所具有的形式就会越加粗暴，同时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就会越加危险。苏维埃国家不仅被阻止消亡，甚至被阻止摆脱官僚主义寄生虫，这并不像斯大林那种赤裸裸的警察理论所说的，是以前的统治阶级“残余”造成的，因为这些残余本身并没有力量。苏维埃国家所受到的阻止，是来自力量大得无可估计的一些因素，例如物质匮乏，文化落后，以及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最直接最密切关系到每个人的领域居于支配地位——即在保证个人生存的那些事情当中居于支配地位。

四、“普遍化的匮乏”和宪兵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两年以前，年轻的马克思写道，“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匮乏就会普遍化，而如果出现匮乏，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又要开始，而这就意味着，一切旧的欺诈行为必然复活。”马克思再没有把这种思想直接发展下去，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从没有预见到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也没有阐述这个思想，而这也并不是偶然的。他没有预见到苏维埃国家会这样长期陷于孤立状态。然而，上面的引语，虽然是马克思的一种抽象的说明，是从相反的方面得出的论断，却为了解苏维埃制度的全部具体困难和病态提供了一把不可缺少的理论钥匙。在贫困的历史性基础上——这种贫困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破坏而更加深重——“个人之生存斗争”不仅没有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消失，不仅没有在以后的年代里缓和下来，而且恰恰相反，有时还具有前所未闻的猛烈性质。我们有没有必要回忆一下国内某些地区曾经两度陷于吃人肉的境地呢？

沙皇俄国同西方隔离的程度，只有现在才能真正了解。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即内部没有混乱和外部没有灾难的情况下，苏联还需要再多有几个五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吸收最先诞生的一些资本主义文明国家花了好几个世纪时间才取得的经济和教育成就。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以前的问题——这就是当前苏联经济和文化工作的实质。

说实在的，在生产力方面，苏联即使现在也超过马克思时代最先进的国家。不过，首先，在两种制度的历史性敌对状态下，问题并不在于绝对的水平，而在于相对的水平；苏联经济面对的是希特勒、鲍尔温 and 罗斯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俾斯麦、巴麦斯顿^①或者亚伯拉罕·林肯的资本主义。其次，人类需要的范围已经随着世界技术的进步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马克思时代的人，对于汽车、无线电、电影和飞机一无所知。但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自由享受这些东西，那是不可想像的。

用马克思的名词来说，“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已经接近的那种水平开始的。然而，即将实施的苏联五年计划的真正纲领，却是“赶上欧洲和美国”。在苏联广阔无垠的土地上建立汽车路和柏油路交通网，比从美国把汽车厂搬来或者甚至比学会美国的技术，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物资。要使苏联的每个公民能够开汽车到他所愿意去的地方，并且在路上添油没有困难，究竟需要多少年呢？在野蛮社会中，骑马的人和步行的人构成两个阶级。汽车使社会分化的程度并不下于有鞍的马。只要甚至一辆中等的“福特牌”汽车，还是为少数特权者所有，那末，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一切关系和习惯就会保留下来。与此同时，不

① 巴麦斯顿 (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 1784—1865)，英国外交大臣 (一八三〇至一八四一年，一八四六至一八五二年)，首相 (一八五五至一八五八年，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五年)。原为保守党人，一八三〇年以后成为自由党人。任内曾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并曾镇压印度、波兰等国的民族起义。——中译者注

平等的維護者国家也会保留下来。

列宁虽然完全以馬克思的无产階級专政理論为基础，但是，我們已經說过，他在論述这个問題的主要著作（即《国家与革命》）中或者党綱中，並沒有从經濟落后和国家陷于孤立状态方面对于国家的性质得出一切必要的結論。党綱把官僚主义的复活解釋为由于群众不熟悉行政管理工作，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特殊困难，因此党綱只規定了一些政治措施来克服“官僚主义的腐化”，如所有的全权代表都可随时选举和罢免，取消物质上的特权，由群众进行积极的监督，等等。当时的想法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官僚就会从上司的地位轉变为單純的而且是临时的技术人員，而国家也就会逐漸在不知不觉之中消失。

这种想法显然过低地估計了眼前的困难，这是由于党綱完全以国际的前景为基础。“俄国的十月革命已經实现了无产階級专政……世界无产階級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經开始了。”这就是党綱的引言中写的話。起草綱領的人們不仅沒有为自己規定“一国社会主义”的目标——当时任何人的头脑里都沒有这种想法，特别是斯大林，更談不上——而且沒有接触到这样一个問題，即如果苏联被迫要在长达二十年的孤立处境下解决先进的資本主义早已解决的經濟和文化問題，那末，苏維埃国家将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战后的革命危机，並沒有导致社会主义在欧洲取得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拯救了資产階級。在列宁和他的同事看来似乎是短暫的一段“喘息时机”，已經延长成一整个历史时代。苏联的矛盾的社会結構及其国家的极端官僚主义性质，都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和“未能預見”的历史停頓所带来的直接結果，与此同时，这种历史停頓还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导向法西斯主义和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局面。

建立一个沒有官僚主义的国家的初次嘗試，首先遭到了这样的困难：群众对于自治不熟悉，缺少为社会主义而努力的熟练工人，等等；在遇到这些直接的困难以后，这种嘗試又很快地遇到其

他一些更加严重的困难。党綱要求，国家改为执行“核算和监督”的职能，同时逐漸縮小强制的职能，这种改变至少具有一种普遍滿足的相对条件。恰恰沒有这种必要的条件。西方沒有給予援助。当时的任务是順应那些特权集团，因为他們的存在对于国防、工业、技术以及科学來說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苏維埃的权力便受到压制，甚至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把十个人創造的东西拿来給一个人用的这种絕對不是“社会主义”的行动，在分配方面便形成并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专家阶层。

最近一个时期在經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沒有緩和和不平等关系，反而使不平等現象更加尖銳化了；与此同时，官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前是一种“腐化現象”，現在却变成一种行政制度了，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并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在試圖回答这个問題以前，讓我們听一听苏維埃官僚的权威领导人怎样估計他們自己的制度吧。

五、“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专政的加强”

近年来，有好几次宣布，說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經“完全胜利”——在談到“消灭富农階級”問題时采取了特別明确的口气。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日，《真理报》在闡述斯大林的一篇演說时說，“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国經濟当中資本主义因素的**最后殘余**将被消灭。”（重点是我們加的）从这种前景来看，国家在同一时期一定会消亡，因为資本主义的“最后殘余”被消灭以后，国家便沒有事可做了。布尔什維克党綱在这个問題上这样說，“苏維埃政权公开承认，只要社会划分为階級的情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整个国家权力沒有完全消失，每个国家就必不可免地具有階級性。”然而，有些不謹慎的莫斯科理論家，由于相信資本主义的“最后殘余”已被消灭而得出了国家消亡的結論，結果官僚便立即宣布了这种理論是“反革命的”。

官僚的理論錯誤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基本前提上呢？还是在結論上呢？两方面都有錯誤。最初宣布“完全胜利”的时候，左翼反对派作出的答复是：你們不可以把自己局限于各种关系的社会法律形式上，因为这些关系是不成熟的，是互相矛盾的，在农业方面还很不稳定，同时离开了基本标准：生产力水平。法律形式本身由于它所依据的高度技术水平而具有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内容。“法权永远不能高于經濟结构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文化水平。”（馬克思語）如果苏維埃的所有制形式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把最先进的美国技术成就运用到經濟生活的各个部門去——那就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初級阶段了。但是苏維埃的所有制形式，如果以低劳动生产率为基础，那就只能意味着一种过渡性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命运，历史还没有作出最后的估計。

我們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写道，“这不是怪事嗎？国家不能摆脱物品荒。每采取一个步骤都会发生供应停止的情况。孩子們沒有牛奶喝。但是官方的神諭却宣称：‘国家已經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玷污社会主义的名字更恶毒的嗎？”卡尔·拉狄克——现在是苏联統治集团的一位著名政論家^①——在德国自由派报纸《柏林日报》的一期苏联专号（一九三二年五月）上，对于上面的評論避而不答，而写了这样几句堪称不朽之作的話：“牛奶是乳牛的产物，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你們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同一个乳流成河的国家形象混为一談了，因此才不了解一个国家即使沒有相当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条件，也能在一个时期达到較高的发展水平。”这几句話是在可怕的饥荒正在全国猖獗的时候写的。

社会主义是一种使人类需要得到最大滿足的計划生产结构；否則它就不配称为社会主义。如果乳牛都社会化了，但是数量太少，或者产奶不够，那就会由于牛奶供应不足而在下列一些方面发

^① 一九三六年八月卡尔·拉狄克被捕，罪名是进行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恐怖阴谋活动。这句话是在这以前写的。——英譯者注

生冲突：城市和乡村之間，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之間，无产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間，整个劳苦群众和官僚之間。事实上，正是由于把乳牛社会化，才引起农民大批屠宰乳牛。由于匱乏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可以反过来引起“一切旧欺詐行为”的复活。从本质上說，这就是我們的答复。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通过一項決議，庄严地确认：国有化工业的成就，集体化的成就，资本主义分子的排除和富农阶级的消灭，所有这些成就表明，“苏联已經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和不可变更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全面加强。”共产国际的这个宣告，尽管語气明确，却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如果社会主义不是作为一种原則而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已經“最后和不可变更地”取得了胜利，那末，重新“加强”专政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事。反过來說，如果专政的加强是由于制度的真正需要而引起的，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还很遙远。不仅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就是任何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也都应当了解，有必要“加强”专政——即政府采取镇压措施——这一点不是证明取得了一种无阶级的和諧局面这样的胜利，而是证明新的社会对抗有了发展。所有这些說明了什么呢？那就是由于劳动生产率低而缺乏生活資料。

列宁曾經一度把社会主义的特点归納为一句話：“苏維埃政权加电气化”。这句話是有片面性的，这是为了当时的宣傳目的而說的；但是这句話至少是以资本主义电气化水平为最低出发点。目前苏联按人口計算的电力，只等于先进国家的三分之一。如果考虑到，苏維埃当时已經被一种脱离群众的政治机器所代替，那末，共产国际就只能这样宣布，即社会主义就是**官僚权力加上三分之一的资本主义电气化**。这样一个定义非常确切，但是对于社会主义來說，这个定义还很不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忠实于斯达汉諾夫工作者代表會議的實驗性目的的斯大林，在对斯达汉諾夫工作者发表的一篇演說中出其不意地宣称，“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

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斯大林在这里附带地否定了三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在同一个问题上作出的决议，同时也否定了他自己屡次的宣告，而用**未来**的时态谈论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社会主义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过资本主义的时候，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看到，不仅动词的时态常常改变，连社会标准也常常改变。要苏联公民紧紧跟上“总路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后，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在同罗易·霍华德谈话的时候，给苏维埃制度下了一个新的定义：“我们所创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可称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组织，这种组织虽然还没有完全建成，可是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故意含糊其词的定义中，矛盾之多几乎同这段文字一样多。社会组织被称之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但是，苏维埃是一种政权形式，而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这两个名称不仅不同，而且从我们的利益的观点来看，还是矛盾的。只要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就应该取消，就像一座楼房盖好以后，手脚架应该拆除一样。斯大林提出了一句校正的话：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成”。“没有完全”是什么意思呢？是百分之五没有完成呢？还是百分之七十五没有完成呢？关于这一点，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正像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指的是所有制的形式呢？还是技术呢？然而，定义含糊的地方正好表明，已经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那种明确得多的公式后退了。如果沿着同一条道路再向后退的话，那就会承认：每个社会组织的“根”是生产力，而苏维埃的根刚好不是茁壮到足以支持社会主义的茎干及其枝叶：人的福利。

第四章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

一、货币和计划

我们在分析国家的时候，已经试图考察了苏维埃制度。我们在分析货币的时候，也可以进行一次类似的考察。**国家和货币**这两个问题有若干共同点，因为二者归根到底都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中的问题：劳动生产率。国家的强制性，正如货币的强制性一样，也是阶级社会的遗产。阶级社会除了用偶像——宗教的或世俗的——形式便无法规定人与人的关系，而且首先是派定一切偶像当中最令人不安的用牙咬着大刀的偶像即国家来维护这种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和货币都将消失。因此在社会主义之下，这两种东西便应当开始逐步消亡。在国家转变为半国家状态的时候，在货币开始失去其魔力的时候，只有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才能谈得上社会主义的真正胜利。这一点将意味着，社会主义在摆脱资本主义的偶像以后，开始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更加明朗、自由和有价值的关系。像“废除”货币、“废除”工资或者“消灭”国家和家庭等这样具有无政府主义特点的要求，只不过是机械论思想的典型表现。货币是不能专横地予以“废除”的，国家和旧家庭也是不能专横地加以“消灭”的。这些东西必须让它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耗尽自己的力量，然后消逝。只有在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已经使我们双足动物对于多进行一分钟劳动不再采取吝啬态度、对于我们的配给量不再有可耻的担忧心理的时候，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对于金钱的崇拜才会遭到致命的打击。货币失去了使人幸福也使人遭到摧残的能力以后，就会变成纯粹记账用的收据，用来使统计工作者感到方便，达到计划的目的。在还很遥远的未来，也许就不需要这种收据了。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交给

我們的后代去解决,因为他們会比我們聪明得多。

生产資料和信貨的国有化,国内貿易的合作化或由国家經營,对外貿易的壟断,农业的集体化,以及对于遺產制訂的法律——所有这些都严格地限制个人积累貨幣,防止貨幣变成私人資本(在高利貸方面、商业方面和工业方面)。然而,貨幣的这些职能,虽然同剝削有联系,在无产階級革命初期却没有取消,反而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轉到国家手中,即轉到唯一的商人、信貨者和工业家手中。与此同时,貨幣的更为基本的职能,例如作为**价值的尺度、交換的手段和支付的媒介**,不仅保留下来,而且拥有的活动范围比在資本主义之下还要广闊。

政府的計劃已經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但同时也表明它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一个想像中的經濟計劃——特别是在一个拥有一亿七千万人口、城乡之間存在着深刻矛盾的落后国家中——并不是一种不变的福音,而是一种概括的假定,它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必须加以檢驗和修改。我們的确可以定出这样一条法則:行政的任务完成得越“准确”,經濟的領導就越糟。为了制訂和实施計劃,有两个杠杆是必需的:一个是政治杠杆,其形式为有关的群众真正参加領導,这一点如果没有苏維埃民主,那是不可想像的;另一个是財政杠杆,其形式为在唯一等价物的帮助下真正檢驗想像中的估計,这一点如果没有稳定的貨幣制度,那也是不可想像的。

貨幣在苏維埃經濟中的作用不仅沒有完成,而且正如我們已經說过的,它还有长期发展的前途。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过渡时期,整个說来,并不意味着削減貿易,恰恰相反,还会大大地扩大。一切工业部門都会改造自己并且发展下去。新的工业部門会繼續不断地产生,而所有的部門必然要規定彼此之間的关系,無論是数量上或者是质量上,都必须这样。自給自足的农民經濟的消灭,以及閉关自守的家庭生活的消失,意味着以前在农民院子里或者在私人住房里消耗掉的劳动力轉移到社会交換領域,实际上也就是轉移到貨幣流通的領域。所有的产品和勞務,这才在历史

上第一次开始彼此交換。

另一方面，如果計劃制度中不包括生产者和消費者的直接个人利益，即他們的自我利益，那末，要社会主义建設取得成就是不可想像的。而自我利益，只有在傳統的可靠而有伸縮性的工具即貨幣能為它服務的時候，才是有成果的。如果沒有一種準確的尺度在一切工業部門普遍運用——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一種穩定的貨幣單位，那末，要想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改进產品質量，是根本不會成功的。因此，很明顯，在過渡經濟中，也正像在資本主義之下一樣，唯一可靠的貨幣是以黃金為基礎。所有其他的貨幣只不過是代替品。固然蘇維埃國家的手中掌握着大批商品，同時還掌握着印制貨幣的機器。然而，這並沒有改變情況。政府在商品價格領域所進行的操縱，無論是對國內貿易或是就對外貿易來說，都根本沒有建立或者改換一種穩定的貨幣單位。蘇聯的貨幣制度，正像若干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取消了獨立的基础以後——即不再以黃金為基礎以後，就必然具有一種閉關自守的性質。對世界市場來說，盧布是不存在的。如果說蘇聯能夠比德國或者意大利更順利地經受得住這種貨幣制度的反面影響，那末，這只是部分地由於在對外貿易方面進行了壟斷。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國家的自然財富。只是由於這一點，蘇聯才沒有被自給自足的經濟扼死。然而，歷史任務並不僅僅在於避免扼死，而是要建立一種完全合理的強有力的經濟，它可以同世界市場上的最高成就媲美，它保證最大限度地節約時間，因而也保證文化呈現最繁榮的景象。

富有生氣的蘇聯經濟，正在經歷連續不斷的技术革命和大規模實驗，它比任何其他經濟更需要用一種穩定的價值尺度來繼續進行試驗。從理論上說，毫無疑問，如果蘇聯經濟擁有金盧布，那末，五年計劃的結果就會比現在的情況有利得多。當然，不能“無中生有”^①。但是，也絕不能把不得已的事裝成自願做的事，因為

① На нет и суда нет. ——英譯者注

那样做，在經濟方面就会造成更多的錯誤和損失。

二、“社会主义的”通貨膨脹

苏联通貨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經濟上有困难、有成功也有失敗的历史，而且是一部官僚主义思想左右搖摆的历史。

由于改行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卢布恢复了。这种恢复同“资产階級权利法規”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恢复起来是直接有联系的。只要对富裕农民的方針繼續执行下去，金卢布就是政府所关心的对象。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相反地，所有膨脹的水閘都开放了。通貨的总发行額，从一九二五年初的七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二八年初的十七亿卢布，这还是比較适中的数字，这个数字大約相当于大战前沙俄的紙币流通額——但是，当然沒有以前的准备金作为基础了。此后，通貨膨脹的曲綫年年上升，其高漲的数字順序如下：从二十亿到二十八亿，到四十三亿，到五十五亿，然后是八十四亿！最后的数字八十四亿卢布是在一九三三年初达到的。在这以后，来了一个重新考虑和退却的时期：从六十九亿到七十七亿，到七十九亿（一九三五年）。一九二四年按照官定汇兌价格，一个卢布等于十三个法郎，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个卢布已經下跌到只等于三个法郎——这就是說，还不到原来价值的四分之一，或者几乎等于法国法郎由于战争而贬值的程度。两种比价，老的和新的，都是以一定的情况为条件的；目前一个卢布按照世界价格所具有的购买力，还抵不上一个半法郎。虽然如此，贬值的程度表明，在一九三四年以前，苏联通貨的价值是以怎样一种令人头昏眼花的速度下跌着。

斯大林在全力推行他的經濟冒險主义的时候，曾經答应要把新經濟政策——即市場关系——“送到阴間去”。所有的报刊，就像一九一八年一样，都紛紛写道，“直接的社会主义分配”将最后代替商人的贩卖，这一点的表面征象就是实行粮食券。与此同时，通

貨膨脹遭到了堅決的拒絕，把它當作一種與蘇維埃制度不相容的現象。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說道，“蘇聯通貨價格的穩定性，主要是由這樣一點來保證的，即國家手里掌握着大量商品，以穩定的價格在市場上流通。”儘管這種謎樣的話既沒有進一步發揮，也沒有進一步說明（一部分的確因為如此），這一段話已經變成蘇聯貨幣理論的基本法則——或者更確切地說，已經變成這種理論所排斥的通貨膨脹的基本法則。此後，金盧布即被證明不是一種普遍適用的等價物，而只不過是“大”量商品的普遍陰影而已。這個陰影也像所有的陰影一樣，有權伸長自己，也有權縮短自己。如果說這種自我安慰的理論有任何意義的話，那末，也只能是這樣，即蘇聯的貨幣已經不再是貨幣；它已經不再是一種價值的尺度；“穩定的價格”是由國家政權規定的；金盧布只不過是計劃經濟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符號——即一種普遍使用的分配券。總之，社會主義已經“最終地不可變更地”勝利了。

軍事共產主義時期最空想的看法，就這樣在一種新的經濟基礎上恢復起來。這種經濟基礎固然提高了一些，但是從取消貨幣流通來說，還是很不夠的。當時統治集團全部抱着這種看法，即只要有計劃經濟，通貨膨脹就沒有什麼可怕。這就差不多等於說，如果手里有指南針，坐破船也沒危險。實際上，通貨膨脹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信貸膨脹，它帶來的結果是，虛假代替了真實，同時使計劃經濟從內部遭到腐蝕。

不用說，通貨膨脹意味着把可怕的捐稅加在勞苦群眾身上。至於社會主義在它的幫助下所得到的好處，那是很成疑問的。工業固然在繼續迅速發展，但是巨大建設的經濟效率，是從統計上計算的，而不是從經濟上計算的。官僚既然掌管着盧布——即給予不同的居民階層和經濟部門以各種各樣硬性規定的購買力——它就使自己失去了客觀衡量自己的成敗的必要工具。沒有正確的核算，而以“約定俗成的盧布”組合的辦法在紙面上加以掩飾，這樣實際上就引起個人利益的下降，生產率的降低，以及產品質量的進一

步下降。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这种坏现象达到日益具有威胁性的程度。一九三一年七月，斯大林提出了著名的“六条件”，这些条件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工业品的生产成本。这些条件（按照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付酬，生产成本核算，等等），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资产阶级权利法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已经提出来，到一九二三年初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又有了发展。只是到了一九三一年，在基本建设投资效率下降的影响下，斯大林才注意到这种法规。在以后的两年中，苏联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提到这些“条件”所具有的拯救力量。与此同时，由于通货膨胀还在继续，由此产生的各种症状自然都没有治好。对破坏分子和怠工分子虽然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但无济于事。

官僚一方面展开斗争反对“不分个人”和“平等化”，即反对无记名的“平均”劳动和类似的“平均”工资，人人一样；另一方面又把新经济政策，即用货币来表示一切物品（包括劳动力）的价值的政策，“送到阴间去”。现在看来，像这样的事简直是不可相信的。官僚们一只手恢复“资产阶级法规”，另一只手又去毁坏这种法规下唯一有用的东西。由于“关闭的分配办法”代替了商业，价格完全陷于混乱状态，结果个人劳动和个人工资之间的一切联系当然趋于消失，工人为个人利益而劳动的兴趣也就因而消失。

在经济核算、质量、生产成本以及生产率方面，最严格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这种情况并没有使领导人认识到，不应该说所有的经济困难是人们恶意地没有实现斯大林的六个条件造成的。当时即使最谨慎地谈到通货膨胀，也被当作一种滔天大罪。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当局常常指控教师们违反学校的卫生规则，可是另一方面又禁止他们说缺乏肥皂。

金卢布的命运问题，在共产党派系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对派的纲领（一九二七年）要求“保证货币单位的绝对稳定”。这个要求在以后的年代中变成了一个主题。一九三二年反对派的国

外机关报写道，“用铁手腕使通货膨胀停止发展，并且恢复稳定的通货单位”，甚至“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也在所不惜。“乌龟速度”的维护者和超工业化者，这时好像暂时互换了位置。针对着他们所吹嘘的将把市场“送到阴间去”的大话，反对派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挂起这样一幅标语：“通货膨胀是计划经济的梅毒。”

* * *

在农业领域，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也是同样严重的。

在农民政策还是针对着富裕农民的时期，据说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开始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将通过合作社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完成。合作社由于一个接一个地拥有了购买、销售和信贷的职能，最后一定也会使生产本身社会化。所有这些合起来，就叫做“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是沿着完全不同并且几乎相反的道路发展的，即用暴力来非富农化和全盘集体化。单个经济职能的逐步社会化，以及为此而在物质和文化条件方面进行准备，这些事都闭口不说了。集体化实行以后，好像共产主义制度在农业中也同时实现了。

这种做法带来的直接后果，不仅是有一半以上的牲畜被消灭，而且更重要的是，集体农庄的成员对于社会化的财产以及自己的劳动成果根本漠不关心。政府被迫作了一次仓促的撤退。它又一次提供给农民小鸡、猪、羊和乳牛，作为个人的财产。它把农场附近的土地分给农民，作为私人的土地。集体化的影片开始倒过来放映。

国家这样恢复小型的个体农业经济，是采取一种妥协的办法，正像当时的情况那样，企图用钱来使农民抛弃个人主义倾向。集体农庄保留下来了，因此乍看起来，这种撤退好像是次要的事情。其实，这种撤退的意义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能说是过高的。如果撇开集体农庄的贵族不谈，那末，普通农民的日常需要，在较大的程度上还是依靠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而不是依靠参加集体农庄。一个农民从个体经营当中所得到的收入，特别是从事技术

性工作，如种植果树或饲养牲畜，往往比在集体经济中所得到的多两倍。这个事实已经为苏联的报刊本身所证明，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千百万的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在小型经营中完全野蛮地浪费掉了；另一方面，集体农庄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

为了提高大规模集体农业的水平，必须再用农民所懂的语言同农民交谈——这就是说，恢复市场，从实物税再回到商业上来——一句话，把过早地送到撒旦那里去的新经济政策，再从撒旦那里请回来。因此，过渡到一种多多少少稳定的货币核算，便成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卢布的复兴

大家都知道，智慧的猫头鹰是到日落以后才飞出来的。同样，“社会主义”制度的货币和价格理论，只是在通货膨胀论者的幻想破灭以后才发展起来。忠实的教授们为了发挥上面提到的那段斯大林说的谜一样的话，便创造了一整套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苏维埃价格同市场价格对比之下，具有一种唯一的计划的和指导的性质。这就是说，苏维埃价格不属于一种经济范畴，而属于一种行政范畴，因此它可以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在重新分配人民的收入方面更好地服务。教授们忘记说明，不知道实际成本，怎么能“指导”价格；同时，如果所有的价格都是表现官僚的意志，而不是表现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那末，又如何估计实际成本。实际上，政府为了重新分配人民的收入，已经把捐税、国家预算和信贷制度等这样有力的杠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根据一九三六年的支出预算，用来资助各个经济部门的直接拨款在三百七十六亿卢布以上，间接拨款也有许多亿。预算和信贷机构在计划分配国民收入方面是完全胜任的。至于价格，越是忠实地开始表达今日的实际经济关系，就会越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结论。“指导性”价

格，在实际生活当中并不像在学者的著作当中那样感动人。在同一件商品上，价格规定了好多种。在这些不同价格的巨大差额当中，形形色色的投机、倒把、奉承阿諛以及其他坏事都找到了地盘，这已不是例外的情况，而成了一般的现象。与此同时，金卢布本来应当是稳定价格的固定阴影，实际上却变成本身的阴影了。

这时，方针又需要进行一次急剧的改变了，不过这次改变是由经济成就所产生的困难而促成的。一九三五年一开始，面包券取消了。到十月，其他食品券取消了。一九三六年一月，一般工业消费品券也取消了。城乡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从此都用货币来表示。卢布成为居民影响经济计划的一种工具，首先是从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开始。要使苏维埃经济合理化，再没有别的办法。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宣布说，“目前关于银行和工业相互关系的制度必须修改，银行必须认真地用卢布来进行监督。”这样，对政府计划的迷信和对政府价格的幻想就都破灭了。如果说，逐步接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在财政领域把卢布逐步代之以分配券，那末，一九三五年的改革就必须当作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然而，实际上，这样一种估计将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用卢布代替分配券，只不过是说明排斥了空想，公开承认必须重新采取资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才能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一九三六年一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财政人民委员宣称，“苏维埃卢布是世界上价值最稳定的货币。”如果认为这种宣布完全是吹嘘，那就错了。苏联国家预算收入的增加年年超过支出。说实在的，对外贸易本身虽然微不足道，却是顺差。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一九二六年只值一亿六千四百万卢布，现在则已达十亿以上。国内黄金的产量增长得很快。一九三六年，这个工业部门估计已居世界第一位。在市场恢复的情况下，商品流通发展得非常迅速。纸币膨胀的情况，实际上在一九三四年已经停止。卢布在某种程度上趋于稳定的因素已经出现。尽管如此，财政人

民委員的宣布，必須在很大的程度上當作是過分樂觀的表示。如果說蘇維埃盧布在工業的一般增長方面得到有力的支持，那末，生產成本高得驚人仍然是它的致命弱點。盧布只有在這樣的時候，即蘇聯的勞動生產率超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因而盧布本身感到自己的最後時刻即將來到的時候，才會成為最穩定的貨幣。

從財政的技術觀點來看，就更不能說盧布最優越。黃金儲備雖然超過十億盧布，但全國流通的紙幣差不多有八十億盧布。因此，黃金儲備只占流通貨幣的百分之十二點五。國家銀行的黃金，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帶有不可動用的戰爭準備金的性質，而不是作為通貨的基礎。從理論上說，說實在的，蘇維埃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並不是不可能採用金本位制，以使國內的經濟計劃準確，使同外國的經濟關係簡化。因此，通貨在交給鬼魂以前，還能再一次發出純金的光輝。不過，這一點，無論如何還不是最近將來的問題。

在即將到來的時期中，還談不上改變成金本位。然而，只要政府增加黃金儲備，設法提高這種儲備同紙幣的百分比，即使是純粹理論上的百分比；只要紙幣發行的限度是根據客觀條件決定的，而不是決定於官僚的意志；那末，蘇維埃盧布至少可以達到相對穩定的地步。只要做到這一點，就會得到巨大的好處。將來如果能夠堅決防止膨脹，那末，通貨雖然已經失去了金本位所具有的好處，但是毫無疑問，一定能夠有助於治療多年來官僚主觀主義給經濟造成的許多嚴重的創傷。

四、斯達漢諾夫運動

馬克思說，“一切經濟”——也就是在文明發展的各個階段人類同自然進行的各種鬥爭——“歸根到底，在於時間的節約。”歷史歸結到最初的基础，也不過是爭取節約勞動時間的鬥爭。社會主義還不能只用廢除剝削來辯護；它必須比資本主義更能保證社會節約時間。如果不實現這個條件，僅僅取消剝削，那就只不過是一

种戏剧性的插曲，没有什么前途。在运用社会主义方法方面进行的第一次历史实验，已经显示了这些方法拥有巨大的可能性。但是苏维埃经济还远远没有学会利用时间，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最宝贵的文化原料。输入的技术，本来是节约时间的主要工具，但是在苏维埃土地上还没有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产生的那些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点对于一切文明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胜利。事实已经表明，它能够而且应当取得胜利。但是它还没有取得胜利。一切与此相反的论断都是无知和吹嘘所产生的结果。

说公道话，莫洛托夫有时比苏联其他领导人能够稍微多摆脱一点官样文章，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的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还比美国和欧洲低得很多。”把这句话说得再确切些就是：比欧洲和美国低百分之六十六点六、百分之八十，有时甚至低百分之九十，而我们的生产成本却相应地高得多。莫洛托夫在这篇演说中更加概括地承认：“我们的工人的平均文化水平，还比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相应水平低些。”关于这一点，还应当补充这样一句：平均生活水平也是这样。用不着说明，这些顺便说出来的具有严肃意义的話，多么无情地反驳了数不清的官方当局的那些大话和外国“友人”的那些动听的话！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以及对于国防的关怀，是苏联政府活动的基本内容。在苏联演变的各个阶段，这一斗争都具有不同的性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所运用的方法，也就是“突击队”的方法，是建筑在鼓动、个人模范、行政压力以及各种集体鼓励和特权等基础上的。在一九三一年“六条件”的基础上实行一种计件工资的企图，由于通货所具有的那种变幻莫测的性质和价格不统一而发生了困难。国家分配产品的制度，用一种所谓“奖金制度”代替了有伸缩性的有差别的劳动价值，而这种“奖金制度”，从本质上说，就是按照官僚的随心所欲来偿付劳动价

值。为了爭夺許許多多的特权，突击队当中出現了越来越多的經過特別提拔的騙子手。归根到底，整个制度終於完全違背了自己本來的目的。

只有廢除购貨券制度，开始稳定通貨和統一价格以后，才为实行計件工資創造了条件。在这个基础上，突击队被所謂斯达汉諾夫运动代替了。为了追求卢布——到这个时候卢布才有了真正的意义——工人才开始更加关心自己使用的机器，更审慎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時間。斯达汉諾夫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加强劳动强度，甚至延长工作日。在所謂“非劳动”時間，斯达汉諾夫工作者便把他們的橈子和工具整理就緒，把原料分类放好，队长則向隊員发出指示，等等。这样一来，七小时工作日只不过剩下了一个名义。

計件工資的秘密，并不是苏联的官員发现的。这种制度使人們的神經处于緊張状态，但从表面上看不出强制的性质，因此馬克思认为，这是“最适合于資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制度。工人对于这种革新不仅不同情，而且采取敌对的态度。要希望他們采取任何別的态度都是不近情理的。参加斯达汉諾夫运动的，毫无疑問，有真正热心于社会主义的人。这种人，特别是在行政管理方面，究竟比純粹的钻营分子和騙子手多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很难說。不过，大多数工人都是从卢布的角度对待这种新的支付方法的，而他們往往不能不发觉他們拿到的工資越来越少。

虽然乍看起来，在“社会主义最終地和不可变更地胜利”以后，苏联政府重新采取計件工資的办法，似乎可能是向資本主义关系后退，实际上，在这里必須重述在卢布复兴問題上說过的話：这并不是一个放棄社会主义的問題，而仅仅是拋棄幼稚的幻想这样一个問題。工資支付的方式只不过是更好地符合于国家的实际資源。“法权永远不能高于經濟結構。”

但是，苏联的統治阶层如果沒有一种社会的伪装，还不能过下去。一九三六年一月，国家計劃委员会主席麦日劳克在給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說，“卢布正在变成实现社会主义(!)劳动

支付原則的唯一实际手段。”虽然在旧君主时代，任何东西，甚至公共厕所，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工人国家中，任何东西都会自动地变成社会主义的。卢布是实现**资本主义**劳动支付原則的“唯一实际手段”，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基础上。这种矛盾我們已經熟悉了。在創造“社会主义”計件工資制度这个新的神話的时候，麦日劳克补充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則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些先生們在玩弄理論方面的确是毫不害羞的！当劳动的速度是由追求卢布来决定时，人們並沒有各尽“所能”——即按照自己的神經和肌肉情况进行劳动——而是侵犯自己的能力。这种方法只能有条件地加以辯护，只能用迫切需要来辯解。把这种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則”就具有这样的嘲笑意味，即把一种新的和更高的文化思想踐踏到大家所熟悉的资本主义泥坑里去了。

斯大林在这条道路上更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认为斯达汉諾夫运动是“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現在讀者当会看到，給苏联的那些按照官方方便而运用的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是多么重要。社会主义，或者說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固然要求严格控制劳动量和消費量，但是无論如何，它的控制形式比資本的剝削天才們所发现的控制形式要人道些。可是在苏联，現在正以一种无情的方式强使落后的人材去适应从资本主义方面借来的技术。在爭取取得欧洲和美国水平的斗争中，像計件工資制等典型的剝削方法所运用的那样赤裸那样粗暴的形式，連资产阶级国家的改良主义工会也不会容許。在苏联，工人“为自己”工作这一点，只有从历史前景的角度看才能认为是真实的，而且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們这样預言——才能认为是真实的，即工人不服从高高在上的专制的官僚。无論如何，生产資料国有制並沒有把大粪变成黄金，也沒有給耗尽一切生产力当中最偉大的因素——人——的血汗制度圍上一个神圣的光圈。至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准备工作，要从恰好相反的一端开始——即不是从

实行計件工資制开始，而是从廢除这种作为野蛮的残余的計件工資制开始。

* * *

要对斯达汉諾夫运动的功过加以評定，还为时过早；但是要分辨运动的某些特点以及整个制度的某些特点，已經完全可能。个别工人的某些成就，毫无疑问是极其令人感到兴趣的，因为这种成就证明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可是要在整个經濟当中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那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由于一个生产过程同另一个生产过程是密切地相互依賴的，因此只靠个人努力是不能繼續不断地获得高产量的。如果在单独的工厂和企业关系方面对生产不进行改組，平均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不仅如此，要把千百万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稍微提高一点，那要比鼓动几千名积极分子难得无可比拟。

正像我們所听到的，领导人自己有时也抱怨苏联的工人缺乏技术。但是，这只說明了实际情况的一半，而且还不到一半。俄国的工人是富有进取心的，是手艺精巧的，而且是有天赋的。随便找一百个苏联工人，比如說派到美国工业的条件下工作，那末，只要几个月，甚至只要几个星期的時間，也許就不至于落在同类美国工人的后面。困难在于总的劳动組織。苏联的行政管理人員在担負新的生产任务方面，通常比工人还要差得多。

有了新的技术，計件工資制就会不可避免地使目前还很低的劳动生产率有步骤地提高。但是，要为这一点創造必要的基本条件，那就要求从車間的工长到克里姆林宮的领导人都提高管理水平。而斯达汉諾夫运动只能在极小的程度上滿足这种要求。官僚絕望地試图越过自己所不能越过的困难。由于計件工資制本身沒有立即产生人們所期望的奇迹，官僚便用粗暴的行政压力来帮助这种計件工資制，一方面給予奖金和口头表揚，另一方面則实行懲罰。

这个运动最初采取的步骤表現在这样的事情上，即对被指控

进行反抗、怠工，有时甚至謀杀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的技术工程人員和工人进行大批的镇压。镇压的严厉证明了反抗强烈到什么程度。上司把这种所謂“怠工”說成是一种政治上的反抗。实际上，这种情况主要是技术、經濟以及文化方面的困难所引起的，而相当大一部分困难又是官僚本身造成的。这种“怠工”很快就被明显地压制下去。心怀不滿的人都害怕了；聪明的人則采取沉默的态度。电报像雪片一样到处飞舞，报道前所未聞的成就。而事实上，只要这还是一种个别先鋒的問題，那末，服从命令的地方管理机构就是經過事先的特殊考虑来安排这种工作的，即使这样做要牺牲矿山或基尔特的其他工人。但是，在几十万工人突然列入“斯达汉諾夫工作者”队伍中的时候，管理机构又完全陷于混乱状态。它不知道怎样在很短的时间內把生产制度安排妥当，从客观上看，它也沒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于是它便設法侵犯劳动力和技术。在发条慢慢松下来的时候，它便用釘子把小齿輪撥动一下。实行“斯达汉諾夫运动”日和十日周的结果是，許多企业陷于一片混乱。这种情况說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乍看起来是令人吃惊的——即随着斯达汉諾夫工作者人数的增加，往往不是企业总生产率的提高，而是下降。

目前，这个运动的“英雄”时期显然已經过去。日常的艰苦工作开始了。必須进行学习。那些教別人的人，特別需要更多地学习。但是，他們正好是最不願意学习的人。使苏联經濟的所有基尔特后退并陷于瘫痪状态的那个社会基尔特，就是官僚組織。

第五章 苏維埃的热月^①

一、为什么斯大林取得了胜利

苏联的历史学家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結論，即居于統治地位的官僚，在重大問題上所采取的政策都曾經历一系列自相矛盾、左右搖摆的过程。试图用“环境不断变化”的理由来为自己解釋和辯护，显然不能自圓其說。领导意味着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有預見性。斯大林派却一点也沒有預見到事态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他們每次都是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他們完全用行政手段来应付新的局面。关于每次形势轉变的理論，都是在事后才創造出来的，同时很少考虑他們过去是怎么說的。根据这些不可辯駁的事实和文件，历史学家只好得出这样的結論，即所謂“左翼反对派”对国内事态发展的进程倒是提供了正确得多得多的分析，而且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具有远为符合实际情况的預見性。

乍看起来，这个論断同这样一个簡單的事实是矛盾的，即沒有远見的派別不断地取得胜利，而洞察力比較深刻的集团倒是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敗。这种反駁意見自然会从心里产生，但是，它只对这样的人有說服力，即以理性主义的方法思考問題，同时认为政治是一种合乎邏輯的推論或者一盘棋賽。政治斗争就其本质來說，是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的斗争，而不是說理的斗争。领导的品质如何对于斗争的结果当然不是无所謂的，不过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① 热月，原文音譯为特米多尔(Thermidor)，是十八世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实行的新历第十一月，即热月。新历共和二年热月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反动政治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罗伯斯庇尔政权，从此政治走向反动。发动这次反动政变的政治集团被称为“特米多尔派”，亦称“热月党”。在这里，热月一詞成为政治趋于反动的同义語。——中譯者注

归根到底，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另外，斗争的每个阵营都是按照本身的形象来选择自己的领袖的。

二月革命把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拥上权位，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沙皇统治集团“更加聪明”或者“更加机灵”，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至少暂时是这样——举行起义反抗旧制度的革命人民群众。克伦斯基能够把列宁打入地下和监禁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并不是因为他在个人才能方面超过这些人，而是因为当时大多数工人和士兵还在追随爱国的小资产阶级。克伦斯基个人的“高超”——如果在这里可以使用这个字眼的话——在于他没有比绝大多数人看得更远些。后来布尔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争取过去，并不是由于其领导人个人的高超，而是由于新的社会力量对比。最后无产阶级终于成功地领导了心怀不满的农民去反抗资产阶级。

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阶段——包括它的上升阶段以及下降阶段——也同样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即相互接替的“领导人”和“英雄”的力量，主要在于他们符合那些支持自己的阶级和阶层的性质。只是由于这种符合，而不是由于任何不相干的什么高超，那些“领导人”和“英雄”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他个人的作用。米拉波^①、布里索^②、罗伯斯庇尔、巴拉斯^③和波拿巴^④的相继

① 米拉波(Honoré Gabriel Mirabeau, 1749—1791)，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斐扬派领袖之一，是一伯爵。革命初期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一七九〇年以后为宫廷奔走。——中译者注

② 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 1754—1793)，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革命初期主张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后力图解散巴黎公社和封闭雅各宾俱乐部。——中译者注

③ 巴拉斯(Paul Barras, 1755—1829)，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热月党首脑之一。两次镇压巴黎贫民起义。督政府成立后任总理，拿破仑执政后退休。——中译者注

④ 波拿巴(Bonaparte)，此处指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一世于一八〇四年恢复君主政体，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从一七八九年开始到这时结束。——中译者注

当权，都是遵循着远比这些历史主角本身的特点为有效的客观规律。

大家知道得很清楚，到目前为止，每次革命以后，接踵而至的总是反动，甚至是反革命。这种情况固然从来没有把整个民族拖回到原来的起点，但它往往把人民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夺走。在第一次反动浪潮下遭到牺牲的，一般总是在革命进攻期间站在群众前列的那些先锋、首倡者和鼓动者。代替他们的是站在第二线、同以前的革命敌人结成联盟的人民，这些人站到了最前列。“主角们”在公开政治舞台进行着富有戏剧性的决斗，在这种决斗下面，阶级关系发生着变化；还有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即新近参加革命的群众在心理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许多同志曾经提出这样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的活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活动的革命首创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平民的自豪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代替所有这些的是出现了那么多卑鄙、懦弱、胆怯和自私自利的现象？拉柯夫斯基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生活史作为回答，并以巴贝夫^①为例。他说巴贝夫从阿巴耶监狱^②出来以后，对于巴黎郊区英雄的人民所发生的变化也感到惊奇。革命是一种大量消耗人的精力（既包括个人的也包括集体的）的事情。神经要失去抵抗力。意识要动摇，性格要磨尽。事态的发展太快，以至新力量来不及弥补损失。饥饿、失业、革命干部的死亡，以及群众被排挤出政府机关，所有这些都使巴黎郊区的人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陷于严重的贫困状态，以至他们还需要再过三十年才能准备好举行一次新的起义。

在苏联的书刊中有这样一句原则性的论断，即资产阶级革命

① 巴贝夫(François Noël Babeuf, 1760—1797)，法国人，鼓吹绝对平等和公有制，一七九六年组织政变失败后被处死。其主张被称为巴贝夫主义(Babouvisme)。——中译者注

② 阿巴耶监狱(Abbaye prison)，在巴黎，一七九二年九月曾屠杀一百六十四名囚犯。此狱建于一五二二年，毁于一八五四年。——中译者注

的法則“不適用”于无产階級革命。这种論断是根本沒有科学內容的。十月革命的无产階級性质，决定于世界形势和內部力量的具体对比。但是階級本身是在沙皇統治和落后的資本主义的野蛮条件下形成的，而絕不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形成的。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正是由于这一点，在許多方面还落后的无产階級，才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以空前的速度从半封建的君主政体跳跃到社会主义专政；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的队伍中才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反动。这种反动发展成一系列連續不断的浪潮。外部条件和事态发展都不断地促进这种反动。一次干涉接着一次干涉。革命沒有从西方直接得到帮助。国家沒有出現預期的繁荣，却长期陷于前景不妙的貧困状态。不仅如此，工人階級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國內戰爭中死亡，就是高升几級而脫离了群众。这样，在力量、希望和幻想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緊張阶段以后，便产生了疲倦、消沉和对革命結果极度失望的情緒。“平民自豪感”进入低潮而让位給胆怯和自私自利的浪潮。新統治阶层就在这种浪潮上达到自己的地位。

五百万紅軍的复員，对于官僚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戰場上取得胜利的指揮官，在地方苏維埃、經濟部門和教育部門担任了領導职务，他們把國內戰爭时期保证取得胜利的那种制度坚决地貫徹到每个地方。于是，群众便在各方面逐步地被排除实际参加国家的領導工作。

无产階級內部的反动，使城乡的小資产階級阶层有了极大的希望和信心，新經濟政策給了他們新生命，他們越来越大胆。最初作为无产階級代理人的年輕的官僚，現在开始觉得自己是各个階級之間的仲裁法庭了。官僚的独立性越来越得到加强。

国际形势也以巨大的力量朝同一方向推进。世界工人階級遭到的打击越沉重，苏維埃官僚的自信心越强。二者之間不仅有一种年代上的关系，而且有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在两方面都起作用。官僚的領導人促进了无产階級的失敗；而这种失敗又促进了官僚的兴起。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亚起义的失敗和德国工人党不光

采的退却，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起义企图的瓦解，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的被叛卖和波兰工人党在毕苏斯基^①上台时的可耻行为，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惨遭屠杀，最后还有德国和奥地利最近遭到的更为不祥的失败——所有这些历史性灾祸，摧毁了苏联群众对世界革命的信心，并使官僚作为唯一的救星而越来越提高自己的地位。

至于十三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遭到失败的原因，作者不能不提起自己的其他著作。作者在那些著作中试图揭露这一点，即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由于脱离群众和非常保守而对各国的革命运动起了摧毁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怀的是这样一个无可辩驳和富有教育意义的事实，即欧洲和亚洲的革命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一方面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却大大加强了苏维埃官僚。在这一系列历史事变中，有两个时期特别具有意义。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苏联工人热情地注视着德国，当时那里的无产阶级似乎已经开始夺取政权。德国共产党的仓皇退却给苏联劳动群众带来了极大的失望。苏联官僚立刻展开了一个运动，反对“不断革命”论，并且给予左翼反对派第一次残酷的打击。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苏联居民又有了新的希望。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东方，当时在那里中国革命的戏剧正在发展。左翼反对派已经从以前遭到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并且正在征收大批新的追随者。一九二七年底，中国革命遭到了刽子手蒋介石的屠杀，共产国际实际上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出卖给了蒋介石。一种失望的冷潮淹没了苏联的群众。官僚在报刊上和会议上对左翼反对派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以后，最后便在一九二八年对这个反对派大肆逮捕。

的确，有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团聚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旗帜周围。先进的工人毫无疑问地是同情反对派的，但这种同情是消极的。群众不相信一次新的斗争可以大大地改变局势。

^① 毕苏斯基(Josef Pilsudski, 1867—1935)，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波兰法西斯独裁者，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五年任总理。——中译者注

与此同时，官僚說，“为了国际革命，反对派建議把我們拖进一次革命战争。动荡得已經够了！我們已經赢得了休息的权利。我們一定要在国内建設社会主义社会。請信賴我們，信賴你們的领导人！”这种休息的福音大大地巩固了官僚机关以及軍官和国家官員，并且毫无疑问地在疲倦的工人当中，特别是农民群众当中得到了共鳴。他們問自己：反对派真是为了“不断革命”的想法而准备牺牲苏联的利益嗎？实际上，这种斗争同苏維埃国家的生存利益是一直有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德国执行的錯誤政策，十年后造成了希特勒的胜利——即造成了一种来自西方的具有威胁性的战争危險。在中国执行的同样錯誤的政策，支援了日本帝国主义，使东方的危險大大迫近。然而，反动时期的特点，首先还在于缺乏勇敢的思想。

反对派被孤立了。官僚則趁热打铁，利用工人的困惑和消极情緒，使其中比較落后的阶层反对先进的阶层，而且一般地來說越来越大胆地依靠同富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不多的几年当中，官僚就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

如果以为在群众中默默无闻的斯大林，是突然夹着完整的战略计划出現的，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絕不是这样。在斯大林找到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已經找到了他。斯大林給官僚带来了一切必要的保证：一个老布尔什維克的威望，一种倔强的性格，狹小的眼界，以及同政治机器——他的势力的唯一来源——的密切联系。胜利落到他头上，最初是連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这是新統治集团欢迎他的友好表示，这个集团企图摆脱旧的原则，摆脱群众的监督，同时在内部事务方面需要一个可靠的仲裁者。在群众面前和革命事态发展过程中作为二等人物的斯大林，显示了自己是热月式官僚的无可怀疑的領袖，是其中的第一号人物。

新統治阶层很快就流露出自己的想法、感情以及更为重要的私心。当前官僚当中較老一代的絕大多数人，在十月革命时期都是站在营垒的另一边的。（就以苏联的駐外大使为例吧：特罗揚諾

夫斯基、馬伊斯基、波丹金、苏里茲、金楚克等就是这样。)要不然,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們也是站在斗争之外。在現在的官僚当中,那些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站在布尔什維克陣营里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至于年輕的官僚,都是年老一輩的官僚挑选和教育出来的,他們往往就是老官僚的子弟。这些人并不能完成十月革命,但是他們完全适合于利用十月革命。

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間发生的个人偶然事件,当然不是沒有影响的。例如,列宁的生病和逝世就毫无疑问地加速了进程。如果列宁活得再长些,官僚政权的压力至少在头几年当中会发展得比較慢些。但是早在一九二六年,克魯普斯卡婭就在一些左翼反对派人士当中說过这样的話:“如果伊里奇还活着,他也許已經被关在監獄里了。”当时列宁的担心和令人不安的預言,对于她來說还記憶犹新,她沒有抱什么幻想,以为列宁个人的无上权威可以抵擋得住相反的历史潮流。

官僚征服了比左翼反对派更多的东西。它征服了布尔什維克党。它击败了列宁的綱領,而列宁曾經看到国家机关“从社会公僕变为社会主人”的主要危險。官僚击败了所有这些敌人:反对派、党和列宁,他們所使用的武器不是思想和論辯,而是自己的社会力量。官僚的沉重的臀部压倒了革命的头。这就是苏維埃热月的秘密。

二、布尔什維克党的蜕化

布尔什維克党准备了并且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它創建了苏維埃国家,并供給这个国家一副坚强的骨骼。党的蜕化是国家官僚化的原因,也是結果。必須至少簡短地說明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

布尔什維克党內部制度的特点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把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概念結合起来,并沒有一点矛盾的地方。党

不仅密切注意二者的界限应当随时划清，而且还密切注意运用这种方法的人应当真正有权规定党的政策方向。批评自由和思想斗争是党内民主不可变更的内容。目前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容许搞派别活动的说法，在堕落时期是神话。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派别斗争的历史。同时说实在的，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既然以推翻世界为自己的任务，把最大胆的叛逆者、战士和反抗者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那它要生存和发展下去，怎么能没有思想冲突、没有小圈子和暂时的派别组织呢？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远见，往往能使冲突缓和下来，使派别斗争的持续性减小，但也仅此而已。中央委员会所依靠的就是这种热烈的民主的支持。它正是从这种支持当中得到胆量，来作出决定和发布命令。领导在各个危急阶段所表现的明显的正确性，使中央委员会拥有很高的权威，这种权威是集中制的无价的精神资本。

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党的制度，特别是在夺取政权以前，同目前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所实行的制度是完全相反的。目前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的“领导”都是由上面指派的，一道命令就可以把政策完全改变，党的机关完全没有监督，它对普通党员傲慢骄横，对克里姆林宫则百般顺从。但是，就是在夺取政权以后的头几年，即使党内已经出现了管理腐败的现象，如果有人把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党的形象讲给布尔什维克听，那末，每个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在内，都会把这个人斥责为最恶毒的诽谤者。

列宁和他的同事的注意中心是，经常地关心保护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使它不受当权者的那些恶习的影响。然而，在开头几年，党和国家机关的特别密切关系，以及有时实际上融合在一起，毫无疑问已经给党内制度的自由和弹性造成了损害。随着困难的增加，民主越来越少。最初，党曾祝愿和希望苏维埃机构内保持政治斗争的自由。但是国内战争使这种打算作了很大的改变。反对党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禁止。这种显然同苏维埃民主精神矛盾的作法，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领导人不是当作一种原则，而是当作一种暂时

的自卫手段。

执政党的迅速成长，它的任务的新颖和广泛，不可避免地使党内发生了分歧。国内的各种反对暗流，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对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施加压力，这样就加剧了派别斗争的尖锐性。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这种斗争采取了这样尖锐的形式，以至有动摇国家政权的危险。一九二一年三月，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叛乱，不少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这次叛乱，这时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禁止派别活动——这就是说，把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也运用到执政党的内部生活中。这种禁止派别活动的做法也被当作一种非常措施，准备在局势大大好转的时候取消。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极其谨慎地运用这种新办法——这种办法对于它本身的关系最大——以免因而扼杀了党内生活。

可是，这种办法原来只不过是对付困难局势的一种必要的让步，官僚却认为完全适合自己的胃口，于是他们便开始完全以行政上感到方便的观点来处理党内生活。早在一九二二年，列宁在健康好转的一个短时期里，由于对官僚主义日益具有威胁性的发展感到震惊，就准备展开斗争反对斯大林派。斯大林派这时已经使自己成为党机器的轴心，作为夺取国家机器的第一个步骤。列宁的第二次病倒和以后的逝世，使他未能同内部的这支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从此以后，斯大林——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同他一道工作——便把全部努力放在促使党机器摆脱普通党员的监督方面。在这种“稳定”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中，事实证明了斯大林是他的同事当中最坚决最可靠的一个。他用不着分心去注意国际问题；他从来没有关心过那方面的问题。新统治阶层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也就是他自己的观点。他深信，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其本质来说是民族性的和行政性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是一个必要的坏东西，只要能为外交政策的目的服务，就应当加以利用。在他的眼里，他自己的党之所以还有价值，也不过是因为它驯服地支持国家

机器。

除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外，官僚还散布了这样一种理论，即在布尔什维主义中，中央委员会就是一切，党等于零。第二种理论无论如何比第一种理论实现得更加成功些。统治集团利用列宁的逝世宣布了一次“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运动”。党的大门，过去是一直小心地加以守卫的，现在大大地敞开了。工人、职员、小官员，成群结队地挤进去。这种策略的政治目的是，把革命先锋队融化在沒有經驗、沒有独立性而有服从权势的老习惯的普通人当中。这个计划成功了。“为纪念列宁主义而吸收党员运动”，由于使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因而给予列宁的党一个致命的打击。机器赢得了必要的独立。民主集中制让位给官僚集中制。在党的机关本身当中，工作人员从上到下作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动。服从被宣布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的借口下，“奇诺夫尼克”^①彻底地代替了革命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从此便成为一部迅速蜕化的历史。

左、中、右三派的领导人都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同一个参谋部——政治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对于正在发展中的斗争的政治意义认识不清。在肤浅的人看来，这似乎完全是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是一种争取列宁的“继承权”的斗争。但是在严峻的专政条件下，社会矛盾在初期除了通过执政党的机关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热月派人物都是从雅各宾党人当中产生出来的。波拿巴本人在早期就属于雅各宾党，后来法国的这位第一执政官和皇帝也正是从以前的雅各宾党人当中挑选其最忠实的臣仆的。时代改变了，雅各宾党人也随着改变了，二十世纪的雅各宾党人也不例外。

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现在已经只剩下斯大林一个人。当时的两个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流亡时期都曾同

^① “奇诺夫尼克”(Чиновник)，即职业政府官员。——英译者注

列宁共事多年，現在却以莫須有的罪名服着十年徒刑。另外还有三个政治局委員，即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①，已經完全离开领导崗位，但是由于采取了屈服的态度，目前担任着次要的职务。最后，还有本书的作者，目前在流亡中。列宁的寡妻克魯普斯卡娅，由于不能全力使自己完全适应热月，也遭到了軟禁。

目前的政治局委員，在布尔什維克党史上都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如果有人革命的頭几年預言他們以后会高升到那样的地位，那他們首先会感到驚訝的，同时这种驚訝不会掺杂着虛伪的謙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目前的作法更加严格了，即政治局永远正确，反对政治局的人就不可能正确。但是不仅如此，由于斯大林不可能犯錯誤，因此政治局就不能反对斯大林，而斯大林也不能反对他自己。

在这整个时期，要求党内民主是所有反对派别的口号。这种要求实现的希望越小，这些派别要求实现的决心就越大。上面提到的左翼反对派綱領，在一九二七年就要求在刑法中加入这样一条特別法律：“凡直接或間接迫害提出批評的工人，即以严重罪行惩处。”代替这条法律的是，刑法中加入了一条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法律。

党内民主在老一代当中只剩下了一点回忆。与此一道消失的还有苏維埃、工会、合作社、文化組織和体育組織的民主。駕于所有这些組織之上的是党支部書記的无限威权。在“极权”这个字眼从德国傳來以前好几年，苏联的制度在性质上就已經是“极权”的了。拉柯夫斯基在一九二八年写道，“敗坏道德的方法把有思想的共产党人变成机器，并且摧毀了意志、性格和人的尊严，統治集团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自己变成不可动搖不可侵犯的寡头，以此代替

^①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硬被說成是反斯大林的“恐怖陰謀”案的同謀犯，而于一九三六年八月被判处死刑；托姆斯基也因同一案件而自杀或被处决；李可夫由于同此案有牽連而被撤职；布哈林虽然受到怀疑，但还未失去自由。——英譯者注

了階級和黨。”自從拉柯夫斯基寫出這幾句憤慨的話以來，制度的蛻化已經走得無比遙遠了。國家政治保衛局已經成為黨內生活的決定性因素。如果說一九三六年三月莫洛托夫已經能夠向一個法國記者吹噓說，執政黨內部不再有派別鬥爭，那只是因為現在不同的意見已經由政治警察的自動干涉解決了。老的布爾什維克黨已經死亡，再也沒有什麼力量會使它起死回生。

* * *

隨着黨在政治上的蛻化，沒有監督的機關在精神上也趨于墮落。“Sovbour”——即 Soviet bourgeois（蘇維埃資產階級）——這個用來稱呼享受特權的顯貴的字眼，很早就工人的字彙中出現了。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資產階級傾向便有了更廣闊的活動余地。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寧在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對於統治階層蛻化的危險提出了警告。他說，歷史上曾經不止一次地出現過這種事情，即被征服者的水平較高的時候，征服者便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化。俄國資產階級和舊官僚政治的文化固然相當可憐，但是可惜新統治階層還必須經常向那種文化脫帽致敬。有“四千七百個負責的共產黨員”在莫斯科管理着國家機器。“究竟是誰領導着誰呢？我非常懷疑，你們是不是能說共產黨員是在領導着……。”在以後的幾次黨代表大會上，列寧不能說話了。但是在他能活動的最後幾個月當中，他的全部思想集中在警告和武裝工人上面，希望他們反抗官僚的壓迫、專橫和腐化。然而，他當時也只不过是看出了病症的初期症狀而已。

克里斯琴·拉柯夫斯基，以前擔任過烏克蘭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後來擔任過蘇聯駐倫敦和巴黎的大使，他在一九二八年流放期間曾經給他的朋友寫過一封信，簡略地探討蘇維埃官僚。這封信，我們在上面已經引用過好幾次，因為它至今還是關於這個問題所寫的一篇最好的東西。拉柯夫斯基在這封信中說，“在列寧的心中，以及我們大家的心中，黨領導的任務在於保護黨和工人階級，使他們不受當權者方面由於擁有特權、地位和任命權而做出的

腐敗行动的影响,不同旧貴族和旧市民的殘余接近,不受新經濟政策的腐化影响,不受資產階級道德和思想意識的誘惑……我們必須坦率地、明确地和高声地說,党机关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它暴露了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发挥保护者和教育者的双重作用。它失败了,破产了。”

不錯,拉柯夫斯基本人在官僚的压迫下后来否认了自己的尖銳判断。但是,七十岁的伽利略也曾經这样。他陷入異端裁判法庭的魔掌以后,被迫否认了哥白尼的体系——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地球繼續繞日运行。我們不相信六十岁的拉柯夫斯基真收回了自己的意見,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对这种收回自己意見的做法进行过令人敬畏的分析。至于他的政治批評,在客观发展的事实当中比在他本人的主观坚定思想当中找到的支持远为可靠。

政权的取得不仅改变了无产階級同其他階級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无产階級本身的内部結構。运用政权成了一个固定社会集团的专门工作,这个集团越把自己的使命看得高,它就越急于解决自己的“社会問題”。拉柯夫斯基繼續作了解釋:“在一个无产階級国家中,执政党的党员是不容許进行資本主义积累的,差別最初是职务上的,但是后来就成了社会上的差別。我不是說这种差別变成一种階級差別,而是变成一种社会差別……拥有汽車、美好住宅、定期休假和得到党的最高薪水的共产党员,同在煤井中工作、每月得到五六十个卢布的共产党员比較起来,社会环境是不同的。”拉柯夫斯基列举了雅各宾党人在执政时期蜕化的原因——如追逐财富、参加政府的商业合同和供应等等,他还引用了巴貝夫的这样一种奇妙的評論:新統治阶层的蜕化,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受了以前的貴族少女的影响,雅各宾党人对于她們是非常友好的。巴貝夫叫喊道,“你們这些小心眼的平民,你們在干什么呀?今天她們拥抱你們,明天她們就会絞死你們。”如果調查一下苏联統治阶层的妻子,那就会显示一种类似的景象。苏联的著名記者索斯諾夫斯基曾經指出“汽車—閨房的因素”对于形成苏維埃官僚的精神面貌

所起的特殊作用。的确，索斯諾夫斯基继拉柯夫斯基之后也收回了自己的意見，然后从西伯利亚回来了。但是这样并没有改进了官僚的精神面貌。恰恰相反，这种收回意見的行动正是道德越来越败坏的证明。

索斯諾夫斯基的旧文章，人們抄写出来一个一个地傳閱，这些文章描繪了新統治阶层生活当中的一些令人难忘的插曲，这些插曲清楚地說明了征服者已經为被征服者的精神活动同化到多么严重的程度。然而，我們用不着回到过去的年代——因为索斯諾夫斯基最后在一九三四年放下了批評的鞭子，而換成了歌功頌德的七弦琴——我們不妨看看苏联报刊上的一些嶄新的例子。我們并不挑选謾罵和所謂“过火”的东西，而是挑选那些正式的社会輿論所认可的日常現象。

莫斯科有一个工厂的經理，是一个杰出的共产党员，他在《真理报》上吹嘘他所領導的企业在文化方面的发展。“一个机械工人在電話中問道：‘先生，您有什么命令，是立刻关上熔炉呢还是等一下呢？’我回答說：‘你等一下吧。’”这位机械工人同經理談話的时候是毕恭毕敬的，他用的是“您”，而經理回答的时候用的却是“你”。这种可耻的对話在任何有文化的資本主义国家都是不可能出現的，可是这位經理在《真理报》上竟当作完全正常的事情来談論！报纸的編輯沒有提出異議，因为他不注意这种事情。讀者沒有提出異議，因为他们已經习惯于这一套。我們也沒有觉得惊奇，因为在克里姆林宮庄严的會議上，“領導人”和人民委員就是用“你”来称呼屬於他們管轄的工厂經理、集体农庄主席、車間工长以及劳动妇女等人的，特别是在授予奖章的时候，更加是这样。在沙俄时期，最流行的革命口号之一就是要求上級对下級講話时不要用“你”这个称呼，他們怎么能忘記这件事呢！

克里姆林宮里的权威人士同“人民”的这种对話（这些“人民”对于那些权威人士的老爷般的粗暴态度是感到驚訝的），毫无疑义地证明了这一点，即虽然經歷了十月革命，生产資料已經国有化，

土地已經集体化，“消灭了富农阶级”，但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在苏维埃金字塔最上层的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落后于一个有文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有了更大的倒退。这种真正的俄罗斯野蛮主义的复活，毫无疑问，根源在于苏维埃的热月；这种热月给予没有什么文化的官僚的是完全的独立和自由，使他们不受任何监督；给予群众的著名福音却是服从和沉默。

我们绝不想把抽象的专政和抽象的民主加以对比，在纯粹理性的天秤上衡量二者的优劣。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只有变化是永恒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已为事实证明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进步工具之一。但是在这里也是一样，用诗人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变成无理，仁慈变成灾祸。”反对党被禁止以后，派别也被禁止。而派别被禁止的结果则是，禁止人们与没错的领导人有不同的想法。由警察一手制造的党的磐石般一致，带来了官僚不受惩罚的结果，这种结果成了各种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行为的泉源。

三、热月的社会根源

我们已经说明，苏维埃的热月就是官僚对群众的胜利。我们已经试图揭露了这种胜利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有一部分被行政机关吸收而逐渐腐化，有一部分在国内战争中被消灭了，还有一部分则遭到排挤和垮下去了。疲倦而失望的群众对于最上层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然而，这些条件尽管重要，却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官僚能够驾于社会之上并且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单靠他们自己的意志来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新统治阶层的兴起，一定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十八世纪热月派对雅各宾党人的胜利，也得到这一点的帮助，即群众的厌倦和领导干部的腐化，但是在这种基本上属于偶然情

况的现象下面，还进行着一种深刻的有机进程。雅各宾党人所依靠的是大浪潮所掀起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然而，十八世纪符合生产力发展过程的革命，归根到底只能使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热月只不过是这种不可避免的进程的一个阶段。在苏维埃的热月中，表现出什么类似的社会需要呢？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对于宪兵为什么取得胜利这个问题已经试图提出初步的答案。我们现在必须继续分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以及国家在这个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让我们再把理论性的预测和现实作一比较。一九一七年列宁在谈到夺取政权以后应当立刻开始的阶段时写道，“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是居民中的大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的情形完全相反……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①这种消亡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的在于这一事实，即“人民大多数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军官）的特殊机关来直接进行”^②镇压的职能。列宁接着还说了这样一句明白而不可辩驳的话：“而行使国家政权的职能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③在生产资料方面废除私有财产这一点，取消了历史性国家的主要任务——保护少数人专有的特权，使其不受绝大多数人的侵犯。

根据列宁的看法，国家的消亡开始于剥夺剥夺者的那一天——即在新政权有时间处理其经济和文化问题以前。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取得的每个成就都意味着在消灭国家方面前进了一步，即在国家溶化于社会主义社会方面前进了一步。这种溶化的程度是表明社会主义结构的深度和效率的最好的指数。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这样一条社会学定理：在一个工人国家中，群众所施加的压制力量，同剥削倾向或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成正比例，而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06页。——中译者注

② 同上。——中译者注

③ 同上，第407页。——中译者注

同社会团结的力量和对新制度的普遍忠诚成反比例。因此，官僚——即“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军官”——所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的压制力量，这种压制力量是群众不能或不願施加的，同时总是这样或那样用来反对群众本身的。

如果民主的苏维埃至今还保持着它原来的力量和独立，而且仍然不能不像最初几年那样采取镇压和压制措施，那末，这种情况本身就可能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群众性的苏维埃已经从舞台上完全消失，实行压制的职能已经转入斯大林、雅戈达之流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令人忧虑的程度一定还要大得多。而且压制采取的是些什么形式啊！首先，我们必须问自己：国家具有这样顽强的力量，特别是它在警察化，这究竟有什么社会原因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我们必须从根本上修正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传统看法，或者从根本上拒绝官方对苏联的估计。

我们现在从莫斯科一家报纸的最新一期上看看对于苏联现行制度的固定说法，这种说法是全国到处天天重复和学校的儿童必须牢记在心的许多说法之一，即“在苏联，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等寄生阶级已经彻底消灭，因此已经永远结束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日益高涨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正在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真理报》）不用说，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的报刊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如果剥削已经“永远结束”，如果国家现在的确已经走上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的道路上，那末，社会除了最终扔掉国家这件紧身衣以外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可是与此相反——这种矛盾现象甚至难以捉摸！——苏维埃国家反而具有了一种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的性质。

同样致命的矛盾也表现在党的命运方面。在这里问题差不多可以这样加以表述：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旧统治阶级还拿

着武器进行斗争，他们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积极支持，同时武装的富农对军队和国家的粮食供应工作进行着破坏活动——在这样的時候，为什么党内对于最严重的政策问题能进行公开的和无所顾忌的争论？而现在，干涉已经停止，剥削阶级已被推翻，工业化已经取得无可置疑的成就，绝大多数农民已经集体化，为什么反而不能容许对不可动摇的领导人进行最轻微的批评呢？为什么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如果按照党章要求召开党代表大会，就会马上被开除出党，而任何公民如果敢于大声讲出怀疑斯大林的绝对正确，就会几乎当作恐怖阴谋的同谋犯来进行审讯和判罪呢？这样可怕地、可恶地和难以容忍地加强镇压和警察机关是什么缘故呢？

理论并不是一张支票，可以随时请现实兑现。如果一种理论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就必须修正它或者把它的缺陷弥补起来。我们必须找出那些使苏维埃现实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之间发生矛盾的实际社会力量。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要在黑暗中游荡，重复那种对于领导人的威信有用而与活生生的现实恰好相反的官样文章。现在我们来查看一个关于这一点的令人信服的例子。

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讲演中宣称：“国家的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了（鼓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解决了消灭阶级的问题（鼓掌）。”然而，还存在着过去的“本质上同我们敌对的分子”，即以前的统治阶级的残余。不仅如此，在集体化农民、国家职员当中，以及有时也在工人当中，“小投机商”^①被发现了，“侵占集体和国家财富的人，诽谤苏维埃的人等等”也出现了。这样一来，就必须进一步加强专政。同恩格斯的看法相反，工人国家绝不是“沉睡”，而是恰恰相反，必须越来越提高警惕。

这位苏维埃政府首脑所描绘的情况，如果不是非常自相矛盾的话，是会完全得到肯定的。社会主义在国家中完全居于统治地

① 即 спекулянтки。——英译者注

位：“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才是消灭了。（如果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是消灭了，那末在其他意义上还是存在的。）固然社会的和谐到处遭到过去的渣滓和残余的破坏，但是不能想像被剥夺了权力和财产而梦想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些人，还能同“小投机商”（甚至还**不是投机商**哩！）和“诽谤者”一道来推翻无阶级的社会。看来一切事情都在以能够想像得到的最好的情况发展着。那末，官僚的铁一般的专政还有什么用呢？

我们必须相信，那些反动的梦想者是会逐渐死亡的。“小投机商”和“诽谤者”在超民主的苏维埃一笑之下也是可以解决掉的。一九一七年列宁对官僚国家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改良主义理论家的答复是：“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特别的镇压机器，特别的镇压机关，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正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都很容易去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①这些话听起来就像列宁已经特别预见到一个继承他担任政府首脑的人将要说的话。列宁在苏联公立学校里是学习的对象，在人民委员会里显然不是。否则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莫洛托夫敢于毫不犹豫地提出列宁所极端反对的那种说法。奠基者及其不肖门徒之间的尖锐矛盾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一方面，列宁认为，即使是消灭剥削阶级这个任务，也可以在**没有**官僚机关的情况下完成；另一方面，莫洛托夫在说明为什么官僚机器消灭阶级**以后**还扼杀了人民的独立时，却找不到更好的借口，而只好说还存在着被消灭的阶级的“残余”。

然而，以这些“残余”为借口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因为按照官僚本身的权威代表所供认的话来说，昨天的阶级敌人正在被苏维埃社会成功地同化着。正是由于这种说法，因此党中央委员会的书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50页。——中译者注

記之一波斯杜謝夫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說：“許多怠工者……已經誠懇地悔过，并已参加到苏維埃人民的队伍中来。”由于集体化的順利实现，“富农的子女不必为他們的父母負責了”。还有：“富农本人現在也差不多不相信，他們会有可能在乡村中恢复自己以前的剝削地位。”怪不得政府取消了社会出身的限制！但是，如果波斯杜謝夫說的話——这些話是莫洛托夫完全同意的——有任何意义的話，那只有这一点：不仅官僚已經变成不合时宜的討厭东西，而且一般的国家强制在苏維埃国土上已經无事可做。然而，無論是莫洛托夫或者是波斯杜謝夫，都不同意这种不可变更的論断。即使自相矛盾，他們也要掌握着政权。

实际上，他們也不能拋棄政权。要是用客观的語言來說就是这样：目前的苏維埃社会不能沒有一个国家，甚至也不能——适当地——沒有一个官僚阶层。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絕不是过去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残余，而是目前的强大的力量和傾向。苏維埃国家作为强制性机关而存在的理由在于，目前的过渡性結構还充滿了社会矛盾，这种矛盾在消費領域——这是人人最亲切地最敏感地感觉得到的領域——处于极端緊張的状态，而且时时刻刻有在生产領域出現的危險。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說是最終的，也不能說是不可变更的。

官僚統治的基础是社会缺乏消費品，因此便引起了你爭我夺的斗争。如果商店里的貨物充足，购买者就可以随时去买。如果貨物很少，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而在队排得很长的时候，就必須指派一个警察来維持秩序。这就是苏維埃官僚的权力的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須等待。

乍看起来，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应当减少特权的必要性，縮小“资产階級法权”适用的范围，从而动摇这种法权的保卫者即官僚的立足点。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截至目前为止，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各种形式的不平等、特权和优待都得到了极端的发展，官僚也因而得到了极端的发展。这也不是偶然的。

苏維埃制度在初期，毫無疑問要比現在平等得多，官僚作風也要少些。不过，当时是一种普遍貧穷的平等。国家的資源是那样貧乏，以至沒有可能从居民群众中分化出一个特权阶层。同时，工資的“平等化”摧毀了个人的兴趣，也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苏維埃經濟必須从它的貧穷基础上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特权的大量积蓄才有可能。目前的生产状态还远远不能保障每个人的一切需要，但是已經足够給予少数人相当大的特权，并且可以把不平等当作一条鞭子来驅赶大多数人。这就是生产的发展到現在为止沒有加强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反而加强了它的資產階級因素的第一个原因。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除了在現阶段支配資本主义工資制的經濟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这个政治因素就是官僚本身。从本质上說，官僚阶层是不平等制度的建立者和保护者。它最初是作为工人国家的資產階級机关出現的。在使少数人得到好处并維護这些好处的时候，它当然把最大的好处留給自己。誰也不会在有財富可分的时候把自己除外。这样，由于一种社会需要而产生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已經远远超过自己的社会必要职能，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因而也就成为使整个社会机体遭到巨大危險的泉源。

苏維埃热月的社会意义，現在开始在我們面前具体化了。群众的貧穷和文化落后又一次体现为掌握大权的統治者的那种恶劣形象。被廢除的和遭到詛咒的官僚，从社会的僕人又一次变成社会的主人了。它在社会方面和道德方面已經达到这样脫离人民群众的地步，以致它現在無論在活动方面或者收入方面都不容許任何监督了。

官僚对于“小投机商、侵占者和誹謗者”的近乎神秘的恐惧，由此便可得到完全合乎邏輯的說明。苏維埃經濟由于还不能滿足居民的基本需要，因此它每走一步都要产生和复活那些侵占和投机的傾向。另一方面，新貴族的特权在居民群众中也引起了一种傾

向，这种倾向就是倾听反苏维埃的“诽谤”——也就是倾听对于上司的贪婪和专横行为提出的任何批评，即使是悄悄的批评。因此，这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幽灵的问题，不是一个关于不再存在的残余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积雪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新的、有力的和不断重新生长的个人积累倾向的问题。国家的第一个繁荣的浪潮还是很微弱的，正因为还很微弱，因此它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这些离心倾向。另一方面，没有特权的人也产生了一种欲望，即把新显贵的贪婪的手挡回去。于是社会斗争又趋于尖锐化。这就是官僚的权力的泉源。但是，也正是这个泉源产生了一种威胁，一种对官僚的权力的威胁。

第六章 不平等和社会矛盾的发展

一、匱乏、奢华和投机

苏維埃政权开始的时候是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到一九二一年便被迫恢复了市場。在五年計劃时期，由于物质資料极端缺乏，又实行了国家分配制——即在較高的基础上重新实行“軍事共产主义”的那一套做法。然而，事实证明，这个較高的基础还是不够的。到一九三五年，計劃分配制便又让位給商业。这样，事实就再一次表明，切实可行的分配办法，主要决定于技术水平和現有的物质資源，而不是决定于所有制的形式。

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实行計件工資制以后，将来就可以增加商品的数量，降低物价，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即資本主义在繁荣时期也不例外的一面。社会的現象和进程还必须从彼此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方面进行考察。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还意味着不平等的加剧。领导阶层的幸福的增进开始远远超过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国家財富的增长，新的社会分化也在发展。

根据日常生活条件，苏維埃社会已經分成安全的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和在匱乏中生活的多数人。不仅如此，从苏維埃社会的两种极端情况来看，这种不平等还拥有极其对立的性质。准备广泛流通的产品，通常总是价格高而质量低，而且离开中心城市越远就越难买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投机而且公然盗窃消費品，都具有群众性。过去这些行为是計劃分配制下的一种补充，現在則成为苏維埃商业的一种調节办法了。

苏联的“友人”有一种特有的习惯，那就是闭着眼睛、用棉花塞住耳朵来收集印象。我们不能信赖这种人。敌人则经常进行恶毒的诽谤宣传。因此，我们最好还是转向官僚本身。他们至少不会敌视自己，因此他们的正式自我谴责——这种情况常常是由于某种紧急的实际需要而引起的——应当比他们的更经常更叫得厉害的自我夸耀更值得相信些。

大家知道，一九三五年的工业计划是超额完成的。但是住宅建筑只完成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七。不仅如此，工人住宅的建筑还是在最缓慢最糟糕和最马虎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集体农庄的庄员，他们还和以前一样地同他们的小牛和蟑螂一道住在自己的破旧草房里。另一方面，苏维埃的达官贵人却在报刊上抱怨，为他们新造的住宅没有“家庭工人房间”——即没有专供家庭佣人居住的房间。

每一种制度在一般建筑和专门建筑方面都有其可纪念的特色。目前苏维埃时代的特点是，无数的苏维埃宫殿和楼房，官僚们的有时价值达一千万卢布的真正圣殿，豪华的影剧院，红军之家——即主要为军官修建的军人俱乐部——以及专供有钱人使用的富丽堂皇的地下铁道，而另一方面，工人住宅的建筑还是那样极端落后，甚至造得像营房一样。

铁路在运输国家货物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但是普通苏联人并没有在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公路和交通部的领导人发出无数的命令，抱怨列车和车站不卫生，“在旅途中对旅客服务的不周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在火车票方面出现大量作弊、盗窃和欺骗的行为……留下空座位进行投机活动，受贿……在车站和路上抢劫行李。”事实上，这些行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输业当中都是刑事罪。善于辞令的官员这样三番五次地抱怨，在一定的程度上表明，运输工具还非常不够人民使用，运输的产品还很缺乏，另外还有一点，铁路方面的官员同所有其他有权的人一样，对于普通人是根本漠不关心的。官僚们在陆地上、水上以及空中都令人羡慕地能

够为自己提供交通工具，关于这一点，我們只要看看大量的苏維埃特等客車、专車和专輪就可以知道——而上面說的这些交通工具，現在又在日益換成最好的汽車和飞机。

列宁格勒中央委员会主席日丹諾夫在說明苏維埃工业的成就时曾經肯定地說，在一年以內，“我們的工人积极分子来开会就不用再坐現在这种一般的福特車，而可以坐新式的小轎車了”，这句话得到了直接有关的听众的掌声。苏維埃的技术虽然是面向着人的，但它的努力方向首先还是滿足特定的少数人的高級要求。在有电車的地方，电車还是像从前那样挤得悶死人。

粮食工业人民委員米高揚曾吹嘘說，最低級的糖果正在被最高級的糖果排挤出生产部門，“我們的妇女”越来越要求高級香水。这种情况只不过意味着，自从工业轉入貨币流通的范圍以后，它正在日益适应更高級的消費者。这就是市場的規律，在这种市場上，高等的“夫人們”絕不会起最小的作用。除了这种情况以外，人們还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即根据一九三五年烏克兰的調查，在九十五个商店中，就有六十八个根本沒有糖果；对于点心的需要，也只能滿足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同时质量还是很低的。《消息报》曾經这样抱怨，“工厂的工作竟沒有考虑到消費者的要求。”自然，这里所指的消費者不是那些能够維護自己利益的人。

巴赫教授是从有机化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問題的，他发觉“我們的面包有时簡直糟透了”。男女劳动人民虽然不了解酵母和发酵的秘密，但也有同样的想法。他們跟尊貴的教授所不同的是，沒有机会在报刊上发表他們的意見。

在莫斯科，服装托拉斯登广告宣传各种各样的絲綢时装，这些时装都是由專門的“时装設計公司”設計的。然而，在各省，甚至在大工业城市，工人們如果不排队并忍受其他的煩惱就买不到一件印花布衬衫。理由很簡單：东西不够！供給多数人必需品比供給少数人奢侈品要困难得多。历来的情况就是这样。

米高揚在列举他的成就时告訴我們說：“人造牛油工业是一个

嶄新的工業部門。”不錯，這個工業部門在舊制度下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們沒有必要急于作出這樣的結論，即情況已經變得比在沙皇統治下還要壞。在那個時候，人民也是看不到牛油的。但是，牛油代用品的出現至少意味着，蘇聯已經有兩種消費者：一種是吃真正牛油的，另一種則只能吃到人造牛油。這位米高揚還曾吹噓說，“我們供應了大量馬霍卡煙給所有需要它的人”。他忘記了補充這樣一句話：無論在歐洲或者在美國，都從來沒有聽說過像馬霍卡這樣劣等的煙葉。

關於不平等現象，一種如果說不上大胆至少也是很明顯的表現是，在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有一些專賣高級商品的商店，這些商品上面都有一種不是俄羅斯式的但很有意味的設計：“Luxe”（“豪華”）。與此同時，人們無休止地抱怨莫斯科和各省的糧店發生大量搶劫的事情，這一點說明，雖然每個人都想有點東西吃，但是食品只能滿足少數人的需要。

工人家庭主婦對於社會制度有自己的看法，她們還有自己的“消費者”標準——這是幹部嘲笑她們的說法，其實這些幹部對於自己的消費也是很注意的——歸根到底，這種看法和標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勞動婦女和官僚的衝突當中，馬克思和列寧，還有同他們在一起的我們，都是站在勞動婦女一邊的。我們反對官僚，因為他們誇張自己的成績，掩飾矛盾，並且扼住勞動婦女的咽喉，使她們無法提出批評。

即使今天人造牛油和馬霍卡煙已經成為不適當的必需品，但如果吹噓和粉飾現實，那也還是沒有用。“積極分子”有新式小轎車，“我們的婦女”有高級香水，工人則只有人造牛油，貴人有“de luxe”（“豪華的”）商店的商品，平民則只能通過櫥窗看一眼精美的物品——這樣的社會主義在群眾看來只不過是一種改頭換面的資本主義，這種看法是並不怎麼錯的。在“普遍匱乏”的基礎上，爭奪生存資料的鬥爭有使“一切舊欺詐行為”復活的危險，而事實上，這種舊行為已經在一步一步地逐漸復活。

* * *

目前的市場关系与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下的市場关系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在于,目前的市場关系应当在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組織同各个公民之間沒有中間人和私商的情况下得到直接的发展。然而,这一点只有从原則上看是不錯的。国家和合作社的零售貿易額增长得很迅速,按照說明书,应当在一九三六年达到一千亿卢布。集体农庄的貿易額,一九三五年达到一百六十亿,今年还会大大地增长。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中間人在这些貿易額当中以及以外究竟占什么地位——至少不是无足輕重的地位!——是很难断定的。不仅是个体农民,就是集体农庄,特别是集体农庄的个别庄員,也都很喜欢依靠中間人。家庭工业的工人、合作社社員以及与农民进行交易的地方工业,也都走同样的道路。漸漸地就发生了这样出乎意料的事,即在一个广大的地区,肉、牛油和鸡蛋等商业都被“投机商”壟断了。甚至最必需的日用品,如食盐、火柴、面粉、汽油等,尽管国家的仓库里儲备着足够的数量,但是在官僚化的农村合作社中有时竟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沒有。显然,农民会通过其他道路来取得他們所需要的物品。苏維埃报刊常常在談到經紀人的时候,就像談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样。

至于其他形式的私人企业和积累,作用似乎比較小些。独立的馬車夫、小客棧的老板以及单独的手艺工人,就像单干的农民一样,都是半容許的职业。在莫斯科,就有相当多的私人小企业和修理店。这些商店的存在是得到默許的,因为它們填补了經濟中的巨大裂縫。可是还有多得多的私人企业家,在各种劳动組合和合作社的虛假招牌下或者在集体农庄的掩护下活动着——就好像是为了扩大計劃經濟中的裂縫这样一个特殊的目的。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員,常常按照恶毒的投机商这样的性质,把在街上出售家庭制造的圓扁帽或者布衬衫的飢餓妇女逮捕起来。

一九三五年秋天斯大林宣称,“在我們的国土上,投机活动的

基础已被摧毁，如果还有投机商的话，那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即缺乏阶级警惕性，对苏维埃机关各个环节中的投机商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这真是理想的官僚思想典型！投机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不需要任何警惕性了。例如，如果国家能够保障居民有足够的中等帽子，那就没有必要去逮捕那些可怜的街头小贩了。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必要性，的确还是一个疑问。

上面所说的私商的数目，正像他们的营业额一样，就其本身来说还不是令人感到不安的。你不可能真害怕汽车司机、卖圆扁帽的小贩、钟表匠以及买鸡蛋的人去进攻国家财产的堡垒！但是，这个问题仍然不是由纯粹的数学关系来决定的。只要行政方面稍微暴露出一点弱点，各种各样的投机商就会像发烧时出疹子一样地大量出头露面，这一点表明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还在继续不断地施加压力。投机的细菌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究竟有多大的危险，这一点完全决定于国家经济政治机体的总的抵抗力。

普通工人和集体化的农民——即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的情绪和行动，主要决定于他们的实际工资的变化。但是，他们的收入同地位较好的阶层的收入之间的关系，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人的消费领域内，相对性的法则可以最直接地表现出来！所有的社会关系，如果用货币来计算，那就会彻底地揭示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实际份额。即使我们了解不平等现象在很长的时期内还有历史必要性，但是在每个具体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的限度及其对社会的利害得失究竟如何，依然还是问题。为了分享国民收入而进行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目前的结构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结构这个问题，并不决定于官僚的诡辩，而决定于群众本身即产业工人和集体化农民本身对于这个结构所采取的态度。

二、无产阶级的分化

人们会以为，在一个工人国家里，关于实际工资的材料一定会特别仔细地加以研究——所有按照居民的类别而统计的收入材料一定是极其明了和易于了解的。然而，事实上，这个同劳苦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有关的整个问题，被一层不可穿透的密网包裹起来了。对于调查者来说，了解苏联工人家庭的预算比了解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预算要困难得多，这一点可能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我们曾经设法把各种类型的工人的实际工资用图表来说明，但是甚至连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情况也没有弄出来。各个方面和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寡言，正像它们对于毫无意义的数字大吹大擂一样说明问题。

根据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从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五年这十年当中，工人每月的产量增加了二点二倍，货币工资增加了三点五倍。但是后面这个堂而皇之的数字究竟有多少被工人阶级上层的专家吞掉了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个票面数字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呢——关于这种问题，我们无论是从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中或者报刊的说明中都找不到答案。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举行的一次苏维埃青年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科沙罗夫宣称，“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青年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但是，即使这些精心挑选的、年轻而喜欢鼓掌的勋章佩带者，对于这种吹嘘也没有发出一声掌声。听众同讲话的人一样十分清楚，市场价格的急剧变化已经降低了基本工人群众的物质条件。

每个人的“平均”工资，连托拉斯的经理和女佣都包括在内，一九三五年大约是两千三百卢布，一九三六年将达两千五百卢布左右——即票面价值达七千五百法国法郎，虽然实际购买力很难超过三千五百到四千法郎。这个数字本身就很不高，而如果考虑到

一九三六年的增加工資，是為了部分地補償由於取消消費品的特價和取消一系列的免費服務而遭到的損失，那末，這個數字就更加微小了。但是，主要的還是，每年兩千五百盧布，即每月兩百零八盧布，正如我們所說的，是**平均工資**——即一種算術上的假象，這種假象的職能在於掩飾工資的真正悲慘的不平等。

毫無疑問，上層工人的情況，特別是所謂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情況，去年有了相當大的改善。報刊不是沒有根據地那樣熱衷於列舉這個或那個得獎的工人為自己買了多少衣服、鞋子、留聲機、自行車或者多少瓶糖果。附帶說一句，這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普通工人得到這些好處的機會是多麼微乎其微。斯大林在談到斯達漢諾夫運動的推動力的時候宣稱，“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順利了。”在對計件工資制——這一點可以說明統治階層的最大特色——所作的這種樂觀的說明中，包含着這樣一個平凡的真理，即工人貴族之所以能夠形成，完全是由於國家以前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但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動力並不是來自“愉快”的情緒，而是來自那種想得到更多的錢的慾望。莫洛托夫用這樣的話糾正了斯大林的說法：“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提高生產率的直接動機，就是對增加收入感到興趣。”這句話一點也不錯。在短短的幾箇月中，一個工人階層出現了，他們被稱為“千字號人”，因為他們每月的收入已經超過一千盧布。還有些人每月的收入甚至在兩千盧布以上，而底等工人的收入往往還不到一百盧布。

看來好像只靠這種工資的差別就可以使“富”工人与“不富”工人之間有足夠的區別。但是對官僚來說，這一點還不夠。他們把各種各樣的特權幾乎像下驟雨般地給予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給他們新住宅或者給他們修繕舊房子，優先把他們送到休養所或者療養院去，派教師和醫生到他們的家里去免費教授和治病，給他們發免費的電影票。在某些地方，他們還可以免費理髮和修面，並且可以隨到隨理。在這些特權中，好像有許多是故意用來傷害和侮辱

一般工人的。当局方面之所以有这样过分的善意，除了权位概念以外，还由于他们良心上感到不安。地方上的统治集团，都急于抓住机会让上层工人同他们共享特权，以免自己陷于孤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实际所得往往等于下层工人的二三十倍。至于那些特别幸运的专家，他们的薪水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支付八十个到一百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工资的不平等方面，苏联已经不仅赶上而且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那些最优秀的真正为社会主义动机所推动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于自己得到的特权并不感到愉快，而是感到烦恼。这是不奇怪的。他们是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享受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因此周围充满了嫉妒和恶意，这就使他们受到了损害。这种关系同社会主义道德的距离，比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关系同这种道德的距离还要远得多，因为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还能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剥削的斗争。

尽管如此，在日常生活方面，甚至熟练工人也是不好过的，在各个省里尤其如此。七小时工作日在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越来越受到损害，不仅如此，还要花费不少时间来另外设法补助生活。他们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苏维埃农场比较好的工人所过的特别幸福的生活，即拖拉机手、康拜因驾驶员等等——这些人都是已经臭名远扬的贵族——都有自己的乳牛和猪。没有牛奶的社会主义比没有社会主义的牛奶好这样一种理论已经抛弃了。现在承认的是，在既不缺牛也不缺猪的国营农业企业中，工人们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得到保障而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小经济。同样显著的一件事是，官僚洋洋得意地宣称，哈尔科夫有九万六千名工人有自己的菜园——其他城市也都被要求同哈尔科夫竞争。在“自己的乳牛”和“自己的菜园”这些字眼里，包含着多么可怕的人力浪费！官僚加在工人身上的，特别是加在工人的妻子儿女身上的，又是怎样一种中世纪式的掏粪挖土的重担！

至于基本群众，当然既没有乳牛也没有菜园，大部分甚至没有

自己的住宅。非熟练工人的工資，每年是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卢布，甚至还要少些——这种情况在苏維埃的物价下就意味着一种貧困。作为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最可靠的标志的生活条件是极其恶劣的，常常是无法忍受的。絕大多数工人挤在公共宿舍里，其設備和維修比营房还要差得多。在有必要为工业部門遭到的失敗、工人装病怠工和出产次品等現象辯解的时候，管理机关本身也会通过新聞記者的笔描繪出这样的生活状况来：“工人們睡在地板上，因为床上的臭虫咬得他們睡不着。椅子坏了；沒有喝水用的杯子，等等。”“两家人住在一間房子里。房頂是漏的。下雨的时候，他們就把屋內的雨水一桶一桶地倒出去。”“廁所髒得熏死人。”这种描述同全国各地都有联系，而且想写多少就可以写多少。由于这种不堪忍受的条件，例如石油工业的領導人就写道，“劳动力的流动性已經达到最高点。……由于沒有工人，很多油井完全廢棄了。”在条件特別不利的某些地区，只有在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各样的違反紀律行为而被开除或解雇的人，才願意来干活。因此，在无产階級的底层，正在形成一个被遺棄的苏維埃貧民层，他們沒有权利，可是像石油生产这样重要的工业部門还不能不使用他們。

由于这种悬殊的工資差別，再加上专橫的特权，官僚便在无产階級当中制造了尖銳的矛盾。斯达汉諾夫运动的材料有时就呈現出一幅小規模內战的图景。例如工会的机关报就写道，“損坏和破坏机器是反对斯达汉諾夫运动的斗争所喜欢使用的(!)办法。”接着又說，“階級斗争在每一个步驟当中都可以感觉得到。”在这个“階級”斗争中，工人站在一边，工会站在另一边。斯大林曾經公开建議，向那些反抗的人“直接开火”。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員也不止一次地进行威胁，要把“蛮橫的敌人”从地球上清除干净。斯达汉諾夫运动的經驗特別清楚地表明，当局和无产階級之間存在着深刻的裂痕，官僚在运用“分而治之”这个的确并不是他們发明的格言时非常坚决。不仅如此，为了安慰工人，这种强制性的計件劳动被称作“社会主义竞赛”。这个名称听起来就像一种嘲弄！

竞赛是我们的生理遗传中所固有的东西，如果清除了其中的贪婪、嫉妒和特权成分，那末，毫无疑问，在共产主义下也仍然会是最重要的促进文化的动力。但是在目前的准备时期，要使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而且一定会真正建成，那就不是用苏维埃政府所采用的那种令人感到羞辱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办法，而是用更值得解放了的人所使用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不用官僚的那根鞭子。因为这根鞭子是从旧世界传下来的最令人厌恶的遗产。必须把它粉碎并在营火中烧掉，才能毫无愧色地谈社会主义。

三、集体农村的社会矛盾

如果说工业企业“原则上”是社会主义企业，那末，集体农庄还不能这样说。集体农庄所依靠的不是国家，而是集体财产。同分散的个体经济比较起来，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集体企业是不是会导致社会主义，那还要看一系列的条件，其中有一部分条件是在集体农庄的范围以内，有一部分是在苏维埃制度的一般条件以内，还有一部分——并且是同样大的一部分——则在世界舞台上。

农民和国家之间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目前还很不稳定的农业组织，只不过是两个斗争中的阵营在彼此之间进行了可怕的内战以后的一种暂时的妥协。的确，百分之九十的农庄已经集体化，百分之九十四的农产品是从集体农庄来的。即使考虑到有一定百分比的集体农庄是一种假象，在它们那里基本上是个体农民，但还是必须承认，战胜个体经济的工作看来至少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九。然而，农村地区的各种力量和倾向之间的真正斗争，远远不是局限于个体农民和集体农民之间的针锋相对的对立这样一个范围。

为了安撫农民，国家认为自己不能不向农村的私有的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作很大的让步，首先是把“永久”使用土地权正式转交

給集体农庄——这就是在实质上廢除了土地的社会化。这是一种法律上的假象嗎？从力量对比来看,这种假象有可能成为现实,并且在最近的将来会使全国范围的計划經濟遭到巨大的困难。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国家被迫恢复了个体农民經濟,农民有了自己的小块田地,还有了自己的牛、猪、羊、家禽等等。由于这种違反社会化和限制集体化的做法,农民們才温順地——虽然还没有多大热情——同意了在集体农庄中干活,而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他們有机会完成对国家的交售义务,同时也可以使他們自己得到一些东西。这种新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形式,因此即使苏联的統計学家比較誠实,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这种关系。然而,从許多事情看来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結論,即从农民个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小块田地并不比集体农庄不重要。这一点意味着,个人主义傾向和集体傾向之間的斗争还在整个农村居民中进行,同时斗争的結果还没有决定。那末农民們究竟傾向于哪一条道路呢?他們自己还不太清楚。

一九三五年底农业人民委員說,“到目前为止,在完成国家的粮食供应計划方面,我們遭到了富农分子的猖狂反抗。”換句話說,这一番話意味着,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到最近”(今天的情况又怎样呢?)还认为把粮食交給国家是一件对自己不利的事,他們傾向于搞私营商业。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证明,即国家制訂了严厉的法律来保护集体财产,防止集体化农民自己进行掠夺。很有启发的是,集体农庄向国家保險的财产是二百亿卢布,而集体化农民所保險的私有财产是二百一十亿卢布。如果这种对比不一定意味着分散的农民比集体农庄富足,那末无论如何說明了这一点,即农民在私有财产保險方面比在公共财产保險方面要慎重得多。

从我們的观点看来,同样說明問題的是畜牧业的发展情况。馬的数目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以前是在不断地减少,只是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年才略有增加;而牛的数目到去年已經增加到

四百万头。在一九三五年这个条件有利的年头，养馬計劃只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四，而养牛則大大超过了計劃。这些材料的意义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即馬只能是集体财产，而牛則已經是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可以私有的牲畜。这里只需要补充这样一点，即在草原地区，集体化农民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可以拥有一匹馬，因此这些地区的馬比集体农庄的馬增加得快，而集体农庄的馬又比苏維埃农場的馬增加得快些。这些情况并不是說，私有小經濟比大規模社会化經濟优越，而是說明从私有小經濟过渡到大規模社会化經濟，从野蛮主义过渡到文明，其中隐藏着許多困难，而这些困难都是不能仅仅用行政压力来克服的。

“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經濟制度以及由此經濟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出租土地虽然是法律所禁止的，实际上却很广泛地流行着，不仅如此，还以最致命的分成制形式流行着。这个集体农庄的土地租給那个集体农庄，有时租給一个外面的人，最后，有时甚至租給本农庄比較有个人事业心的庄員。說来难以相信，苏維埃农場——即“社会主义”企业——居然也出租土地。另外，尤其說明問題的是，干这种事的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苏維埃农場！在这个維護法律的高級机关的保护下，苏維埃农場的經理向农民提出的租地条件，几乎完全是从旧地主与临时工訂的契約中抄下来的。我們从这些方面看到了官僚剝削农民的情况，这种官僚已經不再具有国家代理人的性质，而具有半合法地主的性质了。

尽管一点也沒有扩大这种丑恶現象的范围——这种現象当然无法統計——我們还是不能不看到这种現象所具有的巨大的带有征兆性的意义。这种現象明白无誤地证明了，在这个包括絕大多数人口的还极端落后的經濟部門，资产阶级傾向多么强烈。与此同时，尽管财产关系具有新的結構，市場关系还是不可避免地加强着个人主义傾向，加深着农村的社会分化。

平均計算，每个集体农庄的收入大約四千卢布。但是，关于农

民的“平均”数字甚至比关于工人的“平均”数字还要具有欺騙性。例如在克里姆林宮，有人汇报說，集体化漁民在一九三五年的收入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一倍，即每人得到一千九百一十九卢布，后面这个数字得到了掌声，这一点說明这个数字大大超过集体化基本群众的收入。另一方面，有些集体农庄的每户收入高达三万卢布，这还没有把个人經濟的貨幣和实物收入計算在內，也没有把整个企业的实物收入計算在內。总的說来，这些大集体农庄的每个庄員的收入等于“平均”的工人工資和低等集体化农民收入的十倍到十五倍。

收入的等級只是部分地决定于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勤奮程度。集体农庄和农民个人的土地，由于气候、土壤和作物类别的不同以及距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远近不同，而必然处于非常不平等的状态。城乡的对立不仅沒有在五年計劃期間減輕，反而由于城市和新工业区的迅速发展而大大尖銳化。苏維埃社会的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对立，主要是因为級差地租，不可避免地会在集体农庄之間以及集体农庄內部派生出矛盾。

官僚的漫无限制的权力，也是促使社会分化的一个同样有力的工具。他們掌握着工資、物价、捐稅、預算以及信貸这样一些杠杆。中亚地带有一系列种植棉花的集体农庄，收入很不平衡，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規定的价格不同，而不是由于集体农庄庄員的工作好坏。某个居民阶层剝削另一个居民阶层的現象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掩盖起来了。几万个“富裕”集体农庄庄員的幸福是牺牲其他集体农庄庄員和产业工人的利益而得到的。使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員都达到富裕的水平，是一个比牺牲多数人而使少数人拥有特权要困难得多和費时得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内左翼反对派曾宣称，“富农的收入已經增加得比工人的收入多到无法衡量的地步”，这个說法到現在还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換了一种形式。上层集体农庄庄員的收入已經增加得比基本工农群众的收入多到无法估計的程度。目前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別也許比消灭富农以前还要悬殊。

集体农庄**内部**的分化，一部分表现在个人的消费上；一部分表现在同集体农庄毗连的个人企业上，这是因为集体农庄本身的基本财产已经社会化。集体农庄**之间**的分化已经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后果，因为富有的集体农庄有机会使用更多的肥料和更多的机器，因而可以更快地富足起来。取得成就的集体农庄往往雇用穷苦集体农庄的劳动力，而当局对此闭眼不问。把价值不等的土地分配给集体农庄，这就大大地促进了集体农庄之间的进一步分化，并形成一种资产阶级集体农庄，或者叫做“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甚至现在它们还被人这样称呼。

在农民发生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当然可以作为调整者进行干预。但是朝哪个方向做呢？干预到什么限度为止呢？进攻富农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这就会同农民当中比较“进步的”阶层发生新的冲突，而这种阶层的农民只是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停顿以后，现在才开始感到迫不及待地需要一种“幸福的生活”。不仅如此——而这一点还是主要的——国家政权本身变得越来越不能进行社会主义监督了。在农业当中也像在工业当中一样，国家政权设法寻找强有力的、顺利的“田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支持和友谊，寻找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的支持和友谊。国家政权最初所关心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就只关心自己了。正是在消费与生产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农业中，集体化已经为官僚的寄生主义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并为这种寄生主义同集体农庄的上层集团相互帮助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集体农庄的庄员在克里姆林宫的庄严会议上献给领导人的祝贺性“礼品”，只不过是它们向地方政权代表经常纳贡的象征性表现。

由此可见，低生产水平同社会主义的甚至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地发生冲突的情况，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还要严重得多。归根到底，官僚正是从这种矛盾中产生的，而它们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矛盾。

四、統治階層的社会面貌

在苏联的政治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指責“官僚主义”的話，說它是一种坏的思想习惯或者是一种坏的工作方法（这种指責常常是自上而下的，这正是上层集团的一种自卫的方法。）。但是無論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到官僚作为一个統治階層的調查材料——它的人数和結構，它的人員，它的特权和欲望，以及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吞噬的部分。虽然如此，它是存在的。它非常謹慎地隱蔽自己的社会面貌，这一点证明它有一种統治“階級”的特殊感，而对于自己有权进行統治却还远远沒有自信心。

用准确的数字來說明苏維埃的官僚是絕對不可能的，理由有二。首先，在一个政府几乎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很难說什么样的机关才不是行政机关。其次，在这个問題上，正如我們已經說过的，苏維埃的統計学家、經濟学家以及政論家都抱着完全沉默的态度。他們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他們的“友人”的仿效。我們順便提一句，在韦伯夫妇辛勤編写的那一千二百頁的书中，从沒有把苏維埃官僚作为一个社会范疇来提。这并不奇怪，因为从实质上說，他們就是在官僚的命令下写的！

按照官方数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的中央国家机关領導人員約为五万五千人。但是，这个数字（最近几年又有了很大的增长）既沒有包括陆軍部、海軍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沒有包括合作社和像国防航空化学协进会（Ossoaviokhim）^①这样的一系列所謂社会团体。此外，每个共和国还有自己的政府机关。

同国家机关、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机关（有一部分是互相交錯的）平行的，还有强有力的党机关。如果我們說苏联和各个共和国的上层領導集团有四十万人，那很难說是誇大。目前这个数字

^① 全称是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工业发展协进会。——英譯者注

很可能已經增加到五十万。这还没有包括一般干部，而只包括“达官贵人”、“领导人”——姑且这么說——即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統治阶层，虽然說实在的，它本身又为很重要的界限分成若干等級。

这个拥有五十万人的上层，由一个巨大的行政金字塔支持着，而这个金字塔的基础是寬闊的和多方面的。各省各县的苏維埃执行委员会，以及与此平行的党机关、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运输机关、陆軍和海軍的司令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直屬机构，总共大約有两百万人左右。同时我們还不能忘記六十万个城乡苏維埃的主席。

工业企业的直接管理权在一九三三年(沒有更新的材料)是掌握在一万七千名經理和副經理的手中。車間、工厂和矿山的全部行政管理人員和技术人員，甚至包括較低的职位如工长，大約有二十五万人(虽然其中有五万四千名专家，严格地說来并没有担負行政管理的职能)。此外，我們还必须加上工厂中的党机关和工会机关。正像我們所知道的，在工厂里，行政管理就是以这种“三角”的形式进行的。有五十万人管理着全国性的工业企业，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个数字并没有夸大。另外我們还必须加上各个共和国和地方苏維埃的企业中的管理人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官方的統計数字表明，一九三三年整个苏維埃經濟有八十六万以上的行政人員和专家——工业中有四十八万以上，运输业中有十万以上，农业中是九万三千人，商业中是两万五千人。这个数字固然包括了沒有行政权力的专家，但并没有包括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这些材料在最近两年半当中也大大地落后于实际情况了。

就二十五万个集体农庄來說，如果只計算主席和党的組織者，那就有五十万行政管理人員。实际数字要大得多。如果加上苏維埃农場和机器拖拉机站，社会化农业的領導者总数，远远超过一百万。

一九三五年，国家有十一万三千个商业部門，有二十万个合作

社。这两类机构的领导人，从本质上說并不是商业雇員，而是国家干部，并且还是壟断者。連苏維埃报刊也不时地抱怨，“合作社的管理人員已經不把合作社社員看成自己的选民了”——好像合作社机构在性质上可以同工会、苏維埃和党本身截然分开！这整个阶层都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只是管理、下令、指揮、寬恕和惩罚，撇开教师和学生不算，这个阶层总在五六百万人之間。这个总数就像构成这个数字的各个項目一样，根本談不上准确，但很够我們进行初步的研究。事实足以使我們确信，领导的“总路綫”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

在这个統治结构的各个阶层中，从下到上，共产党員大約占百分之二十到九十。在全部官僚当中，共产党員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員大約有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人——由于接連不断的清洗，目前这个数字只有少了一些，而不会增加。这就是国家政权的支柱。这些共产党行政管理人員也正是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柱。以前的布尔什維克党，現在已經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鋒队，而成了官僚的政治組織。剩下的党員和共青团員只是构成这种“积极分子”的泉源——即补充官僚队伍的后备軍。非党的“积极分子”也是为同一目的服务。从假定的意义上說，我們可以认为，工人貴族和集体化农民貴族、斯达汉諾夫工作者、非党“积极分子”、得到信任的人以及他們的近亲远亲，差不多等于我們估計的官僚数字，即大約也在五六百万人之間。如果再加上他們的家屬，那这两个相互交錯的阶层大約有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人。我們对家庭成員的估計相对地來說比較低些，因为往往丈夫和妻子，有时甚至儿子和女儿都在机关里占着一个位置。此外，統治集团的妻子在限制家庭人口方面要比劳动妇女，特别是比农村妇女容易得多。目前的反墮胎运动是官僚发起的，但并不适用于他們自己。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也許有百分之十五——这就是专制的統治集团的真正社会基础。

只要还是只有很少数人能够得到单独的住宅、足够的食品和

整洁的衣服，那末，几百万大小官僚就会首先设法利用权力来保障自己的福利。这样就会使这个阶层具有浓厚的自私自利心理，使它的内部有一种牢固的团结一致精神，使它害怕群众的不满情绪，使它顽固地坚持压制一切批评，最后还使它向“领袖”进行虚伪的宗教式的膜拜——这是因为这位“领袖”正是这些新贵族的权力和特权的体现者和维护者。

官僚本身在协调一致方面比无产阶级或农民还要差。农村苏维埃的主席和克里姆林宫的达官贵人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各种范畴的低级干部基本上过着一种很原始的生活——比西方熟练工人的生活水平还要低。但是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他们周围的居民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得多。集体农庄主席的命运，党的组织者的命运，合作社下级管理人员的命运，就像最高级上司的命运一样，一点也不决定于所谓“选民”。为了平息某种不满情绪，这些干部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自己的直接上司搞下去。但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有时也可以高升一步。这些人至少在遇到第一次严重的波折以前，是由于共同的安全保障而同克里姆林宫结合在一起的。

统治阶层在生活条件方面包括各种各样的等级，从边远地区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一直到大都会的大资产阶级生活。同这些物质条件相适应的，也有各自的习惯、兴趣和思想范围。目前苏维埃工会的领导人在心理形态方面与西特令、石乌和格林之流并没有多大的不同。虽然言词有所不同，但是同样的以傲慢的恩人态度对待群众，同样的以没有良心的狡猾手段施展二流的阴谋诡计，同样的保守，同样的眼界狭小，同样的只关心自己的平静生活，最后，同样的崇拜最浅薄的资产阶级文化形式。苏维埃的大多数将校军官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将校军官也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不顾一切地竭力模仿后者。苏维埃外交家从西方外交家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燕尾服，而且还有他们的思想方式。苏维埃新闻记者的愚弄读者方面也不亚于他们的外国同行，虽然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方式。

如果說估計官僚的人數是一件困難的事，那末，要確切地說出他們的收入更是一件困難的事。早在一九二七年左翼反對派就曾抗議，“龐大的享有特權的行政機關正在吞掉很大一部分剩餘價值”。根據反對派綱領中的估計，單單貿易機關就“吞掉一大部分國民收入——占全部生產的十分之一以上”。由於這種估計，當局便採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使別人無法再做這種估計。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經常性開支不僅沒有削減，反而增加了。

其他方面的情況並不比貿易方面好些。正如拉柯夫斯基一九三〇年所寫到的，正是由於黨的官僚和工會的官僚之間偶然發生的一次爭吵，居民才從報刊上發現，在工會的高達四億盧布的預算中，就有八千萬盧布是用來養活工作人員的。我們要指出，這裡還只不過是一個合法預算的問題。除此以外，工會官僚還從工業部門的官僚方面得到大量表示友誼的禮品，例如現金、住宅、交通工具，等等。拉柯夫斯基問道，“究竟有多少錢是用來維持黨、合作社、集體農莊、蘇維埃農場、工業機關和行政機關以及它們的分支機構呢？”他的回答是，“我們連假設的材料都沒有。”

擺脫監督的不可避免的後果是濫用職權，其中包括金錢方面的不法行為。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政府又一次被迫提出了合作社的工作情形不好的問題，在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簽字下，政府確定了這樣的事實：“在許多農村消費合作社中，存在着大量掠奪、浪費和損失現象。”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財政人民委員抱怨說，地方執行委員會容許隨便濫用國家的資金。如果這位委員對於中央機關的情況保持沉默的話，那只不過是因為他本人就屬於那個範圍。

要估計官僚在國民收入方面占用了多大的比例是不可能的。這不僅是因為官僚連自己的合法收入也謹慎地隱蔽起來。也不僅是因為他們可以利用不法行為的最後界限，常常還可以越過這種界限來廣泛地使用事先預計不到的收入。而主要是因為在社會福利、市政公用事業、舒適、文化、藝術等方面的整個進步，如果不是

全部的話，至少主要还是为这个特权上层服务。

关于官僚的消費情况，我們只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就可以把說过资产阶级的話重說一遍。沒有理由夸大官僚对于个人消費品的欲望，这样做也沒有意义。但是，如果我們考虑到官僚几乎独占了文明的新老成果，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名义上說，这些好东西当然是屬於全体居民的，至少是屬於城市居民的。但是实际上，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居民才可以得到这种东西。官僚的情况恰好相反，他們通常想什么时候使用就什么时候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就好像是他們个人的財產一样。如果不仅計算薪水和各种各样的实物收入以及各种型式的半合法补充收入，而且还加上官僚和苏維埃貴族在影剧院、休养所、医院、疗养院、避暑地、博物館、俱乐部以及体育场等地方所享受的待遇，那也許有必要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即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二十的居民所享受的財富，并不比其余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居民所享受的少多少。

那些“友人們”也許要反駁我們的数字吧？希望他們提出更准确的数字。希望他們能够劝說官僚把苏維埃社会的收支賬目公布出来。只要他們还没有这样做，我們就坚持我們的意見。我們毫不怀疑，苏联在物品分配方面要比沙俄时代民主得无可比拟，甚至比西方最民主的国家也民主得无可比拟。但是，这同社会主义仍然沒有有什么共同之处。

第七章 家庭、青年和文化

一、家庭中的热月

十月革命忠实地履行了它在妇女方面的义务。年青的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予妇女同男子一样的各种权利，而且更重要的，它还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比任何其他政府都做了多得多的努力，来真正保障妇女从事各种形式的经济和文化工作。然而，最大胆的革命，像“全能的”英国议会那样，也不能把女人变成男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能使男女平均分担怀孕、生产、养育和教导孩子的负担。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来摧毁所谓“家庭”——即劳苦阶级的妇女在其中像奴隶般地从小劳动到死的那种陈腐、令人感到窒息和停滞的制度。按照计划，家庭作为一种与外界隔绝的小组织，将由一种社会给予关怀和方便的完善制度来代替，这种制度包括产科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医院、疗养院、体育组织、电影院，等等。家庭的那些有关家务的职能如果完全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机构来执行，把好几代人都团结起来并使他们互相帮助，那就会使妇女，因而也就会使一对一对的爱人，真正摆脱千年的桎梏。一直到現在，这个问题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四千万苏维埃家庭的绝大多数依然还是中世纪的巢穴，妇女处于奴役和歇斯底里的状态，儿童天天遭到虐待，妇女和儿童沉溺在迷信中。我们绝不能在这方面抱任何幻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在处理家庭问题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才最足以说明苏维埃社会的真正性质及其统治阶层的演变情况。

事实已经证明，用猛烈的手段一下子把旧家庭取消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因为缺乏意志，也不是因为家庭还那样根深柢固地

长在人们的心里。恰恰相反，女工以及比较进步的农妇，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对政府及其托儿所、幼儿园等类似的组织不信任以后，已经认识到儿童由集体照管以及整个家庭经济社会化的无限好处。不幸，社会太穷了，也太没有文化了。国家的实际资源同共产党的计划和意图不相称。家庭不能“废除”，而必须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它。妇女在“普遍匮乏”的基础上是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的。经验很快地就证明了马克思在八十年前所表述的这个朴素的真理。

在荒年期间，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只要可能就都在工厂和其他公共食堂里吃饭，这种情况被正式地认为是达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活以前的一种过渡状态。现在没有必要再来分析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不同时期的特点。事实是，从一九三五年取消粮食券制度以后，所有待遇较好的工人都开始回到家里吃饭。如果认为这种倒退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谴责，那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制度总的来说还从来没有实行过。但是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对于官僚所组织的“公共食堂”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公共洗衣房，因为那里撕破和偷掉的衣服比洗的衣服还要多。回到家庭的厨房去吧！但是在家里做饭和在家里洗衣服——这是目前讲话的人 and 新闻记者半含羞愧的心情所称道的事情——意味着工人的妻子又回到锅勺和洗衣盆旁边，这就是说，又回到旧的奴隶地位。共产国际关于“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彻底和不可变更的胜利”的决议，对于工厂区域的妇女来说是不是那么有说服力，确是一个疑问！

不仅同家庭工业而且同农业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比城市家庭要稳定得多，也保守得多。一般的规律总是，只有少数几个穷农业公社在初期建立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根据最初所宣布的办法，集体化将在家庭的领域发生一次决定性的变化。他们没收了农民的牛以及鸡，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关于公共食堂在整个农村地区取得胜利的进展，当然也不会不加以宣扬。但是在开始退却的时候，现实情况突然从这种夸大的幻影当中显现出来了。农民

从集体农庄所得到的东西，通常只是給他自己吃的面包和喂牲口的粮草。肉类、乳制品以及蔬菜，几乎全部是从农庄旁边的个人小块土地上得到的。只要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是由于家庭本身的单独努力而得到的，就再談不上什么公共食堂。在这种情况下，为家庭炉灶奠定了新基础的小块田地，便給妇女加上了双重的負担。

一九三二年托儿所平常收容的儿童总数是六十万，农忙季节也只不过四百万左右。一九三五年婴儿的总数是五百六十万，但是經常在托儿所的婴儿只占一小部分。此外，就現有的托儿所來說，即使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中心城市的，通常也不能滿足最低的要求。苏联的一家大报纸抱怨說，“一个托儿所，如果孩子觉得比家里还糟，那就不是一个托儿所，而是一个坏的孤儿院。”难怪待遇較好的工人家庭总是不願意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但是对于基本的劳苦群众來說，就是这种“坏的孤儿院”也嫌太少了。就在最近，中央执行委员会还通过了一項決議，凡是棄儿和孤儿都要由私人收养。这样，官僚政府通过它的最高机关承认了，它在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职能上已經破产。幼儿园的孩子，在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五这五年当中，从三十七万增加到一百一十八万一千名。一九三〇年的数字固然低得惊人，就是一九三五年的数字在苏維埃家庭中似乎也只是滄海之一粟。如果进行进一步的調查，那就会毫无疑问地表明，在这些幼儿园中，主要的也就是比較好的幼儿园，都是屬於行政官吏、技术人員和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等的家庭的。

就是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不久以前被迫公开承认了这样一点，即“关于肃清无家可归和无人照管的儿童的決議执行得很差”。这种不得已的供认背面隱藏了些什么呢？我們只是偶然从报纸用小字体排的評論中了解到，在莫斯科，有一千多个儿童在“特別困难的家庭条件”下生活着；在首都的所謂儿童之家，大約有一千五百个儿童无处栖身而流落街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一九三五年秋季的两个月当中，有“七千五百个父母被法庭傳訊，因为他們把孩子扔下不管”。把他們帶到法庭上有什么好处呢？有几

千几万父母避免了被带到法庭上呢？还有多少生活在“特别困难条件”下的儿童没有登记下来呢？特别困难的条件与完全困难的条件有什么不同呢？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答。大批儿童无家可归的现象——明显的以及表面上看不到的——是旧家庭迅速瓦解而新制度来不及代替它这样一种社会大危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从报纸偶然透露的这些情况以及犯罪记录的片断中，读者可以发现苏联还存在着卖淫现象——即妇女为了能出得起钱的男人的利益而做出的极端堕落的行为。去年秋天，《消息报》突然告诉读者，在莫斯科逮捕了“多到一千名在无产阶级的首都的大街上暗中卖淫的妇女”。在这些妇女当中，有一百七十七个女工，九十二个女职员，五个女大学生，等等。是什么把这些妇女赶到街头上去的呢？工资不够，匮乏，需要“得到一点什么东西来买件衣服，买双鞋”。要想了解这种社会罪恶的大致范围，那是徒劳的。稳健的官僚命令统计学家保持沉默。但是，这种强迫的沉默本身就确切无误地证明了苏联妓女“阶级”的人数众多。在这里，从本质上说，不可能是“过去的残余”这样一个问题；妓女是从年青的一代人当中产生的。当然，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把这种与文明同样悠久的罪恶的具体责任推在苏维埃制度身上。但是，在卖淫现象存在的情况下高谈社会主义胜利，这是不可原谅的。不错，报纸断言——在它们获准论述这个棘手的问题时——“卖淫现象日益减少。”同饥饿和衰颓的年代（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比较起来，这种情况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但是，自从当时恢复货币关系而取消了一切直接分配的制度以后，妓女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必然会有新的增加什么地方有特权者，什么地方就有贫穷的贱民！

毫无疑问，大批儿童无家可归的现象最清楚地也最富有悲剧性地说明了母亲处境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就连一向乐观的《真理报》有时也不能不辛酸地承认：“生孩子对于许多妇女的地位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革命政权才给予妇女

墮胎權，在匱乏和家庭窮困的情況下，不管宦官式的男子和老處女在這個問題上說些什麼，這種權利乃是婦女在公民、政治和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權利之一。然而，婦女的這種權利本身儘管是十分淒慘的，在現有的社會不平等情況之下却正在變成一種特權。從報刊上偶爾透露的一些關於墮胎情況的消息看來，確是令人驚訝。例如，僅僅經過烏拉爾某區一家鄉村醫院的調查，一九三五年就有“一百九十五個婦女被產婆搞成殘廢”，其中有三十三個勞動婦女，二十八個女職員，六十五個集體農莊婦女，五十八個家庭主婦，等等。烏拉爾的這個地區與大多數其他地區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這個地區的情況碰巧給報刊披露了。在蘇聯的整個國家內，每天有多少婦女變成殘廢啊？

由於事實表明，國家沒有能力為那些被迫墮胎的婦女提供必要的醫療幫助和衛生設備，於是它便突然改變方針，走上禁止墮胎的道路。正像在其他情況下一樣，官僚只好假裝是主動採取了這種措施。蘇維埃最高法院的法官之一、一位婚姻問題專家蘇耳茲，把當時即將實行的禁止墮胎歸結為這樣一個理由，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既然已經沒有失業等等現象，婦女就沒有權利拒絕“做母親的快樂”。牧師的哲學也被賦予了憲兵的權力。我們剛剛聽到執政黨的中央機關報說，生孩子對於許多婦女——更真實點說是對於絕大多數婦女——的“地位來說是一種威脅”。我們剛剛聽到蘇維埃最高機關說，“肅清無家可歸和無人照管的兒童的任務執行得很差”，這種情況毫無疑問地意味著無家可歸的兒童又增加了。可是現在蘇維埃的最高法官卻告訴我們，在一個“生活快樂”的國家里，墮胎應當受到坐牢的懲罰，就像在生活悲慘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很清楚，在蘇聯就像在西方一樣，那些落在獄吏的魔掌中的婦女主要是很難隱瞞自己的困難的女工、女傭和農婦。就需要精緻香水和其他好東西的“我們的夫人”來說，她們仍和以前一樣，可以在縱容的法官面前做任何她們認為必要的事情。蘇耳茲閉着眼睛不看無家可歸的兒童而得出結論說，“我們需要人”，千百萬勞苦

妇女如果不是被官僚封住了嘴的话，也许会回答这位最高法官说，“那末就请你们多生些孩子吧。”这些老爷似乎已经完全忘记，社会主义是要消除那些迫使妇女堕胎的原因，而不是借助于讨厌的警察干预妇女最隐秘的生活领域，来强迫妇女接受“做母亲的快乐”。

禁止堕胎的法律草案进行了所谓全民讨论，即使在苏联报刊那样严密的控制下，还是有許多辛酸的抱怨和遭到压抑的抗議爆发出来。讨论刚刚宣布就突然停止了，于是在六月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把这个可耻的草案变成三倍可耻的法律。甚至官僚的一些官方辯护士也感到困惑。路易斯·費希尔說，这项立法具有某种可悲的誤会性质。实际上，这个对付妇女——但有利于貴妇——的新法律是热月反动的自然的和合乎邏輯的結果。

在家庭胜利恢复的同时，卢布也恢复了——真是天緣巧合！——这是国家在物质和文化方面都遭到破产而引起的后果。领导人不敢公开說，“我們已为事实证明，还太穷太无知，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社会主义关系，我們的儿子和孙子将实现这个目标”；他們却强迫人民把破碎了的家庭外壳重新粘合起来，不仅如此，他們还在极刑的威胁下强迫人民承认家庭是胜利的社会主义的神圣核心。这种退却的程度是很难用眼睛来衡量的。

立法者和文学家，法庭和民兵，报纸和教室，每个人和每样东西都被拉进了新路線。有一个天真老实的共青团員在他的报纸上大胆地写道，“你們最好还是設法解决怎样才能使妇女摆脱家庭的魔掌这样一个問題”，結果他挨了几耳光，沉默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被宣布为“左傾的过火行为”。沒有教养的势利之徒的愚蠢而腐朽的偏見，却以新道德的名义复活了。在这个广闊无垠的国家的各个角落的日常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报刊只是輕微地反映出热月反动在家庭领域所达到的严重程度。

由于傳布福音的崇高热情是随着罪恶的增长而增长的，結果第七誡^①便在統治阶层当中大为盛行。苏維埃的道德家只要把詞句稍微改变一下就行。一种反对太經常太随便的离婚的运动已經

展开。立法者运用他們的創造思想发明了一种“社会主义”措施，即离婚登記要繳納一笔錢，离婚的次数越多繳納的錢也就越多。我們在上面談到，家庭的复活同卢布教育作用的增加是携手并进的，这并不是沒有原因的。毫无疑问，征税会使那些繳不起錢的人很难进行离婚登記。对于上层的人來說，我們可以想像，繳款不会带来任何困难。不仅如此，有漂亮住宅、有汽車和有其他好东西的人，还可以把私事安排得不致于不必要地暴露給外人，因此也就不必去登記。只是在社会的底层，卖淫才具有一种悲惨的和羞辱的性质。至于苏維埃社会的上层，在那里权力和幸福是結合在一起的，卖淫是以一种不大看得出交易性质的雅致形式表現出来的，甚至还具有“社会主义家庭”的外表。关于“汽車——閨房因素”在統治阶层的蜕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們已經听过索斯諾夫斯基所說的話。

那些喜欢歌功頌德的人、經院学派以及其他的“苏联友人”，都有眼睛，但什么也看不见。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婚姻和家庭法，曾經一度是这次革命理应感到自豪的事情，現在却由于从資產階級国家的法律宝庫借来了大量东西而正在逐漸丟棄和瓦解。好像有意要把背叛弄成一件可笑的事，原先提出来作为贊成无条件自由离婚和自由墮胎的那些論据——“妇女解放”、“保障个人权利”、“保护母亲”——現在却用来作为限制离婚和完全禁止墮胎的論据了。

这种退却不仅具有令人厌恶的虛伪形式，而且比严峻的經濟需要所要求的退却程度还要走得远得多。像离婚后贍养費等資產階級形式的所以恢复，除了客观原因以外，还有一点，即統治阶层的社會利益也要求加强資產階級法权。目前对家庭加以推崇的最强烈的动机，毫无疑问在于官僚需要一种稳定的等級关系，需要由四千万个支持权威和权力的家庭来約束青年。

政府一方面还是希望把教育青年一代的責任掌握在國家的手

① 上帝通过先知摩西傳下十誡，第七誡为“不可奸淫”。見《聖經》旧約出埃及記第二十章。——中譯者注

里，另一方面却不仅不关心支持“长辈”——特别是父母——的权威，而且相反还竭力使儿童同家庭分开，以使儿童摆脱那种停滞不前的生活方式的传统。就在不久以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学校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都在利用儿童来揭发、羞辱和普遍地“重新教育”自己的好喝酒的父亲或者信教的母亲，至于成效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这种做法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父母的权威。在这个并非不重要的领域，现在也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随着第七诫的盛行，第五诫^①也完全恢复了它的权力——虽然还没有求助于上帝。但是，法国学校没有用这一点来作为补充也还是一样过下去，这并没有妨碍这些学校进行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的教育。

顺便提一下，对于老一辈人的权威的关心，已经引起宗教政策的改变。否认上帝以及他的帮助和奇迹，是革命政权分化儿童和父母的最尖锐的武器。反教会的斗争，在雅罗斯拉夫斯基这样类型的人物的领导下，由于跑在文化、认真宣传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的前面，往往堕落成滑稽剧和恶作剧。向上帝的猛攻，就像向家庭的猛攻一样，现在已经停下来。官僚由于关心自己的名誉受到尊敬，已经命令年青的“无神论者”放下斗争的武器而坐下来读书。关于宗教问题，正在逐步建立一种富有讽刺意味的中立制度。但这只是第一个阶段。如果事态的发展完全决定于当权的人，那是不难预测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的。

流行意见的虚伪性，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发展成社会矛盾的平方或立方。如果用数学的语言来说明意识形态的历史法则的话，大致上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如果无愧于自己的名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没有贪婪，友谊没有忌恨和阴谋，爱情没有卑鄙的打算。据官方学说宣称，这些理想的标准已经实现了——但是，越是坚持这种说法，现实的反抗也越强烈。例如，一九三六年

^① 第五诫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中译者注

四月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新綱領中說，“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一种新的家庭正在形成，苏維埃国家关怀这种家庭的发展。”官方評論給这个綱領作了这样的补充：“我們的青年在选择終身伴侶——妻子或丈夫——的时候，只有一个动机，一种推动力：爱情。建立在金錢关系上的資產階級婚姻，对于我們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年來說，是不存在的。”（見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真理报》）就普通男女劳动人民來說，这种情况或多或少是真实的。但是，这种“金錢婚姻”在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当中也比較少見。在中上层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新的社会結合自动地在个人的关系上打下了烙印。权力和金錢在性的关系上所造成的罪恶，在苏維埃官僚队伍中大量滋生，好像这些官僚給自己規定的目标就是要在这方面超过西方資產階級。

正像苏維埃报刊在偶然透露或者无法避免吐露的情况下所承认的，同剛剛引过的《真理报》評論完全相反，“金錢婚姻”現在已經完全恢复。資历、工資、职业以及軍装上的袖章越来越重要，因为同这些有联系的是鞋子、皮大衣、住宅、浴室以及最后所梦想的东西汽車等問題。在莫斯科，仅仅为了一間房子，每年就使不少男女結婚和离婚。亲屬問題也有了特別重大的意义。如果岳父是一个司令官或者一个有势力的共产党員，如果岳母是一个达官貴人的姊妹，那是很有用的。我們能对这一点感到惊異嗎？还能是其他情况嗎？

在苏維埃这部偉大的书当中，很富有戏剧性的一章是苏維埃家庭瓦解和破裂的故事。在这些家庭中，丈夫由于是党員、工会工作者、指揮官或者行政官員而在生活方面产生了、发展了并最終拥有了一些新的嗜好，而妻子由于为家庭拖垮而依然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在两代苏維埃官僚的道路上，布滿了妻子被遺棄和被打入冷宮的悲剧。这种現象在新的一代人当中現在也可以看到了。所有最粗暴最殘忍的事，也許都发生在官僚的最高层，因为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沒有什么文化的暴发戶，他們认为自己沒有不可

以干的事。档案和回忆录总有一天会暴露，那些当作福音来宣传家庭道德和宣传强制性的“做母亲的快乐”的人们对于妻子以及一般妇女所犯的不折不扣的罪行，这些人只是由于他们所占据的地位才免于受法律制裁。

的确，苏维埃妇女还没有自由。到现在为止，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权利，主要是给予上层妇女的，也就是在官场、技术、教育以及总的来说文化方面工作的代表人物，这种权利给予女工的要少得多，至于农妇就更少了。只要社会还不能代替家庭担负起在物质方面进行关怀的任务，做母亲的要想顺利地完成任务，就只有雇佣一个白种奴隶，如保姆、女僕、女厨等。在构成苏联人口的四千万家庭当中，有百分之五，也许有百分之十，是把“炉灶”建立在家庭奴隶劳动上面的。如果对苏维埃的佣人进行一次准确的调查，那就会和研究全苏法典——不管它多么进步——具有同样的意义，也能够对苏联妇女的地位进行社会主义评价。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维埃的统计学家把佣人都归到“女工”或“其他”名义下面了！家庭主妇如果是一个受尊敬的共产党员，有厨师，有电话可以向商店订货，有汽车可以随时使用，等等，那末她的处境同女工的处境是很少共同之处的，因为女工不能不跑到商店去买东西，不能不自己做饭，不能不走着去幼儿园——如果真有幼儿园可进的话——把孩子领回来。什么社会主义招牌都不能掩盖这种社会对立，这种对立的尖锐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西方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贵妇和无产阶级妇女之间的对立。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家庭里，社会将使它摆脱那些不可忍受的和屈辱的照料工作所带来的日常烦恼，因此它也就没有必要保持任何强制的做法；在这种家庭里，谈起堕胎和离婚法律时的想法，不会比想起妓院或者牺牲人命时的感觉好些。十月革命的立法朝这种家庭的方向迈出了大胆的一步。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却产生了一种残酷的反动。热月的立法正在朝资产阶级模型退却，用来掩护这种退却的是关于“新”家庭的神圣性的虚伪演说。在这个问题

上也是一样，社会主义的破产是用虚伪的尊崇来掩飾的。

有些誠实的观察家，特别是在儿童問題上，被高度的原則和丑恶的現實之間的对立震动。采取严厉的刑事措施来对付无家可归的儿童，只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說明，社会主义立法是用来保护妇女儿童的说法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欺騙。还有一种相反的观察家，他們被已經表现为法律形式和行政机关形式的那些想法的豪迈和高尚所欺騙。这些乐观主义者看到貧困的母亲、妓女和无家可归的儿童时，往往就对自己說，随着物质财富的进一步增长，社会主义法律也将逐步合情合理。要断定这两种对待問題的方式中哪一种更加錯誤更加有害，并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只有看不清历史的人，才看不出社会計划的豪迈和大胆，才看不出这种計划的第一个发展阶段的意义以及它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对那些消极的和从根本上說对一切漠不关心的乐观主义者不感到憤慨，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人閉起眼睛来不看社会矛盾的加深，而用将来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同时他們还尊敬地建議把达到这种希望的钥匙交到官僚的手里。好像男女权利的平等还没有被这些官僚改变成男女权利都被剝夺的平等！好像有什么充滿智慧的书已經肯定地指出，苏維埃官僚不会用一种新的压迫来代替自由。

男人怎样奴役妇女，剝削者怎样压迫男女双方，劳苦人民怎样试图用鮮血的代价来使自己摆脱奴役而結果只是換了一条鎖鏈——所有这些，历史都可以告訴我們很多。从本质上說，历史不可能告訴我們別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怎样解放儿童、妇女和人类呢？关于这一点，我們还没有可靠的模型。所有过去的历史經驗——完全是消极的——都要求劳苦人民至少首先要坚定地不信任一切享有特权的和不受监督的卫士。

二、反对青年的斗争

每个革命政党都是从新兴階級的年青一代中寻求主要的支

持。政治上的腐朽表明自己已經沒有能力把青年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来。一个接一个退出舞台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党，被迫把青年交給革命或者交給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維主义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一直是一个年青工人的政党。孟什維克所依靠的是更加值得尊敬的工人階級上层熟练工人，他們总是为此自豪，而看不起布尔什維克。后来的事态发展严酷地向他們說明了他們的錯誤。在决定性的时刻，青年帶領了更加成熟的阶层，甚至还有老年人。

革命給了新的苏維埃一代一种强有力的历史推动力。它使青年一下子就摆脫了保守的生活方式，并且向他們透露了最大的秘密——辯证法的第一个秘密——即在这个地球上，沒有一件事物不在改变；社会是由可以做成任何形状的材料造成的。从我們这个时代的事态发展来看，那种种族形态不可改变的理論多么愚蠢！苏維埃联邦是一个巨大的熔炉，有好几十种民族的性格正在这个熔炉中溶合在一起。“斯拉夫灵魂”的神話正在像泡沫一样地消失。

但是，給予青年一代的推动力还没有在相应的历史事业中表現出来。不錯，青年在經濟領域內是很积极的。苏联有七百万工人不到二十三岁——工业部門有三百一十四万，铁路部門有七十万，建筑部門也有七十万。在新建的大工厂中，差不多有一半工人是青年。在集体农庄中，目前有一百二十万共青团員。最近几年，有好几十万共青团員动員起来去做建筑工作，伐木工作，挖掘煤矿，开采金矿，到北极、庫頁島去工作，或者到正在建筑一个新城市共青团城的阿穆州去工作。新一代不断地涌現出突击队、先进工人、斯达汉諾夫工作者、工长以及下級行政管理人員。青年們都在学习，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在刻苦地学习。他們在体育領域最勇敢或最好斗的运动如跳伞和射击等方面，如果說不是更加积极的話，至少也是积极的。有进取心的和勇敢的青年都紛紛参加各种各样危险的远征。

著名的北极探險家斯密特說，“我国最好的青年都很願意到困

难的地方去工作。”毫无疑问，这话是真实的。但是在各个领域，革命后的一代还在监护之下。上面的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和怎样做。政治作为最高的指挥形式，依然完全掌握在所谓“老警卫”的手中，这些老人在向青年发表热烈的和往往哗众取宠的演说时，警惕地保卫着自己的垄断权利。

恩格斯没有设想过在国家没有消亡的情况下——即在各种警察压迫没有被受过教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治代替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他把完成这个任务的责任交给了青年一代，“他们将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将能够抛弃所有这些国家主义的废物”。列宁补充了自己的意见：“……抛弃各种国家主义，连民主共和制也包括在内。”当时在恩格斯和列宁的心中，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前景大体上是这样的：夺取了政权的一代，即“老警卫”，将开始进行消灭国家的工作；下一代则完成这项工作。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诞生的。如果以二十三岁作为两代人的界线，那末，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苏维埃人还没有达到这个界线。因此，全国的大部分人口，在个人的记忆中只知道苏维埃制度而不知道任何别的制度。但是，正是这新的一代，并不是像恩格斯所想像的那样是在“自由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而是在统治阶层的不可忍受的和不断加强的压迫下形成的，这个统治阶层——按照官方的胡说——是由那些完成伟大革命的人组成的。在工厂，在集体农庄，在营房，在大学，在教室，如果不是在托儿所的话，甚至也在幼儿园，人的最大光荣被说成是这样的，即个人忠实于领袖和无条件地服从。近来的许多教育上的警句和格言，似乎就是从戈培尔那里抄来的，如果大部分不是戈培尔从斯大林的同事那里抄来的话。

学校和学生的社会生活都充满了形式主义和虚伪。儿童学会了开无数死气沉沉的会议，这种会议有不可缺少的名誉主席团，要唱歌赞美亲爱的领袖，要进行看来还正直的辩论，在这种辩论中，

儿童完全按照长辈的做法，說的是一套，想的又是一套。最天真的学校儿童试图在这种假正经的沙漠中创造一块绿洲，往往遭到严厉的压迫。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过它的代理人把令人厌恶的叛卖和告密的腐败做法，介绍到所谓“社会主义学校”中。比较有思想的教师和儿童读物作家，虽然被迫装出乐观的样子，但是面对着这种摧残学校生活的压迫、虚伪和无聊的气氛，还是不能经常掩饰自己的恐怖情绪。新一代由于没有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經驗，只有在苏维埃民主的条件下，只有有意识地研究过去的經驗和现在的教训，才有可能变得成熟，以便独立地参加国家的社会生活。独立的性格像独立的思想一样，没有批评是不能得到发展的。然而，苏维埃青年却根本没有最起码的机会来交流思想，犯错误，进行尝试以及改正自己的和别人的错误。所有的问题，包括他们自己的问题，都已由别人代他们作出决定。他们的任务就是执行决定并歌颂那些作出这些决定的人。对于每句批评的话，官僚都报之以残酷的压制。青年队伍中所有杰出和不肯屈服的人，都被有步骤地加以摧残、压迫，或者在肉体上加以消灭。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在千百万共青团员当中，就没有涌现出一个大人物来。

青年使自己投身于机械工程、科学、文学、体育和棋赛，可以说，他们在各方面都赢得了荣誉，将来可以取得伟大的成就。在所有这些领域，青年同训练很差的老一代进行竞赛，常常达到同样的水平，甚至超过他们。但是，一接触到政治，青年就碰钉子。因此，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种可能性：参加到官僚当中而飞黄腾达；默默地忍受压迫，退避到经济工作、科学工作或者自己的琐碎事务方面；最后一种可能性是，进入地下，学习斗争和锻炼性格，以便将来采取行动。向官僚钻营的道路，只有很少数的人可以走。在另一个极端，也有很少数的人参加反对派的队伍。中间的人，即绝大多数人，是参差不齐的。但是，这些青年在严厉的压制下，正在发生一种隐蔽的但极其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决定苏联的未来。

199

国内战争时期的禁欲倾向，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如果说不是让位给一种贪婪的情绪的话，那至少是让位给一种更加享乐的情绪。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变成一个非自愿的禁欲时期——但是现在只是对群众和青年来说是这样的。统治阶层紧紧地守在个人幸福的障地上。第二个五年计划毫无疑问带来一种反对禁欲主义的激烈的反动。对于个人发展的注意力抓住了广大的居民，特别是青年。然而，事实是，在新的苏维埃一代中，只有设法爬到群众头上和这样那样尽量适应统治阶级的极少数人，才能得到福利和幸福。在官僚方面，则在有意识地发展和挑选唯命是听的政客和钻营之徒。

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报告人说，“贪婪利润，庸俗狭隘，卑鄙自私，这些都不是苏维埃青年应有的恶劣品质。”这些话同当时盛行的口号“幸福美好的生活”，以及计件工资、奖金和奖章等办法非常不协调。社会主义并不是禁欲的；恰恰相反，它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非常敌视。它还对一切宗教采取非常敌对的态度，因为它所依附的是这个世界，而且只是这个世界。但是，社会主义对于世俗的准则也分成若干等级。个人开始为社会主义奋斗，并不是为了幸福生活，恰恰相反，是为了抛弃这种想法。然而，没有一代人能够跳过自己的头。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整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建筑在“卑鄙自私”的基础上的。衡量成功的标准——赚了多少条裤子和多少条领带——所证明的恰好就是“庸俗狭隘”。我们姑且认为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好吧。但还是需要如实地来看待这种情况。市场关系的恢复，毫无疑问为个人幸福的大大增进提供了机会。苏维埃青年大批地涌向机械工程职业的倾向，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吸引力，而是因为工程师赚的钱比医生或者教师多得多。这种倾向在文化压迫和思想反动的情况下滋长起来，加以上面还有意识地给钻营的本能提供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社会主义文化”的宣传往往变成极端反社会的自私自利教育。

但是，如果把青年说成是完全或者基本上被个人利益所左右，

那是粗暴的誹謗。不是那樣，就一般的青年群眾來說，他們是高尙的，有責任心的，有進取心的。往上爬的鑽營思想完全是上面灌輸給他們的。在他們的心灵深处，藏着各种各样还没有系統化的英雄主义傾向，而只是等待机会發揮出來。最新的蘇維埃爱国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地丰富起来，最主要的正是由于青年具有这些情緒。毫無疑問，这种爱国主义是非常深刻的，誠摯的，富有生气的。但是，就是在这种爱国主义当中，也存在着把青年人和老年人隔裂开来的裂縫。

青年的健康的肺，无法忍受那种虛伪的气氛，这种气氛是同一种热月分不开的，也就是說，是同一种还不得不披着革命外衣的反动分不开的。社会主义標語和生活现实之間的强烈对照，損害了人們对官方教規的信賴。有相当大一部分青年以輕視政治、粗野荒淫为榮。在許多情况下，也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不滿的最初表現形式，正是要自己独立这种秘密願望的最初表現形式。几十万年青的“白卫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者”被共青团和党开除，被逮捕和流放，这种情况证明产生有意識的左右政治反对派的源泉并没有枯竭。与此相反，最近几年来，这些源泉还不断地涌現出新生的力量。最后，那些最不能忍耐的、脾气暴躁的、控制不住自己的以及在利益方面和感情方面受到損害的人，正在使自己的思想朝恐怖主义的复仇方向发展。大体上，这就是蘇維埃青年的政治情緒的輪廓。

苏联的个人恐怖历史清楚地标出国家一般演变的各个阶段。在蘇維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在国内战争还没有結束的气氛中，白卫分子或社会革命党人坚持恐怖行为。在以前的統治階級对复辟失去了希望的时候，恐怖主义也随着消失了。到最近还感觉得到其回聲的富农恐怖，总是带着地方的性质，这种恐怖是反蘇維埃制度的游击战争的一种补充。至于最近发生的恐怖行为，既不是依靠旧統治階級，也不是依靠富农。最近出現的恐怖分子，完全是从青

年当中产生的，从共青团和党的队伍中产生的，并且还不是不经常地从统治阶层的子弟中产生出来。这种个人恐怖虽然完全不能解决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具有极其重大的象征意义。它深刻地说明了官僚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和青年之间的尖锐矛盾。

经济冒险，跳降落伞，北极探险，明显的冷淡，“浪漫的胡作非为”，恐怖主义情绪，以及个人恐怖行为——所有这些集合起来，正在促使青年一代对老年一代的无法忍受的教育进行一次爆炸性的反抗。一次战争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个通风口，把越积越多的怨气排泄出去——但绝不会长久。在一次战争中，青年会很快地得到必要的战斗锻炼和目前最缺少的威信。同时，大多数“老人”的声望将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害。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一次战争也只会使官僚再有一个时期的苟延残喘。以后的政治冲突还会更加尖锐化。

当然，把苏联的基本政治问题降低为两代人的问题是片面的。在老年人当中有许多公开和暗中反对官僚的人，正像青年人当中有几十万完全唯唯诺诺的人一样。但是，不管对统治阶层的地位进行的攻击来自哪一方，来自左面还是右面，攻击者的主力总是来自那些被压迫的和心怀不满的、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青年。官僚是相当高明地了解这一点的。他们对于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的任何事情，一般说来都是非常敏感的。自然，这些官僚为了防止后患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便建立了主要的战壕和坚固的堡垒来抵抗年青的一代。

我们已经提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当然，谁也不耐烦说明，为什么违反团章，过了整整五年才召开代表大会。不仅如此，事情很快地就表明，这次经过慎重挑选和选择的代表大会，在这个时候召开完全是为了剥夺青年的政治权利。根据新团章，共产主义青年团现在甚至在法律上也被剥夺了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权利。以后它的唯一活动领域是教育工作和文化训练工作。共青团的总书记根据上级

的命令在演說中宣稱，“我們必須……**停止談論**工業和財政計劃、降低生產成本、經濟核算、作物的播種以及國家的其他重要問題，**好像這些問題是要由我們來決定似的。**”整個國家完全可能要重復最後一句話：“好像這些問題是要由我們來決定似的！”至於那句傲慢的譴責：“停止談論”，甚至在这次最馴服的代表大會上也沒有得到熱烈的反應。如果還記得，蘇維埃法律規定十八歲是政治成熟的年齡，凡是達到這個年齡的青年男女都有充分的選舉權，同時，根據舊團章，共青團員的年齡限制是二十三歲，因此這個組織的成員實際上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超過這個年齡的，如果還記得這些情況，那末，那句傲慢的譴責就更加明顯了。这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兩項同時進行的改革：它承認了超齡的共青團員是合法的，这样就增加了共青團的選舉者的數目，同時又剝奪了整個組織的權利，使它不僅不能干預一般政治領域——這是絕沒有問題的！——而且還不能過問當前的經濟問題。取消過去的年齡限制是由于這樣一個事實，即以前共青團員轉為黨員幾乎是一種自動的發展過程，現在則變得極其困難了。這種取消政治權利的最後殘余——甚至連表面上的政治權利——的做法，是由于想把共青團完全地最終地放在大大清洗過的黨的奴役下。這兩項措施雖然很明顯是彼此矛盾的，然而却是從同一個來源產生的，這個來源就是官僚對青年一代的畏懼。

代表大會上發言的人，在發言中都明白表示是來執行斯大林的明確指示的。他們提出這樣的警告，是想事先就阻止可能發生的辯論。這些發言人以驚人的坦率說明了这次改革的目的：“我們不需要任何第二政黨。”這種說法顯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據統治集團看來，共產主義青年團如果不遭到決定性的扼殺，就有變成第二政黨的危險。另外一個發言人好像就是為了說明這些可能的傾向似的，他帶着警告的口吻說，“正是托洛茨基在他當權的時候，曾企圖蠱惑青年，用建立第二政黨等反列寧主義反布爾什維克的思想鼓動青年。”這個發言人所引證的歷史是錯誤的。實際上，托洛

茨基“在他当权的时候”只是提出过这样的警告，如果政权进一步官僚化，那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同青年的决裂，并造成出现第二政党的危险。但是万想不到，事态的发展正好证实了这个警告，事实上已经把警告变成一个纲领了。日益蜕化的党只是对那些钻营之徒还具有吸引力。诚实而有思想的男女青年不能不厌恶那种拜占廷式^①的奴颜婢膝、那种掩饰特权和专横的虚伪言词，以及那些互相吹捧的庸俗官僚的自吹自擂——整个说来，这些元帅，由于无力上天摘星星^②，只好尽量在自己的身上贴星花。因此，青年已经不再像十二三年前那样，是一个第二政党的“危险”问题，而是一个青年具有作为能够进一步推进十月革命事业的唯一力量这样一种历史必要性的问题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的修改，虽然增加了新的警察威胁，当然还是不会阻止青年在政治上的成熟，也不会阻止他们同官僚发生敌对性的冲突。

如果发生了巨大的政治骚乱，青年会走上哪条道路呢？他们将自己的队伍集合在什么旗帜下呢？现在谁也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尤其是青年自己。在青年的心里，蕴藏着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倾向。归根到底，基本群众的动向将决定于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决定于一次战争，决定于法西斯主义的新成就，或者相反，决定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论如何，官僚将会发现，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青年代表着一种具有强大爆炸力的历史冲击力量。

一八九四年，俄罗斯的专制政体通过年青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用这样一句著名的话答复了那些胆怯地梦想参加政治生活的地方自治局：“这是毫无意义的幻想！”一九三六年，苏维埃官僚对青年一代的还很模糊的要求作出的答复，是这样一句更加粗暴的话：“停止谈论！”这句话也会变成具有历史意义的话。斯大林政权为

① 拜占廷指拜占廷帝国，建立于公元三九五年，灭亡于一四五三年，又称希腊帝国或东罗马帝国。拜占廷式即东方帝国式的意思。——中译者注

② “他不能上天摘星星”是一句谚语，系指一个人很平凡。——英译者注

这句话所付的代价，不可能比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政权所付的代价少些。

三、民族和文化

布尔什维主义对民族问题的政策，不仅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还帮助苏联在内部有离心力量、外部有敌对力量的情况下坚持下去。国家政权变成官僚政治，这种蜕化像大石头一样压在民族政策上。列宁正是想在民族问题上，准备在一九二三年春天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同官僚、特别是同斯大林进行第一次斗争。但是在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列宁病倒了。他当时所准备的一些文件，甚至到现在检查官还禁止发表。

由于革命唤起了各民族的文化要求，这就需要尽可能广泛的自治。同时，只有把苏联的各个部分都放在一个总的集中计划之下，工业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但是，经济和文化不是截然分开的。文化自治和经济集中的倾向，自然常常要发生冲突。然而，二者之间的矛盾远远不是不可调和的。虽然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现成公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关的群众是抱着百折不挠的意志的。只有这些群众真正参与了管理自己的命运，才能在每个新阶段在经济集中的合理要求和民族文化的实际倾向之间划清必要的界线。然而，问题在于，苏联居民在民族不同的情况下所表现的意志，现在已经完全被官僚的意志所代替，这些官僚处理经济和文化问题，都是从行政管理方便和统治阶层的具体利益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

的确，在民族政策的领域，正像在经济领域一样，苏维埃官僚虽然开支过多，但还在继续执行一部分进步工作。对于苏维埃联邦的落后民族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这些落后民族必须经过一个或多或少比较长的时期，来输入、模仿和吸收一些已有的东西。官僚正在为这些落后民族架设一座桥梁，以使他们得到资产阶级

文化——有一部分甚至是資產階級以前的文化——的基本好处。苏維埃政权在許多領域和許多民族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在进行彼得一世及其同僚对老莫斯科国所完成的历史性工作，只是規模要大一些，速度也快一些。

在苏維埃联邦的学校中，目前上課所使用的語言不下八十种。其中大多数語言必須新造字母，或者用比較帶有民主政体气味的拉丁字母来代替帶有极端貴族气味的亚洲字母。報紙也用同样多的文字出版——这些報紙第一次使农民和牧民了解人类文化的基本概念。在沙皇帝國的遙远边界以內，本国工业正在兴起。半氏族社会的古老文化正在被拖拉机摧毁。随着識字的普及，科学的农业和医药也正在出現。这项工作正在兴起新的居民方面所具有的意义，是无论怎样估計都不会过分的。馬克思說得对，革命是历史的火車头。

但是，就是最强有力的火車头，也不能創造奇迹。它不能改变空間的法則，而只能使运动加快。千百万人需要認識字母和学会看报，需要懂得簡單的卫生常識，这一点表明，必須走过多么漫长的一条道路，才能真正提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問題。例如，报刊告訴我們，在西伯利亚西部，奥罗特族人以前是不懂得洗澡的，現在則“許多村庄都有了浴室，他們有时要走三十公里路去洗澡”。这个极端的例子虽然說的是文化水平最低的情况，但是它却真实地說明許多其他成就所达到的高度，而且还不限于落后地区。有一个地方政府的首腦，为了說明文化发展的情况，提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集体农庄中，人們开始要求“铁床、牆钟、毛衣毛褲、汗衫、自行車等东西”了。这种情况只不过意味着，苏維埃村庄中富裕的上层开始使用西方农民群众早就普遍使用的那些工业品。在演說中和报刊上，天天有人談論“文明的社会主义商业”这个題目。从本质上說，这是一个使政府办的商店看起来整洁、有吸引力的問題，要供給这些商店必要的技术設備，要把貨物进行足够的分类，不要让苹果腐烂，不要把綫袜和討厭的棉花放在一起，同时要使售

貨員树立有礼貌和为顾客服务的思想——換句話說，要学会資本主义商业的普通經營方法。我們还远远沒有解决这个极为重要的問題——它还根本沒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

如果我們暫時把法律和制度放在一边，而来看看基本居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如果我們沒有故意自欺欺人，我們就不能不承认，在苏維埃国家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方面，沙皇俄国和資產階級俄国的遺產还大大超过社会主义萌芽的成长。在这一点上最令人佩服的是居民本身，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极少，却如饥如渴地模仿西方現有的一套。年青的苏維埃職員，往往还有工人，在服装和風度方面都尽量模仿他們在工厂中偶然遇到的美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員。工业部門和机关里的女工和女職員，都貪婪地盯着到俄国来旅行的外国妇女，想学会她們的装束和風度。幸运的女孩子一旦在这方面模仿得很像，往往就变成大家模仿的对象。工資較高的青年女工已經不再留那种老式的短发，而开始留一种“不变的波浪式”头发。青年們爭先恐后地参加“西方的社交舞会”。从某种意义上說，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进步，但是这里主要表明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比資本主义优越，而是小資產階級文化超过宗法式的生活，城市超过农村，中心地区超过穷乡僻壤，西方超过东方。

与此同时，苏維埃的特权阶层也模仿資本主义上层社会的那些花样。在这方面，带头的是外交官、托拉斯的經理、工程师，他們必須常常到欧洲和美国去。在这个問題上，苏維埃式的諷刺嘲笑是听不到的，因为关于“万人”上层的情况是干脆不許碰的。然而，我們不能不忧虑地指出，苏联最崇高的使节面对着資本主义文明，既沒有能够表現出自己的一种風格，也沒有表現出任何独有的特点。他們內心里缺乏足够的稳定力量来使自己蔑視外表的漂亮和保持必要的超然态度。一般地說来，他們的主要野心就是尽可能同資產階級最典型的市儈沒有什麼区别。总而言之，他們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感情和行为并不像是新世界的代表，而倒像是庸俗的暴发戶！

然而，如果說苏联現在正在進行先進的國家早已在資本主義基礎上進行過的文化工作，那隻說對了一半。新的社會形式絕不是沒有關係的。這種形式不僅使落後國家有可能達到最先進的國家的水平，而且還可以使落後國家在比西方以前所需要的短得多的時間里完成這項任務。這種速度加快的原因是很簡單的。資產階級的先驅必須既在經濟領域也在文化領域發明技術並加以應用。而蘇聯則可以運用最新式的現成技術，同時由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它還用不着部分地逐步地運用過來，而可以立即並且大規模地加以運用。

軍事當局曾經不止一次地贊揚軍隊作為文化傳遞者的作用，特別是在農民當中。我們雖然沒有在資產階級軍國主義所灌輸的特种“文化”方面自己欺騙自己，但是我們不能否認，許多進步的習慣是通過軍隊才傳到人民群眾中的。以前參加革命運動、特別是農民運動的士兵和下級軍官，一般總是站在起義者的最前列，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蘇維埃制度有機會不僅通過軍隊而且通過整個國家機關以及同國家機關互相交織在一起的黨、共青團和工會機關，來影響人民的日常生活。採用技術、衛生、藝術和體育方面的現成成就，要比原來發展這些成就的國家所用的時間快得多，這是由於財產的國有形式、政治的專政以及行政管理的計劃方法在這方面提供了保證。

如果十月革命只是提供了這種加快發展的運動，那末，從歷史上說它還是正確的，因為日益衰落的資產階級制度已為事實證明，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沒有能夠推動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落後國家真正向前發展。然而，俄國無產階級是以更加遠大得多的任務的名義完成革命的。不管目前它在政治上遭到什麼樣的鎮壓，它中間較好的一部分人既沒有放棄共產主義綱領，也沒有放棄同這種綱領結合在一起的巨大希望。官僚被迫迎合無產階級，部分是在其政策的方向方面，但主要還是在解釋這種政策方面。因此，在經濟領域或文化領域每前進一步，不管它的實際歷史內容如何，或者在群

众生活中的实际意义如何，都被說成是前所未見和前所未聞的“社会主义文化”成就。毫無疑問，要使千百万直到昨天还一点也不懂得清洁卫生的人都能有一块肥皂和一把牙刷，那实在是一件很偉大的文化工作。但是，肥皂或牙刷，甚至“我們的夫人”所需要的香水，都根本不能构成一种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可怜的文明产物只有差不多百分之十五的居民可以享有。

苏維埃报刊上一再談論的“人的改造”，的确是在全力进行。但是，到什么程度才是一种社会主义改造呢？俄国人民过去既沒有像德国人那样經歷一次宗教大改革，也沒有像法国人那样經歷过一次資產階級大革命。如果我們撇开英国島民在十七世紀所經歷的改革—革命，那末，資產階級个性，这个一般人性发展中很重要的一步，正是从那两座熔炉中产生出来的。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两次俄国革命，自然意味着个性在群众中的第一次觉醒，这是从原始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个性結晶。这就是說，这两次革命以簡洁的形式和加快的速度完成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改革和革命所进行的教育工作。然而，远在这項工作完成以前，甚至大体上完成以前，在資本主义末日爆发的俄国革命，还是由于階級斗争发展的路綫而被迫跳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苏維埃文化領域的矛盾，只不过是反映出和折射出由于这种跳跃而产生的經濟和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个性觉醒，必然或多或少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质，这不仅在經濟上是如此，而且在家庭生活和抒情詩中也是如此。官僚本身已經变成最极端的、有时是毫无节制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傳布者。他們一方面在經濟上容許并鼓励个人主义的发展(如計件工資、私人小块土地、獎金、勳章)，同时又在精神文化領域无情地压制个人主义的进步方面(如批評的观点、个人意見的發揮、个人尊嚴的培养)。

某一个民族集团的发展水平越高，或者它的文化創造越高，或者它处理社会和个人問題时越是密切地結合在一起，那末，官僚的压力也就变得越加沉重和越加不能忍受。在苏联各族人民的一切

知識活动都由一个指揮棒来指揮，或者不如說是由一根警棍来指揮的时候，实际上就談不上民族文化的特点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魯吉亚或者突厥的书报，只不过是把官僚的命令譯成各自的文字。莫斯科的报刊以优秀的民間創作的名义，每天都用俄文譯載各个民族的得奖詩人歌頌領袖的詩篇，实际上这都是一些很糟的詩，只是在奴顏婢膝和缺乏才能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大俄罗斯文化在禁閉制度下所遭到的摧殘并不亚于其他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主要是由于革命以前形成的老一代人花了很大的代价。青年就好像被铁板压住了似的。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在本来的意义上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問題，而是集中权力的警察机关压迫一切民族文化发展、首先是压迫大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問題。然而，我們不能忽視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的出版物有百分之九十是用俄文印的。說实在的，如果这个百分比和大俄罗斯人口的相对数字过分悬殊的話，那末，無論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独立份量方面，或者是在国内落后民族和西方之間起媒介作用方面，它也許还比較符合俄罗斯文化的一般影响。但是尽管这样，大俄罗斯人在出版社（当然还不只是在那里）占特別大的比例，是不是意味着大俄罗斯人在牺牲联邦其他民族的利益下拥有一种真正专橫的特权呢？这是十分可能的。对这个极其重大的問題，不可能想多么明确就多么明确地作出答复，因为在生活中它并不是决定于文化的合作、竞争和互相丰富，而是决定于官僚的最后裁决。由于克里姆林宫是权威的所在地，同时偏僻地区不能不同中央采取同样的步調，因此官僚主义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一种专橫的俄罗斯化色彩，而給予其他民族的唯一无可怀疑的文化权利就是用自己的文字歌頌这个裁决者。

* * *

官方在文化方面的理論是随着經濟的左右搖摆和行政管理的方便来改变的。但是，不管怎么改变，有一个特点是保留下来了，那就是絕對明确的特点。随着“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出現，以前

不受欢迎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又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反对这种理论的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具有严格的过渡性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想在一系列历史时期中居于统治地位，新统治阶级目前这一代人的任务，主要应当局限于吸收资产阶级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无产阶级停留在无产阶级的时期越长——即保留过去的压迫痕迹越久——就越加不能摆脱过去的历史遗产，而新创造的可能性的真正出现，也是完全决定于无产阶级本身溶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程度的。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意味着，资产阶级文化应当由一种社会主义文化来代替，而不是由一种无产阶级文化来代替。

在反对用实验方法创造的“无产阶级艺术”理论的论战中，作者曾经写道，“文化是要靠工业的液汁来滋养的，要想使文化成长、提高和繁荣起来，那就必须有丰足的物质。”即使最顺利地解决了基本经济问题，“也还远远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新历史原则的彻底胜利。只有科学思想在全国范围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和一种新艺术发展起来，才会意味着历史的种子不仅长出了根茎，而且已经开花。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发展是每个时代是否具有活力和是否具有重要意义的最好的试金石。”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后来官方突然宣布这是一种“投降”观点，说它是“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创造力。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时期开始，布哈林早就开始宣扬“无产阶级文化”了，斯大林则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无论如何，两个人都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将以一种“龟行”的速度向前推进，无产阶级将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创造自己的文化。至于这种文化的性质，这两个理论家的概念是模糊的，就好像他们一点灵感也没有。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那几个暴风雨的年代，推翻了那种龟行的前景。在一九三一年，可怕的饥荒的前夜，国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样，在官方庇护的作家、艺术家以及画家还没有着手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时候，甚至还没有着手创造比较有意义的社会主

义文化初期东西的时候，政府就宣布无产阶级已经溶化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了。艺术家只好使自己适应这样的事实，即无产阶级并没有具备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必要条件：时间。昨天的概念立刻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社会主义文化”马上提到日程上。关于这种文化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一些了。

精神创造要有自由才行。共产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使自然服从技术，使技术服从计划，并使原料能够无限制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不仅如此，共产主义的最高目的是使人类的一切创造力最终地和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压力、限制和屈辱的依附地位。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和艺术将不知道任何外面强加的“计划”为何物，甚至也不知道任何强制的阴影为何物。至于精神创造究竟达到什么样的个人程度或者集体程度，那将完全决定于创造者。

一种过渡的制度是一种不同的东西。专政所反映的是过去的野蛮，而不是未来的文化。它有必要对一切形式的活动——包括精神创造——规定严格的限制。革命纲领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些限制是暂时的坏现象，因此有责任随着新政权巩固的程度而一个一个地取消对自由的一切限制。无论如何，在国内战争最激烈的年代里，革命的领导人已经明白，政府在各种政治考虑之下是可以对创作自由加以限制的，但是绝不能在科学、文学以及艺术领域以指挥者的角色自居。列宁虽然在艺术方面的个人喜好相当“保守”，但是他对艺术问题还是极为审慎的，他总是诚恳地说明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研究。艺术教育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对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都采取赞助的态度，这一点往往使列宁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列宁只是在私下谈话时说一些讽刺的话，而根本没有意思要把他的文学爱好变成法律。在一九二四年，新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作者曾经这样表述了国家同各种艺术派别和倾向的关系：“一方面给它们订出赞成革命或反对革命的明确标准，另一方面在艺术自决的领域内要让它们完全自由。”

当专政拥有一种情绪激昂的群众基础和一种世界革命的前景

时，它并不害怕实验、研究和学派斗争，因为它了解，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一个新文化时代进行准备。当时人民群众的情绪还很饱满，并且千年来第一次大胆地思考问题。所有最优秀的青年艺术力量也都感情充沛。在最初的那几年当中，人们充满了希望和大胆，不仅创造了最完整的社会主义立法，而且还产生了最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就在那个时期，也摄制了一些非常杰出的苏维埃影片，尽管当时的技术条件很差，这些影片却以处理现实题材的新鲜而有力的手法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

在同党内反对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文学派别一个一个地被扼杀了。这不仅是一个文学的问题。所有的思想领域都出现了毁灭的过程，而由于这种过程大部分是不知不觉的，因此它进行得比较果断。目前的统治阶层认为自己的任务不仅是从政治上控制精神创作，而且还要规定它的发展道路。简单指挥的做法不仅应用到集中营里，而且同样地应用到科学农业和音乐方面。党的中央机关报刊载不署名的指示性社论，这种社论在建筑、文学、戏剧和芭蕾舞方面具有军事命令的性质，至于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

官僚对于不直接为自己服务的东西以及自己所不懂的东西抱着一种迷信般的恐惧态度。当他们要求自然科学与生产有某种联系的时候，这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命令科学研究者只以直接的实际重要工作为目的的时候，这就威胁到堵塞最珍贵的发明泉源，其中包括实际的发现，因为这些发现大半是在没有预见到的道路上出现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军事理论家，由于有过辛酸的教训，都避免作出各种广泛的论断，他们怕哪一个“红色教授”——一般总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从列宁或者甚至从斯大林的言论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一段话来威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自己的思想，或者保持自己在科学上的尊严，就往往意味着要遭到压迫。

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还要坏得多。不要说新闻工作

者，就是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甚至統計學家，也都特別注意不要同——即使是間接地——官方路線的暫時左右搖擺發生矛盾。關於蘇維埃經濟，或者國內外政策，人們只能抄襲“領袖”演說中的一些陳辭濫調，並且事前就給自己規定了這樣的任務，即在文章中要說明一切事物恰好是按照應該發展的那樣發展着，甚至發展得還要好些。雖然這種百分之百地加以迎合的做法可以使人們免除日常的不愉快，但是它往往帶來最重的懲罰：空洞無物。

儘管從形式上說，馬克思主義在蘇聯是國家所奉行的學說，但是在過去十二年，沒有在經濟學、社會學、歷史或哲學方面出現過一種值得注意和譯成外國文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馬克思主義著作都不超過經院式的編纂範圍（這種編纂只是重複那些事先批准了的舊概念），都是按照當時行政管理的需要重新編排那些舊引語。千百萬冊書籍和小冊子通過國家機構分配到各地，這些書籍和小冊子對任何人都沒有用處，都是一些用胶水、甜言蜜語和其他粘性物質拼湊起來的東西。可能說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和獨立意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關在牢里就是被迫默不作聲，儘管事實上，社會形式的演變在每個階段都提出了巨大的科學問題！進行理論工作所不可缺少的謹慎被玷污和踐踏在腳下了。甚至《列寧全集》的注釋，在每次新版本中都從統治人物的個人利益出發作了徹底的修改；“領導人”的名字加以推崇，反對派的名字加以誹謗；事實則被掩蓋起來。關於黨史和革命史的教科書，情況也是一樣。事實被歪曲，文獻被隱藏起來或者加以偽造，名譽凭空製造出來或者有意加以詆毀。如果簡單地比較一下任何一本書在過去十二年當中所作的修改，那末，我們就可以正確無誤地看出統治階層的思想 and 良心蛻化的過程。

“極權”制度對文學藝術的影響也具有同樣的毀滅性。各種傾向和各種學派的鬥爭已成過去，代之而起的是解釋領導人的意志。針對着各種文學藝術團體，建立了一個強制性的總組織，這是一種文學藝術的集中營。中庸而“思想正確”的作家如綏拉菲摩維奇或

革拉德珂夫等被尊崇为經典作家。有才能而不肯过于違背自己的作家，則被一些专门教訓別人的人用一些厚顏无耻的話和几十段引語来加以訓誡。最杰出的艺术家不是自杀，就是从遙远的过去找材料，或者从此沉默了。忠实而有才华的著作只是偶尔出現，这种著作是从地下拿出来的，具有艺术違禁品的性质。

苏維埃艺术生活是一种殉教史。自从《真理报》的社論下令反对“形式主义”以后，作家、艺术家、导演、甚至歌剧的演唱者中間开始出現了一种羞辱性的自我檢討流行病。这些人都擯棄了自己过去的罪过，但是，由于怕一旦发生进一步紧急的情况，因此都避免明确地說明这种“形式主义”的性质。到后来，当局不得不下一道新的命令来終止这种过分泛濫的自我檢討浪潮。由于斯大林对詩人馬雅柯夫斯基称贊了几句，文学估价在几个星期內便发生了变化，教科书重新改編，街道改名，雕像建立起来。新歌剧給予高貴听众的印象馬上变成作曲家的一种音乐指导。共青团的書記在一次作家代表會議上說，“斯大林同志的建議就是法律”，全体听众都鼓掌，但是毫無疑問，有些人是感到可耻的。好像是要彻底嘲弄文学一样，連俄文句子都写不通順的斯大林，竟被宣布为文学風格的一种典型。这种拜占廷主义和警察統治，虽然某些表現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喜剧情調，但是其中也包含着某种深刻的悲剧。

官方的公式是这样的：文化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然而，究竟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是什么，只能作某些多多少少有些乐观的猜測。誰也不能在一种不充分的經濟基础上发展那种文化。艺术远不像科学那样能够預測未来。无論如何，“描写未来的建設”、“指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造人类”等諸如此类的指示，对于創作想像力的帮助并不比五金店的价目表或者铁路上的時間表多些。

一种艺术的民族形式是同它的普遍容易接受的性质一致的。《真理报》向艺术家发号施令說，“凡是人民不要的东西，就不可能具有美的意义。”这种拒絕从艺术方面教育群众的民粹派老公式，

现在有了更加反动的性质，因为决定人民要什么艺术和不要什么艺术的权力还掌握在官僚的手里。官僚是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出版书籍的。官僚还用强制的办法卖书，不让读者有所选择。归根到底，在官僚的心目中，整个事情在于注意这样一点，即艺术要反映他们的利益，并且要找出能够使官僚对人民群众具有吸引力的那种形式。

毫无用处！什么文学也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领导人自己也不能不承认：“无论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或者是第二个五年计划，都还没有给我们一个可以超过十月革命所掀起的第一个浪潮的新文学浪潮。”这句话是说得非常温和的。实际上，尽管有些个别的例外，热月时期显然将作为一个平庸、吹捧和谄媚的时期载入艺术创作史。

第八章 外交政策和軍隊

一、从“世界革命”到“維持現狀”

外交政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国内政策的继续，因为外交政策也是由同一个统治阶级来执行的，同时它所追求的也是同样的历史目的。苏联统治阶层的蜕化，必然使苏维埃外交在目的和方法上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一次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流露出一种迹象，要努力使苏维埃外交政策摆脱国际革命的纲领。然而，官僚并不想从此同共产国际脱离关系。因为如果那样做，共产国际就会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反对派组织，而给苏联国内的力量对比带来不利的结果。与此相反，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越是减少以前的国际主义，统治集团就越要牢固地把共产国际的舵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现在共产国际是在旧的名义下为新的目的服务。然而，要达到新的目的，就需要新的人民。从一九二三年秋天开始，共产国际的历史就成了一部彻底革新其莫斯科人员以及各国支部人员的历史，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系列的宫廷革命、从上而下的清洗以及开除等等。目前共产国际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为苏维埃外交政策服务的驯服工具，可以在任何时候为任何左右摇摆的做法服务。

官僚不仅已经同过去决裂，而且还丧失了认识过去最重要的教训的能力。在那些教训当中，一个主要教训是，如果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帮助，如果没有殖民地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苏维埃政权连十二个月都维持不了。德奥军事力量之所以没有把对苏俄的进攻坚持到底，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感到背后有了强烈的革命气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起义活动差不多进行了三个季度，结果使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变成一张废纸。

一九一九年四月法国水兵在黑海的起义，迫使第三共和国政府放弃了在苏俄南部的军事行动。一九一九年九月，英国政府在本国工人的直接压力之下撤退了它在苏俄北部的远征军。一九二〇年红军从华沙近郊撤退以后，只是由于掀起了强有力的革命抗议浪潮，才阻止了协约国去帮助波兰摧毁苏维埃国家。一九二三年寇松^①勋爵向莫斯科提出具有威胁性的最后通牒以后，在决定性的时刻被英国工人组织的反抗束缚住了手脚。这些人所共知的事情并不是特殊情况。这些事情表明了苏维埃诞生以后最初最困难的时期的整个性质。虽然革命只是在俄国的范围内而没有在别的地方取得胜利，但是这种胜利所产生的希望远远不是没有成果的。

在那些年代里，苏维埃政府同资产阶级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一九一八年三月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一九二〇年同爱沙尼亚签订了条约；一九二〇年十月同波兰签订了里加条约；一九二二年四月同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另外还签订了一些次要的外交协定。然而，整个苏维埃政府或者其中的任何成员都从来没有想到把它的资产阶级对手当作“和平的朋友”，更没有想到让德国、波兰或者爱沙尼亚的共产党投票支持签订这些条约的资产阶级政府。不仅如此，正是这个问题对于群众的革命教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时苏维埃不能不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正像精疲力尽的罢工工人不能不签字同意资本家所强加给他们的最残酷的条件一样。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虚伪的“弃权”形式来使投票有利于这种和平的时候，却被布尔什维克斥责为支持强盗的抢劫行为。虽然四年以后同民主德国签订的拉帕洛条约是建立在双方表面上具有“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但是，如果德国共产党以此为借口而表示信任德国的外交，那就会立即被共产国际开除。苏维埃国际政策的基本路线决定于这样一个事实，

^① 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859—1925)，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年任外交大臣，一九二三年五月向苏联提出挑衅性最后通牒，并于同年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中译者注

即苏維埃政府同帝国主义者商业、外交或軍事方面进行这种或那种交易的时候——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絕不能限制或削弱各該資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归根到底，工人国家本身的安全只能由世界革命的发展来保证。齐切林^①在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时候，建議为了迎合美国的輿論把苏維埃宪法作某些“民主的”修改，結果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写的一封正式信件中提出了一項紧急建議：馬上把齐切林送到疗养院去。当时如果有誰敢于建議，通过加入——姑且这么說——虛伪而空洞的凱洛格公約或者削弱共产国际的政策等办法来博取“民主的”帝国主义的好感，那末，毫無疑問，列宁就会建議把这位革新者送到精神病院去——同时他在政治局中是不会遭到任何反对的。

那个时期的领导人特別反对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幻想——如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仲裁法庭、裁减軍备等等。他們认为这些幻想只不过是欺騙劳苦群众的一种方法，使他們在新战争爆发的时候措手不及。在由列宁起草而在一九一九年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綱中，我們可以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这样一段明确的說明：“无产阶级日益加强的压力，特别是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所取得的胜利，正在加强剝削者的抵抗，迫使剝削者采取新形式的資本家国际联合（如国际联盟等），这种联合把系統地剝削各国人民的行为在世界規模上組織起来，并且首先努力于直接镇压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所有这些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国的內战同革命战争結合起来，这种革命战争既包括无产阶级国家保卫自己的革命战争，也包括被压迫的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奴役的革命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在資本主义下进行国际裁軍、建立仲裁法庭等和平主义口号，不仅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对劳苦大众的赤裸裸的欺騙，企图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并使它忽視解除剝削者的武装这一任务。”布尔什維克党綱中的这一段話，有預見性地估計了而且真正

^① 齐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 1872—1936), 一九一八至一九三〇年期間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員。——中譯者注

深刻地估計了目前的蘇維埃外交政策以及共产国际及其世界各地的和平主义“朋友”的政策。

在干涉和封鎖时期以后，資本主义世界对苏联的經濟和軍事压力，說实在的，比本来所担心的那种情况要弱得多。欧洲所想的还是过去的战争，而不是未来的战争。接着发生了前所未聞的世界經濟危机，这种情况使全世界的統治階級意气沮丧。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联才能在国家又一次陷于內战、饥荒和流行病的情况下經受了第一个五年計劃的考驗。第二个五年計劃的头几年，使国内的情况有了显著的好轉，但是在这几年当中，資本主义世界的經濟情况也开始恢复，同时一种充滿希望、貪婪、渴望和备战的新潮流也出現了。在我們看来，联合起来进攻苏联的危險之所以明显，只是因为蘇維埃国家还陷于孤立状态，因为这个“占世界地面六分之一”的地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一个原始落后的領域，因为尽管生产資料已經国有化而劳动生产率还远低于資本主义国家，最后——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世界无产階級的主要部队已經瓦解，缺乏自信心，同时失去了可靠的領導。这样，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十月革命便显示出来，它是深深地依靠世界的发展的；十月革命，过去在它的領導人看来，只不过是世界革命的序幕，但是在事态发展的进程中，它得到了一种暫时的独立的意义。事实又一次明显地表明，誰战胜誰这个历史性問題是不能在国家疆界以內决定的，国内的成功和失敗只不过是為这个問題在世界舞台上的解决准备或多或少有利的条件。

蘇維埃官僚——我們必須这样公正地說——已經拥有丰富的經驗，知道怎样指揮人民群眾，引誘他們沉睡，分化和削弱他們，或者是欺騙他們，而所有这些都是直截了当地为了毫无限制地統治他們。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蘇維埃官僚已經喪失了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任何能力。这些官僚既然在国内扼杀了下层人民的独立性和首創精神，自然在世界舞台上也就不能喚起敏銳的思想和革命的勇气。不仅如此，蘇維埃官僚作为一个拥有特权的統治

阶层，非常重視西方那些在社会形态上同自己接近的資產階級激进分子、改良主义議員和工会官僚的帮助和友誼，而很看不起那些在社会地位上同自己有很大距离的普通工人的帮助和友誼。这里不准备叙述第三国际衰落和蜕化的历史，因为作者已經就这个題目写了一系列专著，并且已經用几乎文明世界的各种語言出版。事实上，从共产国际領導者的角度来看，具有民族局限性和保守性的无知的和不負責任的苏維埃官僚，帶給世界工人运动的仅仅是不幸。好像是历史作出的公正决定，苏联目前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世界无产階級失敗以后所引起的后果，而不是决定于单独建設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只要回忆这样两件事就够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敗，使日本軍国主义在东方有了行动自由；而德国无产階級遭到的挫折，使希特勒取得了胜利，使德国軍国主义瘋狂地发展。这两件事都是共产国际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

背叛了世界革命而仍然自以为忠实于世界革命的热月官僚，把自己的主要努力放在使資產階級“中立化”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就有必要使自己看起来像一个稳当的、像样的和可靠的保障秩序的堡垒。但是，要装得像，而且长期装得像，那就必須变成那个样子。統治阶层的有机演变已經注意到这一点。因此，这个官僚阶层面对着自己的錯誤所造成的后果而步步退却的时候，便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要保证苏联的不可侵犯性，那就必須把自己包括在欧亚現狀体系中。結果，还有什么比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簽訂一个永久性的互不侵犯公約更好的呢？目前外交政策的官方公式受到了广泛的宣傳，进行这种宣傳的不仅是可以使用其职业所特有的习惯語言的苏維埃外交，而且还有应当使用革命語言的共产国际。这个官方公式是：“我們不要外国的一寸土地，但是我們也不能丢掉我們的一寸土地。”好像这只是爭執一小块土地的問題，而不是两个不可調和的社会制度之間的世界性斗争的問題！

苏联认为把中东铁路让給日本是比較现实的做法，并且当作

为和平事业服务具有自信力的表现来庆祝。其实，这种软弱的行动造成了后来中国革命的崩溃。实际上，苏维埃政府把这条在战略上极其重要的交通线交给敌人，就是推动日本进一步攫夺华北，鼓励它现在试图进攻蒙古。这种被迫作出的牺牲并不意味着危险的“中立化”，而顶多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喘息时间；与此同时，这却是对东京军事统治集团的一种有力的刺激。

蒙古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在未来的反苏战争中日本所要占领的战略地位的问题。苏维埃政府这次不得不公开宣布，如果日本军队侵入蒙古，它就要用战争来对付。然而，这里还不是一个直接保卫“我们的土地”的问题，因为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有没有人严重威胁苏维埃的边界时，消极保卫才似乎是足够的措施。苏联的真正保卫方法应当是削弱帝国主义的障地，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各国人民的障地。一种不利的力量对比有可能迫使我們放弃许多“寸”土地，就像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里加和约时所做的，也像在移交中东铁路这件事上所做的。同时，要想争取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的变化，工人国家就要担负起一项经常性的义务，那就是帮助其他国家的解放运动。但是，正是这项基本任务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二、国际联盟和共产国际

同现状的主要维护者法国和解，随后又同它缔结十足军事性的条约，这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取得胜利所带来的一种政策，它对法国要比对苏维埃有利得多。按照条约，苏维埃方面给予法国军事支持的义务是无条件的；与此相反，法国给予苏维埃的帮助却决定于法国同英国和意大利的事先协商，而这种协商却为施展反苏敌对阴谋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场所。同莱因兰有关的事态发展表明，如果莫斯科对局势有更现实的估计，而且更能自制的話，那末，它本来是可以从法国方面得到更好的保证的——如果在国家组合

发生剧烈变化、接連不断地发生外交危机以及时而和解时而破裂的时代，条約真可以被当作“保证”的話。但是，这并不是第一次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苏維埃官僚在同本国先进工人进行斗争的时候相当坚决，而同资产阶级外交家谈判的时候却远远不是那么坚决。

有这样一种說法，苏联方面的帮助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同德国没有共同疆界，这种說法是不能认真看待的。如果德国进攻苏联，进攻的一方显然就会找到共同的疆界。如果德国进攻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波兰就一天也不能保持中立。如果波兰承认自己作为法国的盟国而承担的义务，那末，它就不可避免地要为紅軍敞开道路；而如果它撕毁了同盟条約，那末，它就会馬上变成德国的助手。在后一种情况下，苏联是不难找到“共同疆界”的。不仅如此，在未来的战争中，海上和空中“疆界”所起的作用也絕不会比陆地疆界小。

苏联官僚利用戈培尔慣用的那套欺騙手法，把苏联加入国际联盟这件事向俄国人民說成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結果。实际上，资产阶级之所以接受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只不过是出于革命的危險已經大大减少。这件事并不是苏联的胜利，而是热月官僚向这个无原則妥协的日内瓦机构的投降。按照上面所引的布尔什維克党綱上的話，这个机构“将在将来努力于镇压革命运动”。自从布尔什維主义的大宪章頒布以来，什么东西使国际联盟的性质、和平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职能以及苏維埃的政策发生了这样根本性的变化呢？提出这个問題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經驗很快就证明，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不能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这种实际利益通过同个别资产阶级国家訂立协定是可以得到的），与此同时，却给自己增加了严重的限制和义务。苏联为了维护它刚刚得到不久的保守声望，正在最忠实地遵守这些限制和履行这些义务。苏联在国联內不仅必須迎合法国，而且还必須迎

合法国的盟国，这种情况迫使苏維埃外交在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的冲突中采取了一种极其模棱两可的立場。李維諾夫——他在日内瓦只不过是賴伐尔的影子——感謝法国和英国外交家“为了和平”而作的努力，这种努力居然幸运地使阿比西尼亚灭亡，而在这个时候，高加索的石油正在源源不断地供給意大利的舰队。即使你可以了解，莫斯科政府不敢公开破坏一个商业条約，但是工会是沒有必要考虑对外貿易人民委员会的事情的。如果苏联的工会作出决定要真正停止对意大利的出口，那就会掀起世界性的抵制运动，这种运动要比叛卖的“制裁”实际得无可比拟，因为那种“制裁”都是外交家和法学家事前同墨索里尼取得了協議以后才提出的。苏維埃工会在一九二六年曾經公开征募了千百万卢布支援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如果这次与此相反而連手指都不敢动一动，那只是因为这样一种倡議是統治官僚所禁止的，他們的主要事情是討好法国。然而，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沒有哪个軍事盟国能够挽救苏联在殖民地各国人民和一般劳苦群众中所丧失的信用。

克里姆林宫里的人难道不了解这种情况嗎？苏維埃官方报纸这样回答說，“德国法西斯的根本目的是孤立苏联……好吧，这有什么用呢？結果今天苏联在全世界的朋友比任何时候都多。”（見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消息报》）意大利无产階級被法西斯的鎖鏈束縛住了；中国革命被破坏了，于是日本开始在中国发号施令；德国无产階級遭到那样的打击，以致希特勒在全民投票中根本沒有遇到一点抵抗；奧地利的无产階級被束縛住了手脚；巴尔干各国的革命政党被踐踏在地上；在法国，在西班牙，工人都在跟着資产階級激进派前进。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苏維埃政府自从加入国际联盟以后还是“在全世界的朋友比任何时候都多”！这种吹嘘乍看起来是十分荒謬的，但是如果不是从工人国家的情况来看，而是从它的統治集团的情况来看，那是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的。难道不是由于世界无产階級遭到了惨敗，苏維埃官僚才能在國內夺取政权，在資本主义国家爭取到多多少少比較有利的“輿論”嗎？

共产国际越是沒有能力威胁資本的地位，克里姆林政府的政治信用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資產階級國家的眼中就越高。因此，苏联官僚在國內和國際的實力，正好同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基地的實力成反比例。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外还有一面。

在惊人的做法和轰动的事件中往往流露出一种深刻洞察力的劳合·乔治^①，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曾警告下議院，要它不要譴責法西斯德国，因为据他說，法西斯德国注定要成为欧洲最可靠的反共堡垒。“我們还要祝賀它成为我們的朋友哩。”这是一句最有意义的話！世界資產階級对克里姆林宮的半恭維半嘲笑的贊揚，一点也不是一种保障和平的做法，甚至一点也沒有減輕战争的危險。苏維埃官僚的演变之所以引起世界資產階級的兴趣，归根到底，是从希望所有制的形式可能发生变化这一点出发的。拿破侖一世在完全拋棄了雅各宾主义的傳統以后，戴上皇冠并恢复了对天主教的崇拜，但是他仍然还是整个半封建欧洲所仇恨的对象，因为他並沒有放棄保卫革命所創造的新財產制度。只要对外貿易的壟断情况還沒有取消，只要資本的權利還沒有恢复，不管統治階層做了多少事情，在全世界資產階級的眼中，苏联就依然还是一个不可調和的敌人，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則是一个朋友，如果今天不是这样的話，至少明天是这样。甚至在巴尔都^②和賴伐尔同莫斯科談判的时候，尽管希特勒方面发出了严重的威胁，尽管法国共产党已經急剧地轉到爱国主义方面，法国大資產階級还是頑固地拒絕把賭注放在苏联的牌上。当賴伐尔同苏联簽訂条約的时候，左派指責他表面上是联合莫斯科来恐吓柏林，而实际上却是寻求同柏林和罗

① 劳合·乔治(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国自由党人，1916—1922年曾任英国首相。——中譯者注

② 巴尔都(Jean Louis Firmin Barthou, 1862—1934)，法国政客、律師，一九一三年任总理，一九三四年在杜迈格內閣中任外交部长，同年十月被法西斯分子暗杀。——中譯者注

馬的和解来反对莫斯科。这种判断也许还不太成熟，但是同事态的自然发展一点也没有不同的地方。

不管人们怎样估计法苏条约的利害，没有一个严肃的革命政治家会否认苏维埃国家有权同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締結暫时的协定，来使自己的不可侵犯得到一种輔助性的支持。只是必須明确地和公开地向群众表明，这种局部性的策略性的协定在总的历史力量体系中占什么地位。为了特別利用法国和德国之間的矛盾，一点也没有必要把资产阶级盟国或者暂时躲在国际联盟的烟幕下的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理想化。然而，不仅苏维埃外交，而且共产国际也步其后尘，都有步骤地把莫斯科的暂时盟国描繪成“和平的朋友”，并且用“集体安全”和“裁軍”等口号来欺騙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它們实际上就变成帝国主义者们在工人阶级当中的政治代理人。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同斯科利甫斯—霍华德报系总經理罗易·霍华德进行的臭名远揚的談話，是一个宝贵的文件，这个文件具体地說明了苏维埃官僚对于世界政治的重大問題一无所知，同时还說明了苏联领导人同世界工人运动之間所建立的那种虛伪的关系。对于战争是否不可避免这个問題，斯大林的回答是，“我认为爱好和平的人們的陣地正在巩固起来。他們可以公开进行活动，他們依靠社会輿論的威力，他們掌握着像国际联盟这样一些工具。”这些話没有一点现实主义味道。资产阶级国家并没有把它們自己分成和平的“朋友”和“敌人”，特别是由于这样的和平并不存在。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关心維護本国的和平，这种关心越强烈，則这种和平对于它的敌人來說就越加不可忍受。斯大林、鮑尔温^①、萊翁·勃魯姆^②等人的共同公式是，“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团

① 鮑尔温(Stanley Baldwin, 1867—1947), 英国保守党人, 曾三度担任首相(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作者写本书时, 鮑尔温正担任首相。——中譯者注

② 萊翁·勃魯姆(Léon Blum, 1872—1950), 法国社会党領袖,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任法国总理。作者写本书时, 勃魯姆也正担任总理。——中譯者注

結在国联內来保卫它，和平就会真正得到保障。”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意味着，如果不存在破坏和平的原因，和平就会得到保障。如果你願意的話，这种思想是正确的，但并不是那么有份量。像美国那样沒有参加国联的一些大国，显然认为在抽象的“和平”之上保持行动自由的做法更有价值。这些大国需要这种行动自由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到了适当时候它們会表明的。像日本和德国等退出国联的国家，或者像意大利等暂时向国联“請假”的国家，都有足够的重大理由来維護它們的所作所为。这些国家同国联决裂只不过是改变了处理現有矛盾的外交形式，而沒有改变这些矛盾的性质，也沒有改变国联的性质。那些宣誓永远忠实于国联的善良国家，不得不更加坚决地利用国联来維護自己的和平。但是即使这样，它們彼此之間也不是一致的。英国很願意延长和平时期，但它想以牺牲法国在欧洲或非洲的利益来达到这个目的。在法国方面，則准备牺牲英国海路的安全来支持意大利。但是，为了維護它們自己的利益，它們都願意訴諸战争，用不着說，自然是最正义的战争。最后，那些沒有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躲在国联阴影下的小国，归根到底将会表明，它們并不是站在“和平”方面，而是站在战争中 strongest 的联合势力方面。

国联在維護現狀方面并不是一个“和平”組織，而是一个少数帝国主义者用暴力对付絕大多数人类的組織。要保持这样的“秩序”，只有依靠接連不断的战争——小的和大的，今天在殖民地，明天在大国之間。帝国主义对現狀的忠实，总是具有一种有条件的、暂时的和有限度的性质。意大利昨天所保卫的是欧洲的現狀，而不是非洲的現狀。明天它在欧洲的政策是怎样的呢，誰也不知道。但是，非洲疆界的改变已經在欧洲引起了反应。希特勒之所以敢于把他的军队开进萊因兰，只不过是因為墨索里尼侵入了阿比西尼亚。在和平的“朋友”当中，是很难把意大利算进去的。然而，在法国看来，它同意大利的友好远比它同苏联的友好来得重要。在英国方面，它所寻求的則是同德国友好。集团的組合有了变化；欲

望却依然如故。所謂維護現狀的國家的任務，從本質上說是要使國聯最有利於各種力量的聯合，最有利於掩蓋未來戰爭的準備工作。至於哪個國家發動戰爭和怎樣發動，這要看次要的情況如何。將來總會有人發動戰爭，因為現狀本身就是一個火藥庫。

在帝國主義矛盾還存在的時候，“裁軍”計劃是最有害的假象。這種計劃即使由於取得普遍協議而實現了——這顯然是荒誕的假定！——也一點也不會防止新戰爭。帝國主義者並不是由於有了軍備才進行戰爭的；恰恰相反，他們製造武器是因為他們需要打仗。要想進行新的而且很迅速的武裝，關鍵在於當代的技术。不管有了什麼樣的協議、限制和“裁軍”，軍火庫、軍事工廠、實驗室以及整個資本主義工業都還保留着自己的力量。例如，德國雖然被它的征服者在最細致的監督下解除了武裝（順便說一句，這才是唯一真正的“裁軍”形式！），可是由於它擁有強大的工業，現在又開始變成歐洲軍國主義的堡壘。在德國方面，則想把它的某些鄰國“解除武裝”。所謂“逐步裁軍”的思想，只不過意味着在和平時期設法削減過多的軍事費用。這是一個資金問題，而不是愛好和平的問題。但是即使這樣，這項任務也還是沒有實現。由於地理位置、經濟力量以及殖民地的大小不同，任何裁軍標準都不可避免地會使力量對比的改變有利於一些國家而不利於另外一些國家。這就是在日內瓦所作的努力總是沒有結果的原因。在裁軍問題上進行了將近二十年的談判和會談以後，只不過是掀起了新的擴軍浪潮，這種浪潮的推進使我們迄今所看到的一切事情都遠遠地落在後面。把無產階級的革命政策建築在裁軍計劃上，意味着不是把這種政策建築在沙漠上，而是建築在軍國主義的煙幕上。

要想為了帝國主義進行毫無阻擋的屠殺而扼殺階級鬥爭，只有在群眾性工人組織的領袖的幫助下才能做到。一九一四年實現這項任務所提出的口號是“最後的戰爭”、“反對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戰爭”、“爭取民主的戰爭”，這些口號的信用已經被最近二十年的歷史完全破壞。代替這些口號的是“集體安全”和“普遍裁軍”。歐

洲工人組織的領袖在支持国际联盟的借口下正在准备“神圣同盟”的新版本，对于战争來說，这样一个同盟的重要性并不小于坦克、飞机以及“禁止使用”的毒气。

第三国际是在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憤怒抗議声中誕生的。但是，十月革命給它填裝的革命火药早已用完。現在共产国际像第二国际一样，也站到国际联盟的旗帜下面来了，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共产国际更加厚顏无耻。当英国社会主义者斯塔福德·克利浦斯^①爵士把国际联盟叫做国际强盜联盟的时候（这个名称虽然不礼貌，却是公正的），倫敦的《泰晤士报》带着嘲笑的口吻問道，“那末，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又如何解釋呢？”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因此，莫斯科的官僚是可以大力地支持十月革命曾經給予毁灭性打击的社会爱国主义的。

在这一点上，罗易·霍华德也曾想得到一点說明。他問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的計劃和意图，目前的情况究竟怎样？“我們从来没有过这类計劃和意图。”不过，那末……“这是出于誤会。”霍华德又問，“悲剧的誤会嗎？”斯大林回答說，“不，喜剧的，或者可以說是悲喜剧的誤会。”这里引用的話完全是按照原来的對話抄下来的。斯大林繼續說，“周圍的国家如果真正站稳的話，能够认为苏維埃人民的思想有什么危險呢？”不錯，但是假如——訪問者可能这样問道——那些国家並沒有站稳呢？斯大林又提出了一个令人安心的論据：“輸出革命，这是胡說。每一个国家如果想要革命，它就会自己来进行自己的革命，如果不想革命，也就不会有革命。例如我們国家想要进行革命，于是就进行了革命……”这一次我們还是一字一句地引用原来的談話的。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很自然地过渡到一国进行革命的理論。那末，为什么还要共产国际存在呢？——訪問者本来是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問題的。但是，他显然知道正当的好奇心的限度。斯大林的这种重新提出保证的解

^① 斯塔福德·克利浦斯(Stafford Cripps, 1889—1952), 英国工党人, 曾任掌璽大臣、財政大臣等。一九五一年任費边社主席。——中譯者注

釋，不僅會被資本家讀到，而且也會被工人讀到，而這種解釋卻充滿了漏洞。在“我們國家”想要進行革命以前，我們從其他國家輸入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並且利用了外國的革命經驗。幾十年來，我們的亡命徒在國外指導了俄國的鬥爭。我們得到了歐洲和美國工人組織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援助。我們取得勝利以後，在一九一九年建立了共產國際。我們不止一次地宣稱，革命勝利的國家的無產階級，有責任去援助被壓迫的和起來反抗的階級，而且不僅是思想上進行援助，如果可能的話，還要拿武器去援助。我們也並沒有局限於只是三番五次地宣告這一點。我們在我們自己那個時期曾經用武裝力量去援助芬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格魯吉亞的工人。我們曾經試圖以紅軍進攻華沙的行動去援助正在暴動的波蘭無產階級。我們派遣了組織者和指揮官去幫助中國人革命。一九二六年我們募集了千百萬盧布去援助英國的罷工工人。而現在，所有這些似乎都變成誤會。是悲劇的誤會嗎？不，是喜劇的。難怪斯大林宣稱，住在蘇聯已經成為“愉快”的事。甚至共產國際也從一個嚴肅的角色改變成一個喜劇性的角色了。

斯大林如果不是誹謗過去，而是把熱月的政策同十月革命的政策作一公開的對比，那末，他本來是可以給予那位訪問者更加令人信服的印象的。他本來可以這樣說，“在列寧的眼中，國際聯盟是一種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機器。我們卻認為它是一種和平工具。列寧說過革命戰爭的不可避免性。我們卻認為輸出革命這樣一種思想是胡說。列寧斥責無產階級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結成聯盟是一種叛賣行為。我們卻以全力推動國際無產階級走上這條道路。列寧抨擊在資本主義下的裁軍口號是欺騙工人。我們卻把我們的全部政策建立在这个口號上。你們的悲喜劇的誤會，”——斯大林本來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於你們把我們當作布爾什維主義的繼承者，而事實上我們卻是布爾什維主義的掘墓人。”

三、紅軍及其學說

旧俄国軍人是在农村宗法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們的特点首先是一种盲目的群众心理。凱撒琳二世和保罗时代的大元帅苏伏罗夫，是一支封建奴隶軍队的无可匹敌的主人。法国大革命使旧欧洲和沙皇俄国的軍事艺术成为完全过时的东西。旧俄帝国固然还繼續征占了大片的領土，可是它再沒有战胜过文明国家的軍队。在外部遭到一系列的失敗和在内部引起一系列的騷乱都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才能在这种火焰中改变民族的性格。紅軍只能在一种新的社会和心理基础上形成。长期来所忍受的那种盲目群众心理和听天由命的状态，在年青的一代人中已經代之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对技术的崇拜。随着个性的觉醒，文化水平也迅速地提高。不識字的士兵越来越少。紅軍不让不能讀也不能写的人退伍。各种体育活动在軍队中以及軍队的周圍大力地展开。在工人、官員以及学生当中，射击成績优異的奖章很受欢迎。在冬季的几个月里，滑冰使軍队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在跳伞、滑翔和航空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北极的飞行和同温层的飞行已經家喻戶曉。这些高度成就就可以代表大量的其他成就。

关于紅軍在国内战争年代里的組織工作和軍事行动水平，沒有必要加以理想化。但是，对于青年指揮官來說，那几年却是一次大洗礼。沙皇軍队中的普通士兵、下級軍官以及軍士表现出組織者和軍事領導者的才能，他們在規模巨大的斗争中鍛炼了自己的意志。这些自己苦干出来的人不止失敗过一次，但是他們終究取得了胜利。其中最好的一部分人以后就勤奋地进行学习。目前的高級首长都經歷了內战的学校，其中絕大多数还是从軍事学院或者特別訓練班里毕业出来的。在年紀較大的軍官中，差不多有一半人受过高等軍事教育；其他人也讀过軍事課程。軍事理論給予他們必要的思想訓練，但是並沒有損害国内战争时期富有戏剧性

的軍事行动在他們身上所喚起的那種大膽作風。這一代人目前大約有四五十歲，正是體力和精神達到平衡狀態的年齡，正是大膽的首創精神可以依靠經驗而還沒有被經驗所摧毀的時候。

黨、共青團、工會——甚至不要管它們是怎樣實現自己的社會主義使命的——國有工業的管理部門、合作社、集體農莊、蘇維埃農場——甚至也不要管它們是怎樣完成自己的社會主義任務的——所有這些組織都在訓練無數的青年管理幹部，這些幹部將習慣於同大批人和大批貨物打交道，將習慣於使自己同國家合而為一。這些幹部是指揮官的天然儲備。學生在服兵役以前所受的高等教育構成另外一支獨立的儲備。學生組成特別訓練營，這種訓練營在一旦動員的時候可以順利地改為臨時軍官學校。要估計這方面的人數，只要指出這一點來就夠了，即從高等教育機關畢業出來的學生，目前已經達到每年八萬名；大專院校的学生已經超過五十萬，在所有教育機關進行學習的學生總數將近兩千八百萬名。

在經濟領域，特別是工業方面，社會革命為國防事業提供了舊俄所夢想不到的好處。計劃方法從本質上說意味着政府手中的工業不斷地動員，這種方法使得政府有可能甚至在修建和裝備新工廠的時候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國防利益方面。紅軍的人力和機械力量的對比，大體上可以認為比得上西方最好的軍隊的水平。在炮兵的重新裝備方面，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生產汽車、裝甲車、坦克和飛機方面正在支出巨額的款項。目前全國已經有了大約五十萬台拖拉機。一九三六年將生產十六萬台，共計八百五十萬匹馬力。坦克的生產也正以相同的速度進行着。紅軍動員計劃的規定是，在有軍事行動的前沿每公里配備三十至四十五輛坦克車。由於世界大戰的結果，海軍的噸位從一九一七年的五十四萬八千噸減為一九二八年的八萬二千噸。在這方面，我們必須幾乎從頭做起。一九三六年一月土哈切夫斯基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宣稱，“我們正在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我們正在把自己的力量首先集中在發展潛水艇方面。”我

們可以假定，日本海軍部一定很清楚苏联在这方面的成就。現在波罗的海方面也同樣受到重視。在未來的幾年中，海軍在保卫海岸綫方面还只能起一种輔助性的作用。

但是，空軍已經有了巨大的发展。两年多以前，据报刊报道，有一个法国航空工程师代表团“对于这方面的成就感到惊讶，也感到高兴”。这个代表团通过一次机会特別信服了这样一点，即紅軍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重轰炸机，其續航力在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公里之間。远东一旦发生战争，日本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就会遭到来自苏联海岸的攻击。根据报刊上的材料，紅軍的五年計劃規定一九三五年成立六十二个空軍大队，能够同时使五千架飞机投入战斗。毫無疑問，这个計劃已經完成，而且也許超額完成了。

航空事业同工业的一个部門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工业部門在沙皇俄国时代是几乎不存在的，而只是近来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这个工业部門就是化学工业。下面一点已經不是什么秘密：苏維埃政府——还有世界其他各国政府——一点也不相信关于“禁止”使用毒气的謠言。意大利开化者在阿比西尼亚所做的工作又一次清楚地表明，这种人道主义的限制对于国际强盜有什么用处。我們可以断言，为了对付軍用化学和軍用細菌学方面发生任何意外的灾难，紅軍在这种最神秘最邪恶的事业方面是同西方軍隊装备得一样好的。

至于軍用工业品的质量，是可以提出一种应有的疑問的。然而，我們已經指出，苏联的生产工具是比一般用品制造得好的。主顾如果是有势力的統治官僚集团，产品的质量就大大超过平均水平，而平均水平还是很低的。最有势力的顾客是軍部。如果具有毁灭性的机器的质量不仅比消費品好，而且比生产工具好，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然而，軍事工业依然还是整个工业的一个部分，同时虽然它的不足程度較輕，但是毕竟还是反映出整个工业的不足之处。伏罗希洛夫和土哈切夫斯基一有机会就公开地这样提醒工业家：“我們并不总是完全滿意你們供給紅軍的产品的质量。”我們

可以断言，在秘密會議上，軍事領導人員是会更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見的。兵站補給的质量通常总是不及軍火。鞋子的质量不如机关枪。还有飞机的发动机，虽然已經取得了无可怀疑的进展，但是还大大落后于西方最好的类型。就整个軍事装备來說，老任务还摆在那里，即尽快地赶上未来敌人的水平。

农业的情况还要糟。在莫斯科，人們常說，由于工业的收入已經超过农业的收入，苏联事实上已經由一个农工业国家改变为一个工农业国家。实际上，收入的新对比并不是决定于工业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也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是决定于农业的非常低的发展水平。好几年来苏維埃外交对日本之所以表现出少見的軟弱，主要就是由于在粮食供应方面遭到了严重的困难。然而，最近三年来已經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特别是在远东已經建立了軍用粮食供应基地。

軍隊中最令人痛心的一点是缺少馬匹，虽然这一点看来可能是荒謬的。在全力推行全盘集体化时，全国大約有百分之五十五的馬都被屠宰了。此外，尽管今天的軍隊都需要摩托化，但还是像拿破侖时代一样，每三个士兵还是要有一匹馬。然而，在去年，这方面发生了有利的轉变：全国的馬又在增加了。无論如何，即使在今后的几个月中爆发战争，一个拥有一亿七千万人口的国家总能够为前方动員必要的粮食資源和馬匹——說实在的，那要牺牲其他居民的利益。但是，在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下，所有国家的人民群众，总的來說，希望得到的只能是飢餓、毒气和流行病。

* * *

法国大革命是把新組織的部队同皇家兵团混編在一起才建立了自己的軍隊。十月革命把沙皇軍隊完全解散了，一点也沒有留下。紅軍是另起炉灶新建立起来的。这支軍隊是苏維埃制度的孿生兄弟，无論在大事情或者小事情上，它都同苏維埃制度共命运。紅軍之所以較沙皇軍隊无比优越，完全是偉大的社会革命賜給的。然而，它並沒有摆脱苏維埃制度蜕化进程的影响。恰恰相反，这种

进程在军队中表现得最完整。在试图说明红军在未来的军事大动乱中可能起的作用以前，有必要先简略地谈谈它的指导思想和结构的演变情况。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二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条法令，这条法令为建立正规武装部队奠定了基础，它这样规定了这支部队的目标：“政权转移到劳苦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手中以后，就有了建立新军队的必要，这支军队应当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堡垒……并且将作为一种支持力量来为即将到来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服务。”每逢“五一节”，年青的红军士兵都要重述从一九一八年一直保留下来的“社会主义誓词”，他们“在俄国和全世界劳苦阶级的眼前”宣誓，“一定不遗余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各个民族的兄弟关系”而斗争。斯大林现在把革命的国际性质说成是“喜剧的误会”和“胡说”，这一点除了表明其他许多情况以外，尤其表明他对苏维埃政权至今还没有废除的基本法令尊重得不够。

军队自然同党和国家一样，受着同一思想的培育。军队颁布的法令、报纸宣传和口头鼓动都受了这样的鼓舞，即国际革命是一项实际任务。在军部里，革命的国际主义纲领经常具有一种夸张的性质。已故的斯·古谢夫——一度担任军队的政治部长，后来成为斯大林的亲密伙伴——一九二一年在官方的军事报纸上写道：“我们之所以正在准备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军队……不仅是为了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活动的保卫战争，而且是为了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战争（既包括防御性战争，也包括进攻性战争）。”不仅如此，古谢夫还直截了当地谴责当时军部的首脑，嫌他没有进行足够的准备工作来使红军担负起它的国际任务。作者在报刊上答复了古谢夫，请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革命进程中，外国军事力量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而不能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在有利的条件下，它们才能加速革命的完成和促进胜利的到来。“军事干涉就像医生的钳子一样。运用得及时，就可以减

輕分娩的痛苦；运用得过早，就只能造成流产。”（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可惜我們不能詳盡地在这里叙述这个并非不重要的問題的历史。然而，我們要指出一点，即現在的元帅土哈切夫斯基一九二一年曾写信給共产国际，建議設立一个以他为主席的“国际参謀部”。这封有趣的信后来由土哈切夫斯基收在他的一本論文集里发表了，这本論文集起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书名：《階級战争》。这位有才能而有些操之过急的指揮官應該从字典中了解到这一点：“只有在几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参謀部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国际参謀部；只要做不到这一点，国际参謀部就必然会变成一种諷刺画。”如果不是斯大林本人——对于原則性問題，尤其是新的原則性問題，他一般总是避免采取肯定的立場的——那末，至少是他后来的許多亲密同事，那些年都是站在党和軍队的領導机关的“左派”方面。在这些人的思想中，有不少天真的夸大成分，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說有不少“喜劇的誤会”。沒有这些东西，难道能够有偉大的革命嗎？早在我們必須把武器轉向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論所包含的那种同样极端的“諷刺画”以前很久，我們就在反对那种左的国际主义“諷刺画”了。

同后来人們所描繪的情况相反，布尔什維主义的精神生活在內战最激烈的时期是像泉水一样地涌流不息的。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各个角落，包括軍队在內，人們热烈地討論着一切事情，特别是軍事方面的問題。領導人的政策受到自由的而且常常是尖銳的批評。关于軍事檢查制度的某些过分做法的問題，当时的軍部首腦曾經在官方軍事報紙上这样写道：“我願意承认，檢查制度犯了許多錯誤；我认为很有必要給予那些受到尊敬的人物比較适中的地位。檢查制度应当維護軍事秘密……而沒有权利干涉任何其他事情。”（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国际参謀部的問題只不过是思想斗争中的一段插曲，這場斗争虽然沒有超出行动紀律的範圍，但是在軍队中，至少是在軍队的上层中，甚至已經形成一种具有反对派性质的东西。“无产阶

級軍事學說”派——屬於這一派或者追隨這一派的有伏龍芝、土哈切夫斯基、古謝夫、伏羅希洛夫等人——是從这样一种先天的信念出發的，即紅軍不僅在政治目的上，而且在結構、戰略和戰術上，也都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毫無共同之處。新統治階級必須擁有一種在各方面都與眾不同的軍事系統；問題只在於把这样一种軍事系統建立起來。在國內戰爭時期，事情當然主要只限於從原則上反對使用“將軍”——即沙皇軍隊的舊軍官——和牽制最高統帥部進行反對地方上臨時自作主張和嚴重違反紀律的鬥爭。這個新學派的極端分子甚至企圖以戰略原則的名義，以“運動戰”和“進攻戰”的名義走向極端，甚至否定軍隊組織的集中化，認為這種集中化在未來的國際戰場上會妨礙革命主動性。從本質上說，這是企圖把國內戰爭初期的游擊方法擴展成爲一種永久的普遍的制度。有很多革命指揮官更願意維護新學說，因為他們不願意研究舊學說。抱着這種情緒的人主要集中在察里津（即現在的斯大林格勒），布瓊尼、伏羅希洛夫以及後來的斯大林，都是在這裏開始進行軍事工作的。

戰爭結束以後，才比較有系統地試圖把這些革新辦法上升爲一種完整的學說。倡議者是已故的伏龍芝，他是國內戰爭時期傑出的指揮官之一，沙皇時期曾被判爲政治苦役犯。他得到伏羅希洛夫的支持，在某種程度上也得到土哈切夫斯基的支持。從本質上說，無產階級軍事學說同“無產階級文化”學說是完全相似的，二者都是形而上學公式主義。在鼓吹這種傾向的人所留下來的某些著作中，這種或那種實踐方案一般遠遠不是新提出來的，而是從無產階級作爲一個國際的和採取攻勢的階級的标准特點推斷出來的——也就是說，是從靜止的心理抽象狀態而不是從實際的時間和地點條件推斷出來的。馬克思主義雖然在各方面都受到尊敬，但是，實際上已經被純粹的唯心主義所代替，這些混亂的思想雖然是誠摯的，但是從中不難看出官僚的那種正在迅速發展的自滿心理的萌芽，因為官僚想相信而且想使別人也相信，在所有的領域，

他們都能在沒有特別准备、甚至沒有物质前提的情况下做出历史的奇迹。

当时軍部的首脑在报刊上这样答复伏龙芝：“我也不怀疑，如果一个拥有发达的社会主义經濟的国家发觉自己不得不同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战争的話，那末，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面貌就完全不同了。但是，絕不能根据这一点就试图在今天从我們的手指縫里挤出一个‘无产阶级战略’来……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經濟和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办法……我們就会毫无疑问地用新的方法丰富軍事艺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努力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而不应该试图“用推理的方法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推断出一种新战略来”。（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阿基米德說，如果給他一个支点，他就能轉动地球。这句话說得不錯。然而，即使給了他所需要的支点，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他既沒有杠杆也沒有力量使杠杆发挥作用。胜利的革命給了我們一个新的支点，但是要轉动地球，还必须把杠杆造起来。

“无产阶级軍事学說”，像它的姐姐“无产阶级文化学說”一样，也被党否定了。然而，到后来——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二者的命运大不相同。在宣布“一国社会主义”和宣布一切阶级已經消灭的七年期間（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一年），斯大林和布哈林举起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旗帜，說实在的，并没有取得显著的结果。与此相反，虽然以前鼓吹“无产阶级軍事学說”的人很快掌握了国家大权，这个学說却一点也沒有复活。这两个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学說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命运，在苏維埃社会的演变中具有深刻的意义。“无产阶级文化”只同无法具体衡量的事情有关系；官僚越是粗暴地把无产阶级排除到政权外面，就越是寬宏大量地把这种精神上的补偿給予无产阶级。相反，軍事学說不仅同国防利益很有关系，而且同統治阶层的利益也很有关系。这里不容許在意識形态上为所欲为。以前反对聘用“將軍”的人，这时自己变成“將軍”了。那些主張設立国际參謀部的人，这时安詳地坐在“一

国”參謀部的华盖下面了。“階級战争”被“集体安全”学說代替了。世界革命的前景让位給神圣的現狀。为了加强可能的同盟者的信心，同时为了不要过分刺激敌人，現在的要求是，不管代价有多大，要尽可能同資本主义国家軍隊沒有区别。在这些学說改变和門面刷新的背后，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进程正在发展。一九三五年对軍隊來說发生了一种双重的国家革命——一种既同民兵制度有关也同指揮官有关的革命。

四、廢除民兵和恢复軍官軍銜

苏維埃武装部队建立二十年以后，究竟同布尔什維克党写在它的旗帜上的型式符合到什么程度呢？

根据党綱，无产階級专政的軍隊应当具有“一种明确的階級性——也就是說，完全由无产階級和农民中同无产階級接近的半无产階級組成。只有到了階級消灭的时候，这种階級軍隊才轉变为全国社会主义民兵”。党虽然把軍隊的**全民性**推迟到未来的时期，但一点也沒有拋棄民兵制度。恰恰相反，根据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的一項決議，“我們正在把民兵轉移到階級基础上并把它轉变为苏維埃民兵。”軍事工作的目的規定为逐步建立一支軍隊，“尽可能用临时兵营的办法——即在一种接近工人階級劳动条件的情况下”。到最后，所有的部队都在地区上同工厂、矿山、乡村、农业区以及其他有机集团合而为一，“拥有一个地方指揮部，拥有一些地方武器庫和儲放各种供应品的地方倉庫”。一个地区、学校、工业和体育方面的青年組織，将不仅仅是代替兵营所灌輸的那种集体精神，并且可以在沒有高踞于軍隊之上的职业軍官的情况下培养自觉的紀律。

然而，民兵制度不管多么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还是需要一个高度的經濟基础。正規軍所需要的特殊环境已經具备。因此，地区性軍隊可以更加直接地反映国家的实际条件。文化水平越低，

城乡差别越大，民兵制度就越不完善和越不统一。缺少铁路、公路和水路，以及没有汽车路和缺乏汽车，都会使地区性军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最初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危急时期运动极其缓慢。为了在动员期间保卫边境、进行战略上的转移和集中，除了地区性部队以外，还必须要有正规军。红军从最初起就是作为这两种建制的一种必要的折衷办法而建立起来的，不过还是侧重于正规军。

一九二四年，当时的军部首领写道，“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注意两种情况：即使转为民兵制度的可能性已经由于苏维埃结构的建立而首先创造出来，这种转变的速度也还是决定于国家的一般文化条件——技术、交通工具、识字等等。民兵的政治前提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但是经济和文化前提还极其落后。”如果给以必要的物质条件，地区性军队不仅不比正规军差，而且会远远地超过它。苏联为了国防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它还没有富足到足以建立一个花费比较小的民兵制度。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正是由于贫穷，苏维埃社会才被耗费很大的官僚阶层所扼制。

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工厂、集体农庄、家庭、学校，在文学方面，在军队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同样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问题。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甚至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看也低的生产力水平同原则上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对比。新的社会关系正在促使文化不断地提高。但是不够繁荣的文化又在拉社会形式的后腿。苏维埃现实就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一种平衡状态。在军队中，由于其结构极为固定，二者的平衡状态是可以由十足确切的数字来衡量的。正规军同民兵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实际运动的一种良好标志。

自然和历史为苏维埃国家提供了一万公里没有屏障的边界，另外还提供了稀少的人口和恶劣的道路。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当时即将离职的旧军事领导再一次呼吁不要忘记这样一点：“在今后几年中，民兵的建立必须具有有一种准备的性质。每前进一

步必須先把以前取得的成就审慎地加以证实。”但是，到一九二五年，一个新的紀元开始了。以前鼓吹无产阶级軍事学說的那些人掌握了权力。从本质上說，地区性軍隊同这一派人的起家本錢“进攻論”和“运动战論”是有着深刻的矛盾的。但是，現在他們开始忘記世界革命。新领导人希望通过资产阶级“中立化”的办法来避免战争。在以后的几年当中，竟有百分之七十四的軍隊在民兵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組！

只要德国还处于解除武装、甚至“友好”的状态，莫斯科參謀本部在西方边界問題上的估計就是以羅馬尼亚、波兰、立陶宛、拉脫維亞、爱沙尼亚、芬兰等近邻国家的軍事力量为基础的，另外这些近邻国家还可能得到最强大的敌人的物质支持，其中主要是法国。在那个早已过去的时代（到一九三三年为止），法国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上帝保佑的“和平之友”。周圍的国家可以投入战場的軍隊，总共有一百二十个步兵师，差不多有三百五十万人。紅軍的动員計劃是，設法在西部边界保证一支人数相同的一流軍隊。在远东，在戰場发生各种情况的条件下，也只能是几十万人的問題，而不是几百万人的問題。每一百个战斗員在一年当中差不多需要补充七十五个人。两年战争，除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仍服現役的人以外，全国大約要損失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人。到一九三五年，紅軍共有五十六万二千士兵——連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軍隊在內，共六十二万士兵——四万名軍官。另外，我們已經說过，一九三五年初，有百分之七十四的軍隊是地区性部队，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是正規軍。还能找出更好的证据证明社会主义民兵已經获得胜利——如果不是百分之百，至少也是百分之七十四——而且“最終和不可变更地”获得了胜利嗎？

然而，上面的估計——尽管都是有条件的——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已經没有什么意义了。德国开始瘋狂地武装，而且主要是針對着苏联。同資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前景突然黯淡下来了。軍事危险的迅速逼近，迫使苏維埃政府不仅把武装部队扩大到一百三十

万人，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紅軍的結構。目前，紅軍里的正規师或者所謂“基干”师占百分之七十七，地区性部队只占百分之二十三！地区性軍隊这样削減，看起来簡直可以說是廢除了民兵制度——如果你沒有忘記这一点的話：軍隊并不是和平时期所需要的，而恰恰是在軍事危險的时刻所需要的。因此，历史經驗从这个最不容許开玩笑的領域起，已經无情地揭示了这样一点：只有得到社会生产基础保证的东西，才是“最終和不可变更地”获得了胜利。

然而，从百分之七十四一下减为百分之二十三，似乎有些矯枉过正。我們可以断言，如果沒有法国參謀本部的“友好”压力，这种变化是不会发生的。更加可能的是，官僚抓住了一个有利的借口来采取这一步驟，那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民兵部队就其性质來說，是直接依賴居民的。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就是这个制度的主要好处。但是，从克里姆林宮的观点来看，这也正是它的危險所在。正是由于軍隊同人民的关系密切到这样不合意的程度，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軍事当局才排斥了民兵制度，虽然从技术上說，这种制度在这些国家是容易實現的。毫无疑问，紅軍內部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所表現的深刻不滿情緒，也是后来廢除地区性部队的一个重要动机。

我們的意見肯定会为紅軍在反改革前后的确切統計所证实。然而，我們沒有这种材料；如果有的話，我們也认为不能公开使用。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容許有两种解釋的，这也是人人容易了解的一个事实：苏維埃政府一方面把軍隊中民兵所占的比重削減到百分之五十一，另一方面却恢复了沙皇軍隊中的唯一民兵組織哥薩克騎兵队！騎兵队一直是軍隊中享有特权的和最保守的部分。而哥薩克又一直是騎兵队中最保守的部分。在战争和革命期間，哥薩克騎兵队是一支警察力量——最初是为沙皇服务，后来是为克倫斯基服务。在苏維埃政权下，哥薩克騎兵队还是像汪德分子^①

① 汪德分子 (Vendean)，法国保皇党分子，一七九三年在汪德省发动叛乱，反对法国大革命，一七九五年被扑灭。——中譯者注

一样。集体化是采取了特别的暴力措施才在哥薩克当中实现的，而这种集体化当然也还是没有改变他们的传统和气质。不仅如此，哥薩克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还恢复了私有馬匹的权利。当然，他们也不会没有其它特权。难道可以怀疑这些草原上的騎士又站在特权者一边反对被压迫者嗎？在不断地采取镇压措施来对付青年工人当中的反对倾向的情况下，哥薩克騎兵队的恢复毫无疑问是热月最清楚的表现之一！

* * *

对十月革命原则的一个更加致命的打击是，頒布法令恢复了軍官的那种资产阶级的荣耀显貴地位。紅軍的指揮官虽然有其缺点也有其不可估計的优点，但他们都是从革命和內战中成长起来的。不容許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青年，毫无疑问向紅軍提供了不少有能力的人。另一方面，国家机关的日益蜕化也不能不反映到广泛的指揮官集团中。在一次公开會議上，伏罗希洛夫在談到指揮官有责任对士兵以身作則的时候，认为有必要在这方面承认：“不幸，我不能特別夸口”；在下級前进的时候，“指揮干部却往往落在后面”。“指揮官經常不能用一种适当的方式回答”新問題，等等。这是最負責的——至少形式上是这样——的軍隊領導人的辛酸的自白，是能够引起不安但不致于引起惊慌失措的自白。伏罗希洛夫关于指揮官情况所說的話，对所有的官僚來說也是真实的。当然，講話的人沒有意思把上层統治集团也包括在“落在后面”的人当中。这些上层統治分子随时随地向任何人都大声喊叫，憤怒地頓脚，命令別人“好好地干”，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事实上，正是这个不受监督的“領導人”集团——伏罗希洛夫本人就屬於这个集团——是产生落后、因循保守以及許多其他弊病的主要根源。

軍隊是社会的縮影，社会有的一切疾病它也有，而且通常还要严重些。战争是个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虛构，也不能模仿。軍隊需要批評的新鮮空气。指揮部需要民主的监督。紅軍的組織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他們认为必須为选举指揮部这样的措施

进行准备工作。党关于军事问题的基本决议是，“部队内部团结的加强，士兵对自己和指挥官的批评态度的加强，……将创造有利的条件，使指挥人员的选举原则能够越来越广泛地加以运用。”这个决议通过以后十五年——这样长的一段时间似乎足够使内部团结和自我批评达到成熟的程度——统治集团却转到恰恰相反的方面去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文明国家的人民，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惊讶地听说红军现在产生了一种军官等级，从少尉起一直到元帅。据军部的实际首脑土哈切夫斯基说，“政府在军队中实行军衔以后，将为指挥干部和技术干部的发展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这种解释是故意说得含糊的。指挥干部首先是靠士兵的信赖来加强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红军开始的时候就取消了军官阶层。恢复等级制绝不是军事利益所要求的。重要的是指挥官的指挥地位，而不是指挥官的军衔。工程师和医生都没有官衔，但是社会还是有办法把他们安置在需要的位置上。居于指挥地位的权利是由研究、才能、性格和经历来保证的，这些都需要不断的评定，尤其是个别的评定。少校军衔对于一个营长并没有什么好处。红军有五个高级指挥官晋升为元帅，但这既没有给予他们新的才能，也没有给予他们额外的权力。真正因而拥有“稳固基础”的不是军队，而是军官阶层，并且是付出了高居军队之上的代价才取得那种基础的。这次改革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粹政治性的目的：给予军官一种新的社会地位。莫洛托夫便是这样从本质上说明那个法令的意义的：“为的是提高我们军队的领导干部的重要性”。事情还不至于只实行军衔。随着而来的是为指挥官们加紧建筑住宅。一九三六年，计划建筑四万七千间房屋，比前一年增加工资百分之五十七。“为的是提高我们军队的领导干部的重要性”意味着，以削弱军队的精神联系为代价，而使军官同统治集团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者认为没有必要为恢复军阶而创造一套

新的軍銜。相反，他們顯然要同西方採取同樣的步調。與此同時，他們卻又流露出自己的弱點，不敢恢復將軍的軍銜，因為這個軍銜在俄國人民當中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富有諷刺意味的名稱。蘇維埃報刊在宣布五個軍事顯貴晉升為元帥的時候——這裡要指出，這五個人被挑選出來，主要是根據他們個人對斯大林忠實的程度，而不是根據他們的才能或者工作——沒有忘記提醒讀者回憶沙皇軍隊的情況，它的“等級崇拜和順從”的情況。那末，為什麼還要那樣忠順地模仿它呢？官僚在建立新特權的時候，每走一步都要使用曾經用來摧毀舊特權的那些論據。傲慢同懦弱輪流表現出來，另外還有越來越厲害的虛偽作風。

雖然乍看起來正式恢復“等級崇拜和順從”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但是我們還必須承認，政府是沒有什麼選擇自由的。指揮官在個人資歷的基礎上進行提升，只有在軍隊本身具有自由的主動精神和批評精神的條件下才能實現，而且軍隊要由全國的輿論來進行監督。嚴厲的紀律可以同廣泛的民主很好地結合起來，甚至可以直接依靠廣泛的民主。然而，軍隊不能比培育它的制度更為民主。官僚主義的因循保守和擺空架子，並不是出自軍事方面的特殊需要，而是出自統治階層的政治需要。在軍隊中，這種需要只有以最完整的方式表現出來。軍官等級廢除了十八年以後又恢復起來，這一點同樣表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已經有一條鴻溝，蘇維埃軍隊已經失去了使它贏得“紅”的名稱的那些主要品質，而官僚把這些蛻化的結果制訂為法律又是多么玩世不恭的表現。

資產階級報刊給予這種反改革以應得的評價。法國官方報紙《時報》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寫道，“這種外表上的變化，是目前整個蘇聯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的徵象之一。制度現在已經肯定地鞏固，正在逐步穩定下來。革命的習慣和作風在蘇維埃家庭和蘇維埃社會中，正在讓位給在所謂資本主義國家依然盛行的那些情調和作風。蘇維埃正在日益資產階級化。”對於這個評價，簡直用不着再增加一個字。

五、战争中的苏联

軍事危險只是苏联必須依靠世界其他部分的一种表現，因此也是用来反对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烏托邦思想的一种論据。但是，这种不祥的“論据”只是到現在才提出来。

要想事前列举未来的国与国狗打架的一切因素，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如果事先可能进行这种估計，利益的冲突就都会以簿記員太太平平的計算方式結束了。在血腥的战争方程式中，未知数太多了。無論如何，苏联方面是有很多有利因素的，有些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有些則是新制度創造的。国内战争期間外国干涉的經驗又一次证明，俄国最有利的条件过去是、現在还是它的空間辽阔。外国帝国主义只用几天的時間就推翻了苏維埃匈牙利，虽然說实在的，可悲的貝拉·孔^①政府在这方面也并不是沒有起作用。苏維埃俄罗斯从一开始就被切断了同周圍国家的联系，却同外国干涉进行了三年战斗。在某些时刻，革命的領土几乎縮小到旧莫斯科公国那样大小。但是，即使那样，事实还是证明了它能坚持下去，并且取得了最后胜利。

俄国的第二个很有利的条件是它的人力儲备。苏联人口每年差不多增加三百万，現在显然已經超过一亿七千万。一年征集的人数在一百三十万左右。經過身体上和政治上最严格的挑选，淘汰掉的不会超过四十万人。因此，后备人力虽然从理論上估計可能在一千八百万到两千万之間，实际上是沒有限制的。

但是，自然条件和人只不过是战争的原料。所謂軍事“潜力”主要决定于国家的經濟实力。在这方面，苏联同旧俄比起来是有很多有利条件的。我們已經說过，計劃經濟到这个时候，从軍事观

^① 貝拉·孔(Bela Kun, 1886—1930), 匈牙利共产党領袖,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匈牙利建立苏維埃共和国, 任总理。同年八月一日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叛乱下, 共和国被顛复。——中譯者注

点来看是有极大的好处的。边远地区、特别是西伯利亚的工业化，使草原区和森林区有了完全不同的价值。虽然如此，苏联却依然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很低，产品质量不高，运输工具不够，所有这些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用空间、自然财富和人口来相抵。在和平时期，两种敌对社会制度之间的经济力量较量（借助于政治手段，首先是对外贸易的壟断）是可以延缓的——可以延缓一个长时期，但絕不可以永远延缓下去。在战争期间，考验是直接在这场地上进行的。因此，危险是存在的。

军事失败虽然通常总是引起重大的政治变化，但其本身并不总是引起社会经济基础的混乱。一种可以保证财富和文化得到高度发展的社会制度，是不能被刺刀推翻的。相反，胜利者会继承被征服者的那套制度和作风，如果这些东西在演变上超过胜利者的话。所有制形式只有在同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尖锐矛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军事力量推翻。如果德国在一次反苏战争中遭到失败，那就会不可避免地不仅引起希特勒的垮台，而且还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垮台。另一方面，很难怀疑这一点：军事失败不仅对于苏维埃统治阶层而且对于苏联的社会基础也会是致命的打击。目前德国结构的不稳定，是由于其生产力早已超过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与此相反，苏维埃制度的不稳定，则是由于其生产力还远远没有赶上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军事失败对于苏联社会基础之所以成为一种威胁，正同这种社会基础在和平时期需要官僚和壟断对外贸易的理由一样——这就是说，都是由于这种社会基础薄弱。

然而，我们能够指望苏联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不致战败吗？对于这个坦率地提出的问题，我们将同样坦率地回答：如果战争始终只是一场战争，苏联战败将是不可避免的。从技术、经济和军事的意义上说，帝国主义是无可比拟地更为强大的。如果帝国主义不是由于西方的革命而陷于瘫痪状态的话，它将会铲除这个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制度。

人們可以这样回答：“帝国主义”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也是被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这是十分正确的，如果帝国主义不是因为有这些矛盾的話，苏联早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苏联簽訂的外交和軍事协定有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的。然而，如果看不到这些矛盾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消失，那将是一个致命的錯誤。正如从最反动的政党到社会民主党这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党之間的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威胁面前会消失一样，为了阻止苏联取得軍事胜利，帝国主义的对抗也总会找到妥协办法的。

正如某位总理有一次不无理由地說，外交协定只不过是一些“廢紙”。哪里也沒有写着这样的話；甚至到爆发战争的时候，这种协定还必须存在下去。到欧洲任何一部分有发生社会革命的直接威胁的时候，同苏联簽訂的条約就沒有一个还会存在下去。不用說法国，只要西班牙的政治危机进入革命阶段，劳合·乔治所提出的对希特勒救主的希望就会不可抗拒地掌握所有資產階級政府的心灵。另一方面，如果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国不稳定的局势最后导致反动的胜利，那末，苏联簽訂的公約也不会留下一点痕迹。最后，即使这些“廢紙”在軍事行动初期还能有效，毫无疑问，各种力量集团在战争的決定性阶段，将决定于比外交家的誓言强大得无可比拟的一些因素，因为外交家的职业就是說假話。

如果資產階級盟国得到这样的物质保证，即莫斯科政府不仅在战争的壕沟上而且在階級的壕沟上也同它們站在一边，当然情况就会根本不同。資本主义的“和平之友”利用苏联将在两面夹攻之下所遭到的困难，当然会采取一切措施在对外貿易壟断方面和苏維埃财产法方面打开一个缺口。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白俄流亡者所展开的日益强大的“保卫”运动，就是完全依靠这种估計的。如果你认为，世界斗争将只限于在軍事方面进行下去，那末，盟国就有达到它們的目的的好机会。如果没有革命来干涉，苏联的社会基础不仅在失敗的情况下，就是在胜利的情况下也必然要

被摧毀。

两年多以前，有一个綱領性的文件《第四国际和战争》用下面的一段話概括了这种前景：“在国家迫切需要主要必需品的影响下，农民經濟的单干傾向将大大加强，而集体农庄的离心力将与日俱增……在战争的緊張气氛中，我們可以指望……盟国外資具有吸引力，在对外貿易的壟断方面打开一个缺口，国家对托拉斯的控制被削弱，托拉斯之間的竞争尖銳化，托拉斯和工人之間发生冲突，等等……換句話說，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下，如果世界无产阶级处于消极状态，那末，苏联內部的社会矛盾不仅有可能而且必然会导致一种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最近两年来的事态发展已經使这种診斷的力量加强了好几倍。

然而，上面談到的种种考虑一点也不会得出所謂“悲观主义的”結論。如果說我們不願閉眼不看資本主义世界的巨大物质优势、帝国主义“盟国”不可避免的背叛以及苏維埃制度的內部矛盾，那末，另一方面我們也就絕不会傾向于过高地估計敌对国家或者同盟国家的資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在一場使双方精力消耗殆尽的战争能够彻底衡量經濟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前，它早就使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受到考驗。所有研究人类未来大屠杀的认真的理論家，都考虑到这种大屠杀的結果有可能引起革命，甚至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某些集团一再提出的小“职业”軍想法，虽然并不比大卫和歌利亚^①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想法实际多少，但是它的荒唐想法正好显示了那种畏惧武装起来的人民的现实情况。希特勒从来不放过一次机会来加强他“对和平的热爱”，其办法是大談西方一旦进行战争，就会不可避免地招来一場新的布尔什維克風暴。暂时抑制战争狂热的力量并不是国际联盟，也不是共同安全公約，更不是和平主义的公民投票，而完全是統治階級在革命面前的那种

^① 大卫 (David) 是以色列王，耶西的第七子，曾与非利士人的勇士歌利亚 (Goliath) 战斗，用一块石子杀死了后者。見《聖經》旧約《撒母耳記上》第十七章。——中譯者注

自卫性的恐惧。

社会制度也同所有其他现象一样，必须在比较的基础上加以估计。苏维埃制度尽管存在着很多矛盾，但是在稳定性这一点上还是比它可能的敌人的制度有着巨大的好处。纳粹之所以能够统治德国，正是由于德国的社会对抗发展到不可忍受的紧张程度。这些对抗并没有消除，甚至也没有削弱，而只不过是法西斯的禁令给压下去了。只要发生战争，这些对抗就会又露出头来。在进行战争到胜利这一点上，希特勒的机会远比威廉二世为少。只有及时的革命才能把德国从战争中拯救出来，才能使它避免新的失败。

全世界的报刊都把最近日本军官对政府大臣的血腥进攻^①描述为一种过分狂热的爱国主义的轻率表现。实际上，这些进攻同俄国虚无主义者向沙皇官僚投掷炸弹属于同一历史类型，尽管从思想意识上说二者是不同的。日本居民在亚洲式土地制度和最现代化资本主义的联合奴役下呻吟着。只要军事钳子稍一放松，朝鲜、满洲国和中国就会起来反对日本的暴政。战争将给天皇的帝国带来最大的社会灾难。

波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毕苏斯基政权是所有政权中最没有成绩的，事实证明它甚至没有能力减轻农民所遭受的土地奴役。西乌克兰(加里西亚)遭受着沉重的民族压迫。工人正在用不断的罢工和反叛活动来震撼国家。波兰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同法国结成联盟和同德国友好的办法来为自己保险，但是它没有能够用这些手段完成任何事情，而只不过是加速了战争的到来和自己在战争中更加肯定地死亡。

战争危险和苏联战败是一种现实，但革命也是一种现实。如果革命不阻止战争，战争就会帮助革命。第二次分娩通常总比第一次要容易些。在新战争中，将不需要等待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才

^① 指一九三六年日本少壮派军人刺杀藏相高桥是清等的“二·二六事件”。——中译者注

发生第一次暴动。不仅如此，一旦战争爆发，这一次革命就不会半途而废。归根到底，苏联的命运将不是在参谋本部的地图上决定，而是在阶级斗争的地图上决定。只有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和他们同一阵营中的那些“和平之友”的欧洲无产阶级，才能保护苏联，使它免遭毁灭或者“盟国”的暗害。只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即使苏联在军事上遭到失败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另一方面，如果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余部分还能坚持下去，那末，什么样的军事胜利也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

苏维埃官僚的僕从说我们“低估”了苏联的内部力量和红军等，正如他们过去说我们“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样。这些论据的水平低到甚至无法进行有成果的意见交换。如果没有红军，苏联就会像中国一样地被摧毁和被瓜分。苏联只有顽强地和英勇地抵抗未来的资本主义敌人，才能为帝国主义阵营阶级斗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红军是一个具有巨大意义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红军是唯一的历史因素。它能够给予革命一种强有力的推动，这已经不错了。只有革命才能完成主要任务，单单红军是不能胜任的。

谁也没有要求苏维埃政府进行国际冒险，采取不合理的行动，试图用暴力强行规定世界事态发展的进程。恰恰相反，虽然过去官僚也进行过这种尝试（在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广州，等等），但只不过是反动派所利用，并且都曾遭到左翼反对派的及时谴责。这是苏维埃国家总的方向问题。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同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最具有毁灭性的表现就是共产国际屈从于保守的官僚及其无所作为的新宗教。

欧洲工人和殖民地各国人民是不能在维持现状的旗帜下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也不能在这个旗帜下起来反对这样一种战争，即它必然要打破和推翻现状，几乎就像发育好的胎儿不可避免地要破坏怀孕的现状一样。劳苦者对于保卫现存的边界一点兴趣也没有，特别是在欧洲——在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指挥下是这样，在反对

資產階級的革命暴動中更是這樣。歐洲的衰落正是由於這樣一個事實造成的，即它在經濟上已經分裂成差不多四十個半民族國家，這些國家擁有自己的海關、護照、貨幣制度以及龐大的軍隊來保衛民族特殊性，它們已經成為人類經濟和文化發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礙。

歐洲無產階級的任务並不是使邊界永遠保持下去，而恰恰相反是通過革命來廢除邊界；不是維持現狀，而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合眾國！

第九章 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

在工业方面，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几乎普遍地占着优势。在农业方面，这种所有制只是在苏维埃农场中占着绝对优势，而这种农场在全部耕地中所占的百分比不超过百分之十。在集体农庄中，合作社的或者集团的所有制表现为各种不同比例的国有制和私有制的结合。土地虽然从法律上说是属于国家的，实际上已经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这种情况同集团所有制并没有什么不同。拖拉机和复杂机器属于国家；较小的设备才属于集体农庄。此外，每个集体农民都经营个体农业经济。最后，还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农民依然是个体农民。

根据一九三四年的人口调查，全国有百分之二十八点一的人口是国家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产业工人和建筑工人，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在一九三五年达七百五十万。集体农庄和手工业合作社的成员，在人口调查的时候，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九。学生、红军的士兵、领养老金者以及其他直接依靠国家的人，共占百分之三点四。总起来说，百分之七十四的人口属于“社会主义部分”，而百分之九十五点八的国家基本资金分配在这百分之七十四的人口身上。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在一九三四年还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而他们所占有的国家资金只不过比百分之四稍微多一些。

一九三四年以后，没有再进行人口调查；下次调查将在一九三七年进行。然而，毫无疑问，在过去两年中，私营企业部分已经缩小得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部分”。根据官方经济学家的估计，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现在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即大约一千七百万人。这些人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减小，远不及他们在人

数上所拥有的重要性。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耶夫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宣布说，“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所占的相对比重，在一九三六年应当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五。这就是说，还有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点五属于非社会主义部分。”乍看起来，这些乐观的数字似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已经取得“最后和不可变更的”胜利。但是，谁要是不能看出数学背后的社会现象，那才可悲！

数字本身是有些夸大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集体农庄旁边那些私人小块土地也都算在“社会主义”部分内。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经济的国有形式和集体形式在统计上所表现的完全无可怀疑的巨大优越性，虽然对将来是重要的，但它们并没有消除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资产阶级倾向在“社会主义”部分当中所拥有的力量问题，而这种情况不仅在农业中存在，而且在工业中也存在。目前达到的物质水平已经足以提高人们对各方面的要求，但是，整个说来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经济进展的动力必然会不仅在农民和“脑力”劳动的代表当中而且也在无产阶级上层集团中唤醒小资产阶级的欲望。只是把个体农民和集体农民，把个体手工业者和国营工业进行简单的对比，那还一点也看不出这种欲望所具有的爆炸性力量；这种欲望可以渗透到整个国家经济当中，而且一般地来说还会表现为这样一种愿望，即每个人给予社会的越少越好，而取之于社会的越多越好。

国家在解决赚钱者和消费者的问题方面所花的精力和智力，并不比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少。这也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部分原因。在国家继续同这些离心力的分散行动进行斗争的时候，统治集团本身却在变成个人合法和非法积累的主要贮藏所。在新法律标准的掩盖之下，小资产阶级倾向当然不容易从统计上加以确定。但是，这种倾向在经济生活当中所占的实际优势首先已为“社会主义的”官僚本身所证明；而官僚这种极端丑恶的内部矛盾重重的集团，这种丑恶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变态，反过来又成为滋长社会毒害的泉源。

我們将会看到，新宪法的整个基础是把官僚和国家混为一谈，把国家和人民混为一谈。这个新宪法中说，“……国家的财产——即全体人民的所有物。”这种混为一谈的说法是官方学说的诡辩基础。一点不错，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本人开始——在谈到工人国家的时候，是把**国家财产、国民财产和社会主义财产**当作同义语来使用的。从广泛的历史范围上说，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妥的地方。但是，运用到一个新社会的初期的和还没有得到保证的发展阶段上，而且是运用到一个孤立的和经济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上，这种说法就会变成产生根本错误和公然欺騙的泉源。

私有财产要变成社会财产，必须经过国有阶段，正好像幼虫要变成蝴蝶，必须经过蛹的阶段一样。但蛹并不是蝴蝶。无数的蛹没有变成蝴蝶就死了。国有财产要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只有到社会特权和社会差别消失的时候，到国家也因而没有必要存在的时候。换句话说，国有财产转变为社会主义财产的程度决定于它本身不再是国有财产的程度。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苏维埃国家越是高高地站在人民的上面，越是强烈地把自己当作财产的保卫者而把人民当作财产的浪费者，就越是明显地证明它自己是反对这种国有财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我们离彻底废除阶级还很遥远”，这是官方报刊在谈到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差别时说出的的一句话。这种纯粹学院式的承认有这样一种好处，即可以使官僚在“脑力”劳动这样可尊敬的名义下把自己的收入掩盖起来。“友人们”——这些人是：爱真理，但尤爱柏拉图^①——也只限于学院式地承认还存在着旧的不平等“残余”。实际上，这些欺騙意味很浓的“残余”完全不足以解释苏联的现实。如果说城乡之间的差别在某些方面

^① 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曾说过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里把这句名言颠倒过来，意指这些“友人们”并不爱真理。——中译者注

已經減輕了的話，那末，在另外一些方面是大大地加深了，这是因为城市和城市文化——也就是城市少数人的舒适——都发展得非常迅速。近年来，虽然从下层来的人使科学干部有所扩大，但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間的社会差别不是縮小了，而是扩大了。千年来在各方面限制着每个人的生活的阶级壁垒——文雅的城市人和粗野的农民，卓越的科学家和临时的小工——不仅沒有把过去保留下来的东西稍微減輕一点，反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重新产生出来，并且还具有越来越严重的性质。

“干部决定一切”这句臭名昭彰的口号典型地說明了苏維埃社会的性质，这种說明比斯大林本人所願意說明的远为坦率。干部就其本质來說代表着統治和指揮的机关。迷信“干部”首先意味着迷信官僚，迷信官吏——技术貴族。苏維埃政权在培养和发展干部方面，也正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还不得不解决先进的资产阶级在他們本国早已解决了的那些問題。但是，由于苏維埃干部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产生出来的，他們便要求一种几乎是神圣的尊敬和一种不断增加的薪金。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干部的发展，资产阶级的不平等也恢复了。

从生产資料的所有权这个观点来看，元帅和女佣之間，托拉斯經理和临时小工之間，人民委員的儿子和无家可归的孩子之間，似乎根本沒有什么差别。虽然如此，可是前者占有堂皇的住宅，在乡下不同的地点有好几处避暑別墅，还有最好的汽車供自己使用，并且早就忘記了怎样擦亮自己的皮鞋。后者則住在往往沒有隔开的木棚里，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他們之所以也不擦自己的皮鞋，只是因为他們是光着脚走路的。在官僚看来，这种差别似乎并不值得注意。然而，在临时小工看来，这却似乎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样看也并不是沒有理由的。

肤淺的“理論家們”当然可以用这样的話来为自己解嘲：財富的分配同財富的生产比較起来，毕竟是次要的因素。然而，交互作用的辯证法在这里还是具有它的全部效力的。国有生产資料的命

运，归根到底，决定于个人生活上的那些差别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如果一只船宣布为集体财产，而乘客还是照旧分成头等二等三等，那末，显然对三等乘客来说，生活条件的差别要比所有权在法律上的改变重要得多。另一方面，头等乘客喝着咖啡，吸着雪茄，会提出这样一种想法：集体所有制是最最重要的，一间舒适的舱室则没有什么。从这种情况产生出来的对抗，很可能打破不稳定的集体所有制。

苏维埃报刊满意地提到这样一件事：在莫斯科动物园里，记者问一个小孩子：“这只象是谁的呢？”回答是：“国家的。”于是这家报刊马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说，有极小的一部分也是我的。”然而，如果这只象真被分配起来的话，那末，贵重的象牙会落在最上层的一些人手中，少数人会尝到象的大腿，大多数人则只能胡嚼烂咽象的蹄子和五脏。什么都分不到的孩子们是很难把国有财产和自己的财产合而为一的。至于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只有把国家的东西偷到自己手中的时候才认为是“自己的”。动物园里的那位小“社会主义者”也许是这样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他已经习惯于从这样一个公式中得出结论，即“朕即国家”。

如果我们用市场上的语言来说明社会主义关系的话，那末，我们可以把公民当作拥有国家财产的一家公司的一个股东。如果说财产是属于全体人民的，那就应当假定“股票”是平均分配的，因而所有的“股东”都有权分得一样的红利。然而，公民参加国家企业，不仅是作为“股东”，而且还要作为生产者。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就是在我们已经同意称为社会主义的阶段，劳动的报酬还是按照资产阶级标准来支付的——即按照技术和劳动强度等等来支付的。因此，从理论上说，每个公民的收入应当包括甲和乙两个部分——也就是红利和工资两个部分。技术越高，工业的组织越完善，甲所占的地位就比乙越大，而个人劳动的差别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就越小。苏联工资的差别不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小些，而是还要大些；从这个事实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苏维埃公民所持有的

股票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在他們的收入中，紅利和工資也不是一样的。不熟练的工人只能得到乙，这是在类似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就可以得到的最低收入；斯达汉諾夫工作者或者官僚則可以得到 2 甲 + 乙，或者 3 甲 + 乙，等等，而这里的乙还可以变成 2 乙、3 乙，等等。換句話說，收入的差别不仅决定于个人生产率的不同，而且还决定于隱蔽地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多少。拥有特权的少数股东是靠牺牲被剝夺了权利的多数股东的利益生活的。

如果你认为苏联的不熟练工人可以比在类似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下的资本主义企业收入多些——这就是說，他还是一个小股东——那末，必須认为他的工資等于甲 + 乙。工种較高的工資将表现为这样的公式：3 甲 + 2 乙，10 甲 + 15 乙，等等。这种情况意味着，不熟练工人只有一股，斯达汉諾夫工作者有三股，专家則有十股。不仅如此，他們的真正工資的比例是 1:2:15。在这种情况下，对神圣的社会主义財產的贊美，在經理或者斯达汉諾夫工作者看来是很有說服力的，在普通工人或者集体农庄庄員看来則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地方。然而，普通工人占社会的絕大多数。社会主义所关心的正是这些工人，而不是那些新貴族。

“我国的工人不是工資奴隶，不是称之为劳动力的商品的出售者。他是一个自由的工人。”（《真理报》）在目前这个时期，这个漂亮的公式还不容許加以夸大。工厂轉到国家手中，只是从法律上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实际上，他还不得不在匱乏中生活，不得不为一定的工資干一定时间的活。工人从前对党和工会所抱的那些希望，在革命以后轉而寄托在自己所創造的国家身上了。但是，这种工具的有用职能却受到技术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为了提高这种水平，新的国家使用老一套办法来压制工人的筋肉和神經。一批鞭策奴隶的人已經成长起来。工业的管理工作变成超官僚主义式的了。工人对工厂的管理已經完全不能发生影响。在实行計件工資、物质生活条件艰苦、不能自由行动以及恐怖的警察压制深入到每个工厂的生活当中的情况下，的确很难让工人感到自己是一个

“自由的工人”。他只能从官僚中看到他的經理，从国家方面看到他的雇主。自由劳动同官僚国家是不能并存的。

把上面說的話加以必要的改变，也同样地适用于农村。按照官方的理論，集体农庄的财产是社会主义财产的一种特殊形式。《真理报》写道，集体农庄“从本质上說已經和国营企业屬於同样的类型，因此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它又立即补充說：农业社会主义发展的保证在于“布尔什維克党管理集体农庄”这样一个条件。这就是說，《真理报》告訴我們，这个問題已經从經濟方面轉到政治方面。这一点实质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关系还没有在人与人的实际关系当中体现出来，而只是存在于当局仁慈的心中。如果工人们认真注意那颗心的話，那就很好了。实际上，集体农庄还站在个体經濟和国有經濟的当中，庄員經營的私有小块土地或者其他个人經濟的迅速发展，对于集体农庄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尽管个人耕种的土地只有四百万公顷，同集体农庄耕种的一亿零八百万公顷土地比較起来还不到百分之四，但是，由于这片土地精耕細作，特别是經營了菜园，結果它可以供給农民家庭最重要的消費品。大部分牛、羊和猪都是集体农民的财产，而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农民往往把自己的輔助性田地摆在主要地位，而让无利可图的集体农庄居于第二位。另一方面，劳动日报酬高的集体农庄正在不断地提高社会水平，产生一种富裕农民。离心倾向不仅还没有消失，相反，正在日益加强。无论如何，集体农庄到现在为止只是改变了农村中經濟关系的法律形式——特别是收入的分配方法——而旧茅草房子和菜园、仓库的杂活以及农民的整个繁重劳动，則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些集体农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以过去的态度对待国家。国家的确不再为地主或者资产阶级服务，但是，它为了城市的利益从农村中拿走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供养的贪婪的官僚也太多了。

由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要进行人口調查，关于社会的分类

已經擬出這樣一張單子來：工人；職員；集體農民；個體農民；個體手工業者；自由業者；教士；其他非勞動人民。根據官方的解釋，這個人口調查表之所以沒有包括任何其他社會特點，只是因為蘇聯已經沒有階級。實際上，設計這個表格的直接意圖是掩蓋擁有特權的上層和被剝奪了權利的下層。蘇維埃社會的實際劃分是應該而且可以很容易地通過一次誠實的人口調查而表現出來的，這種劃分如下：過着資產階級生活的高級官僚、專家等；過着小資產階級生活的中下層；生活水平差不多的工人和集體農莊的貴族；中間的工人羣眾；中間的集體農民；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不斷地變成流氓無產者的下層工人和農民；無家可歸的流浪兒，妓女，等等。

新憲法宣稱，“廢除人對人的剝削”在蘇聯已經完成，這不是說實話。新的社會分化已經創造條件，使人對人的剝削以最野蠻的形式復活，即又開始買賣人口來做個人的奴隸。在新的人口調查表上，個人的僱人根本沒有提到。這些人顯然都列在一般的“工人”類當中了。然而，這樣做有很多問題：社會主義公民有沒有僱人呢？有多少呢（如女僕、廚子、媒姆、女管家、司機）？社會主義公民是否有汽車供自己使用呢？他占有多少房間呢？等等。這種表格竟只字不提收入的等級！如果剝削他人勞動者沒有政治權利這一條法律恢復的話，那就會有些出乎意料地出現這樣的情況：統治集團的核心不在蘇聯憲法的保護範圍以內。幸好他們已經為僱人和主人……建立了完全平等的權利！兩種相反的傾向正在從蘇維埃制度的深處滋長起來。與日益衰落的資本主義相反，蘇維埃制度在發展生產力，這樣它就正在準備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為了上層的利益，它把資產階級分配標準實行得越來越徹底，這樣它就又在準備資本主義復辟。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標準之間的這種對立是不能無限制地發展下去的。或者是資產階級標準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擴大到生產資料方面去，或者是使分配標準適應社會主義財產制度。

官僚是怕暴露這種選擇的。他們隨時隨地——在報刊上，在

演說中，在統計中，在文學家的小說中，在詩人的詩篇中，最后在新憲法的條文中——都絞盡腦汁用社會主義字典中的抽象名詞來掩飾城市和農村的實際關係。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官方的意識形態是那樣的沒有生氣、無能和虛偽。

一、國家資本主義？

我們往往用熟悉的名詞來對付不熟悉的現象。人們曾經試圖掩蓋蘇維埃制度的謎，而把它叫做“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詞的好處是，誰也不確切地知道它是什麼意思。“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最初是指資產階級國家直接負責運輸工具或者工業企業時而出現的一切現象的。採取這種措施的必要性是生產力已經超過資本主義並且正在使資本主義在實踐中部分地否定自己的征象之一。但是，這個衰老的制度連同它的自我否定的因素，還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而繼續存在下去。

從理論上說，的確可以想像這樣一種情況，即整個資產階級本身可以構成一個股份公司，這個公司依靠它的國家來管理整個國民經濟。這樣一種制度的經濟法則不會有什麼神秘的地方。我們知道，一個資本家的利潤收入並不是在他自己的企業中工作的工人所直接創造的那一部分剩餘價值，而是全國創造的總剩餘價值按照他的資本額所應得到的一部分。在一種完整的“國家資本主義”之下，這種平均利潤率的法則不必經過迂迴的道路——即各種資本之間進行競爭——來實現，而是立即直接地經過國家的計算就會實現。然而，這樣一種制度還從來沒有存在過，而由於財產所有者之間有着深刻的矛盾，它也永遠不會存在——尤其是因為國家具有資本主義財產的唯一大貯藏所的性质以後，就會非常容易地變成社會革命的一個目標。

在戰爭期間，特別是在法西斯經濟進行試驗期間，“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詞往往被理解為一種國家進行干預和調節的制度。

法国人用了一个更合适的名詞来称呼这种制度，这个名詞就是国家主义。在国家資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間，毫无疑问是有一些接触点的，不过作为制度來說，两者与其說是相同的，不如說是相反的。国家資本主义意味着用国有財產来代替私有財產，正因为如此，它还具有偏爱某一方面的性质。国家主义則不管在什么地方——在意大利有墨索里尼，在德国有希特勒，在美国有罗斯福，在法国則有萊翁·勃魯姆——都意味着国家在私有財產的基础上进行干預，它的目的正是保护私有財產。不管政府的綱領如何，国家主义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日益衰落的制度的災害从强者的肩上轉到弱者的肩上。它之所以“拯救”小財產所有者，使其免于全部毁灭，只是因为小財產所有者存在下去对于保护大財產來說是必要的。国家主义的計劃措施并不是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是由于要牺牲生产力来保护私有財產（生产力当然也起来反抗私有財產）。国家主义意味着阻撓技术的发展，支持沒有生气的企业，使寄生的社会阶层永远生存下去。总之，国家主义从性质上說是完全反动的。

墨索里尼曾說，“意大利的經濟——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有四分之三掌握在国家手中”（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这句话是不能认真对待的。法西斯国家并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只不过是企业所有者之間的仲裁者。这两种身份并不是一回事。《意大利人民报》就这个问题說，“劳資协会主义国家指导和統一經濟，但并不具体管理經濟（“dirige e porta alla unita l'economia, ma non fa l'economia, non gestisce”），这种做法再加上壟断生产就成了集体主义。”（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一日）法西斯官僚对一般农民和小財產所有者采取一种威胁性的主人态度，对資本家巨头則采取一种首席全权代表的态度。意大利的馬克思主义者費罗西正确地写道，“劳資协会主义国家只不过是壟断資本的售貨員。……墨索里尼把企业的全部風險放在国家肩上，而把剝削的利潤交給工业家。”希特勒在这方面是步墨索里尼的后尘的。計劃原則的界限

及其实际内容是由法西斯国家的阶级性来决定的。这不是一个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增加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力量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剥削社会的问题。墨索里尼大言不惭地说，“如果我愿意在意大利建立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那我今天就拥有一切必要的和足够的客观条件。”万事俱备，只是还缺少一个条件：没收资本家阶级的财产。要实现这个条件，法西斯主义就必须走到相反的方面去——用墨索里尼那种连忙保证的话来说，“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当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还要有其他力量、其他干部和其他领导人。

历史上第一次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是无产阶级用社会革命的方法做到的，而不是资本家用国家托拉斯化的方法办到的。我们的简短分析已经足以表明，把资本家的国家主义和苏维埃制度混同起来的企图是多么荒谬。前者是反动的，后者是进步的。

二、官僚是不是构成一个统治阶级？

各个阶级是由它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占的地位来划分的，并且首先是从它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的。在文明社会中，财产关系是得到法律的确认的。土地、工业生产资料以及运输和汇兑的国有化，再加上对外贸易的垄断，便构成苏维埃社会结构的基础。对于我们来说，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这些关系，苏联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便基本上确定下来。

苏维埃官僚在其仲裁和调节的职能上，在关心保持社会等级上，以及在为了个人目的而剥削国家机关上，都同任何其他官僚是类似的，特别是同法西斯官僚类似。可是也有很多地方不尽相同。在任何其他制度下，官僚从来没有摆脱统治阶级而达到这样独立的程度。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官僚代表有财产有教养的阶级的利

益，这个阶级拥有无数的日常手段来监督官僚的事务管理工作。苏维埃官僚则已经上升到一个几乎还没有摆脱贫困和黑暗的阶级之上，并且没有统治或者指挥的传统。法西斯分子掌握政权以后，用共同利益、友谊、婚姻等纽带同大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苏维埃官僚则只采取了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而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旁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否认，官僚还不仅仅是官僚，而是苏维埃社会中不折不扣的唯一享有特权和发号施令的阶层。

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也同样重要。苏维埃官僚已经从政治上剥夺了无产阶级，以使用自己的方法来保卫社会的战利品。但是，官僚在一个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国家掌握政权，这就在官僚和全国富人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前所未闻的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是，国家——姑且这么说——“属于”官僚。如果这些整个来说还很新的关系一旦固定下来，成为标准并且合法化，那末，不管有没有工人的抵抗，归根到底，这种关系要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战利品完全毁灭。不过，现在谈到这一点，至少为时还早。无产阶级还没有最后发言。官僚也还没有为自己在特殊财产类型的形式下进行统治创造社会支持力量。官僚不得不保卫作为自己的权力和收入的泉源的国有财产。从官僚的活动的这个方面来说，官僚依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

试图把苏维埃官僚当作一种“国家资本家”阶级，这显然经不起一驳。官僚既没有股票，也没有公债。官僚的增加、补充以及更新都是在不依靠自己的任何特殊财产关系的情况下用行政等级的形式来进行的。官僚个人并不能把他的剥削国家机关的权利传给他的后代。官僚是在滥用权力的形式下享受他们的特权的。他们隐瞒自己的收入；他们欺骗别人说，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来说，官僚甚至根本不存在。官僚把一大部分国民收入据为己有的行为具有社会寄生虫的性质。所有这一切都使苏维埃指挥阶层处于非常矛盾、暧昧和不光彩的地位，尽管它拥有完整的权力，而且

还有阿諛奉承的烟幕来为它打掩护。

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經改換过許多种政治制度和官僚阶层，但是它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改变。它依靠自己的生产方法的优越性而保全了自己，使封建的和基尔特的关系不能复辟。国家政权已經有能力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或者是制止这种发展。但是，总的來說，生产力在私有财产和竞争的基础上正在逐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此相反，从社会主义革命产生出来的财产关系同新的国家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因为新的国家是这种财产关系的貯藏所。社会主义倾向之所以比小资产阶级倾向占优势，并不是經濟的自动发展——我們距这种情况还很远——所保证的，而是专政所采取的政治措施給予了保证。因此，整个經濟的性质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

如果苏維埃制度崩潰，那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计划經濟的崩潰，并进而导致国有财产的廢除。托拉斯同其工厂之間的强制性关系将会破裂。比較有成就的企业就会走上独立的道路。这种企业有可能改变为股份公司或者采取某种过渡的所有制形式——例如，工人也参加分配利潤这样一种形式。集体农庄将同时瓦解，而且容易得多。如果目前的官僚专政垮台而不是由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話，那末，资本主义关系一定会恢复，接着而来的将是工业和文化的灾难性的衰落。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对于保持和发展计划經濟來說仍然是絕對必要的話，那末，最最重要的問題是：目前的苏維埃政府究竟依靠誰，并且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它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举行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实际上是向党告別时对指揮集团說了这样一段話：“历史了解各种各样的轉变。依靠信念、忠誠以及其他最好的道德品质——在政治上这些都是不能认真看待的。”存在决定意識。在最近十五年中，政府已經改变了它的社会結構，甚至比改变它的思想还要深刻些。由于官僚在苏維埃社会的所有阶层中最好地解决了自己的社会問

題并且完全滿足于現狀，因此主观上对于自己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經不再提出任何保证。官僚之所以繼續保持国有財產，只是因为他們害怕无产阶级。这种絕无仅有的惧怕是布尔什維克—列宁派这个不合法政党所鼓励和支持的，这个政党是那些反对资产阶级反动——热月官僚已經完全浸透了这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傾向的最自觉的表現。官僚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已經背叛了革命。但是，一次胜利的革命幸好不仅是一个綱領和一面旗帜，也不仅是一些政治机构，而且还是一种关于社会关系的制度。背叛还不够。必須推翻才行。十月革命已經被統治阶层背叛，但是还没有被它推翻。十月革命具有一种偉大的抵抗力量，这种力量就在于已經确立的財產关系、无产阶级生气蓬勃的力量、它的最优秀分子的觉悟、世界資本主义的末日以及世界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三、关于还没有为历史所决定的 苏联的性质問題

为了更好地了解目前苏联的性质，我們不妨对它的未来作两种不同的設想。我們首先假定，苏維埃官僚被一个革命政党推翻，这个政党具有老布尔什維主义的一切特性，而且由于最近一个时期的世界經驗而丰富了自己。这样一个政党首先要做的是恢复工会中和苏維埃中的民主制度。它能够而且一定会恢复苏維埃各党各派的自由。这个政党会同群众一道并且領導群众对国家机关进行一次无情的清洗。它会廢除等級和勳章，廢除各种各样的特权，使劳动报酬上的不平等只限于經濟方面和国家机关方面的生活必需部分。它会給予青年独立思考、学习、批評和发展的自由机会。它还会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按照工农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进行深刻的变革。但是就財產关系來說，新政权就不一定采取革命措施了。它会保持并发展計劃經濟的實驗工作。在政治革命以后，即在廢

除官僚以后，无产阶级一定会在经济方面实行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改革，但这并不是进行另一次社会革命。

第二种假定是，如果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去推翻苏维埃统治阶层，那末，它在目前的一般官僚、行政官员、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支部书记以及特权上层当中就会找到不少的现成奴僕。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有必要把国家机关清洗一下。不过，资产阶级复辟也许会比革命政党要清除的人少一些。新政权的主要任务将是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首先，它必须创造条件从力量微弱的集体农庄中发展强有力的农民，把强大的集体农庄改变为资产阶级类型的生产合作社，即改变为农业股份公司。在工业领域，非国有化将从轻工业以及食品工业部门开始。计划原则在过渡时期将改变为在国家政权和个人“法人”之间采取一系列的妥协措施，这种个人“法人”即苏维埃工业负责人当中的潜在业主、流亡国外的旧业主以及外国资本家。尽管苏维埃官僚已经为准备资产阶级复辟走了很长一段路，新政权在所有制形式和工业方法方面所必须进行的将不是改革，而是一次社会革命。

我们也不妨设想一下第三种情况，即夺取政权的既不是一个革命政党，也不是一个反革命政党。官僚继续领导着国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关系也不会固定不变。我们不能指望官僚会为了社会主义平等的利益而和平地自愿地抛弃自己。如果目前官僚不顾极其明显的不利条件而依然认为有可能实行等级和勋章制度，那末，他们在未来的阶段就必然会在财产关系方面为自己寻求支持。人们可能这样说，大官僚并不关心占优势的所有制形式究竟是些什么形式，只要这些形式能够保证自己的必要收入就行。这种说法不仅忽视了官僚本身权利的不稳定性，而且还忽视了官僚的后代问题。新的家庭迷信并没有从云端掉下来。特权如果不能传给自己的子，那就只有一半价值。但是，遗嘱权同财产权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只当一个托拉斯的经理是不够的，还必须成为一个股东。如果官僚在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取得了胜利，那

就意味着他們變成了一個新的有產階級。另一方面，如果無產階級戰勝了官僚，那就會保證社會主義革命的復活。因此，第三種情況還是使我們回到頭兩種設想。只是為了簡單明了，我們才提出那兩種設想。

把蘇維埃制度說成是過渡性的或者中間性的制度，那就意味着拋棄像**資本主義**（包括“**國家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這樣完整的社會範疇。這樣一種定義除了本身根本不能自圓其說以外，還有可能產生一種錯誤的想法，以為目前的蘇維埃制度只有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種可能性。其實，這種制度倒退到資本主義也是完全可能的。一個更加完整的定義必然是複雜的和煩瑣的。

蘇聯是一個介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一）生產力還遠遠不足以使國有財產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二）由於匱乏而造成的原始積累的傾向，通過計劃經濟的無數漏洞而滋長起來；（三）保持着資產階級性質的分配標準，建立在一種新的社會分化的基礎上；（四）經濟的增長一方面使勞苦者的景況改善得很慢，另一方面卻促進了特權階層的迅速形成；（五）官僚利用社會的對抗而把自己改變成一個同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不受監督的階層；（六）社會革命雖然被執政黨背叛了，但是在財產關係和勞苦群眾的意識當中仍然存在；（七）日益增長的矛盾的進一步發展，可以走向社會主義，也可以退回到資本主義；（八）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反革命將不得不擊潰工人的抵抗；（九）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工人將不得不推翻官僚。歸根到底，問題將決定於國內和世界舞台上現有社會力量的鬥爭。

毫無疑問，純理論家對於這種假定的定義是不會滿意的。他們喜歡明確的公式：“是”就是“是”，“否”就是“否”。如果社會現象總是具有一種完善的性質的話，那末，社會學上的問題肯定就會簡單得多。然而，為了邏輯上的完整，把今天違反你的方案而明天也可能完全推翻你的方案的一些因素同現實分隔開來，再沒有比這

种做法更危险的了。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首先避免侵犯那些没有先例没有类比的富有生气的社会组织。科学任务同政治任务一样，不是对一种没有完成的进程下一个完整的定义，而是研究它的各个阶段，把它的进步倾向和反动倾向分开，揭露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预见各种可能的发展情况，并从这种预见当中找出行动的基础。

第十章 新宪法反映出来的苏联

一、“各尽所能”地工作和个人所有权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苏维埃新宪法草案，根据所有的报刊天天提到的斯大林声明，这部新宪法将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说实在的，这部宪法起草的方式就足够使人怀疑这一点了。无论是在报刊上或者是任何会议上，都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这项重大的改革。不仅如此，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就对美国访问记者罗易·霍华德说，“毫无疑问，我们在今年年底要通过我们的新宪法。”由此可见，当时人民还一无所知，而斯大林已经完全准确地知道什么时候通过这部新宪法。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部“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并不是以十分民主的方式制订出来和提出来的。的确，草案已经在六月间交给苏联人民“考虑”。然而，要在这片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地面上找到一个共产党员敢于批评中央委员会的创作或者一个非党公民会拒绝执政党的建议，那是没有用的。讨论本身变成呈交这样的决议：为“幸福的生活”感谢斯大林。这些祝贺的内容和风格都完全是在旧宪法下面准备好的。

第一章的标题是“社会结构”，最后一句话是：“在苏联，**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这个本身矛盾的——更不用说荒谬了——公式，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已经从演说和报刊上的文章转到精心草拟的国家根本大法的正文当中了。这一点不仅证明立法者的理论水平已经完全降低，而且证明新宪法充满了谎言——这正是统治阶层的一面镜子。要探索这个新“原则”的根源并不是一件难事。为了说明共产主义社会的特点，马克思运用了这样一个著名的公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公式的两个部

分是不可分割的。从共产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說，“各尽所能”意味着：工作到这个时候已經不是一項义务，而变成个人的一种需要了；社会用不着再采取任何强制的手段了。只有病人和不正常的人才會拒絕工作。在“各尽所能”的情况下工作，即在沒有任何强迫的情况下按照肉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能力工作，公社的成員由于拥有高度的技术就会使社会上的商店拥有充分的儲备，社会也就因而能够在不需要令人感到羞辱的监督之下慷慨地“按需分配”。因此，这个有两方面而又不可分割的共产主义公式应当具有这样的內容：丰足、平等、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高度的文化紀律。

苏維埃国家就其一切关系來說，与其說接近共产主义，不如說远为接近落后的资本主义。它甚至还不能想像“按需分配”。而且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也不能使自己的公民“各尽所能”地工作。苏維埃国家发觉自己不得不繼續保持計件工資制，而这种工資制的原則可以归納为这样两句話：“取之于每个人的越多越好，給予每个人的則越少越好。”說实在的，从絕對的意义上說，在苏联沒有一个人的工作能够超过自己的“能力”，即超过自己在肉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潜力。但是，在资本主义下面也是这样。最粗暴的以及最巧妙的剝削方法都不能超过自然所規定的限度。甚至一只騾子在鞭子下面也是“各尽所能”的，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結論說，鞭子是騾子的社会原則。甚至在苏維埃制度下，工資劳动也仍然帶着令人感到羞辱的奴隶制标签。“按劳分配”实际上是牺牲体力劳动、特別是不熟练劳动而对“脑力”劳动有利的一种工資支付办法，这种办法对多数人來說是不公平、压迫和强制的泉源，对少数人來說則是特权和“幸福生活”的泉源。

这部宪法的作者們不是坦率地承认苏联在劳动和分配方面还实行着资产階級标准，而是把这个統一的共产主义原則分割成两半，把后半推遲到无限遙远的未来，而宣布前半已經实现，并把这一点同资本主义的計件工資标准机械地結合起来，然后就把

这一套做法称为“社会主义原则”，并且在这个假造的“原则”上面建立了他们的宪法结构！

在经济方面具有最大的实际意义的，毫无疑问是第十条。这一条同大多数条文相反，十分明确地保障公民在家庭经济、消费、舒适和日常生活的用品方面的个人所有权，防止官僚本身加以侵犯。除了“家庭经济”以外，这种所有权在清除了往往与之结合在一起的那种贪婪和妒忌心理以后，将不仅在共产主义下面存在，而且还会得到空前的发展。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人还会不会要一大堆奢侈品来拖累住自己，固然是一个疑问。但是，他是不会放弃已经得到的任何享受的。共产主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证人人过舒适的生活。然而，在苏联，个人所有权问题还具有小资产阶级面貌，而不是共产主义面貌。农民和不富裕的城市居民的个人财产是官僚方面进行粗暴掠夺的对象，官僚的下层也经常靠这种手段来保证自己的相对舒适的生活。国家的逐步繁荣可以消除这种侵占个人财产的现象，甚至还可以迫使政府保护个人的积累，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推动力。同时——而这一点并不是不重要的——由于法律保护农民、工人或者办事员的茅草小屋、乳牛和家具，也就使官僚的城市住宅、避暑别墅、汽车以及所有其他“属于个人消费和享受的东西”合法化，而这些东西都是官僚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取得的。官僚的汽车肯定会比农民的马车受到新的根本大法更为有效的保护。

二、苏维埃和民主

在政治领域，新宪法同旧宪法的差别在于，从按照阶级和产业团体进行选举的苏维埃制度又回到以全体居民进行所谓“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简单地說，这就是从法律上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资本家的地方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新宪法的创作者这样说——因此国家本身已经由无产阶级

国家变成全民国家。这种論断不管从表面上看多么动人，不是提得晚了十九年就是提得早了許多年。无产階級在剝夺資本家的时候，实际上已經进入作为一个階級来消灭自己的时期。但是，从原則上消灭到实际上溶解于社会之中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新国家被迫进行資本主义的初步工作越久，这条道路也就越长。苏維埃无产階級依旧作为一个与农民、技术知識分子和官僚大不相同的階級存在，而且作为自始至終关心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階級存在。新宪法要在这个階級从經濟上溶解于社会当中以前很久，就从政治上把它溶解于“全民”之中。

的确，改革家們是經過了几次搖摆不定才决定仍旧像以前那样把国家称为**苏維埃**的。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低級的政治詭計，正如当年拿破侖帝国繼續称为共和国时的考虑一样。苏維埃就其本质來說是階級統治的机关，而不可能是任何別的东西。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是市議會、杜馬、地方自治局，随便叫它什么都可以，但不是苏維埃。建立在民主公式的基础上的全国立法議會是一种过时的議會(更确切地說，是議会的諷刺画)，而絕不是苏維埃的最高机关。改革家們試圖用苏維埃制度的历史性权威來为自己打掩护，这只不过表明，他們給予国家生活的那种根本不同的管理机关还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出現。

如果无产階級对国家的影響得到經濟文化一般情况的充分保证，工农政治权利的平等本身就不会破坏国家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肯定应当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如果无产階級在人口中还占少数的时候就的确已經不需要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来保证社会生活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那就意味着国家进行强制的必要性本身已經不存在，而让位給文化紀律了。

在那种情况下，要廢除选举上的不平等，应当首先明显地突出地削弱国家的强制职能。然而，关于这一点，新宪法上只字不提，更为重要的是，生活中也毫无迹象。

新宪章固然“保证”公民在言論、出版、集会以及游行方面拥有

所謂“自由”，但是这种“保证”所表現出来的形式不是沉重的封口工具就是手脚的鐐铐。出版自由意味着繼續进行粗暴的事先檢查，这种檢查的鎖鏈是掌握在沒有經過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書記处手中的。在这种情况下，拜占廷式的阿諛奉承自由当然得到充分的“保证”。与此同时，列宁的无数文章、演說和书信以及他的“遺囑”，在新宪法之下將繼續收藏起来，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文件激怒了新的领导人。列宁的情况是这样，其他作者就用不着說了。对科学、文学和艺术的粗暴无知的命令，整个來說还会保持下去。“集会自由”将同以前一样，意味着某些居民集团必須参加当局召集的會議以通过事先准备好的決議。在新宪法之下，同在旧宪法之下一样，数以百計的相信苏維埃“避难权”的外国共产党人，将在反对領袖不会犯錯誤这一教条的罪名下而繼續被关在牢獄和集中营里。在有关“自由”的問題上，一切如故。連苏維埃报刊也沒有試图在这方面散布任何幻想。恰恰相反，新宪法改革的主要目标被宣布为“进一步加强专政”。由誰专政呢？对誰专政呢？

正如我們已經听到过的，階級矛盾的消除已經为政治上的平等奠定了基础。专政已經不再是階級专政而是“人民”专政了。但是，如果专政者变成摆脱了階級矛盾的人民，那就只能意味着专政已經溶解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首先意味着官僚已經消灭。馬克思的学說就是这样教导的。那末也許是搞錯了吧？但是，宪法的作者們尽管小心翼翼，还是提到了列宁起草的党綱。这里就是党綱中真正說过的話：“……对政治权利的剝夺，以及对自由的所有其他限制，只是作为临时措施來說才是必要的……随着人剝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逐漸消失，这些临时措施的必要性也逐漸消失。”因此，放棄“对政治权利的剝夺”同廢除“对自由的所有其他限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不仅在于农民同工人居于平等地位，也不仅在于資产階級出身的少数公民恢复了政治权利，而且首先在于百分之百的居民享有真正的自由。随着階級的消灭，不仅官僚消亡，不仅专政消亡，而且国

家本身也消亡了。然而，只要哪个不谨慎的人试图在这方面拐弯抹角地说一句，国家政治保卫局就会在新宪法当中找到适当的根据把他送进无数集中营之一。阶级消灭了。苏维埃只留下了空名。但是官僚还存在。工人和农民的权利平等，实际上只不过意味着在官僚面前都没有权利。

采用秘密投票办法也不是不重要的。如果你相信新的政治平等符合已经赢得的社会平等，那就会有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那种情况下，投票为什么要用秘密的办法来加以保障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究竟怕什么人呢？必须防范什么人的企图呢？旧苏维埃宪法认为公开投票就像限制选举权一样，是革命阶级对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敌人的一种武器。我们不能设想，现在采取秘密投票办法是为了少数反革命分子的便利。显然，这是一个保卫人民权利的问题。但是，刚刚推翻了沙皇、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人民究竟怕什么人呢？拍马屁的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所包含的内容比巴比塞之流、路易斯·费希尔之流、杜兰提之流、韦伯夫妇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的全部著作当中的东西还要丰富。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秘密投票意味着维护被剥削者，防止剥削者的恐怖行为。如果资产阶级终于采取了这样的改革——显然是在群众的压力下采取的——那只不过是因为它关心于保护它的国家，使国家至少部分地不致受到它自己带来的堕落所发生的影响。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似乎不可能出现剥削者的恐怖行为。那末，必须保卫苏维埃公民来防范什么人呢？答案是清楚的：防范官僚。斯大林很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为什么有必要采取秘密选举制度呢？他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原话是：“因为我们要使苏联公民完全自由地选出他们所要选的人。”这样，全人类就从一个权威的来源了解到，今天“苏联人民”还不能选举他们所要选的人。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新宪法在未来将真给予他们这种机会，那也未免太轻率了。然而，就在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个

可以給予也可以不給予人民自由投票权的“我們”究竟是誰呢？正是斯大林講話和行动所代表的那些官僚。斯大林的这个暴露适用于执政党，正如完全适用于国家一样，因为他本人占据党的总书记职位就是借助于一个不容許党员选举他們所要选的人的制度。“我們要使苏联人民”自由投票这几个字比新旧宪法加在一起还要重要得无可比拟，因为在这句不謹慎的話里正包含着不是在紙上写出来而是在現有力量的斗争中写出来的真正苏联宪法。

三、民主和党

让苏联人民自由选举“他們所要选的人”这个諾言，与其說是一个政治公式，不如說是一句詩詞。苏联人民只有权利从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在党的旗帜下向他們提出的候选人中挑选“代表”。固然在苏維埃时代的初期，布尔什維克党实行的也是一种壟断。但是，如果把这两种現象混为一談，那就等于把表面現象当作现实。禁止反对党派是在国内战争、封鎖、干涉和饥饉的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执政党在那个时期代表真正的无产階級先鋒队組織，过着一种純洁的党内生活。集团和派别的斗争在一定的程度上代替了政党斗争。現在，在社会主义赢得了“最終的和不可变更的”胜利以后，組織派别反而要受到关进集中营或者枪毙的惩罚。禁止其他政党本来是一种临时不得已的坏做法，而現在已經确定为一項原則。甚至共产主义青年团也被取消了討論政治问题的权利，而且正是在新宪法公布的时候。不仅如此，男女公民年滿十八岁就享有选举权，但是一九三六年以前所規定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年龄限制（二十三岁）現在却完全取消了。这样，政治就被一劳永逸地宣布为不受监督的官僚的壟断物。

那位美国記者訪問斯大林的时候提出一个关于新宪法中如何規定党的作用的問題，斯大林回答說：“可是既然沒有階級，既然階級和階級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沒有階級了，階級和階級——已

經沒有了！——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托洛茨基注），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阶层之間只留下了某些非根本性的差別，那就不会有形成互相斗争的政党的土壤。沒有几个阶级的地方，就不会有几个政党，因为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每个字都有錯誤，有些字而且是錯上加錯！从这段话看来，似乎阶级是完整的，似乎阶级的界限是划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一旦划清就不再变动了，似乎一个阶级的意識严格地符合于它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样一来，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阶级性的学說便被歪曲了。政治意識的动力由于行政方面的利益便被排除在历史进程外面了。实际上，阶级并不是完整的；它們往往被內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只有經過內部的各种傾向、集团和政党之間的斗争才能解决共同的問題。附加一些条件才能够承认“一个政党是一个阶级的部分”。但是，既然一个阶级有許多“部分”——有些向前看，有些則向后看——那末，一个阶级就可以产生好几个政党。根据同样的理由，一个政党也可以依靠不同阶级的好几个部分。一个政党只代表一个阶级的例子在全部政治历史当中是找不到的——当然，除非是把政治的表面現象当作真实的东西。

从社会結構上說，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最完整的阶级。虽然如此，像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这样的“小阶层”的存在，已經足够产生机会主义政党，这种政党在事态发展的过程中变成为资产阶级統治的一种武器。不管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学观点来看，工人貴族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間的差別是帶有“根本性的”，或者只不过具有根本无足輕重的“某种性质”，正是由于这种差別，才有必要同社会民主主义决裂而創建了第三国际。即使在苏維埃社会中已經“沒有阶级”，这个社会至少也比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不完整得多，复杂得多，因而就能够提供形成好几个政党的适当土壤。斯大林在理論領域所作的这种不謹慎的漫談，证明了比他所要证明的东西多得多。根据他的推論，不仅苏联不可能有不同的政党，而且甚至不可能有一个政党。因为既然沒有阶级，一般地說

来也就无所谓政治。然而，斯大林却从这个法则当中得出一个有利于他担任总书记的那个政党的“社会学”结论。

布哈林试图从另一个方面解决问题。他说，在苏联，走向何处——后退到资本主义，或者前进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必须讨论的问题。因此，“已被消灭的敌对阶级的分子组织政党，是不能容许的”。在一个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党羽只不过是一些连一个政党也组织不起来的可笑的唐·吉珂德，撇开这一点不谈，就是现有的政治分歧也远远不能归结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个问题。另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用什么速度，等等。选择道路并不比选择目标不重要。是谁将去选择道路呢？如果形成政党的土壤的确已经消失，那末，就没有理由禁止政党。与此相反，现在正是按照党纲取消“对自由的一切限制”的时候。

斯大林在设法消除这位美国记者理所当然的怀疑时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考虑：“提出候选人名单的，将不仅是共产党，而且是各种非党的社会团体。这种团体我们有好几百个……〔苏维埃社会的〕这些阶层中的每一阶层会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且经过现存的很多社会团体反映〔表现？〕这种利益。”这种诡辩并不比其他诡辩高明些。苏维埃的“社会”团体——工会、合作社、文化团体等——一点也不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因为所有这些团体都拥有一个同样的等级结构。即使在这些团体显然代表群众团体的情况下，如在工会和合作社中，其中的主要角色也完全是由上层特权集团的代表来扮演的，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操在“党”的手中，换句话说，操在官僚的手中。宪法只不过是要选民从彭歇斯那里转到彼拉多^①那里罢了。

这套把戏不折不扣地表现在根本法的条文中了。第一百二十六条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来说是宪法的轴心，这一条“保证”全体男

^① 彭歇斯·彼拉多 (Pontius Pilate) 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古罗马犹太总督。这里把他的名字分开，意指选民的实际情况没有改变。——中译者注

女公民“有权”结合于工会、合作社、青年团体、体育、国防、文化、技术和科学团体之中。至于党——即政权中心——并不是一个全体公民的权利问题，而是少数人的特权问题。“……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阶层当中最积极最有觉悟〔这是上面的看法——托洛茨基注〕的公民，则结合在共产党之中……**它是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这个坦率得令人惊异的公式写在宪法的正文里，说明了那些“社会团体”具有政治作用的全部虚伪性，其实它们只不过是官僚商店的分店。

但是，如果没有政党之间的斗争的话，也许一个政党内部的不同派别可以参加这种民主选举吧？莫洛托夫在回答一个法国记者提出的关于执政党的派别问题的时候说，“在党内……建立特殊派别的企图是有过的……但是几年前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统一体。”这一点最好是用接连不断的清洗和集中营来证明。莫洛托夫作了解释以后，民主的把戏就完全清楚了。维克托·塞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敢于提出一个要求或者表示一个批评意见的工人必须坐牢的话，那末，十月革命还剩下一些什么呢？呵，这样做以后，你们才能想建立多少投票箱就建立多少！”千真万确：连希特勒也没有侵犯过秘密投票箱。

改革家们文不对题地卷入了关于阶级和政党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性争论。这并不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是一个物质利益问题。在苏联享有壟断权的执政党是官僚的政治机器，而这些官僚实际上只有所失而再无所得。他们要保持这种“土壤”完全是为了自己。

* * *

在一个革命的熔岩还没有冷却的国家里，拥有特权的人要为特权所焚毁，正像偷金表的贼要为偷来的金表所焚毁一样。苏维埃统治阶层害怕群众，完全像资产阶级一样害怕了。斯大林借助于共产国际为上层集团日益增加的特殊权利提供“理论”根据，借助于

集中营来维护苏维埃贵族而压制人民的不满。为了使这部机器不断地运转，斯大林不得不常常站在“人民”一边来反对官僚——当然，这是得到官僚默许的。他认为采取秘密投票的办法是有用的，至少可以部分地消除国家机关当中那些正在起腐蚀作用的腐化现象。

早在一九二八年，拉柯夫斯基在讨论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若干官僚盗窃案件的时候就写道：“在这种丑事日益蔓延的浪潮中，最突出最危险的事情是群众的消极情绪，共产党员群众甚至还超过非党群众……他们由于害怕当权的人，或者干脆由于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对于这些情况没有提出抗议，或者只限于背后埋怨。”从那个时候起已经过去了八年，情况变得更加坏得多了。政治机器一步步显露出来的衰败现象，开始威胁到国家本身的存在——这个国家现在不再是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而是统治阶层的权力、收入和特权的泉源了。斯大林不得不看一看这种改革的动机。他对罗易·霍华德说：“我们有不少机关工作得不好……苏联的秘密投票办法将成为人民手中的鞭子，用来鞭策工作做得不好的政权机关。”这真是一个出色的自白！官僚用自己的手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反而感到需要……一条鞭子了！这就是宪法改革的动机之一。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动机。

在取消苏维埃这一点上，新宪法把工人溶解在一般居民群众中。从政治上说，说实在的，苏维埃早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对抗的增长和新的一代的觉醒，苏维埃还有可能再生。当然，最可怕的是，幼稚的天真的共产主义青年越来越多地参加城市苏维埃。在城市中，奢华和匮乏之间的对照是太明显了。苏维埃贵族首先关心的是摆脱工人和红军苏维埃。至于分散的农村居民的不满情绪，那要容易对付得多。集体化农民甚至可以在某种成就的吸引下被利用来反对城市工人。官僚反动依靠农村来进行反对城市的斗争，这并不是第一次。

新宪法中具有原则意义和重大意义而且真正超过资产阶级国

家最民主的宪法的，只不过是冲淡了十月革命的根本文件的意义。只要估计经济成就，就用虚假的前景和夸张的手段来歪曲真实情况。最后，凡是同自由和民主有关的事情都彻头彻尾地充满了侵犯强夺和玩世不恭的精神。

新宪法实际上是从社会主义原则向资产阶级原则后退一大步，是按照统治集团的尺寸剪裁缝制的，因此它所走的历史过程是同下列事情一样的：为了国际联盟的利益而放弃了世界革命，恢复资产阶级家庭，用常备军代替民兵，恢复军官等级制度和颁发勋章制度，使不平等的现象加剧。新宪法通过从法律上加强官僚“特殊阶级”的专制政治，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的诞生创造了政治前提。

第十一章 苏联到何处去？

一、作为一种危机制度的波拿巴主义

我們在前面曾以讀者的名义提出这样一个問題：“統治集团犯了无数錯誤，怎么能把漫无限制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呢？”或者換句話說，“热月分子的智力貧困和物质力量之間的矛盾怎么解釋呢？”現在这个問題已經有了一个比較具体和比較明确的答案。苏維埃社会并不是和諧的。这个階級或阶层认为是罪恶的东西，另一个階級或阶层可能认为是一种美德。从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这个观点来看，官僚的政策是十分矛盾的和反复无常的。但是，从加强新統治阶层的权力这个观点来看，这种政策却是始終一貫的。

国家对富农的支持（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來說包含着一种致命的危險。另一方面，在小資產階級的帮助下，官僚又把无產階級先鋒队的手脚捆起来，并对布尔什維克反对派进行了镇压。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錯誤”；从官僚的观点来看，这却完全是一件好事。当富农开始直接威胁到官僚本身的时候，官僚才把武器轉过来对付富农。对富农的猛烈进攻还扩大到中农身上，这种做法使經濟遭到的損失并不下于一次外国入侵。但是，官僚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他們完全消灭了以前的同盟者以后，就开始全力发展新貴族。这样做不是危害社会主义嗎？当然——但同时却加强了統治阶层。苏維埃官僚在这一点上同所有的統治階級一模一样，即只要他們的领导人无条件地忠实于維護官僚的特权，他們就閉眼不看这些领导人在一般政治領域所犯的最严重的錯誤。新貴族对于局势越是感到不安，則凡是為了維護他們那样公正地得到的权利、使之不受任何一点威胁而采取的

无情手段，就越为他們所推崇。暴发戶阶层正是从这个观点上来挑选它的領導人的。斯大林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此。

然而，官僚的权力和独立性的增长并不是沒有限制的。历史因素比元帅們更强有力，甚至比总书记們更强有力。如果沒有准确的計算，經濟要合理化是不可想像的。而計算是同官僚的任所欲为不相容的。官僚之所以被迫关心恢复卢布的稳定性，也就是使卢布摆脱“領導人”的控制，是因为他們的专制統治同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之間的矛盾越来越大——正像专制君主政体到一定的时候同資產階級市場的发展不相容一样。然而，貨幣核算不能不使不同阶层在国民收入分配上所进行的斗争具有更加公开的性质。在实行粮券制度时期几乎无所謂的工資等級問題，現在对工人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而随着这个問題的產生，工会也发生了問題。由上級指派工会工作人員的做法，必然要遇到越来越强烈的反抗。不仅如此，在計件工資制下面，工人是直接关心工厂管理方面的正确安排的。現在斯达汉諾夫工作者越来越强烈地埋怨生产組織方面的錯誤。官僚在委派經理、工程师等方面用人唯亲的做法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合作社和国营商店比以前更加依賴购买者。集体农庄和个别集体农庄庄員逐漸学会用数字来衡量他們同国家的交易。他們越来越不願意順从地忍受由上級任命領導者的做法，因为这些領導者的唯一优点往往就是同当地的官僚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最后，卢布又往往把光亮投射到最神秘的領域，即官僚合法和不合法的收入方面。由此可見，在一个政治上遭到扼杀的国家里，貨幣流通可以变成动员反对力量的一个重要杠杆，而且可以預告“开明的”专制制度結束的开始。

一方面，工业的增长和农业的納入国家計劃領域使領導任务大大复杂化，因为质量問題提到前面来了；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却在摧毁首創精神和責任感，而沒有这些，质量是沒有也不可能有进步的。官僚主义的烂疮在大型工业中也許不那么明显，但是，在合作社以及輕工业、食品制造业、集体农庄和地方小工业中——即在

所有同人民关系最密切的經濟部門中——这种烂疮却在蔓延。

苏維埃官僚的进步作用只存在过一个时期，即热中于把资本主义技术中最重要的因素介紹到苏联的时期。借用、模仿、移植和接枝的初步工作都是在革命所奠定的基础上完成的。到现在为止，在技术、科学或艺术領域还談不上有任何新东西。在官僚的指揮下，按照西方現成的型式是可以建立大型工厂的——虽然說实在的，要比正常的成本貴两倍。但是，走得越远，經濟当中的质量問題也就越重要，而这个問題像影子一样，官僚总是抓不住。苏联的产品好像印上了粗制濫造的灰溜溜的标记。在合理化經濟下，质量要求一种生产者和消費者的民主，批評和倡議的自由——而这些条件是同恐惧、撒謊和吹捧的极权主义制度不相容的。

在质量問題的背后，有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巨大的問題，这个問題可以包括在**独立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創造**这样一个概念当中。古代的哲学家說过，斗争是万物之父。如果思想不能自由地交鋒，就創造不出新价值。說实在的，革命专政就其本质來說就是要严格地限制自由。但正是由于这一点，革命时代才从来没有直接地有利于文化方面的創造，而只不过是為这种創造扫清了道路。无产阶级专政越是不再成其为专政，就越能为人类的天才开辟广闊的活动場所。社会主义文化只有随着国家的逐步消亡而逐步繁荣起来。这个簡單而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則就包括着对苏联現行政治制度的死刑判决。苏維埃民主并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政策，更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道德。它已經变成国家的一种有关生死存亡的需要。

如果新国家除了社会的利益以外再沒有别的利益，强制职能的消亡就会逐漸具有一种沒有痛苦的性质。但是，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特殊的职能創造了特殊的机关。官僚就其整体來說，对于其职能的关心远远不及对于其职能所带来的好处的关心。統治阶层试图加强的和永远存在下去的是强制性机关。它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和收入有保障，对什么事情和什么人都不顾惜。事态的发

展越是对它不利，它对居民当中的先进分子就越无情。像天主教会一样，它在衰落时期提出了領袖不会犯錯誤的教条，但是它把这个教条高举到連羅馬教皇也从来没有梦想到的程度了。

对斯大林的日益偶像化以及这种偶像化所具有的种种漫画味道，是这个制度所必需的一个条件。官僚需要一个不可侵犯的最高仲裁者，即使不是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第一执政官，因此他們就把一个最能适应自己的統治要求的人抬到肩膀上。領袖的那种“性格力量”虽然使西方那些半真半假的文人雅士傾倒，实际上是一个不顾一切維護自己的地位的阶层所施加的集体压力的总表现。这个阶层的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位上都是这样想的：**朕即国家**。他們每个人在斯大林身上都容易找到自己。而斯大林也能在每个人身上找到他自己的一小部分精神。斯大林是官僚的化身。这就是他的政治人格的本质。

凱撒主义或者它的资产阶级形式波拿巴主义，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进入舞台的：两个陣营的尖銳斗争把国家权力——姑且这么說——抬高到民族之上，而且表面上保证国家权力完全独立于阶级之外——实际上只不过保证这种权力拥有維護特权者所必需的自由。斯大林政权凌駕于政治上分裂的社会之上，依靠警察和軍官集团，并且不受任何监督，这样一种政权显然是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变种——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見过的新型的波拿巴主义。

凱撒主义是在由于内部斗争而动摇了的奴隶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波拿巴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危急时期的政治武器之一。斯大林主义則是同一制度的一种变种，不过是在工人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国家已經被有組織的武装的苏維埃貴族和非武装的劳苦群众之間的对抗弄得四分五裂。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波拿巴主义同普遍的甚至秘密的投票制度相处得不錯。波拿巴主义的民主仪式是公民投票。因而常常就会有这样一个問題向公民們提出：对領袖是**拥护**呢，还是**反对**呢？于是选民就感觉到枪口对着自己的两个肩膀之間的部分。自从拿

破命第三——现在看来，他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外行——那个时代以来，这种技术已经有了特殊发展。在公民投票的基础上建立波拿巴主义的苏联新宪法，就是这种制度的真正顶峰。

归根到底，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世界革命的推迟。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同一原因却造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个乍看起来出乎意料而实际上却是不可避免的结论：苏维埃民主虽然是被全能的官僚所摧毁，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是被法西斯主义所消灭，两者却出于同一原因，即世界无产阶级解决历史为它提出的问题太慢了。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尽管社会基础很不一样，却是两种对称的现象。两者有很多特点是十分酷似的。如果欧洲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那就会不仅使法西斯主义而且使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立即动摇。斯大林主义官僚背弃国际革命的行为，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他们只不过是按照自我保护的要求行事而已。

二、官僚同“阶级敌人”的斗争

从苏维埃制度建立的最初时日起，党就是官僚主义的对头。当时，如果说官僚管理着国家，那末党则控制着官僚。党高度警惕地不使不平等超过必需的界限，为此它时时刻刻同官僚进行公开的或隐蔽的斗争。斯大林派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摧毁这种双层关系，而使党屈从于它自己的官僚并把后者融合在国家的官僚当中。目前的极权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产生的。斯大林就是因为官僚作出了这个并非不重要的服务，才使他的胜利得到保证。

左翼反对派在其斗争的最初十年当中，并没有放弃从思想上夺取党的纲领而去采取通过夺取政权来反对党的纲领。当时它的口号是：是改革，而不是革命。然而，就是在那个时候，官僚也已下定决心要用任何革命手段来保卫自己、反对民主改革。在一九二七年斗争达到特别激烈的阶段时，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

議上就親口對反對派說：“那些幹部只有通過國內戰爭才能清除掉！”由於歐洲無產階級遭到了一系列的失敗，斯大林這句話里所威脅的東西變成了歷史事實。改革的道路變成了革命的道路。

黨和蘇維埃組織之所以不斷地進行清洗，就是為了防止群眾的不滿情緒變成一種一致的政治表現。但是，壓制並不能撲滅思想，而只不過是把思想趕到地下。廣泛的共產黨人集團以及非黨公民都保持着兩種思想體系，一種是公開的，另一種是秘密的。暗探和告密活動到處都在腐蝕着社會關係。官僚當然總是把自己的敵人當作社會主義的敵人。在偽造法律證據的幫助下——這種做法已經變成正常的情况——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把任何罪名強加在自己的敵人身上。他們還可以用槍決的威脅從脆弱的人那里弄到他們自己所授意的供詞，然後再把這種供詞作為控告比較堅強的人的基礎。

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真理報》在評論“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的時候這樣教導人們：雖然階級已經消滅，但是如果認為“敵視社會主義的階級力量已經甘心失敗，那將是不可原諒的愚蠢和罪惡。……鬥爭還在進行。”這些“敵對的階級力量”究竟指的是什麼呢？《真理報》回答說，“反革命集團的殘余、各式各樣的白衛軍，特別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分子。”斯大林的機關報在不可避免地提到“暗探工作、陰謀和恐怖活動”（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分子干的！）以後，提出了這樣的諾言：“我們將來也一定要用堅強的手段打倒並消滅人民公敵——托洛茨基主義的卑鄙家伙和潑婦，無論他們偽裝得多么巧妙。”蘇維埃報刊上天天重說一遍的這些威脅，⁶只不過是對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工作的一種配合。有一個名叫彼得羅夫的人，一九一八年入黨，參加過國內戰爭，後來成為農業專家和右翼反對派的成員，一九三六年他從流放的地方逃出來，在一家流亡的自由派報紙上寫文章，現在他這樣刻畫所謂托洛茨基分子：“左派分子嗎？從心理上說，這是真正的狂熱的最徹底的革命分子。沒有圓滑老練的討價還價，沒有妥協。最可崇敬的一

些人。但是思想呆滯……一場世界大火災以及諸如此類的胡言亂語。”我們暫且撇開他們的“思想”問題。右派敵人給予左派的這種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評價，本身就說明問題。正是這些“真正的、狂熱的和最徹底的革命分子”被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校官和將官們控告……為了帝國主義的利益而進行反革命活動。

官僚仇恨布爾什維克反對派的那種歇斯底里，如果同取消對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的限制聯繫起來看，那就具有一種特別深刻的政治意義。關於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的雇用、工作和教育的那些調和的法令，都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以前的統治階級的反抗將會隨著新秩序的穩定性的日益明顯而逐漸消亡。一九三六年一月莫洛托夫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解釋說，“現在不需要這些限制了。”然而，與此同時，卻發覺最惡毒的“階級敵人”原來是那些一生為社會主義奮鬥的人，從列寧的最親密的同事開始，如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據《真理報》說，“托洛茨基分子”同資產階級不同的地方在於，“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越明顯”，“托洛茨基分子”就越拚命。這種由於需要用舊公式來掩蓋新關係而產生出來的哲學的胡說八道，當然不可能掩蓋社會對抗中的一種真正的變化。一方面，“貴人”階層的形成為那些比較有雄心的資產階級子弟提供了廣泛的事業機會：給予他們同等權利並沒有什麼危險。另一方面，這種現象又在群眾當中，特別是青年工人當中激起一種嚴重的、極其危險的不滿情緒。在這種情況下，才發動了撲滅“卑鄙傢伙和潑婦”運動。專政之劍本來是用來打倒那些要恢復資產階級特權的人們的，現在卻對準那些起來反抗官僚特權的人們。受到打擊的並不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而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同職能上的這種基本變化相適應的是，政治警察以前都是從特別忠誠和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布爾什維克當中挑選出來的，現在則由官僚當中最墮落的一部分人組成了。

熱月派在迫害革命分子的時候，特別仇恨那些提醒他們記住過去和防范未來的人們。監獄、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最遙遠的角

落，以及迅速增加的集中营，都关满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精华——最刚强最忠实的人们。即使在西伯利亚单独监禁的牢狱中，反对派分子还是要受到搜查、禁止通讯和饥饿等迫害。在流放中，妻子被迫同自己的丈夫分离，这种做法的唯一目的是瓦解他们的反抗并使他们悔过。但是，就是悔了过的人也并没有得到安全。一有嫌疑或者有告密者暗中告发，这种人就会受到加倍的惩罚。即使亲属帮助流放的人，也被认为是一种罪行。互相帮助是被当作一种阴谋来惩罚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卫的唯一手段是绝食。国家政治保卫局则以强迫吃饭或者听任饿死作为对策。这些年来，有好几百名俄国的和外国的反对派分子已经被枪杀，或者在绝食中死去，或者自杀而死。在最近十二年当中，当局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好多次：反对派已经被彻底根除。但是，在一九三五年最后一个月和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的“清洗”中，又有几十万党员被开除，其中有好几万“托洛茨基分子”。最积极的分子都立刻被逮捕，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至于其他人，斯大林则通过《真理报》公开劝告地方机关不要给他们工作。在一个国家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就意味着通过慢性饥饿而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旧原则已经代之以不服从者不得食这样的新原则。自从一九二三年波拿巴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究竟有多少布尔什维克被开除、逮捕、流放和扑灭，要到我们检查斯大林政治警察的档案时才会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地下，也要到官僚开始破产的时候才会知道。

对于一个拥有两百万党员的党来说，两三万反对派分子能有多么大的意义呢？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仅仅拿数字来对比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浓厚的政治气氛中，一团军队中只要有十个革命分子就足够把这一团人带到人民方面来。参谋本部对于小小的地下组织或者甚至个人怕得要死，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反动的参谋本部的这种惧怕，浸透了所有的斯大林主义官僚，这种惧怕说明了官僚所进行的迫害和恶毒诽谤具有多么疯狂的性质。

在苏联度过各个镇压阶段的維克托·塞奇，給西欧带来了惊人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从那些由于忠于革命和敌視革命的掘墓人而正在遭受酷刑的人們那里傳出来的。維克托·塞奇这样写道：“我毫不誇張，我的每个字都經過了斟酌。我說的每件事情，我都能举出悲剧性的证据和真实的姓名。在这大批的殉道者和抗議者当中，大部分人是沉默的，有少数英勇的人比所有其他人更同我接近，这些人的精力、洞察力、坚忍不拔以及对于偉大时代的布尔什維主义的忠誠都是宝贵的。成千上万的这种建党时就参加了党的共产党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同志、苏維埃共和国的建立者，在苏維埃还存在的时候正在用社会主义原則反对制度的内部蜕化，正在尽力（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忍受一切可能的牺牲）保卫工人阶级的权利……我把那些还囚禁在那里的人們的消息帶給你們。不管怎样，他們一定会坚持到底。即使他們活不到看見新革命曙光出現的时候……西方的革命分子是可以對他們抱着期望的。火焰將繼續燃燒下去，即使只是在監獄里。同样，他們也對你們抱着期望。你們必須——我們必須——維護他們，以維護世界上的工人民主制度，恢复无产阶级專政的原来形象，并且有一天恢复苏联精神上的偉大和工人对苏联的信心。”

三、新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列宁在談到国家消亡的时候曾經这样写道，“如果沒有什么事情引起憤怒、抗議和反叛，因而产生压制的必要”，那末，遵守社会生活規則的习惯就能够使进行强制的一切必要性失去意义。問題的本质就在“如果”这两个字。苏联目前的制度在每个步驟上都要引起抗議，同时压制得越厉害，抗議也就越激烈。官僚不仅是一种强制机器，而且是一种引起抗議的不变的泉源。由于有一个貪婪的、撒謊的和玩世不恭的統治者阶层存在，不可避免地就要产生一种隱蔽的憤怒。工人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并不能使他們同当局和

解；相反，由于提高了他們的自尊心和在一般政治問題上解放了他們的思想，这种做法反而为他們公开同官僚冲突进行了准备工作。

不可动搖的“領導人們”喜欢发表一些关于必須“进行研究”、“学习技术”和“自修文化”以及其他好听的談話。但是，統治阶层本身却是无知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它什么都不肯认真研究，在社会交往方面是不誠实的、粗线条的。它要求包办社会生活的一切領域，不仅指揮合作社商店，而且还指导乐譜的創作，这种情况尤其令人难以忍受。苏維埃居民如果不摆脱这种屈从于一个篡夺者阶层的羞辱地位，就不能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是官僚将吞食工人国家呢，还是工人阶级将清除官僚呢？这就是問題的所在，而苏联的命运就在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大多数苏联工人甚至現在就已經敌視官僚。农民群众則以他們的那种健康的平民仇恨来仇恨官僚。如果說工人同农民相反，几乎从来没有走上公开斗争的道路，因而使态度坚决的农村陷于混乱和无力状态，那末，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压制的緣故。工人們所担心的是，推翻了官僚以后，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国家和阶级之間的相互关系比庸俗的“民主分子”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如果没有計划經濟，苏联就会倒退好几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說，官僚还在繼續發揮一种必要的职能。但是，官僚是这样履行自己的职能的，即同时也为整个制度的爆炸进行了准备，而这种爆炸有可能完全失掉革命的成果。工人是现实主义者。他們沒有看錯統治阶层——至少沒有看錯同他們接近的下层——他們认为这个阶层暂时还是他們的某一部分胜利成果的看管者。一旦他們看到另外的可能性，他們必然会把这些不誠实的、輕率的和靠不住的看管者攆走。为此，西方或东方就必须另外有革命曙光出現才行。

明显的政治斗争的停止，被克里姆林宮的朋友和代理人描繪为制度“稳定”的表現。实际上，这种情况只不过表明官僚暂时稳定下来。随着人民的不滿情緒的加深，年青的一代特别痛苦地感受到这种“开明的专制”的压力，因为它的专制成分要比开明成分

多得多。官僚对于任何一点活思想的警惕越来越显出不妙的兆头，而对于“领袖”个人天赋的赞美则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这些情况表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离日益加深。这些情况还表明内部矛盾在不断地加深，这是对国家的一种压力。这个国家将会寻找出路，而且必然会找到一条出路。

在真正估计形势的时候，经常对政权的代表人采取的恐怖行为为具有很大的意义。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一件事就是暗杀基洛夫案件。基洛夫是列宁格勒的聪明而比较随便的独裁者，是他那一伙人的典型代表。就恐怖行为本身来说，它推翻波拿巴主义寡头政治的可能性最小。虽然各个官僚都害怕手枪，但是整个官僚阶层却能利用一件恐怖行为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而且能够顺便把它自己的政敌牵连在暗杀案件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案件就是这样)^①。个人恐怖是个人急躁或绝望时的一种武器，而这些人差不多都属于官僚的年青一代。但是，正如沙皇时代的情况一样，政治暗杀是局势动荡的确切无误的征兆，这种暗杀预示了公开的政治危机即将到来。

官僚提出新宪法，就表明它已感觉到这种危险，正在采取预防性措施。然而，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即官僚专政企图通过“自由”改革来解救自己，却只不过削弱了自己。新宪法在暴露波拿巴主义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半合法的掩护物来遮盖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各个官僚集团在选举期间的竞争可以成为一种更加广泛的政治斗争的开端。对付“工作做得不好的政权机关”的鞭子可以转变成对付波拿巴主义的鞭子。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导致人民当中文化较高的力量同官僚寡头之间发生冲突。这种危机是不会带来和平的结果的。还从来没有一个魔鬼自愿斩断自己的魔爪。苏维埃官僚也是不会不经过斗争就放弃自己的地位的。事态的发展显然将导向革命的道路。

^① 这里指的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审讯，而不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审讯，本书是在后者发生以前写成的。——英译者注

由于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和政府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分裂，当权者的抵抗有可能比目前所表现的力量软弱得多。但是关于这一点，只能提出一些假设。无论如何，官僚只能被革命力量铲除。同时，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攻击越是坚决果断，牺牲就越小。准备这项工作和在有利的历史情况下把群众领导起来——这就是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任务。今天这个支部的力量还是弱的，它还处于地下状态。但是，一个政党不合法地存在并不是不存在。这只不过是一种困难的存在形式。压制手段对于一个正在从舞台上消失的阶级来说是能够充分发挥效力的——这一点已经完全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的革命专政所证明——但是对革命先锋队采取暴力行为是不能拯救一个已经活过了头的阶层的，如果总的来说苏联注定还要发展下去的话。

官僚正在准备的那种反对自己的革命将不是社会革命，它同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不一样。这一次问题不在于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在于用这种所有制形式来代替那种所有制形式。历史上已经不仅出现过用资产阶级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社会革命，而且还出现过不摧毁社会经济基础而只清除旧统治阶级的上层表皮的政治革命（如法国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等等）。推翻波拿巴主义阶层当然会带来深刻的社会结果，但是就其本身来说，它还是局限于政治革命的范围以内。

一次工人革命所产生的国家存在下来，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国家所必须经历的阶段还没有先例可循。不错，苏联的理论家和创建者希望，完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和具有灵活性的苏维埃制度将会使国家按照社会的经济文化演变阶段来和平地转变、解体 and 消亡。然而，在这里，生活再一次证明比理论所预期的要复杂得多。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注定要完成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这个历史特权，从一切迹象来看，无产阶级还必须再进行第二次补充革命来反对官僚专制。新革命的纲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革命爆发的时刻、国家已经达到的水平以及国际形势。

这个綱領的基本因素已經清楚，在本书分析苏維埃制度的矛盾以后得出的客观論断中已經指出。

問題并不在于一个統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統治集团，而在于改变国家管理經濟和指导文化的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須让位給苏維埃民主政治。恢复批評权利和拥有真正的选举自由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意味着恢复苏联各党派(从布尔什維克党开始)的自由，恢复工会的作用。在工业中实行民主意味着按照劳动者的利益从根本上修改計劃。自由討論經濟問題将减少由于官僚主义的錯誤和左右搖摆而增加的总开支。浪費的玩意儿——如苏維埃宮、新剧院、富丽堂皇的地下铁道——将停止建筑，而改为兴建工人住宅。“資產階級分配标准”将局限于严格的必需范围以內，并且随着社会財富的增长而逐步让位給社会主义平等。軍官等級制将立即取消。閃閃发亮的勳章将送到熔炉里去。青年将有机会自由呼吸，进行批評 容許犯錯誤和成长起来。科学和艺术将摆脱自己的鎖鏈。最后，外交政策将恢复革命的国际主义傳統。

十月革命的命运从来没有像現在这样同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命运結合在一起。苏联的問題現在正在西班牙半島、法国以及比利时解决。到本书出版的时候，形势将比今天在馬德里城下进行內战的时候明朗得无可比拟。如果苏維埃官僚在执行背叛的“人民陣綫”政策之下使反动在西班牙和法国取得了胜利——共产国际正在竭尽全力朝这个方向做——那末，苏联将面临毁灭的边緣。到那个时候，提到議事日程上的将是資產階級反革命，而不是工人反对官僚的起义。如果不管改良主义者和“共产党”领导人怎样联合怠工，而西欧的无产階級能够找到夺取政权的道路的話，那末，苏联的历史上将展开新的一章。欧洲革命的第一个胜利将像电击一样穿透苏維埃群众，使他們站起来，提高他們的独立精神，喚起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傳統，毀掉波拿巴主义官僚的陣地，并且使它對第四国际的意义不小于十月革命对第三国际的意义。只有这样，第一个工人国家才有可能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得到拯救。

附 录

“一国社会主义”

自給自足經濟的各种反动傾向，反映了衰老的資本主义要保卫历史所面临的这一任务，即要使資本主义經濟摆脱私有财产和民族国家的束縛，而在全世界用一种計劃的方式把經濟組織起来。

列宁的“被剝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由人民委员会提交为时很短的立宪會議通过——对于新政权的“基本任务”是这样規定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組織，使社会主义在所有的国家获得胜利。”革命的国际性质就这样写在新政权的基本文件上。当时沒有人敢对这个問題提出不同的看法！一九二四年四月，即列宁逝世三个月以后，斯大林在《論列宁主义基础》这本小册子当中写道：“为了推翻資产階級，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給我們說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組織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①这几句話用不着注釋。然而，印着这几句話的版本已經停止发行了。

欧洲无产階級所遭到的大規模失敗和苏联所取得的初步的一般經濟成就，使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有这样的想法：苏維埃官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单独一个国家內建成社会主义。圍繞着这个問題，展开了一场对許多肤淺的人來說似乎是学院式的或者是煩瑣的爭論，但是实际上，这场爭論却反映了第三国际墮落的开端，并且为第四国际开辟了道路。

^① 《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中文版第60—61頁。——中譯者注

有一个过去是共产党员而现在亡命国外的白卫分子彼得罗夫（我們曾經引用过他的话），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年青一代的行政管理人員多么激烈地反对那种认为苏联要依賴国际革命的理論。“怎么能說我們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里設法建設幸福的生活呢？”如果馬克思对这一点有不同的提法，那就意味着：“我們不是馬克思主义者，我們是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問題就在这里！”彼得罗夫在回忆了二十年代中期的这次爭論以后补充說，“今天我不能不这样想：在一个国家內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并不仅仅是斯大林的創造。”完全正确！它确切无誤地表达了官僚的心情。这些官僚談到社会主义胜利的时候，指的就是他們自己的胜利。

斯大林在辯解他同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傳統决裂的时候竟不小心到說出这样的话：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了解据說是列宁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法則。在妙語的編目中，这句话真該名列前茅。发展的不平衡貫穿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中。有一位年青的俄国历史学家和經濟学家桑采夫——一位具有特殊天賦和优秀品质的人，因加入左翼反对派而在苏維埃官僚的監獄中被折磨致死——他在一九二六年写了一本研究馬克思的不平衡发展法則的优秀理論著作。这本书当然不能在苏联出版。早已逝世而被人遺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馬尔的著作，虽然由于相反的原因，但是也遭到了禁止。他早在一八七八年闡述关于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景时——不是为俄国，而是为德国——就提到了这个据說在列宁以前还没有人知道的不平衡发展法則。

格奧尔基·福尔馬尔写道，“社会主义无条件地以經濟发达的关系为前提，如果問題仅仅限于这种关系，那末，經濟最发达的地方，社会主义就应当最强大。但是，事情毕竟不是这样。英国无疑是經濟上最发达的国家，但是我們看到，社会主义在那里只能扮演一个很次要的角色；而在經濟上比較不发达的德国，社会主义却已經具有这样强大的力量，以致整个旧社会不再感到自己是穩固的

了。”福尔馬尔在談到决定事态发展过程的許多历史因素的时候繼續說，“显然，由于这么多力量的相互关系，任何一般人类运动的发展在時間上和形式上过去和現在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即使在两个国家当中，更不用說在所有的国家了……社会主义也遵循同样的法則……社会主义在所有的文明国家同时胜利的假設根本不能成立，由于同样的理由，所有其他文明国家必然立即仿效一个按照社会主义原則組織起来的国家这一假設也根本不能成立……”福尔馬尔作出結論說，因此，“我們的到达地点是**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我已經证明——这虽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却有最大的可能。”这本作者在列宁八岁时写的著作对不平衡发展法則所作的闡釋，远比从一九二四年秋天起苏維埃后輩們所作的闡釋正确得多。附带提一笔，我們必須指出，在福尔馬尔这个二流理論家所进行的这一部分研究中，只不过是解釋了恩格斯的思想——而据說，恩格斯是“不知道”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法則的。

“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已不是一种历史的假設，而成为一个事实了——当然是在俄国，而不是在德国。但是，孤立状态这个事实也确切地表明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强大和社会主义的相对軟弱。从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一个永久廢除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經歷一段漫长的历史道路，而这条道路同国际革命的道路是完全一致的。

比阿特里斯·韦伯和悉尼·韦伯肯定地对我们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不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因为他們二人“从来没有梦想到”壟断对外貿易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武器。讀了这两位上了年紀的作家說的这一番話，人們不能不感到困惑。由国家接管商业銀行、公司、铁路和商船，就好像生产資料——包括出口工业部門使用的資料——国有化一样，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須采取的措施。壟断对外貿易无非就是把进出口的物质手段集中在国家手里。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梦想到”壟断

对外貿易，就等于說他們从来没有梦想到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說明全部問題，我們可以指出，在上面引用过的福尔馬尔著作中，壟断对外貿易是十分正确地作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提出来的。如果福尔馬尔不是早就从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知道了这个秘密的話，那末，就必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从福尔馬尔那里知道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內胜利的“理論”——順便說一下，这是斯大林本人从来没有詳細說明过或者提出过任何根据的一种“理論”——形成这样一种极端貧乏的和非历史的概念，即由于国家拥有自然財富，在苏联的地理範圍內就可以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根据同样的理由，你也可以这样肯定，如果地球上只有現在人口的十二分之一，社会主义就能胜利。然而，这种新理論的目的在于向社会意識灌輸一套更加具体的观念，即：革命已經彻底完成；社会矛盾将不断緩和；富农将逐步长入社会主义；不管外部世界的事态发展如何，整个发展将保持一种和平的和有計劃的性质。布哈林在試图为这种理論提供一些根据的时候宣称，这样一些事情已經肯定地得到证明，即“我們將不会由于我国有階級差別和我們的技术落后而毁灭；我們即使在这样貧乏的技术基础上也能建設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成长将緩慢得多；我們一定要以烏龟速度向前爬行；无论如何，我們正在建設这种社会主义，而且我們一定要建成。”我們注意到“即使在一种貧乏的技术基础上建設社会主义”这个公式，同时我們再一次回想起年輕时的馬克思的天才直觉：在低技术的基础上，“匱乏只会普遍化，而由于匱乏，爭取滿足需要的斗争将重新开始，一切旧的欺詐行为必然重新盛行。”

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左翼反对派对烏龟速度理論提出了如下的修改意見：“如果认为在資本主义包圍之下我們可以随便采取一种速度向社会主义前进，那将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錯誤。我們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只有在我国工业同先进的資本主义工业之間的差距不再扩大而显而易见地縮小的条件下才

有保证。”斯大林振振有詞地宣布說，这种修改意見是对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內胜利的理論进行“隱蔽的”攻击，他坚决地否定了把国内建設速度同国际发展条件联系起来的傾向。根据全会的速記记录报告，他的原話是这样的：“誰要是在这里抓住国际因素不放，就是不了解問題的形式。他不是由于不了解而混淆了問題，就是故意要混淆問題。”反对派的修改意見被否定了。

但是，在强大的敌人的包圍之下，在貧乏的基础上用烏龟速度来建設社会主义的幻想，是不能长期經受住批評的打击的。同年十一月，第十五次党代表會議在报刊事先沒有发表一点准备言論的情况下就承认了，需要“一个相对地來說〔？〕最短的历史时期来赶上然后超过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无論如何，左翼反对派在这里是被“超过了”。但是，昨天的烏龟速度理論家們既然提出了“在一个最短时期內”赶上并超过全世界这个口号，那就是向苏維埃官僚那样盲目害怕的那个国际因素屈服了。这样，在八个月的时間里，斯大林主义理論的第一个最純粹的說法就被取消了。

左翼反对派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秘密散发的一个文件中写道：社会主义必須在一切領域不可避免地“超过”資本主义，“但是，現在的問題不是社会主义同一般資本主义的关系的問題，而是苏联的經济发展同德国、英国和美国比較的問題。怎样理解‘最短历史时期’这几个字呢？一系列的未來五年計劃將使我們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內，資本主义世界將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你們承认資本主义在几十年的时間內有重新繁荣的可能，那末，談論在我們的落后国家建設社会主义就是可怜的廢話。这样，也就有必要說：我們过去把整个时代估計为一个資本主义腐朽的时代是錯誤的。这样，苏維埃共和国也將证明，它是巴黎公社以来在无产階級专政方面的第二次試驗，虽然更广泛，更富有成就，但毕竟是一次試驗……然而，对于我們的整个时代，对于十月革命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环节的意义，有沒有任何严肃的理由

重新进行这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考虑呢？沒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或多或少比較完全地度过其复兴时期〔战后〕的时候，……它們也在日益复活，而且正在以无比尖銳的形式恢复战前一切旧的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我們正在建設社会主义，这是事实。然而，更大的、一点也不小的事实——因为一般說来，全部总大于局部——是欧洲和世界的革命都在准备中。局部只有同全部結合在一起才能取得胜利。……欧洲无产阶级开始夺取政权所需要的時間，远比我們在技术上赶上欧美所需要的時間短得多……同时我們还必须系統地縮短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劳动生产率之間的差距。我們越向前进，可能遭到低价商品干涉并进而遭到武装干涉的危險就越小……我們把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得越高，我們就越能真正加速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这种革命就能更快地把世界技术供給我們，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也就能作为欧洲和世界建設的一部分而更真实地向前迈进。”这个文件像其他文件一样，一直沒有得到回答——除非是把开除出党和逮捕当作对它的回答。

烏龟速度的想法放棄以后，与此有关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想法也必须否定了。然而，用行政手段消灭富农的作法却給予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內胜利的理論以新的支持。一旦阶级“基本上”被消灭了，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基本上”建成了（一九三一年）。从本质上說，这个公式恢复了在“貧乏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我們記得，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位官方記者解釋說，嬰兒沒有牛奶喝是由于缺少奶牛，而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缺点。

然而，对劳动生产率的关心，使人們不能长期依靠一九三一年的这些安定人心的公式，因为这些公式本来是对全盘集体化所造成的灾难的一种精神上的补偿。斯大林在談到斯达汉諾夫运动时出乎意料地宣称，“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貧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許拉平各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这是不对的。……其实，社会主义……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

生产率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①完全正确！然而，与此同时，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新团綱——一九三六年四月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取消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后剩余的一点政治权利——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作了这样明确的规定：“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了。”誰也不耐烦去調和这些互相矛盾的概念。每个概念都是按照当时的要求散布出来的。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誰也不敢批評。

发言人在代表大会上解釋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团綱的必要性时这样說：“旧团綱中有一个非常錯誤的反列宁主义的說法，即俄国‘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团綱上的这一点基本上是錯誤的。它反映了托洛茨基主义观点。”而这正是斯大林到一九二四年四月还在保卫的观点。除此以外，还有一点一直得不到解釋，即一九二一年由布哈林起草而在列宁参加下由政治局慎重通过的一个团綱，十五年以后怎么会变成“托洛茨基主义”，并且必須修改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但是，合乎邏輯的辯論对利害攸关的問題是无能为力的。官僚既然摆脱本国无产阶级而赢得了独立，它就不能承认苏联必須依靠世界无产阶级。不平衡发展法則已經使資本主义的技术和财产关系之間的矛盾粉碎了世界鏈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落后的俄国資本主义是第一个为世界資本主义的破产付出代价的資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法則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是由**联合**发展法則来加以补充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崩潰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說，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跳到先进国家前面去了。然而，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同不相称的技术和文化水平发生了抵触。十月革命本身是高度世界生产力和資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間的矛盾的产物，而它自己却产生了低民族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間的矛盾。

說实在的，苏联的孤立并没有产生人們本来所怕的那些具有

^① 參見《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 641—642 頁。——中譯者注

直接危險的後果。資本主義世界太散漫混亂，癱瘓無力，因此它不能充分發揮它的潛力。事實證明，“喘息時機”比有眼光的樂觀主義者所敢希望的還要長些。由於孤立，由於即使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對外貿易額從一九一三年以來已經減少了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也不能使用世界經濟資源，結果不僅使軍事防禦費用浩大，而且使生產力的分布極端不利，群眾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但是，孤立和落後所產生的一個更加有害的產物卻是官僚主義這條章魚。

革命所建立的法律和政治準則對落後的經濟起了一種進步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這些準則本身卻受到那種落後所發生的消極影響。蘇聯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時間越長，社會結構的蛻化也就越深。長期孤立的不可避免的結局，不是民族共產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復辟。

如果說，資產階級不可能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那末，同樣真實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也不可能和平地溶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擺在歷史日程上的，不是“一個國家”的和平的社會主義發展，而是接連不斷的世界動亂：戰爭和革命。在蘇聯的國內生活中，動亂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官僚在爭取實現計劃經濟的鬥爭中被迫使富農非富農化，那末，工人階級在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就會被迫使官僚非官僚化。後者的墓碑將刻上這樣的墓志銘：“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理論在此長眠。”

蘇聯的“友人”

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第一次給予國外的報刊一種鼓舞，不過不是給予可尊敬的右派報刊，而是給予左派和極左派的報刊。人民群眾對偉大的革命的同情正在非常巧妙地被導入蘇維埃官僚的磨坊。“同情的”西方報刊無形中正在日益喪失那種發表使蘇聯統治階級感到不安的東西的權利。凡是克里姆林宮所不喜歡的書籍，這種報刊都惡意地只字不提。振振有詞而毫無價值的辯解文章則

用許多国文字出版。本书从头到尾避免引用官方“友人”的专著，宁願参考粗糙的原始資料而不願使用老一套的外国解釋。然而，这种“友人”的作品，包括共产国际的作品——这是其中最愚蠢最庸俗的部分——却汗牛充栋，在政治上起了并不是最小的作用。我們必須用最后几頁結束語的篇幅来加以論述。

目前对思想宝庫的主要貢獻，据說是韦伯夫妇的著作《苏維埃共产主义》。这两位作者不提取得了什么成就和已經取得的成就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而用一千二百頁的篇幅來說明办公室中所想的所說的東西或者法律中所說明的東西。他們的結論是：种种設計、計劃和法律實現以后，共产主义在苏联就實現了。这就是这本令人感到沉悶的、重述莫斯科官方报告和莫斯科报刊上周年紀念文章的書的內容。

对苏維埃官僚的友誼并不是对无产階級革命的友誼，相反，这种友誼正是妨碍无产階級革命的。韦伯夫妇固然随时可以承认，将来某个时候共产主义制度一定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但是，如何扩展、何时扩展、扩展到什么地方、有什么改变，以及究竟是通过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渗透，或者甚至是有意識的模仿，这些都是我們不能回答的問題。”这种拒絕回答的外交詞令——或者，实际上，这种直率的回答——最好地說明了这些“友人”的特点，同时也說明了他們的友誼的实际价值。如果一九一七年以前，即对革命問題作出回答更要难得无可比拟的时候，每个人的回答是这样的，那末，在今天的世界上就不会有苏維埃国家，同时这些英国“友人”的友情也就会寄托到別的東西上去了。

韦伯夫妇好像不言而喻似地說，欧洲在最近的将来沒有发生革命的希望，他們并由此得到一种寬慰的证据，說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內胜利的理論是正确的。在把十月革命当作一件完全出乎意料而且感到不愉快的事件的那些人們的授权之下，这一对夫妇教导我們說，在不存在其他前景的情况下，有必要在苏联的范围以內建設社会主义社会。这真使人难以抑制得住无礼地耸耸肩！实际

上，我們同韦伯夫妇的爭論并不是有沒有必要在苏联建立工厂和在集体农庄使用矿物肥料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必要在英国准备革命和如何准备革命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这两位博学的社会学家回答說，“我們不知道。”当然，他們认为这个問題是同“科学”冲突的。

列宁非常痛恨自以为是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保守分子，特别是英国的費边社成員。从《列宁全集》所附的年表中不难看出，列宁在其积极活动的整个一生中对韦伯夫妇始終保持一种强烈敌对的态度。一九〇七年他第一次提到韦伯夫妇时写道，他們是“英国实利主义的愚蠢的頌揚者”，他們“企图把宪章运动即英国劳工运动的革命时代說成是純粹儿戏”。然而，如果没有宪章运动，就不会有巴黎公社。如果这两者都没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韦伯夫妇在苏联所看到的只是行政机关和官僚計劃。他們沒有看到宪章运动，沒有看到共产主义，也沒有看到十月革命。對他們來說，今天同过去一样，革命如果的确不是“純粹儿戏”的話，至少还是一种背道而馳的和应当敌視的事情。

大家知道，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論战当中是不屑于注意上流社会的風度的。但是，他的罵人綽号（“资产阶级走狗”、“叛徒”、“舐皮靴之流”）許多年来却恰如其分地描繪了韦伯夫妇的形象——費边主义的福音使徒，即对現存事物采取傳統的尊敬和崇拜态度这样一种福音使徒。韦伯夫妇的观点近年来談不上有什么突然的改变。这两个人在战争期間是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后来还接受了英王加封的帕斯菲尔德勋爵的称号。他們在信奉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而且是外国——胜利方面并没有拋棄什么，也絲毫沒有改变。悉尼·韦伯担任殖民大臣——即英帝国主义的獄吏头目——正是在他的一生中日益亲近苏維埃官僚、接收苏維埃官方材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写出那部两卷巨著的时候。

一直到一九二三年，韦伯夫妇还看不出布尔什維主义和沙皇主义之間有什么重大的差別（例如，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資本主义

文明的衰落》)。然而，現在他們完全承認斯大林政權是“民主制度”了。用不着在這裡找什麼矛盾。費邊社分子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取消了“有教養的”社會的行動自由感到憤慨，可是對於官僚取消了無產階級的行動自由則認為完全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難道這不一直是勞工官僚的職能嗎？例如，韋伯夫婦發誓說，在蘇聯完全可以自由批評。對於這些人不能指望有什麼幽默感。他們是十分嚴肅地提到那個臭名遠揚的“自我批評”的，而這種批評是作為每個人官方義務的一部分規定的，至於其方向及其限度則總是事先確切地說出來。

天真嗎？無論是恩格斯或者是列寧，都沒有把悉尼·韋伯看成天真的人。倒不如說把他看成是可尊敬的人。畢竟這是一個已經建立的政治制度和一些殷勤好客的主人的問題。韋伯夫婦極端不贊成對現存事物的馬克思主義批評。他們自認為是來維護十月革命的遺產而不許左翼反對派來侵犯的。為了說得全面些，我們要指出，在工黨政府時期，帕斯菲爾德勳爵（即悉尼·韋伯）曾擔任大臣，這個政府拒絕發給本書作者進入大英帝國的簽證。這樣看來，當時正在寫關於蘇聯的書的悉尼·韋伯，理論上是維護蘇聯、使它免遭危害的，而實際上維護的卻是英王陛下的帝國。公平地說，在這兩種情況下，他都是忠實於自己的。

* * *

對於許多文章藝術一無所長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來說，一種官方認可的對蘇聯的“友誼”乃是一種靈魂高尚的證書。互濟會或和平主義俱樂部的會員資格同“蘇聯之友”社的會員資格有很多相似之處，因為它們都可以使人們同時過兩種生活：一種是俗世利害圈子裡的日常生活，一種則是使靈魂提高的精神生活。這種“友人”不時地訪問莫斯科。他們在回憶中記下來的是拖拉機、托兒所、少先隊、檢閱、降落傘姑娘——一句話，甚么都有，就是沒有新貴族。其中最好的人之所以閉眼不看這一方面，是由於對資本主義反動具有一種敵對的情緒。安德烈·紀德^①坦率地承認這一點：“對蘇

联进行的愚蠢而不诚实的攻击，使我们现在抱着某种顽固的心情维护它。”但是，敌人的愚蠢和不诚实并不能为自己的盲目辩护。无论如何，劳动群众需要的是英明的友人。

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和属于社会主义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之所以盛行同情苏联统治阶层，是有其并非不重要的原因的。在职业政治家的圈子当中，尽管政纲各有不同，对于诸如已经取得或者可以容易取得的“进步”采取友好态度的人却总是占优势。世界上的改良家总比革命家多得多，顺应环境的人总比不妥协的人多得多。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群众行动起来的时候，革命家才从孤立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而改良家才变得更像离开了水的鱼一样。

在目前的苏维埃官僚当中，没有一个人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甚至在这以后相当一个时期，认为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不是一种空想（当时这种“空想”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老一代的外国“友人”几十年来一直认为俄国的孟什维克是真正的政治家，因为他们主张同自由派结成“人民阵线”，而否定专政的概念，认为专政是极度疯狂的做法。专政已经建立，甚至被官僚弄糟以后，再来承认专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这正是这些“友人”心里所想的。他们现在不仅尊敬苏维埃国家，而且甚至保卫它，防范敌人——防范那些留恋过去的敌人，当然更要防范那些正在准备未来的敌人。如果这些“友人”是积极的爱国者，像法国、比利时、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改良主义者那样，那末，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用关心维护苏联来掩饰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不情愿地变成失败主义者，像昨天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爱国者那样，那末，他们就会希望法国同苏联的联盟可以帮助他们同希特勒或者舒斯尼格^②和解。莱翁·勃鲁姆曾经是布尔什

①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法国作家。三十年代初期写《从苏联归来》一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法西斯分子。——中译者注

② 舒斯尼格(Kurt von Schusnigg,1897—),奥地利政客,一九三四年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同希特勒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希特勒关入集中营,战后逃往美国。——中译者注

維主义在其英雄时代的敌人，曾經在《人民报》上特辟一栏明确地以公开攻击十月革命为目的，而現在却没有一句話来揭露苏維埃官僚的真正罪恶。正像《聖經》上的摩西由于急于想見耶和華的面孔而只被容許向圣体的背后膜拜一样，可尊敬的改良主义者，即既成事实的崇拜者，对于革命也只能了解和承认它的肥胖的官僚屁股。

目前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本质上也属于这一类型。經過了一系列猴子似地跳跃和扮苦臉以后，这些“领导人”突然发现了机会主义的莫大好处，并且以他們特有的无知所固有的那种新鮮勁头抓住了机会主义。单是他們对克里姆林宮上层集团的奴性十足的和并不总是无私的叩头这一点，就使他們絕對不能具有革命的主动精神。他們对尖銳的論据作出的回答只不过是咆哮和狂吠；不仅如此，他們还在主子的鞭子下面搖摆他們的尾巴。这个最沒有吸引力的集团在危險的时刻将会烟消云散，而現在竟把我們当作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虽然有其严肃的性质，但也难免偶尔演出一出滑稽戏。

比較誠实或者睜开眼睛的“友人”，至少在秘密交談的时候承认，苏維埃太阳上有黑点。但是，他們用宿命論的分析代替辯证法的分析，用这样一种思想来安慰自己，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某种”官僚蜕化从历史上看是不可避免的。就算是这样吧！对这种蜕化的反抗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种必然性有两个終点：一个是反动的，另一个是进步的。历史教导我們，个人和政党如果站在一种必然性的两个相反的終点，长此下去，就会站在壁垒的两个相反的方面。

这种“友人”的最后一个論据是，反动派将抓住对苏維埃政权的任何批評。这是毫无疑問的！我們可以假定，反动派将試圖从本书中为自己撈到一点什么东西。难道有什么时候不是这样嗎？《共产党宣言》曾以嘲笑的口吻提到这个事实，即封建反动曾試圖利用社会主义批評的箭来反对自由主义。这种做法并没有能够阻止革

命的社会主义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这种做法同样也不能阻止我們。的确，共产国际的报刊竟至于断言我們的批評是在为軍事干涉苏維埃进行准备。这种說法显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从我們的著作中了解了苏維埃官僚的蜕化以后，将立即装备一支討伐軍来为被踐踏的十月革命原則报仇！同共产国际論战者并不是用利劍来武装的，而是用嘴巴或者其他更不厉害的工具武装起来的。实际上，实事求是的馬克思主义批評只能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提高苏維埃外交的持久信誉。

对于工人阶级及其在知识分子当中的忠实战士，則不相同。我們这本著作的确会引起怀疑和不信任——不是对革命，而是对革命的篡夺者。但这正是我們自己規定的真正目标。进步的动力是真理而不是謊言。

